

## 孫子兵法研究史

### 目錄

#### 緒言

- 第一篇 《孫子兵法》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 第二篇 《孫子兵法》研究發軔時期——戰國
- 第三篇 《孫子兵法》初期校理時期——秦漢
- 第四篇 《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
- 第五篇 《孫子兵法》的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
- 第六篇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
- 第七篇 《孫子兵法》疏解闡發時期——明代
- 第八篇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
- 第九篇 《孫子兵法》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
- 第十篇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 第十一篇 《孫子兵法》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世紀至19世紀
- 第十二篇 《孫子兵法》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世紀
- 第十三篇 20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理論研究
- 附錄一：“孫子兵法八十二篇”證偽
- 附錄二：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知見錄

### 全文目錄

#### 緒言

- 一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
- 二 中國歷代《孫子兵法》研究的內容及特點
- 三 影響中國《孫子兵法》研究發展的因素
- 四 《孫子兵法》在國外流傳概述

#### 第一篇 《孫子兵法》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 一 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與成書，學界眾說紛紜。我們認為，此書的作者應為孫武，其後學曾對之進行過校
- 二 《孫子兵法》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對上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戰爭經驗的總結；對已有
- 三 《孫子兵法》軍事思想博大精深，按照簡易原則，大致可將其概括為戰爭觀、戰略戰術原則和軍隊建設三個

#### 第二篇 《孫子兵法》研究發軔時期——戰國

- 一 戰國時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孫子兵法》不但成功地指導了當時的軍事實踐，而且非軍
- 二 《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得到了廣泛運用，豐富多彩的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實踐充實發展了孫子伐謀、伐交
- 三 《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廣為傳播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論適應了當時社會鬥爭的需要，我們從中可以得到有益

### 第三篇 《孫子兵法》初期校理時期——秦漢

- 一 《孫子兵法》在秦朝受到禁錮，但在社會上仍有流傳，並為農民起義提供過理論武器；以《六韜》、《三略
- 二 西漢和平時期統治者內部對《孫子兵法》高度重視，對外宣傳上卻極力貶斥之；西漢對兵書的三次編訂，對
- 三 《孫子兵法》原本十三篇，但漢代另有八十二篇圖九卷本流傳；銀雀山出土漢簡《孫子兵法》有重要文獻價
- 四 從兩漢時期存世文獻看，漢人注意了對《孫子兵法》思想的闡發；其對孫子其人其書的評介對後世有較大影
- 五 兩漢時期重視對《孫子兵法》的實際運用，在戰略籌畫、作戰指揮等方面有較高成就

### 第四篇 《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

- 一 魏晉南北朝是《孫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時期，《孫子略解》是進入這一時期的里程碑；這一時期的孫子注為
- 二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兵書側重於軍事上的實際應用，其中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某些思想；一些文學作
- 三 《孫子兵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較兩漢倍受重視；其軍事理論被廣泛運用到作戰指導和軍隊建設之中，從而

### 第五篇 《孫子兵法》的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

- 一 孫武在隋唐五代時期大致處於兵學“亞聖”的地位，但《孫子兵法》的理論價值實際上被視為當時諸兵書之
- 二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時期，注解的內容和形式均有創新
- 三 一些兵學著述大都以《孫子兵法》為宗，同時吸收總結了當時的新鮮經驗，因而繼承發展了《孫子兵法》的
- 四 一些非軍事著作中也載有《孫子兵法》的內容，透露了此書在不同階層和領域流布的資訊；《孫子兵法》在
- 五 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軍事實踐方面頗多建樹，唐代作戰指導藝術堪稱為冷兵器時代的一個高峰

## 第六篇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

- 一 宋代《孫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成蕭條、復興和以應用研究為主三個階段
- 二 宋代《孫子兵法》研究成果甚多，編校刊行《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家孫子會注》是其對孫子研究做
- 三 宋人研究《孫子兵法》的主要特點是：文獻研究成績突出，軍事理論研究進展不大；對《孫子兵法》推崇與
- 四 元代立國時間較短，但在《孫子兵法》研究和運用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成績

## 第七篇 《孫子兵法》疏解闡發時期——明代

- 一 明代《孫子兵法》研究文獻數量眾多，形式豐富，特色明顯
- 二 明代在建軍治軍方面對《孫子兵法》的繼承和發展主要體現在精兵與良器並重上，其要點是選練精兵，培育
- 三 明代在國防戰略與作戰指導上對《孫子兵法》的繼承與發展：建立大縱深、多層次的國家防禦系統；辯證認
- 四 科技進步，政治間歇性穩定，經濟相對繁榮，對科舉考試與軍事教育的重視，民族憂患意識等，是明代孫子

## 第八篇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

- 一 清代《孫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為清初武闡研究、中期考據研究和晚清休眠與再造三個發展階段
- 二 孫子兵學內部結構和方法，當時的武舉制度，哲學文化，軍事科技水準和戰爭實踐是制約清代孫子研究發展
- 三 清代孫子研究是中國古代孫子研究的最後一個發展時期，近代以來，傳統的兵學體系經過再造，被納入了近

## 第九篇 《孫子兵法》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

- 一 民國《孫子兵法》研究，在與西方軍事思想的融合中，從內容到形式均有所創新，為古代孫子兵學向現代“
- 二 民國間《孫子兵法》被廣泛應用，驗證了其在近現代戰爭中的指導作用，同時也展示了在非軍事領域的借鑒
- 三 民國間豐碩的研究成果和國際交流的開展，不僅為《孫子兵法》的研究注入了活力，也為孫子學的建立奠定

## 第十篇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 一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三個階段，並呈
- 二 《孫子兵法》的思想、原理被廣泛運用到社會生活領域，《孫子兵法》的非軍事應用研究成為孫子學的一個

三 《孫子兵法》研究形成系統的內容體系，學科建設取得長足進步，孫子學得到確立

#### 第十一篇 《孫子兵法》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 世紀至 19 世紀

一 《孫子兵法》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唐玄宗年間由吉備真備帶回日本，但另說早在唐高宗年間或以前朝鮮

二 《孫子兵法》傳入日本後作為秘密的珍藏書並未迅速傳播，直至戰國時代才公開運用，到了江戶時期《孫子

三 迄 19 世紀末，日本千餘年來研究《孫子兵法》的特點表現為：初期有神秘主義色彩；江戶時代空前活躍，

四 1772 年法國傳教士阿米奧將《孫子兵法》譯成法文並在巴黎出版，法譯本成為第一個西方文字的《孫子

#### 第十二篇 《孫子兵法》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

一 20 世紀初《孫子兵法》英譯本相繼問世，其中賈爾斯的譯本成為西方文字譯本的佳作；該世紀上半葉日本

二 20 世紀下半葉，美國出版了多種不同的《孫子兵法》英譯本，其中格裡菲思的英譯本影響最大，索耶所譯

三 以《武經七書》為理論依據，探索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和大戰略

#### 第十三篇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理論研究

一 重視對“詭道”、“先知”等兵學概念的研究與應用，認為“詭道”是現代軍事欺騙學的先驅；“先知”則

二 《孫子兵法》在戰略研究中的應用：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戰略論》；以《孫子兵法》批判“相互確保

三 《孫子兵法》在現代軍事領域中的研究與應用：1982 年美國陸軍《作戰綱要》；1921 年起美國的一

四 《孫子兵法》在非軍事領域中的研究與應用：二戰結束後，日本率先將《孫子兵法》用於商戰；歐美國家與

附錄一：“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證偽

附錄二：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知見錄

研究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首先瞭解這門科學過去和現在的研究狀況。否則，就不知道前人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借鑒古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不瞭解當前這門科學的前沿性問題，也就談不上在已有的基礎上取得新的進步。從事《孫子兵法》研究，也是如此。

## 緒言

眾所周知，研究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首先瞭解這門科學過去和現在的研究狀況。否則，就不知道前人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借鑒古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不瞭解當前這門科學的前沿性問題，也就談不上在已有的基礎上取得新的進步。

從事《孫子兵法》研究，也是如此。初學者欲入門，專門家要創新，流覽者希望讀有所得，都應首先瞭解《孫子兵法》研究的歷史。

### 《孫子兵法研究史》：兵學發展史文獻

早在 1990 年，我們編撰《孫子學文獻提要》時，就商定，在此基礎上，編撰一本《孫子兵法研究史》。此後，雖發表了多篇這方面的研究論文，但終因其他事情繁多和一些其他原因，而未能將其整理成書。現在總算稍微輕鬆了一點，經和一些同志共同努力，終於將其編撰成冊，也算了卻了多年的一樁心願。

眾所周知，研究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首先瞭解這門科學過去和現在的研究狀況。否則，就不知道前人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借鑒古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不瞭解當前這門科學的前沿性問題，也就談不上在已有的基礎上取得新的進步。

從事《孫子兵法》研究，也是如此。初學者欲入門，專門家要創新，流覽者希望讀有所得，都應首先瞭解《孫子兵法》研究的歷史。

《孫子兵法》研究史是中國兵學發展史的一條主線。要研究中國兵學發展史，也必須首先抓住《孫子兵法》研究史這個綱。

我們編撰《孫子兵法研究史》的目的，正在於此。

## 一、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1)

孫子兵法研究史屬學術研究專史。對這種學術研究專史的分期，應主要依據其自身發展的階段去分，同時兼顧其他性因素，如社會形態、朝代起止等。據此，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 7 個時期。

### (一) 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于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

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西元前 512 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密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臆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 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 201 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僕“摺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這裡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餘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誌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注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

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淩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從目前所見到的這一時期的注解內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解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注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

## 一、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2)

### (四)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于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注解的新水準，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注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

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于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于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闡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蹟、《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

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啓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誌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 一、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3)

### (七) 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注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征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闢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闢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範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 二、中國歷代《孫子兵法》研究的內容(1)

### 中國歷代《孫子兵法》研究的內容及特點

我國從古至今的《孫子兵法》研究，不斷前進、拓寬和深化，逐步形成了一門有獨立的研究物件，系統的研究內容，豐碩的研究成果，多樣的研究形式，在社會實踐中有重大應用價值的專門的學問。探討歷代研究《孫子兵法》的內容及特點，多有可供今人借鑒之處。

### (一) 中國歷代研究《孫子兵法》的內容分類

中國歷代研究《孫子兵法》的內容相當廣泛，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目錄類研究：即史書藝文志、經籍志、公私書目、引用書目等文獻中關於《孫子兵法》的研究和記載。其中又可分為純目錄性和解題性兩類。

校勘類研究：即對《孫子兵法》文字進行校勘方面的研究。此類內容多體現

于《孫子兵法》不同版本中，但亦有專門論述。

注釋類研究：即對《孫子兵法》加以訓詁注解方面的研究。民國以前的孫子書大量的屬於此類。其中又包括義注、考注、評注、斷注、體注、集注、箋注、約注、詳解、說注、句注、眉注、段注、頁下注、篇末注等。

闡發類研究：即闡述發揮《孫子兵法》思想方面的研究，包括講義、引類、參同、史證、概論、淺說、應用引伸等。它們又可分為綜合系統闡發和專題闡發、軍事思想闡發和非軍事思想闡發等不同類別。

應用類研究：將《孫子兵法》應用於軍事、外交、管理等不同領域的研究。

翻譯類研究：即將《孫子兵法》等文獻譯成現代漢語、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外國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考證類研究：即對《孫子兵法》及其作者、成書年代等問題考證、辨偽等方面的研究。

傳記類研究：即關於孫子生平事蹟方面的研究。

輯佚類研究：即關於《孫子兵法》佚文考辨、輯錄、注解等方面的研究。

近代以來，《孫子兵法》的研究內容又有所拓展。概而言之，孫子兵法研究包括關於孫子其人其書的文獻性研究、《孫子兵法》軍事理論研究和《孫子兵法》非軍事應用研究三個主要組成部分。

關於孫子其人其書文獻性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孫子兵法》作者及成書；《孫子兵法》版本流傳；《孫子兵法》文字校勘；《孫子兵法》注釋、通解及翻譯；有關孫子文獻的整理與編纂等。

《孫子兵法》軍事理論研究，包括《孫子兵法》自身軍事理論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兩部分內容。前者主要研究《孫子兵法》本身所包含的軍事思想，包括它的戰爭觀、戰爭指導思想、戰略戰術思想、治軍思想、軍事哲學思想、軍事倫理、軍事心理、軍事經濟、軍事地理思想等。後者則是介於《孫子兵法》自身理論研究和實踐之間的一種更直接指導實際鬥爭的理論研究，如《孫子兵法》與當代國際戰略，《孫子兵法》與現代高技術戰爭，《孫子兵法》與核威懾理論，《孫子兵法》與現代局部戰爭，《孫子兵法》與軍隊管理等。它的突出特點是將《孫子兵法》所闡述的原則具體化為便於當代實行的方法。

《孫子兵法》的非軍事應用研究是指將《孫子兵法》的某些軍事原則應用到軍事領域以外的其他社會領域，以指導人類和平建設為目的的研究，如經營管理、市場競爭、醫療衛生、體育競技、教學藝術、演講技巧等。

## （二）中國《孫子兵法》研究發展的主要特點

縱觀我國研究《孫子兵法》的歷史，就可發現其存在著尊奉與貶斥並存、興衰與治亂相背、祖述與創新兼有、研史與論略相成、高深與普及並重、書生與武人共論等特點。

尊奉與貶斥並存。從戰國時起，各代對《孫子兵法》就既有尊奉者，又有貶斥者，二者並行不悖。如《荀子·議兵篇》中記載的臨武君就唯孫子是奉，而荀子則對其持貶斥態度。漢代一些學者將“孔氏之道”與“孫吳之術”對立起來，

對戰國以來出現的“先詐力而後仁誼（義）”的社會思潮進行了清算；但同時官方又高度重視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兵書的整理和校閱。宋代出現了尊奉與貶斥孫子兩個截然相反、並峙而立的高峰，尊之者奉之為“武經”，貶之者斥之為“盜術”。這種爭論流風所及，至明、清而不衰。

興衰與治亂相背。即《孫子兵法》研究逢亂世而興，遇治世則衰。中國歷代和平時期大都會出現“士大夫恥言兵”的情況，《孫子兵法》研究蕭條，兵學著述甚少，或應景者多，有價值者少，浮躁者多，深入研究者少；而每逢戰亂時期，孫子研究就興盛，兵學著述就繁榮。如秦漢時期的統治者對《孫子兵法》內尊而外貶，甚至實行禁錮政策；唐朝自高宗至玄宗前，宋朝自太祖後至仁宗前，均曾出現兵學蕭條景象。而戰國時期、三國時期、唐安史之亂後至滅亡，宋仁宗之後至南宋亡，民國等時期，則都言兵者甚多，兵學著述傳於世者亦繁，有價值者也較多。這一歷史現象昭示後人：修文亦須尚武，治世休恥言兵。

祖述與創新兼有。中國歷代研究孫子，注釋、闡發者居多，其間亦有創新。如對虛實、奇正、速久、形、勢等軍事範疇的注釋與闡發，隨著社會的進步，不斷被注入新的內容。但總的看，由於中國長期處於封建專制社會形態之中，生產力發展緩慢，軍事技術進步遲滯，人們在觀念上重傳統而多保守，閉關鎖國，缺少交流，因此，人們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多祖述而少創新。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大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西方兵學理論湧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兵學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對傳統兵學理論進行重塑，才使之出現了新的飛躍。

## 二、中國歷代《孫子兵法》研究的內容(2)

研史與論略相成。中國歷代兵學家強調研究兵法要與研究軍事歷史相結合，為提高謀略水準而研究歷史，研究歷史為提高謀略水準服務，史與略結下了不解之緣。故其注釋、闡發《孫子兵法》都列有大量史例，講軍事史者，也必以《孫子兵法》軍事理論為指導。所列史事是對兵法謀略的例釋和闡發；而所講兵法謀略則是對史事的理論概括和昇華，二者相互為用，成為兵學家們注釋闡發《孫子兵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亦是培養造就軍事人才的不可缺少的途徑。這與西方古代重史輕理的軍事學研究傾向有很大不同。

高深與普及並重。中國歷代兵學家研究《孫子兵法》既重視深研和提高，又重視普及和實用，形成了兩者並行、相互為用的研究傳統。他們高度重視“古”為“今”用，為“今”而研“古”，對《孫子兵法》的精義既注意向高深處開掘，又注意為當代“武人”、“士子”等社會大眾服務。《六韜》、《衛公兵法》等，都可視為當時的普及《孫子兵法》之作。葉適所謂《六韜》“似為《孫子》義疏”，杜佑所說“《衛公兵法》，悉出《孫子》”等，即是指此。歷代注釋、疏解《孫子兵法》之書，大都具有提高與普及並重的特點。

書生與武人共論。中國歷史上研究、注解、闡發《孫子兵法》者，既有武人，也有書生。前者如韓信、曹操、李靖、戚繼光等；後者如張良，杜牧、梅堯臣、茅元儀、孫星衍等。武人有軍事實踐經驗，其論多有創見而可操作性強，但往往

理論性不足；書生論兵，視野開闊，學貫古今，理論水準高，但缺乏實踐經驗，正可彌補武人論兵之不足，二者互相結合，相輔相成，促進了中國歷代兵學的發展。

### 三、影響中國《孫子兵法》研究發展的因素

中國歷代《孫子兵法》研究的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孫子兵法》自身思想內容博大精深，揭示了一些軍事鬥爭的規律；有著深刻的哲理性，廣泛而長久的可鑒性；辭如珠玉，文采斐然等，是這一研究經久不衰的主觀原因。除此之外，從客觀因素看，影響其發展的，還有如下幾種：

中國歷史上次數繁多，鬥爭激烈，空間廣，樣式多的戰爭實踐，是《孫子兵法》研究不斷發展的直接因素。據《中國軍事通史》統計，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至 1911 年清朝滅亡，發生戰爭和武裝衝突達 6000 多次。不同時期不同樣式的戰爭實踐，迫切需要先進的軍事理論作指導，步戰、車戰、騎戰、水戰、冷兵器條件下的作戰，火器條件下的作戰，不同兵種合同作戰等，都需要相應的作戰理論指導。《百戰奇法》等，就是這種需求的產物。這種迫切的不間斷戰爭的需求，直接推動了《孫子兵法》研究的發展。

以農業生產為主，多種生產方式共存的經濟模式，是影響《孫子兵法》研究發展的基本因素。中國歷史上的中原地區以農耕為主，周邊民族則以遊牧、漁獵等為主。許多戰爭都是緣於這方面的利益衝突而起。所以，爲此而服務的軍事理論就比較發達。中國中原地區的兵學家們重視研究陸戰而忽略海戰，重視塞防而疏於海防，強調防禦而短於進攻，安土重遷，比較保守等，均與此有關，由此而影響到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和闡發。這種狀況直到近代才逐步有所改觀。另外，生產力的發展速度，軍事技術更新的快慢等，也制約著軍事理論的提高。

長期的、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是影響《孫子兵法》研究發展的政治因素。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大都以天朝自居，比較封閉，自我欣賞有餘，納異心態不足，與外界交流不夠；統治者在治國理軍、戰爭指導等方面有一套與其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原則，如軍權高度集中，禦將於戰場之上，實行愚兵政策，主張“逆取”“順守”，和平時期限制甚至禁錮兵學研究，重視內部敵對勢力甚於重視外部之敵等。這種封建專制條件下的政治必然影響制約著《孫子兵法》研究的發展，歷代注釋、闡發《孫子兵法》的觀點言論大都與這些原則相適應。

幅員遼闊、地形多樣、“四塞之國”等，是影響《孫子兵法》研究發展的地理因素。中國國土遼闊，且平原、山林、沙漠、江海湖泊等地理條件都有，兵學家們在論述軍事問題時，必須考慮其理論指導在不同地理條件下的普遍適用性；同時還要考慮到根據不同的地理條件靈活運用《孫子兵法》的作戰指導原則，因而派生出一系列專門的兵學著述。另外，中國北有大漠，南有峻嶺，西有高原，東臨大海，這種封閉的地理環境，容易培養國人的閉塞心態，這是中國兵學理論體系在封建社會長期未能突破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狀況直到近代以來隨著交通

工具的進步和資訊傳播手段的發展才有所打破。

各時期不同學派思想的互相鬥爭和融合，是影響《孫子兵法》研究發展的文化因素。《孫子兵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驕子，它博取各家精華而自成一家。後世研究《孫子兵法》者也自然會受到當時學術思潮的影響。如漢代的黃老刑名之學，唐代的尊崇道家之風，宋代的理學，明代的心學，清代的考據學等，對《孫子兵法》研究均產生過浸潤作用。歷代兵學家們在注釋疏解《孫子兵法》的方式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當時儒家注經方式的影響。至於中華民族長於統體思維、短於分析思維，長於辯證思維、短於邏輯思維，長於象類頓悟、短於嚴格論證的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和發展都產生了潛指導作用。

影響和制約《孫子兵法》研究與流傳的，還有科學技術上的原因。兵器等軍事技術的發展變化影響《孫子兵法》研究的進步，是不言而喻的。另如造紙術、印刷術等書籍製作業的出現，書籍保管與發行技術的進步等，也對《孫子兵法》研究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 四、《孫子兵法》在國外流傳概述(1)

《孫子兵法》在國外流傳也相當廣泛，其中以傳入朝鮮半島為最早，研究成果以日本為最多，軍事應用以美國為最突出。據日本兵學家佐藤堅司稱，早在 663 年前，百濟的兵學家就將《孫子兵法》帶到了日本。這說明，《孫子兵法》在此前就已傳入了朝鮮半島。西元 716 年，日本吉備真備(693~775)來唐留學，735 年回國，將《孫子兵法》等典籍帶回日本，並在軍隊中傳授，此後這一研究在日本經久不衰。據不完全統計，日本有不同版本的《孫子兵法》200 種左右，有些研究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如吉田松陰《孫子評注》、佐藤堅司《孫子思想史之研究》、阿多俊介《孫子之新研究》、服部千春《孫子兵法校解》等。另外，日本還藏有一些珍貴的中文《孫子兵法》版本，如宋刊《武經七書》、櫻田迪校《古文孫子》、趙本學《孫子書》等。《孫子兵法》于 1772 年被旅居北京的神父約瑟夫·阿米奧譯成法文，傳入歐洲。1905 年由在日本學習的卡爾思羅普譯成英文，後又出版了多種英譯本，其中以撒母耳·B·格里菲斯的譯本影響最大。在俄羅斯，也有《孫子兵法》譯本，如斯萊茲奈夫斯基 1860 年譯的《中國將軍孫子對其屬下將領的教誨》，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 1955 年出版的西多連科譯的《孫子兵法》俄語譯本等。除此之外，《孫子兵法》還有朝鮮文、越南文、泰國文、緬甸文、馬來西亞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捷克文、羅馬尼亞文、荷蘭文、希臘文等 20 多種不同語種的譯本。

國外對《孫子兵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日本學者尾川敬二在《孫子論講自序》中稱孫武是“兵聖”，“東方兵學的鼻祖，武經的冠冕”；福本椿水在《孫子訓注自序》中稱孫子是“兵家之神”；北村佳逸在《孫子解說自序》中稱孫子是“兵學家、哲學家，且是東方第一流的大文豪”。美國戰略學家約翰·柯林斯說：“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在《戰略論》中說：“《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內容之

全面與理解之深刻，迄今還無人超過。”俄羅斯郭泰納夫在《中國軍人魂》稱“孫子確是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軍事學家”等。可見，《孫子兵法》在世界兵學史上也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國外研究《孫子兵法》著眼於解決實際問題，不是坐而論道。他們思路開闊，善於聯想，受框子的束縛少，應用範圍廣泛，善於抓住《孫子兵法》中的精華，密切聯繫實際，常能提出出人意外的重大決策或觀點。如在戰略研究上，美國著名“腦庫”斯坦福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領導人福斯特於 1978 年 11 月向美國國防部及國務院提出了“上兵伐謀”的對蘇新戰略。曾參與這一“合作研究”的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教授三好修把它直稱之為“孫子的核戰略”。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運籌帷幄》中也提出，隨著核時代的到來，應以“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做為美國與蘇聯競爭戰略的總方針。美國著名戰略理論家、美國國防大學校長理查·勞倫斯中將在闡述《空地一體戰——縱深進攻》時，認為這一作戰原則所根據的原理是《孫子兵法》的“奇正之變”和“避實擊虛”。美軍研究軍事欺騙的專著《戰略軍事欺騙》，對《孫子兵法》中的“詭道”思想進行了研討。所謂“戰略軍事欺騙”，實際上就是對孫子“詭道”理論的發揮與發展。《美國海軍學會月刊》1995 年 11 月號刊登署名文章《中美海軍南沙之戰及中國海軍戰略戰術研究》，文章假設 2006 年中美海軍在南沙海域發生海戰。中國海軍用《孫子兵法》原理（海上遊擊戰）打敗了用馬漢海權理論武裝的美國海軍。這些研究成果均體現了其注重運用的思維特徵。

誕生於 2000 多年前的《孫子兵法》不僅登上了當代一些世界強國戰略決策的“廟堂”，而且，在其他一些領域中也被他們率先應用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早在 60 年代，日本就把《孫子兵法》引進了企業管理。日本企業家大橋武夫的《兵法經營學》，就是講述如何將兵爭戰術運用於商戰的，其中特別強調以《孫子兵法》管理企業。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史密斯自稱他的經營之道來自 2000 多年前中國的《孫子兵法》。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喬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則說：“你想成為管理人才嗎？必須去讀《孫子兵法》！”

綜上所述，《孫子兵法》研究源遠流長，曆兩千餘年而不衰。它不但在我國內影響深刻，而且在國外也廣為傳播。這一研究今後還將長期繼續下去。展望 21 世紀的《孫子兵法》研究，必將在《孫子兵法》文獻研究、《孫子兵法》軍事理論及其應用研究、《孫子兵法》非軍事應用研究這三個方面會有新的拓展和提高。高技術條件下的軍事鬥爭，同樣可以從這部產生於戟盾矛櫓時代的兵學聖典中獲得啓示。《孫子兵法》在制定國家戰略、指導局部戰爭、治國理軍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借鑒作用。不但如此，在非軍事領域，比如外交鬥爭、企業管理、競技比賽、醫療衛生等方面，人們都可從中獲得智慧。這就決定了《孫子兵法》研究將繼續深入發展。鑒古而知今，察往而知來。我們應吸取前人研究《孫子兵法》的經驗教訓，為當今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更為有效地開展《孫子兵法》研究，使之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有新的進步。

#### 四、《孫子兵法》在國外流傳概述(2)

此書除《緒言》與附錄外，恰成十三篇。書中《緒言》、第一至第六篇及附一《“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證偽》，由於汝波撰寫；第七篇季德元撰寫；第八篇皮明勇撰寫；第九、十篇及附二《1993年-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知見錄》由蘇桂亮撰作；第十一至第十三篇由潘嘉玢撰寫。全書框架由於汝波設計並統稿。書中不當之處，誠請專家及所有讀者指正。

##### 1. 《孫子兵法》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討論《孫子兵法》的醞釀產生，必須首先確定此書的作者與成書。學界對此持有不同觀點，需要我們作些辨析。另外，《孫子兵法》產生的淵源是什麼，它主要論述了哪些內容等，也是本篇需要回答的問題。

##### 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1)

一、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與成書，學界眾說紛紜。我們認為，此書的作者應為孫武，其後學曾對之進行過校理；“十三篇”成書的時間為春秋末期

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與成書，自宋以來，人們就爭論不已。概括起來，主要觀點有如下幾種：

1、成書於春秋末，孫武著。漢司馬遷《史記》、曹操《孫子略解》、明宋濂《諸子辨》、胡應麟《四部正訛》、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孫星衍《孫子十家注序》等，都持此觀點。

2、成書於春秋末，本于孫武，成于孫臏。明吳興松筠館主人在《孫子參同序》中提出這一觀點。今人陳啓天在《孫子兵法校釋》中進一步提出，“武之兵法授之於臏，臏即據之撰十三篇”。日人武內義雄亦認為十三篇不出於孫武，而出於孫臏。

3、成書於春秋末，伍子胥著。認為孫武即伍子胥，孫臏乃伍子胥之後，居阿、鄧之間，改姓孫。清人牟庭在《校正孫子》中提出這一觀點。

4、成書於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南宋葉適在《習學記言》卷四十六《孫子》中即持這一觀點。

5、成書于戰國，非孫武所著。據歐陽修在梅堯臣《〈孫子注〉後序》中稱，梅堯臣認為此書乃“戰國相傾之說”，非孫武所著。清人全祖望等贊同。

6、成書于戰國，孫臏著，孫武與孫臏為一人。中國學者錢穆與日本學者齋藤拙堂即持此說。今人金德建在《古籍叢考·孫子十三篇作于孫臏考》中亦認為《孫子兵法》的作者為孫臏。

7、不可得而知。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孫武事吳闔廬而不見於《左氏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清人姚際恒《古今偽書考》亦認為，孫武及《孫子兵法》“皆不可得而知”。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正》：“孫武之有無其人雖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孫武書則固無可疑者。”

8、“十三篇”作者是孫武，但孫武不是田書之孫，而是田無宇的長子田武子開，田乞、田書是其弟。今人田昌五先生在 1992 年山東臨沂召開的第三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提出這一觀點。

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證明《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不是一書，《漢書·藝文志》將《吳孫子兵法》與《齊孫子》分別著錄是有根據的。但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和成書問題的爭論仍未停止。李零認為，《孫子兵法》不是春秋末孫武親著，而是“孫子學派”軍事思想的記錄，成書過程大約從春秋末期的吳國開始，到戰國時的齊國，經過長期整理于戰國中期成書，其中不能排除孫臏參與了對此書整理的可能性。郭化若認為，《孫子兵法》是孫武的門徒等根據孫武的著述整理而成，其思想體系屬於孫武，成書時間大概在春秋末至戰國初。楊丙安、陳彭則認為，《孫子兵法》奠基於春秋，基本完成于戰國，定型于秦漢。

我們認為，《孫子兵法》應為孫武所著，在春秋末期既已成書。其後學雖曾對之進行校理，但這種校理是在《孫子兵法》已經成書的基礎上進行的。

明確記載《孫子兵法》作者與成書時間的，是《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其中講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闔廬三年（前 512 年），吳軍在攻克楚城舒（治今安徽廬江縣西南）後，就想攻打楚國都城郢（在今江陵西北），“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同書《伍子胥列傳》中有相同記載。這些記載告訴我們：《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武，他在西元前 512 年攻楚之前即已為吳國“將軍”。關於孫武獻書的時間，後漢趙曄撰《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明確記載是在闔廬三年，與他勸阻吳王攻郢是在同年。這一時間與《史記》相印證，應是比較可靠的。至少至今尚未發現能否定這一記載的確鑿證據。又據《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闔廬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於是有吳楚柏舉（今湖北麻城東北，或說今漢川北）之戰，吳軍“五戰，遂至郢”。另據同書《孫子列傳》和《伍子胥列傳》記載，孫武參與了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的謀劃，在吳國稱霸中，他們都是有功勞的。

宋以來否定以上記載的主要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左傳》等典籍中沒有關於孫武事蹟的記載；二是春秋時期無私家著書；三是春秋時期沒有《孫子兵法》中所說的那麼大的戰爭規模。對此，我們須做一簡要辨析。

關於《左傳》、《國語》等先秦典籍中無孫武事蹟這條理由，明代宋濂在《諸子辨》中已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冊；不然，則否。二百四十年之間，大國者秦、楚，小國者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另外，孫子事，《左傳》、《國語》中沒有記載，但其他先秦典籍中卻有，單據《左傳》、《國語》斷其有無，而置其他典籍於不顧，也是不妥當的。如《孫臏兵法·陳忌問壘》，《尉繚子·制談篇》，《荀子·議兵篇》，《韓非子·

五蠹篇》等，對此均有記載（詳見本書第二章）。這說明，此前確有孫武其人，其人確著有兵書。

## 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2)

對春秋末期有無私家著書問題，學界有不同看法。羅根澤先生提出，戰國前無私家著作。這一觀點成爲後人考辨古書真偽的一個重要依據。但其中多有可疑者。眾所周知，春秋末期已出現私學，有私學就不能肯定絕無私人著述。如鄧析就曾寫成與官方“鑄刑書”不同的《竹刑》（寫在竹簡上的刑法）。《左傳》定公九年記載，繼子產（前 522 年卒）執政的駟“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是《竹刑》先由鄧析寫成而後爲公家所用。杜預注說：“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曰《竹刑》。”此注應持之有據。又據《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中說，鄧析創辦私學，“民之……學訟者不可勝數”，可知其私學之興盛。又載，“鄭國多相懸（懸掛）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致送）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夾帶）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這裡的“書”亦應是指鄧析的《竹刑》，“懸”、“致”、“倚”是其爲了教學，針對上面政策而採取的不同對策。又據《莊子·盜跖》載，跖曾罵孔子“作言造語，妄稱文武”，看來孔子還是“作”過“言”、“造”過“語”的。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他即使“述”，恐怕也不會全憑腦袋記憶，寫寫記記應還是有的。“述”不能完全排斥在“著作”之外。至於《老子》，學界主流性觀點認爲，其書出自春秋晚期曾任周王室史官的楚人老聃之手。如此，則亦應爲私家著作。

說春秋時各國軍隊無《孫子兵法》中講的那樣大的規模，而只能戰國時才有，因此斷言此書不會成書於春秋，亦值得商榷。藍永蔚先生在《〈孫子兵法〉時代特徵考辨》對此進行了考辨。綜合此文及所見其他史料，可知：晉在西元前 541 年治兵于邾南，有簡甲車 4000 乘，如將韓氏、羊舌氏等 10 家 9 縣計算在內，實際車數有 4900 乘之多。西元前 530 年，楚靈王自稱，僅陳、蔡、東、西不羹 4 個大縣，“賦皆千乘”，總計已有 4000 乘的兵力。另外，《詩·魯頌·宮》中歌頌魯僖公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的話。西元前 632 年，城濮之戰，晉車 700 乘以敗楚師；西元前 548 年，鄭子展、子產帥車 700 乘伐陳；西元前 484 年，吳、魯聯合伐齊，僅獲齊軍革車就有 800 乘，甲首 3000。各國參戰兵車就有如此之多，其國家總兵車數都應在千乘以上是沒有問題的。按孫子所說的比例，這些國家的兵力均應在 10 萬以上。又，《國語·越語上》載勾踐誓詞中有“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之語。“億”有大小兩解，大爲萬萬，小爲十萬。此記載說明，當時吳國兵力也已在 10 萬以上。概而言之，《孫子兵法》中所反映的“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的軍隊規模，以車戰爲主的作戰樣式，有車兵、步兵而無騎兵跡象的兵種組成等，都應符合春秋末期的情況。

但《孫子兵法》確經後人整理，在整理過程中有竄入後人文字的情況。如漢簡本《孫子兵法·用間篇》中有“燕之興也，蘇秦在齊”之語；十一家注本《九

地篇》中增“焚舟破釜”四字等。這種情況是在《孫子兵法》成書後整理中出現的，不能影響人們對其成書於春秋末期的認定。

二、《孫子兵法》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對上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戰爭經驗的總結；對已有兵學理論成果的繼承和發展；春秋時期社會思潮的影響和齊文化的培育等

爲什麼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孫武，竟能寫出這樣一部體系完整、認識深刻、應用廣泛、影響深遠的兵學著作呢？爲什麼它只能產生於中國，而不在其他國家呢？這除了孫武個人的天才和實踐條件之外，還有社會、歷史、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中國上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和動力。

在中國上古時，就發生過多次戰爭。見於文字記載的有：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黃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戰，共工與 頊之戰，堯、舜、禹攻苗之戰，夏啓伐有扈的甘之戰，商湯伐桀、武王滅紂、周公東征等戰爭。《孫子兵法》中提到了“黃帝勝四帝”、商滅夏、周滅殷的故事，說明孫武對那個時期的戰爭曾進行過研究，並汲取了這些戰爭所提供的一些經驗教訓。

春秋末期，周朝天子的權威日漸衰微，諸侯、卿大夫的勢力則在不斷擴大，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常常互相攻伐，戰爭此起彼伏，烽煙瀰漫全國。據不完全統計，從周頃王元年（前 618 年）到周敬王元年（前 519 年）這 100 年的時間裡，見於記載而又比較大的戰爭就有 160 多次。他們爲了贏得戰爭，紛紛在國內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軍制也因之而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如西元前 645 年晉國“作州兵”，廢除了奴隸和平民不能充當甲士的限制。西元前 594 年，魯國“作丘甲”，要求按土地面積服兵役和交納軍賦。西元前 538 年，鄭國“作丘賦”，規定奴隸可以充當甲士並承擔軍賦等。由於奴隸可以充當甲士，擴大了兵源，軍隊的數量有較大增加，戰爭的規模也因之擴大了。另外春秋末期的兵器、作戰樣式、謀略的使用等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鐵制兵器已用於戰場。步兵已經興起，舟師也成爲一重要兵種，車、步相結合的野戰是主要的作戰方式。在作戰指揮上，與野戰相適應的奇襲、迂回、包圍、伏擊、後發制人、各個擊破等戰法已廣泛應用，戰爭指揮藝術提高到了了一個新的水準。

### 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3)

春秋末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迫切需要先進的軍事理論作指導，同時又爲軍事理論研究者們源源不斷地提供新鮮的經驗教訓，推動著兵學理論的發展。如宋楚泓之戰、晉楚城濮之戰、鄢陵之戰等戰役從正反不同角度證明，“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逐奔不過百步”等舊的戰爭指導原則已不再適用於變化了的戰場，而出奇制勝、避實擊虛等詭詐之道則應成爲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戰爭指導原則。《孫子兵法》正是適應了這種時代的需要而對當時戰爭實踐提供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概括寫成的軍事理論專著。

(二) 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

中國古代兵學理論源遠流長，早在孫武之前，就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那時就已經有專門性的兵書流傳，見於史籍記載的有《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從目前見到的這些兵書一鱗半爪的佚文看，《孫子兵法》成書是受到了這些兵書的影響的。如《軍志》中有“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之類的話，《孫子兵法》中所說的“歸師勿遏”、“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五事”以“道”為首等，含義與之都比較接近。另外，《孫子兵法》中還直接引用了《軍政》裡的話：“《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可見，孫武曾認真地研讀過這些兵書，並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新的理論創造。

據黃朴民博士考證，古《司馬法》對《孫子兵法》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史記·太史公自序》稱：“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這裡的“孫”即應指孫子。從目前所見史料看，《孫子兵法》中有些話很可能引自《司馬法》，或對其有些觀點進行了介紹和闡發，但在思想體系上進行了新的構築。

除了這些專門性兵書外，先于孫武或與孫武同時代的兵學家們對軍事問題也已有許多精闢的論述。如《左傳》成公十三年載有劉康公的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孫子兵法》開篇就說：“兵者，國之大事也”，與之一脈相承。《韓非子·難一》載有晉大夫狐犯的觀點：“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孫子兵法》中“兵者，詭道”，“兵以詐立”，應是對前人這種認識的理論概括。大約與孫子同時的申包胥提出：“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將“智”擺在首位，與《孫子兵法》提出將帥應具備的五條標準“智、信、仁、勇、嚴”相通。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必須有一個基礎。《孫子兵法》之所以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就是因為其前人或同時代人關於軍事問題的論述，奠定了可供其騰躍的階石。

(三) 春秋時期社會思潮對《孫子兵法》的形成有重要影響

任何思想無不打上時代思潮的烙印。《孫子兵法》也不例外。春秋末期在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思維方式等方面都有新的發展，為正在孕育著的《孫子兵法》源源不斷地輸送了營養。

從政治思想看，春秋時期民本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早在周公時，就提出了“保民”的思想，《尚書·康誥》中反覆講到這一問題。春秋時，這種呼聲更加強烈，如認為“夫民，神之主也”，人民是神的主宰；“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沒有人民的支持就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孫子兵法》“道”、“仁”、“與眾相得”觀點的提出無疑淵源於這種思想。當時人們對“仁”的理解也更加寬泛，有的提出預計功利行動就是仁，“度功而行，仁也”；還有的認為，對人民仁並不妨礙對敵人詐，仁與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並行不悖。在德刑關係上，主張寬猛結合，以猛為主等。這些思想都滲入了《孫子兵法》整個思想體系之中。

從哲學思想看，西周以來以否定天命觀為主要內容的樸素唯物論觀點和迷信

天命鬼神等唯心論的鬥爭一直存在著。軍事鬥爭不迷信權威、只遵奉科學的特點，使更多的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唯物論行事。《孫子兵法》“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的思想正是對這種鬥爭作出的科學結論。我國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源遠流長。《尚書·皋陶謨》所載“寬而栗（寬弘而嚴厲）”，“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強而義（剛強而合於義）”等“九德”，就已經包含著對對立統一原理的感知。《周易》中提出了許多相反相成的哲學範疇。春秋時期，人們對對立統一關係的認識更趨廣泛和深刻。如對五行相生相剋關係的論述說明人們已體悟到這一規律存在的普遍性。醫學家醫和提出的“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蘊含著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結合的萌芽。吳公子季割對周樂的議論，如“直而不倨（正直而不驕傲），曲而不詘（曲折而不屈枉），近而不逼（接近而不咄咄逼人），遠而不攜（遠離而無二志）”等，也飽含著深刻的哲理。《老子》書更是集當時樸素辯證法認識之大成。《孫子兵法》汲取了這些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並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兵家哲學思想。

從思維方式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們往往是通過對自然和社會的觀察、思考、直覺頓悟的思維方式對客觀事物直接作出論斷；長於統體思維，注意完整思想體系的構築；注重對哲學範疇的概括和使用，因此有很強的哲理性；論述問題的方式大都是舍事而言理等。這與同時代西方一些國家的軍事著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古代這種特有的思維方式也是《孫子兵法》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他國的一個原因。

#### 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4)

（四）尚武崇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奇葩的沃土。

孫武生活的地方原屬周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周武王推翻商朝，主要依賴于他的謀略。他受封于齊後，享有征討五侯九伯之權。太公望個人的經歷、思想特點、周建國後擔負的特殊使命等，使他非常重視軍隊和兵學理論。到齊桓公時，管仲實行軍事改革，齊國的軍事實力進一步增強，成為當時諸侯國的霸主，尊王攘夷，東征西討，盛極一時，尚武崇智之風發展到鼎盛，並逐步形成了一種社會傳統。據史書記載，齊人具有“寬緩闊達”，“好議論”，講義氣、尚豪俠，能忍耐，爭強勝等習俗特點，這是尚武文化中較低層次的內容在人們心理上積澱的反映。韓信說，齊人“偽詐多變”，並非完全無據。它從正面說明了齊文化的尚智特徵。這種文化是哺育優秀軍事人才、創造先進軍事理論的良好條件。先秦許多兵書都出在齊地，也說明了這一點。

孫武從小不但在社會上受到這種文化的薰陶，而且還受到家庭軍事文化深刻的影響。如上所言，孫武出身于軍事世家，這對於他成長為軍事理論家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由於以上條件，再加上孫武本人的天才和勤奮，完成《孫子兵法》的任務就必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孫子兵法》的產生，有廣遠的社會實踐淵

源，豐厚的兵學理論基礎，深刻的社會思想影響，濃郁的尚武崇智文化的薰陶。它是中國遠古時期的軍事思想與春秋末期軍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三、《孫子兵法》軍事思想博大精深，按照簡易原則，大致可將其概括為戰爭觀、戰略戰術原則和軍隊建設三個方面

《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是一個博大精深、縝密完整的體系。人們從不同角度可對之作出不同的概括。按照簡易原則，我們大致可將其概括為關於戰爭問題、戰略戰術原則問題、軍隊建設問題三個大的板塊。

#### （一）關於戰爭問題的認識

國家至上，勝利第一。這是《孫子兵法》戰爭觀中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孫子兵法》中 18 次講到“國”字，85 次講到“勝”字，所講內容充分體現了完全從國家利益出發，一切爲了戰爭勝利的思想。它認爲，戰爭是國家的大事，因此必須認真研究；提出決定戰與不戰最根本的依據是國家利益，合於利則動，不合於利則止，“亡國不可以複存”，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制定先勝、全勝、速勝等謀略的著眼點也是國家利益。爲了國家利益，要求將帥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對於國君錯誤的指令也可以不執行，執行與否的最高標準是唯民是保，安國全軍。這些都體現了國家利益至上的思想。要維護、擴大國家利益，就必須取得對敵鬥爭的勝利，否則，國家利益就是一句空話。因此，《孫子兵法》全書論述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在對敵鬥爭中取得勝利，《孫子兵法》說到底是一部“制勝法”，從廟堂多算到戰場指揮，從選將到教民，所有的謀劃和行動都是爲了勝利。最好是不戰而勝，其次是戰場打勝。總之，一切爲了勝利，這是《孫子兵法》寫作的宗旨所在。

重戰慎戰。《孫子兵法》認識到戰爭是關乎國家存亡、人民死生的大事，因此強調必須對戰爭要高度重視，其《計篇》中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重戰，就必須要備戰，所以，《九地篇》中強調，要“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要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做到勝敵一籌，甚至要“以鎰稱銖”，“先爲不可勝”，造成絕對優勢；還要在思想上“以虞待不虞”，不能鬆懈麻痹。重戰，備戰，但不可浪戰，如《火攻篇》所說，必須要“慎之”，“警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多因素制勝。《孫子兵法》認爲，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是道、天、地、將、法。道是政治，要使人民與統治者同心同德，就必須政治修明；否則，就會失敗。這一條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因素。天是天時，地爲地利。這兩條是決定戰爭勝負的自然性條件。將是將帥，《孫子兵法》要求將帥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法是編制、法規、法令的制定與施行，還包括後勤保障（“主用”）。後人稱這五條爲“五事”。另外還有“七計”，內容與此基本相同，增加了“卒”（士兵素質）和“兵”（武器裝備）兩個條件。“五事”“七計”之外，《孫子兵法》還看到了戰爭對經濟的依賴關係，認爲經濟實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物質基礎，《作戰篇》、《用間篇》都論及這一問題。《孫子兵法》對戰爭的這

些認識，在當時來說，無疑都是很高明的。

## （二）關於戰略戰術原則

孫子生活的時代沒有將戰爭、戰役、戰鬥區分開，在戰爭指導上也沒有對戰略、戰法、戰術嚴格區分。用今天的眼光看，《孫子兵法》中確實大量地論述了關於戰爭全面謀劃問題，它是最早論述戰略原理的名著。其中也有論述戰法、戰術的內容。但更多的理論則是既適用於戰略，又適用於戰法、戰術，講的是關於戰略、戰法和戰術的一般原則。概而言之，有如下幾條：

### 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5)

先知原則。《孫子兵法·用間篇》中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就是預先掌握情況，預見戰爭勝負。《謀攻篇》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強調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都必須掌握。《用間篇》對如何知彼作了專門的論述，提出了五間俱起的方略；《虛實篇》論述用計算、挑動、示形、試探性較量等方法瞭解敵情的問題；《行軍篇》列舉了 30 多種相敵之法。這些都是講的“知彼”問題。書中對“知己”也多有論述，如強調國君對將帥要知；將帥對士卒之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要知；對士卒在不同環境下的心理特點要知等。先知是預測戰爭勝負的依據，是進行決策的前提，是指揮軍隊的先決條件（“三軍所恃而動”），因此要不惜爵祿重金，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孫子兵法》關於先知的思想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是其戰略戰術原則中首要的原則之一。

先勝原則。《孫子兵法·形篇》中說：“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先勝，就是先要使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謀劃等方面都勝過敵人。從國家戰略角度講，要通過“修道而保法”，使人民服從國家統治者的意志；要重視國家經濟和軍事實力的積累，形成如積水於千仞之山之勢；通過外交鬥爭，孤立敵人，增強自己的勢力等。在全域上佔優勢，還要在局部上也佔優勢，這就要合理部署，備其當備，攻其不守，守其必攻，而不能無所不備；在全域上處於劣勢，更要通過專我分敵、示形欺敵等手段，造成自己局部上的優勢，以專擊分，達到戰役戰鬥上先勝的目的，並逐步擴大為全域上的勝利。《孫子兵法》認為，實力優勢是取得勝利的先決條件，但如果放鬆警惕，或不善謀劃，既使在實力上處於優勢，也會遭到失敗。因此，它強調在強化實力的同時，在謀劃上也須勝過敵人，正如《計篇》所說：“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全勝原則。《孫子兵法·謀攻篇》提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進而要求“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這就是著名的“全勝”原則。這裡有三點需要注意：一是這裡的“全”首先是指全域上的勝利，孫子主張，最大限度地使敵“全國”而屈，“全軍”而屈，都體現了這一思想。二是“必以全爭於天下”的“全”，是要求在謀劃上全面周到，算無遺策，應釋為“全策”，如既知利，又知害，既知進，又知退，既知奇，又知正，等等，這在哲學上叫兩端分析，即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到。這個“全”講

的是思想方法的全面性，是一種完滿無缺的“全”。三是處理好“全破”的辯證關係。《孫子兵法》中“兵不頓而利可全”的“全”，講的是實際操作和結局，這個“全”並非一定完滿無缺，“全”中允許有“破”，有“破”之“全”也是一種“全”，這是一種相對的“全”。國不能“全”，就退而求全軍，軍不能“全”，就退而求“全”旅，旅不能“全”，就退而求“全”卒，卒不能“全”，就退而求“全”伍。這些都符合“全勝”原則。可見，《孫子兵法》在全勝問題上認識到理想與實際之間的差距，認識到了“全”與“破”相反相成的原理，在指導思想上，要求力爭完滿的“全”，在實踐中，要“全”“破”結合。最終目的是使敵人屈服於我而把敵我雙方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總之，謀全域，懂全破，籌全策，應是孫子全勝思想的基本內容。其中懂全破是理論，籌全策是手段，謀全域是目的，三者相互為用，缺一而不可。實行這一原則的方法，《孫子兵法》也講到了，歸納起來，大致是：首先造成我方力量上的絕對優勢，這是迫敵屈服的物質基礎；使用威懾手段，威加於敵，奪敵將之心，懾敵軍之氣；伐謀、伐交與伐兵相結合，“破”“全”相互為用，以“全”策瓦解敵心，以“破”策迫敵“全”屈等。這一思想既是國家戰略原則，也是軍事戰略原則，同時又是戰役戰術原則。今天看來，這一原則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致人原則。《孫子兵法·虛實篇》說：“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認為，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卷中），可見這一原則之重要。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講的是關於戰爭的主動權問題，或者說是軍隊的自由權，對戰事的駕馭權、對局勢的控制權問題。戰爭是智與力的較量，誰掌握了主動權，誰就可以充發揮自己的長處，即使短處也可變為長處，同時壓制對方之長處，使我敵之間的優劣差距無形中成幾何級數拉大，從而取得勝利。反之，就會被動挨打，遭到失敗。所以，交戰雙方都傾其全力、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地爭奪主動權，通過“示形”、“分敵”、“擊虛”、“先其所愛”，“以利動之”、“戰勝不復”等手段調動敵人；同時，又通過用間、相敵、試探等手段識破敵人的陰謀，防止自己入人彀中。主動權問題，至今仍是致勝的鐵則，是軍事科學研究中一項常用常新的課題。

突襲原則。《孫子兵法》中的《作戰篇》、《九地篇》突出強調進攻和速決的作戰指導思想，主張深入到敵國作戰，認為“深入則專”，能充分調動士卒的鬥志；可以“因糧於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等。進攻速決的最好方式是突然襲擊，提出，“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為了達成突然襲擊的目的，要求秘密決策，隱蔽準備，“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必要時，實行縱深奔襲，“並敵一向，千里殺將”，以巧成事。反對曠日持久，暴師於外。《孫子兵法》之所以如此強烈地主張利用突襲手段，達成速戰速決，一則從當時國家承受能力和後勤供應困難角度考慮，時間過長，國家承受不起；二則從戰爭自身特點出發，因為只有突襲才能出敵不意，攻其不備，取得勝利，這是由“兵之情主速”這一客觀規律決定的。三是怕諸侯之

兵“乘其弊而起”，認為出現這樣的情況，“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 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6)

奇勝原則。《孫子兵法·勢篇》認為，“戰勢不可奇正”，要求“以正合，以奇勝”，即以正兵迎戰，以奇兵取勝，提出“奇正相生，如迴圈之無端”，不可勝窮。這一謀略原則幾千年來一直被兵家視為致勝的妙諦。但各家對奇正的理解詮釋不盡一致。一般地說，符合常規的為正，超出常規的為奇。具體地講，在兵力部署上，擔任常備性任務的為正，機動力量為奇；在作戰方式上，正面攻擊為正，迂回側擊為奇；公開對陣為正，暗中偷襲為奇；按一般原則作戰為正，採取特殊戰法為奇。從軍事心理上看，合乎常情的、人們預料之內的為正，出乎常情的、人們預料之外的為奇等。奇正理論的精髓是“奇正相生”，即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無窮，使敵莫測。出奇勝制的要義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奇勝原則的主要特徵是從實際出發，靈活機動，“與敵變化而取勝”，反對墨守成規。

擊虛原則。《孫子兵法·勢篇》說：“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另在《虛實篇》中提出了著名的“避實而擊虛”的原則。虛實是指兵力大小、眾寡；士氣的高低、凝散；軍隊的治亂、勞逸；兵勢的銳鈍、勇怯；部署的主次、堅瑕等。擊虛是指打擊敵人虛弱而要害之處。擊虛可以使敵之實也變為虛，使強敵變成“易勝”之敵。《管子·制分》中揭示了擊虛原則的底蘊：“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李衛公問對》載唐太宗的話說：“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識虛實之法甚多，如派間諜打入敵人內部偵察，在戰場上“相敵”，通過“示形”迷惑敵人，運用試探手段使之暴露兵力部署等。一旦掌握了敵人虛弱之處，就應採取以石投卵之勢對之進行攻擊，如此，則無有不勝。

任勢原則。所謂任勢，就是運力量，因勢施謀，借勢成事。《孫子兵法·勢篇》之“勢”的基本含義是力，它包括軍隊的正面衝擊力（“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多向威懾力（“疾水漂石”），各種勢力之間普遍存在著的互相作用的力（即所謂“態勢”），自然界因各種差異形成的力（如地勢）等。所謂任勢，首先是要正確發揮自己主觀的力量，這就要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堅持謀勝，以巧成事，不硬拼實力，集中力量，漸蓄乍用，快速出擊等。其次是充分利用客觀矛盾之間互相作用的力量以達成我之目的。如石之不能自轉，因山之險而成不可遏之勢；物之難以力舉，借水之疾漂之遠去；矢之不能自射，憑弩之力而勁發，借他力為我所用，用小力而獲大功。所謂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如“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是以“死地”之勢使人自發地去殊死戰鬥。因勢定謀，借勢成事，是《孫子兵法》中一個很突出的謀略思想。

善守原則。《孫子兵法》不但強調善攻，而且也主張善守，即善於防禦作戰。要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形篇》）。為了取得防禦作戰的勝利，必須首先做好戰爭的準備；在兵力部署上要重點守備，並掌握一定數量的機動兵力，以

應付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反對“所備者多”，更反對“無所不備”；其次，強調發揮防禦作戰的優勢，“先處戰地”，“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利用有利的地形，搞好防禦偽裝，製造假像，欺騙敵人；再次，在防禦作戰中靈活用兵，軍隊具有各種情況下的應變能力：“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在敵“整眾而來”時，先奪其所愛，以調動敵人，以攻為守，破壞敵人的進攻企圖；或堅守不出，“畫地而守”，使敵不得與我戰等。《孫子兵法》的防禦作戰思想，在其軍事思想體系中佔有一定的地位。

《孫子兵法》的用兵思想非常豐富、深刻。還可以說出一些。人們從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但有益的啓示。

### （三）關於軍隊建設

《孫子兵法》中沒有論述治軍問題的專篇，其治軍思想散見於各篇之中。主要的體現在兩個方面：重視將道和以法治軍。

《孫子兵法》認為，將帥強弱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五項基本因素中的一項，將是“國之輔”，輔佐周密，國家必定強盛；反之，國家就會削弱。將是國家安危的主宰，是“生民之司命”。將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對他們必須要有全面而嚴格的要求，這就是“智、信、仁、勇、嚴”五條標準。智，就是要有智慧計謀，這是首要的，是由戰爭的特點決定的，所以居於“五德”之首。孫子的“仁”，既是一種德，也是一種手段，目的是“令民與上同意”。勇，是勇敢堅定。嚴，是制定法規、法令嚴明，並能嚴格執行。這裡需要注意的有兩點：一是這“五德”是一個互相限制又互相統一的整體，將帥必須將五者和諧地統一起來，而不能分割開來。正如賈林所說：“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必須“五者兼備，各適其用”，才可為將帥。二是這種選將標準是對當時實行的世卿世祿制度的一種否定，它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是進步的，應予肯定；但因為它會觸犯某些權貴們的利益，所以，提出者需要有很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態度。

令文齊武是《孫子兵法》在治軍問題上的一個重要思想。“文”指行仁、教化、愛卒、厚賞；武是威重、強制、重罰、嚴刑。二者相輔相成。強調將士卒看成如“嬰兒”與“愛子”一樣，但堅決反對“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行軍篇》）的治軍方法。認為對士卒首要的應是愛，其次才是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同上）要求平時對士卒要進行嚴格訓練，“令素行以教其民”，把“士卒孰練”作為判斷作戰雙方勝負的重要依據之一。要求軍隊內部上下團結，關係融洽，“與眾相得”。戰時，則要善於利用環境條件對人們心理產生的影響，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最大限度地調動士卒的勇敢精神。必要時，還要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置之死地，以激勵士卒的鬥志等。

### 醞釀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7)

但《孫子兵法》也有其難免的局限性。如主張實行愚兵政策，鼓吹搶掠，是

其糟粕。其哲學思想也有唯心主義的雜質。另外，隨著時代的發展，《孫子兵法》中有些論述也已過時，如火攻之法等。我們研究《孫子兵法》，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知一反三。只有這樣，才能使之更好地為現代化建設服務。

## 2. 《孫子兵法》研究發軔時期--戰國

戰國是《孫子兵法》廣為流傳的時期，也是《孫子兵法》研究的初始時期。其思想對當時的兵學理論、諸子學說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它不但成為當時軍事實踐的指導理論，而且在外交鬥爭、生產經營、醫學研究等非軍事領域也開始對之借鑒運用。此書在戰國廣為傳播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外交、政治等社會鬥爭的需要，是中國古代社會思想發展至戰國時期的必然反映。我們從戰國時期《孫子兵法》的流傳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 研究發軔時期--戰國(1)

一、戰國時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孫子兵法》不但成功地指導了當時的軍事實踐，而且非軍事領域也開始對之借鑒運用

《孫子兵法》在戰國初期就應已有傳播。孫子佚文《吳問》中對範氏、中行氏、智氏的滅亡順序說得很準確，但預言韓、魏、趙最終將歸於趙就說錯了。這說明此文很可能完成於三國分晉（前 403 年）前後。如此說來，孫子後學在此時期就已經作祖述、闡發、補益《孫子兵法》的工作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稱，吳起（？—前 381 年）“學兵法以事魯君”，這裡的“兵法”應包括《孫子兵法》在內。戰國中期，《孫子兵法》傳播已相當廣泛。到了戰國末期，此書幾乎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韓非子·五蠹》說：“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即反映了這一情況。

#### （一）戰國時期兵書中反映的《孫子兵法》研究情況

《孫子兵法》是軍事理論著作，對之重視的首先是戰國時期的兵家，他們對《孫子兵法》有深入的研究。這在戰國時期出現的幾部兵書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吳子》一書，今人一般認為是戰國吳起所作。《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吳起四十八篇”，後多佚失。今本《吳子》僅存六篇。《吳子》繼承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而又有新的發展。其有些觀點，與《孫子兵法》極為相近。試舉數例如下：

《孫子兵法》 《吳子》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夫安國家之道，先待也。（《九變篇》） 戒為寶。（《料敵》）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虛實篇》） 而趨其危。（《料敵》）  
令半濟而擊之，利。 涉水半渡，可擊。

（《行軍篇》）（《料敵》）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必死則生，幸生則

死地而後生。（《九地篇》）死。（《治兵》）

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理者，治眾如治寡。

（《勢篇》）（《論將》）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夫鞀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

目也。（《軍爭篇》）麾幟，所以威目。（《論將》）

從以上數例可以看出，《吳子》之言，多有師《孫子》之意者。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臏兵法》，學界認定其為戰國中期軍事家孫臏及其弟子撰。此書祖述、闡發、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思想，在語言上也多有直接或間接引用《孫子兵法》的話。如，《擒龐涓》中的“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示之寡”，即是對《孫子兵法》“示形”理論的具體運用。《威王問》中的“兵者不可不察”，源于《孫子兵法·計篇》首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威王問》中“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而驕之，引而勞之”、“必攻不守”等，大都是由《孫子兵法》的語言演化而來。其“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則源之于《孫子兵法》的“勝敵而益強”。《孫臏兵法》中的“貴勢”思想，如主張“事備而後動”、“料敵計險”、“並卒而擊”、“居生擊死”等，乃是對《孫子兵法》知勢、造勢、任勢思想的發展和發揮。在治軍上，《孫臏兵法》強調“素聽”、“素信”、賞罰嚴明等，與《孫子兵法》的治軍思想一脈相承。《孫臏兵法·陳忌問壘》中說：“……明之吳越，言之于齊。曰知孫氏之道者，必合於天地。孫氏者……”這裡的“明之吳越”當是指孫武，“言之于齊”則是孫臏自稱，稱“孫氏之道”，是強調兩孫子的兵法乃是一家之學。從此句的語氣看，對“孫氏之道”很有些“廣而告之”的味道。

大約成書于戰國中期的《尉繚子》中也引有《孫子兵法》之言和載有孫子之事。此書《將理》中說：“兵法：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漢簡“兵法”作“兵策”，“日費千金”作“費日千金”）；同書《制談》篇中說：“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武子也。”這裡的“武子”當指孫武。作者對孫武的推崇溢於言表，說明他曾認真地研讀過孫武的事蹟及其兵法才得出這樣的結論。《尉繚子》中所講的“道勝”、“威勝”、“力勝”，無疑受到了《孫子兵法》“伐謀”、“伐交”、“伐兵”思想的啓發；它重視“廊廟”決策，主張計先定，慮早決，與《孫子兵法》的“先勝後戰”思想相一致；它反對“考孤虛，占威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的做法，也與《孫子兵法·用間篇》“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的主張相通。

近人一般認為《六韜》成書于戰國晚期。此書對《孫子兵法》的思想多有闡發。葉適認為，《六韜·龍韜》之後43篇“繁悉備舉，似為《孫子》義疏”，《六韜》的“將有十過”近于《孫子兵法》的“五危”；《六韜》的戰車“十死”、

戰騎“九敗”與《孫子兵法》的《行軍》、《九地》相出入。這是有道理的。但《龍韜》之外亦多有闡發《孫子兵法》的內容。如“全勝不鬥，大兵無創”（《武韜發啓》）、“文伐”十二法等，即是對孫子“全勝”思想的注疏和發揮。

## 研究發軔時期--戰國(2)

### (二) 戰國時期非兵書中反映的《孫子兵法》研究情況

《孫子兵法》不但對戰國時期的兵學著作有深刻影響，而且在一些非兵書中，也可以看到其浸潤的痕跡。這說明當時研究《孫子兵法》的領域和範圍已相當廣泛。

《管子》一書，學界一般認為是戰國時齊國稷下各學派著作的彙編，其中可能也有管仲的言論。此書中有的軍事觀點即與《孫子兵法》相近，有的則有所發揮和發展。如該書中的《幼官圖》主張實行“全勝而無害”的“全勝”戰略；《輕重》甲、戊中提出的用經濟手段達到不戰而屈人的戰略目的，即是對《孫子兵法》“全勝”思想的肯定和發展；《七法》中的“先知”、“遍知”與《孫子兵法》的“先知”、“盡知”相通；同篇中的“計必先定”，“然後兵出乎境”與《孫子兵法》的“未戰而廟算勝”相近；《霸言》中的“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等，則是對《孫子兵法》“避實擊虛”思想的闡發。

《商君書》為商鞅及其後學所作。其中《戰法》中強調“廟算”的重要，“廟算”一詞最早見諸《孫子兵法》。《商君書·修權》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是對《孫子兵法》“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之文所作的注釋。《徠民》中說：“兵法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句，當是由《孫子兵法·形篇》“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和《虛實篇》中“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二句演變合成。

《荀子·議兵篇》載臨武君之言：“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其中所講“孫吳”，即指孫武、吳起。臨武君可能是楚人，《戰國策》楚策中載有春申君之言：“僕欲將臨武君”。可見《孫子兵法》已傳入楚國。他認為孫子用兵，只講“勢利”、“變詐”，不講“附民”，這是不對的，實際是孫子既講“附民”，又講“變詐”，將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了。但從臨武君之言中，可見孫武在當時一些將領心目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但荀子對此觀點則進行了批駁，他認為，詭者不仁，仁者不詭，“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從而將“仁”和“詭”完全對立起來，走到另一極端，開儒家批判孫子之端，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

可能在戰國中後期成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的《冠子》，多處引用《孫子兵法》之言。如此書《天則》引：“故法者，曲制、官備、主用也。”語出《孫子兵法·計篇》，原文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冠子·世兵》：“勢急節短，用不縵縵”，其中“勢急節短”出自《孫子兵法·勢篇》：“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冠子·武靈王》中載有武靈王問龐煥的話：“寡

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龐煥以“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予以解釋。武靈王所說的“飛語流傳”之話及龐煥對答之語，均本《孫子兵法·謀攻篇》之言。這說明，《孫子兵法》的思想當時在趙國已廣為流傳。

《文子》可能成書于戰國晚期，今本或有後人附益。此書中亦有明引、暗引或闡發《孫子兵法》之言。如《文子·道原》中說：“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此語系由《孫子兵法》的《形篇》和《勢篇》“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演變而來。又《文子·上仁》篇說：“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語出《孫子兵法·形篇》。《文子·上義》篇說：“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令之以文，齊之以武”，語出《孫子兵法·行軍篇》。

另外還有一些著作也不同程度地透露了《孫子兵法》在當時傳佈的資訊。如縱橫家著作《鬼穀子·謀篇》“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即是師《孫子兵法·虛實篇》“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意；其《本經陰符·分威》中所說“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銖”，則分別取之《孫子兵法》的《虛實篇》和《形篇》；其《損兌》中說：“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于萬仞之溪”，語出《孫子兵法》的《形篇》和《勢篇》。這說明《鬼穀子》的作者是研究過《孫子兵法》的，並汲取了其中的思想。雜家著作《呂氏春秋》中對《孫子兵法》也有較多的反映，如該書《尚德》中稱“闔廬之教，孫吳之兵”，《決勝》中講的“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等。

大約成書于戰國末或秦漢之際的《黃帝內經》中也多處引用了《孫子兵法》的語言。此書《靈樞·逆順》中載：“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引言與《孫子兵法·軍爭篇》“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相近。該書《靈樞·營衛生會》中說：“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此句與《孫子兵法·勢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相象。《黃帝內經》的作者似受到了《孫子兵法》較深的影響與啓發。此乃將兵法原理引入醫學領域之濫觴。

### 研究發軔時期--戰國(3)

#### (三)《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的增附與修訂

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為漢初抄本，其中有《吳問》等十三篇之外的雜篇，這說明，這些雜篇在漢初就已流傳。由此我們推測，漢代初年至班固時流行的孫子書很可能有“八十二篇圖九卷”本。司馬遷看到過這個本子，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很可能也是這個本子，《漢志》著錄的自然也是這個本子，其中《吳問》等五篇就是十三篇之外、六十九篇之內的雜篇，其餘各篇因殘壞而不可見。

孫子獻吳王之兵法是“十三篇”，到了漢初卻變成了“八十二篇，圖九卷”，無疑在漢代之前就有人增附。至少增附工作在戰國時就開始了。如前所言，《吳

問》就大約產生于三國分晉前後。增附者當是孫子後學，其中不排除孫臏及其弟子參與了這項工作。他們對十三篇本文可能也作了校理的工作。雖然此後又有人對十三篇進行過校改，但均非“定型”性手術。從目前史料看，其基本型制在春秋末即已完成。

目前所見孫子佚文約有 20 餘篇、卷。其中《吳問》是以吳王與孫武討論晉國六卿誰先亡、誰成功的形式寫成的問答體文論，其中心思想是“厚愛其民者”勝；反之則亡，損民愈甚，其亡愈速。《四變》對《孫子兵法·九地篇》“君命有所不受”做了解釋，提出：“君令有反此四變者（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則弗行也。”說明“君命有所不受”與其他之“四不”並非並列關係，而是一個條件複句，即君令在違反以上四種情況時才可以拒不接受。《黃帝伐赤帝》解釋《行軍篇》中“黃帝勝四帝”這一典故，認為帝王之勝都須得天道、地理、民情。《地形二》似是解釋《孫子兵法·地形篇》的文字。《見吳王》內容與《史記·孫子列傳》所記孫武見吳王闔廬、以兵法試諸婦人之事大致相同。這當是司馬遷寫《孫子列傳》依據材料之一。這說明，司馬遷確實見過這些託名“孫子”而寫的雜篇。

《隋書·經籍志》等著錄之《吳孫子牝牡八變陣圖二卷》，《通典》載《吳子問孫武》諸篇，清人畢以?認為均在“八十二篇圖九卷之內”，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沒有充分依據推翻這一結論之前，我們姑且從之。下面我們對這些佚文作一粗略考察。

《吳孫子牝牡八變陣圖二卷》，已佚。《隋書·經籍志》始見著錄。書名原缺“牡”字，中華書局 1982 年出版《隋書》據《歷代名畫記》補。上孫家寨漢簡中有“牡陳”字樣。《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有《雄牝城》篇，內容是以地形為據談可攻與否。如認為“城前名穀，倍（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高外下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在亢山間，無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擊也。城前亢山，倍（背）名谷，前高後下者，牝城也，可擊也”。牝牡，猶言陰陽，《淮南子·地形訓》：“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又雲：“凡地形……丘陵為牡，溪穀為牝。”這些可做為考察此書內容之參考。

《孫子八陣圖一卷》，已佚。《隋書·經籍志》始見著錄，《日本國見在書目》作二卷，名為《孫子兵法八陣圖》。《周禮·春官·車僕》鄭玄注雲：“孫子八陣，有蘋車之陣”。蘋猶屏，蘋車是有隱蔽、防護裝置的戰車。說明書中有論述車陣的內容。又杜牧引《軍志》有“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沖其中，兩頭俱救”等語。《唐李問對》卷上亦引此內容，謂是諸葛亮八陣；張預注《孫子》引此句稱之為“《八陣圖》曰”，三家注引出處已不相同。《武經總要前集》卷七《本朝八陣法》謂八陣為方、圓、牝、牡、沖（衡）方、罌、車輪、雁行，取之《裴子新令》；王應麟《小學紺珠·制度類·八陣》則直稱此為“孫子八陣”。不可靠。趙本學在《武編》引中斥之為“偽而又偽”。

《孫子戰鬥六甲兵法一卷》，已佚。《隋書·經籍志》始見著錄。內容似是以遁甲之術言兵之作。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已佚。《隋書·經籍志》始見著錄，大概是講用占候進行決策的方法，《太平御覽》卷三二八引《孫子占》疑即此書，其中講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整然若雨，是爲天沾，其師失……”此內容與孫子《用間篇》“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的思想大相違背，顯然是後人僞託。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已佚。舊、新《唐志》著錄。《太平御覽》卷三五七引有此書佚文。從佚文內容看，此書可能是講部伍陣壘之法的兵書。

另外，《通典》卷一五九載有《吳子問孫武》之文十餘篇，《武經總要》、《太平御覽》、《十家注孫子·九地篇》何氏、張預注中亦有摘引，或作“吳王問孫武”。這些佚文的內容是講解施行孫子提出的不同環境條件下作戰原則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散地戰、輕地戰、爭地戰、交地戰、衢地戰、重地戰、圯地戰、圍地戰、突圍戰、包圍戰、驕敵戰、誘敵戰等。文中多處講到騎兵作戰內容，顯非孫子本人所作，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可能性較大。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推斷：《孫子兵法》十三篇寫就於春秋末，可能曾經戰國時人校理。其餘雜篇，大約爲戰國時孫子後學所作，後來又有好事者修補。

#### 研究發軔時期--戰國(4)

綜上所述，《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研究、流傳的基本情況可概括爲四個特點：傳播廣泛；影響深刻；注重實用；自身在傳播中得到增益和修訂。

二、《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得到了廣泛運用，豐富多彩的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實踐充實發展了孫子伐謀、伐交和伐兵的思想

從軍事鬥爭看，戰國時期各國用兵多與《孫子兵法》所提出的作戰指導原則相合，其中最突出者是孫武的後世子孫孫臧。孫臧在桂陵之戰中採用的“圍魏救趙”之法，是對《孫子兵法》“避實擊虛”、“先其所愛”、“攻其必救”思想的靈活運用。孫臧在馬陵之戰前向田忌建言中引用的“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裡而趣利者軍半至”，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原文是：“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五十裡而爭利，則蹶上將軍……”桂陵之戰、馬陵之戰是戰國時期運用《孫子兵法》取得成功的著名戰例。另外，燕國樂毅採取的誘齊滅宋、爭取與國、“舉天下而圖之”的攻齊方略；田單守即墨所採取的反間、奇襲之計；趙奢在閼與之戰中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先占高地、出其不意以打擊秦軍；李牧在防備匈奴中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等，都與《孫子兵法》論述的用兵原則相合。他們是否讀過《孫子兵法》，史無明載。但從他們所採取的這些戰法和《韓非子》所說的“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來推斷，他們不會是《孫子兵法》的門外漢。

從外交鬥爭看，戰國時各國君臣、策謀遊說之士使用詐謀的情況，如因勢爲資，據時爲變，出奇用異，扶急持傾，倒強爲弱，運亡爲存等，足可令人眼花了亂，實乃變詐奇謀之大觀。其中許多觀點、計策、行爲，都可從《孫子兵法》中找到依據。如，謀士們認爲，“計者，事之本也”，反對迷信天命鬼神，追求不

戰屈人，雄辯折人，“按兵後起”，因勢乘便，以敵制敵，用間反間，爭取與國，孤立強敵，“漁翁得利”，“黃雀在後”，以迂為直，權借時勢等，似是對《孫子兵法》軍事原則的例釋或演義。《漢書·刑法志》中說，戰國時，“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道出了縱橫家與《孫子兵法》在思想體系上的承繼關係。梅堯臣認為，《孫子兵法》是“戰國相傾之說”，確切地說，應為：《孫子兵法》為“戰國相傾之說”提供了理論武器。縱橫家對《孫子兵法》鬥爭藝術的需求和成功運用，也是《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廣為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

戰國的縱橫家極力贊成不戰而勝。他們認為，戰爭所造成的“殘費”極大，“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供)藥”，“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此乃“虛中之計”，“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而不能使諸侯服，是極不划算的。在當時群強林立，形成多極化戰略格局的形勢下，任何一國都不能單憑軍事手段達到兼人並土之目的，只有通過伐謀伐交，才可以收到不戰而勝的理想效果，或為軍事上的勝利創造必須的條件。因而，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都極力推崇不戰而勝，從而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和深化了《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

戰國時實行這一戰略的主要手段有這樣幾種：

聯友分敵。《戰國策》記錄了大量的諸侯國在作戰中爭取盟友、分化敵軍從而取得勝利的戰例，其意都在於強調在多元的戰略態勢下聯合作戰、孤立敵軍的重要。如，秦為了攻楚，首先用誑騙手段破壞了齊、楚聯盟；長平之戰前夕，秦許願歸還魏之垣雍，使其在這一戰役期間一直按兵未動。張儀曾對趙王說：“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鬥，失其党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秦對六國在總體上處於孤立的地位，但在局部上卻常能把對手們一個個推到孤立無援的位置上去，這不能不說是秦善於爭取盟友、分化諸侯力量的結果。這些做法均體現了《孫子兵法》專我分敵的戰略思想。

以敵制敵。根據多極則多矛盾的特點，充分利用客觀矛盾，達到弱敵取利之目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即是對這一策略的形象概括。齊滅宋後，國勢■赫，秦為了打擊這一潛在的強大對手，展開了頻繁的外交活動，挑起了中原諸侯聯合伐齊之戰。這場諸侯國之間的大混戰嚴重削弱了他們各自的力量，是秦以敵制敵策略的一大勝利。《戰國策·齊一邯鄲之難》載，魏攻邯鄲，趙求救于齊，齊段幹綸提出不直接救趙，而是“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後果如其所料。這種殘趙弊魏的打法，無疑也是建立在以敵制敵思想基礎之上的。這些策略體現了《孫子兵法》任勢而不責人的哲學思想。

利而害之。即從暫時、表面看是利敵、但在長遠和實質上卻是害敵的一種策略，其好處是容易使敵人上當。如衛鞅欲弱魏，卻先強之，對魏王說了許多恭維話，勸其先行王事，然後以圖齊、楚。魏王果然聽從。於是，齊、楚怒，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秦乘機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蘇秦為了打擊齊國，採取了“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的策略，從燕至齊，極力鼓動齊王滅宋，齊滅

宋後，遂成爲眾矢之的，爲燕國伐齊造成了有利的態勢。這種欲取姑予、以屈求伸的間接取勝策略體現了《孫子兵法》雜於利害和以迂爲直的战略思想。

### 研究發軔時期--戰國(5)

在別國最高領導層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在這方面，秦開展得最有成效。其做法：一是立足長遠，擁立太子。如秦支持韓太子幾瑟爭國，造成韓亂。齊孟嘗君田文入魏後，因惡齊把魏公子負芻之母齊女逐出魏國，韓秦勸秦昭王乘機娶齊女爲妻，以使秦、齊和好而共立負芻爲魏王。負芻立，因其母在秦必以魏忠心事秦；如齊女再返回魏國，亦會使齊、魏親秦。無論怎樣，都會對秦有利。這無疑是在“放長線釣大魚”。二是著眼現實，積極爭取。在各國當時的統治集團內或其親屬中物色、爭取和扶植親秦分子，如齊王建就一直是在秦爭取的對象之一；楚懷王幸姬鄭袖也曾爲張儀所用而干預朝政。韓、魏、趙、燕等國中也都有親秦勢力存在，每在關鍵時刻，他們就出來爲秦說話。秦通過他們左右其國內政策，坐收攻戰所不能得到的利益。三是派出心腹，擔任要職。如先後使張儀相魏，使張唐相燕，“內韓璿于齊，內成陽君于韓，相魏懷于魏”等。利用合法手段，在其他國家最高決策層中積極培植、爭取、安插自己的代理人，無疑是不戰而勝最緊要的策略。

用重金收買內間。如，周赧王四十九年（西元前 266 年），天下之士合縱攻秦，范雎派唐雎載音樂，攜重金，至武安（在邯鄲西，屬魏），“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鬥矣”。趙將李牧連敗秦軍，秦就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爲反間”，郭開於是誣陷李牧等要造反，趙王遷遂殺李牧，秦乃得以輕取邯鄲。齊王建的相國後勝也因“多受秦間金玉”而爲秦效力，“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從而加速了齊國的滅亡。秦把金錢作爲向敵國進攻的武器，其殺傷效力不在刀槍之下。可以說，戰國時把《孫子兵法》的用間思想就已運用得相當純熟。

威懾以屈人。《孫子兵法·九地篇》中提到了“威加於敵”的思想，戰國時縱橫家將之廣泛運用於軍事和外交鬥爭之中。張儀實行連橫，蘇秦宣導合縱，都帶有威懾屈人的戰略目的。《趙國策·趙二·蘇秦從燕之趙》章中說：“六國從（縱）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張儀也說，由於趙實行合縱，“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說明合縱的威懾戰略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張儀遊說諸侯連橫事秦時，使用的多是威懾手段，均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張儀說趙王：“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于成皋，驅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趙王完全被這種心理戰術所懾服，只好割地以求和。

雄辯以折人。縱橫家認爲，若要使人不戰而屈，還必須有善辯之人說服對方。這種善辯能力由廣博的知識、對天下形勢的深刻認識、對人們心理特點的準確掌握以及應變能力、表達能力等多種因素構成。有了這種能力，就可雄辯勝強兵。

如魯連反對帝秦而退秦兵，頓弱遊說諸侯使“四國畢從”等，都說明了這一點。

《戰國策·秦一蘇秦始將連橫》盛讚蘇秦說：“不費鬥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其中雖不免有些誇張，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作者強調不戰而勝的思想是十分明確的。

總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強調採取不戰而勝的戰略，主張通過伐謀伐交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從而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全勝思想。這一謀略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借鑒價值。但這些謀臣策士過份誇大遊說的作用，對“詭道”的施用物件缺乏嚴格的界定，為達成個人目的，不惜在自己內部使用詭謀等，則是不足取的。

三、《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廣為傳播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論適應了當時社會鬥爭的需要，我們從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啓示

戰國時期《孫子兵法》的研究和傳播何以如此廣泛，影響如此深刻？這種研究和傳播對當時社會的進步起了什麼作用？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些什麼樣的啓示呢？

#### （一）《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廣為傳播的原因

《孫子兵法》之所以能在戰國時期廣為流布，有其必然的思想淵源和深刻的社會原因。撮其要者，有如下幾點：

一是社會思潮自身發展規律的反映。專制社會條件下的社會思潮發展史有一個基本規律，這就是：不斷地進行否定——否定之否定，周而復始，以至無窮，從而推動社會思想的發展。春秋中期之前，人們在外交、軍事、政治等領域中的交往中有一個基本的觀念，就是重禮輕詐。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楚閭陳成公卒而退兵等，並非只是個別現象，而是當時重禮守信的社會思潮支配的結果。到了春秋末期，這種道德觀念受到功利思想的強烈衝擊，人們在處理國與國的關係上由追求道義上的完美逐漸向詐謀取利方面轉化。到了戰國，各國以保存自己、兼併他人為主要目標，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由以道義為分合原則幾乎完全轉變為以利害為取捨標準。崇謀尚奇代替重禮輕詐而成為社會主流性思潮。以宣傳“兵者詭道”為主要內容的《孫子兵法》順應並指導了這一時代性的演變。這是其得以大力傳播的思想原因。

#### 研究發軔時期--戰國(6)

二是當時實際鬥爭的需要。戰國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以軍事和外交鬥爭史為主線的多極鬥爭史。經過激烈的兼併戰爭，至戰國中期，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強並立的格局形成。它們為了各自的利益，爭取盟友，分化敵人，攻城掠地，兵來將擋，展開了激烈的外交和軍事鬥爭。戰爭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如何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是當時每個國君、將帥都須首先關注的大事。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就要求助於先進的軍事理論。《漢書·藝文志》稱：“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道出了當時戰爭的特點。產生於多極鬥

爭年代的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孫子兵法》正是打贏這種戰爭的理論武器。這是《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不脛而走的社會原因。

三是由《孫子兵法》自身價值決定的。《孫子兵法》是對上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昇華，是對前人的兵學理論成果的繼承和發展，是春秋時期先進的社會思想交合的產物，形成了博大精深、縝密完整的軍事理論體系，對於戰爭問題、戰略戰術、軍隊建設等問題都有系統深刻的論述，特別是它的戰略戰術原則，諸如先知、先勝、全勝、致人，速勝、奇勝、擊虛、任勢、善守、專分等，可謂是集古代戰爭謀略之大全，遵之者勝，違之者敗，被後世譽為“兵經”，“東方兵學的鼻祖，武經的冠冕”。《孫子兵法》自身的這種軍事學價值是其在戰國時期廣泛傳播的內在原因。

四是孫臏等人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如同“孟軻好辯，孔道以明”一樣，孫臏對“孫氏之道”的宣傳和在桂陵之戰、馬陵之戰中對《孫子兵法》的成功運用，是使當時社會承認《孫子兵法》價值的一個直接性原因。孫臏因此“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而孫臏業績是與《孫子兵法》聯繫在一起的，故其名愈顯，其兵法流傳愈廣，《孫子兵法》的影響也就愈大。吳起、尉繚等對孫子其人其書的宣傳，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二）《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廣泛傳播的歷史作用

《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廣為流傳，對當時社會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起了積極的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國家統一起了促進作用。《孫子兵法》代表著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它主張進行兼併戰爭，“伐大國”以實現“王霸”之業。這與戰國時期流行的反對兼併、否定戰爭、主張保持割據的種種論調都是相對立的。戰國時期是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時期，統一的主要手段是先勝、全勝和戰勝，《孫子兵法》為這三種鬥爭方式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論武器。

二是帶動了戰國兵學理論的發展。《孫子兵法》是兵學鼻祖，戰國時期兵學理論主要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吳起、孫臏、尉繚、《六韜》的作者等，注意將《孫子兵法》的理論與戰國時期的實際相結合，在戰爭觀、戰爭指導、治軍思想等方面繼承並發展了孫子的思想。如，關於戰爭性質的認識，關於軍事統帥機構的建設，關於騎兵的地位和使用，關於城守方法，關於不同地理條件下作戰指導原則等，大都源于孫子而又有新的發明。

三是對戰國諸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戰國諸子對《孫子兵法》有尊奉者，有批駁者，有宣傳者，有發展者，有取其所需為己所用者。《孫子兵法》在戰國學術界中獨樹一幟，自成一家，與諸子互相彌補、滲透、撞擊、融合，從而促進了當時學術的繁榮與進步。

四是《孫子兵法》被非軍事領域加以借鑒和運用，對當時的生產經營、醫學發展等起了推進作用，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據《史記·貨殖列傳》載，魏文侯時，白圭“樂觀時變，人予我取，人取我予”，“與用事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法”，他介紹自己成功的秘訣時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這是關於將《孫子兵法》運用到生產經營的最早記載。

### （三）戰國時期《孫子兵法》流傳的啓示

從《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的研究和流傳看，最重要的一點啓示就是：《孫子兵法》是關於軍事鬥爭的科學，對於科學，只能用科學的態度對待之，既不能貶抑，亦不能迷信。

《孫子兵法》在春秋末期流傳不廣，其中一條重要原因，是政界、學術界受重禮輕詐傳統觀念的影響，有意對其採取排斥壓抑態度。荀子的觀點並非彼時彼人所獨有。如上所言，真理的傳播規律一般是壓之既久，其發必速，被壓制、埋沒的思想在適當條件下，就會顯現出來，而其顯現形式大都帶有過激的特點。這是《孫子兵法》的思想到了戰國時期迅猛傳播，以至被很快推向極端的一個重要原因。到了西漢，統治者為適應社會統一的需要，對“先詐力而後仁誼（義）”的社會思潮進行了清算，從而完成了又一次否定。此後又有多次類似的反覆。《孫子兵法》有其自身的歷史價值，壓抑貶損，有害無益，只會激之走向另一極端。

但對《孫子兵法》亦不可尊之過度。孫武書並非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它乃“輔”國之一經，而非“主”國之全術。“將者，國之輔也”，孫武話說得很清楚；“將”是國之“輔”，而不是“主”，“主”不可以只治孫武之術。在“國之輔”中，它又僅是其中的一翼，而非全部，“武經”不能代替“文典”，猶如“文典”不能代替“武經”一樣，二者必須兼“輔”，國家缺一而不可。知孫武書非萬能之術，則不可用它去套世上萬事萬物，硬套就難免出錯，如孫子之“詭道”，乃是講的對敵鬥爭的手段，就不能像戰國時一些人一樣用之於自己人內部。還是唐人裴行儉說得對：“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對自己人應以誠信為本，施詭用詐，雖可得益于一時，但卻傷在根本，患伏長遠。總之，對《孫子兵法》尊奉過極，使用過濫，也會將其推向反面。

### 研究發軔時期--戰國(7)

《孫子兵法》一般在戰爭年代特別受人重視，重視的主要原因，是它充滿“變詐”之智。但一旦天下平定後，它就會受到冷落甚至貶斥。貶斥的主要原因，同樣是它充滿“變詐”之智。這與世人存有政權可以“逆取”但必須“順守”的思想有密切關係。其實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孫子兵法》是仁信與詭詐的辯證統一論者。詭詐施之於敵，仁信施之於己，二者不可偏廢。戰亂之秋不應將詭詐推到極端；治平之世也不能把詭詐貶入深淵。仁信與詭詐，二者原本相反相成，所以應使之相互為用。問題的關鍵在於：使用時首先要看清物件是誰；詭詐也須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

### 3.《孫子兵法》初期校理時期--秦漢

秦漢是《孫子兵法》的初期校理時期。《孫子兵法》在這一時期研究和流傳的基本特點是內尊外貶，即統治集團內部對這部兵法高度尊崇，但在對社會的宣

傳上卻予以貶斥。

### 初期校理時期--秦漢(1)

一、《孫子兵法》在秦朝受到禁錮，但在社會上仍有流傳，並為農民起義提供過理論武器；以《六韜》、《三略》為代表的政兵書與之分立並互相補充，使中國傳統的兵權謀理論進一步完善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採取了收繳天下武器、儒家典籍和焚書坑儒等措施。《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既然是“收天下書”，那麼孫子書亦應在被收之列。收上來以後，如何處理？秦始皇要求“去”的所謂“不中用者”，主要應是指儒家的著作，孫子書不當列於其中，因此不會在“盡去之”之列。但此書是克敵制勝的理論武器，既然是武器，統治者可以使用，被統治者也可以使用，而其威力又遠在戟盾矛櫓等物質性武器之上，因此秦始皇也不會讓其在社會上流傳，收上來後必將對之採取禁錮政策，這是可想而知的。

但秦朝廷不可能將在社會上流傳的《孫子兵法》全部收盡，在民間，特別是在逃散的六國貴族的遺老遺少中，仍應有保存此書者。如《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年輕時就學習過“兵法”。古人多稱《孫子兵法》為“兵法”，如《尉繚子》、《冠子》、《黃帝內經》等都是如此，《史記》、《漢書》記載秦漢時人對《孫子兵法》的稱謂也多簡稱為“兵法”。即使當時人所言“兵法”不是專指《孫子兵法》者，其泛指的兵法一般也都應包括《孫子兵法》在內。所以，項羽所學兵法應有《孫子兵法》，當是不成問題的。史書記載韓信也是精通《孫子兵法》的。另外，據《孔叢子·答問》記載，陳涉派周章入關攻秦，有輕敵之意，博士太師孔鮒提意見說：“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其所引“兵法”之言，即出自《孫子兵法·九變篇》，原文是“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同書《論勢》中說：“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此言源于《孫子兵法》的《九地篇》。學界一般認為，《孔叢子》一書託名秦末儒生孔鮒編寫，疑為三國魏王肅所撰，但其中亦有搜集之言，有一定史料依據。至少可作為考察《孫子兵法》在秦朝流傳情況的一種參考。這些史料說明，《孫子兵法》在秦朝雖經官府收繳，但在民間仍有流傳，並為農民起義提供過理論武器。

《三略》一書，今人有認為成書於西漢末或東漢末者。證據尚嫌不夠充分。不能因為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中無此書就斷定其成書于該墓主人死後，正如該墓中無《吳子》，不能斷定《吳子》就是偽書一樣。《漢志》著錄之書，亦存在“猶不能備”的情況，不能因其未著錄一條就斷言無此書。韓信被殺時說：“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其中之“人言”即引自《三略》。《淮南子·原道訓》所說“夫道者……舒之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與《三略·上略》中的“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句式同。《淮南子》引人之文多用其意而改其句，不講出處；而《三略》引文大都標明出典。《淮南子》此言當是由《三略》之言變化而

來。如是《三略》引《淮南子》之言，當有出處。不寫出處，明其是《三略》本文，而非引文。據《史記》記載，黃石公出現于秦代。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還應將此書的作成時間暫置於秦代為宜。

《三略》晚於《六韜》，《六韜》大約成書于戰國末期。它們均屬於“政兵書”，是既談兵略、又講政略的兵書。此書繼承了《孫子兵法》這一“正兵書”的某些思想而又有新的發展。《李衛公問對》卷上說：“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指出了在兵權謀中這兩個流派的存在，但沒有展開論述，以致有些讀者對此言感到莫名其妙。《孫子兵法》和《三略》等，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如都主張爭取“全勝”，都認為將是“國之司命”，都反對“將從中禦”，都強調賞罰嚴明等。但二者也有很多不同，其不同點集中體現在“正”和“政”這兩個字上，即《孫子兵法》是比較“正宗”的兵學著作，可稱之為“正兵書”；《三略》內容則是集軍政於一體，則應名之曰“政兵書”。二者培養的目標就不相同，《孫子兵法》主要培養的是將帥；而《三略》等則是“帝王師”（《三略》卷上），《史記·留侯世家》稱為“王者師”，所謂“帝王師”或“王者師”，都是指君主的高參。由此而決定了兩書內容各有差異：《孫子兵法》研究的是軍事問題，以軍事為中心而及政治、經濟、外交等內容；在軍事問題上，它又著重研究的是戰爭，揭示的是戰爭的一般規律，重點又是講用兵藝術，戰前戰後的問題不是其討論的重點。《三略》等既重軍事，又重政治，既講戰爭之道，又談治國之方，既言戰場致勝，又談戰後守功，其論用兵之道不如《孫子兵法》精深，但注重從政治上考察各種社會矛盾卻是其長。《孫子兵法》從將帥的職責出發，強調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能打勝仗的就是好將帥，對戰爭的性質沒有論及；《三略》等已將戰爭明確區分為義和不義。《孫子兵法》從奪取戰場勝利出發，重“詭”甚於重“信”，重“奇”甚於重“正”，重“智”甚於重“仁”；《三略》等受黃老思想影響，雖然也主張以詭用兵，出奇制勝，但同時更強調以“正”治國，明確“詭”是實行“道”的手段，“道”比“詭”高一層次；以奇用兵要為以正治國服務，“正”占中心位置；軍事謀略與政治謀略兼施，強調政治謀略對軍事謀略的決定、指導和制約作用等。《三略》與《六韜》等一樣，對《孫子兵法》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從而成為有別於正兵家的又一流派政兵家的代表作之一。

## 初期校理時期--秦漢(2)

正兵家與政兵家因有差異，故能互補。中國古代軍事家大致可分為“高參型”和“將帥型”（《問對》稱“張良”型和“韓信”型）兩大類。這兩種類型軍事家的出現，與這兩種傳統軍事文化在他們心理上的不同積澱有著密切關係。

二、西漢和平時期統治者內部對《孫子兵法》高度重視，對外宣傳上卻極力貶斥之；西漢對兵書的三次編訂，對《孫子兵法》的流傳有重要意義

西漢建國後，統治者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亟需建立適應封建大一統政治的思想體系，因此，他們不但注重從政治上、組織上採取鞏固政權的措施，而

且注重在意識形態領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對戰國分裂局面的出現、秦朝興亡的原因等進行了深入探討，以爲現實提供歷史的借鑒。如漢初思想家陸賈從秦王朝的興亡中得出了一條基本的教訓，這就是認爲對天下可“逆取”，但必須“順守”，“取與守不同術”。即奪取天下可採用詭詐之法；但在取得天下後，必須建立嚴格的封建秩序，強化仁義禮教，對戰爭時期必然出現的“詐力”思想和行爲進行清算。他認爲“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強”；強調以柔道治天下，“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長存……柔弱勝剛強”等。賈誼認爲，秦亡天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這樣做，而是繼續實行“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過秦論》）的政策。他提出要守天下，就必須“施仁義”，以“至孝”“至仁”治天下（《數甯》），“厲廉恥，行禮義”（《階級》）。西漢初期曾在社會上造成過“陰謀不祥”的強大輿論，連丞相陳平也自我檢討說：“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足見這場“革心”運動之深刻，輿論之強烈。到漢武帝時，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讓位於儒學，統治者更加強了對人們思想的統治，不允許“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因此，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儒家學者對“先詐力而後仁誼（義）”的社會思潮又進行了進一步討伐，力圖將戰國以來出現的“孔氏之道微，而孫吳之術興”的局面扭轉過來。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以“兵者詭道”、“兵以詐立”立言的《孫子兵法》無疑會受到公開貶責。官修的《漢書·刑法志》對孫子本人及“任詐力”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甚至罵他“身誅戮于前而國亡於後”是應得的報應，反映了兩漢之際占統治地位的某些儒家學者對孫子其人其書貶斥態度之強烈。由於這種政治氣候的影響，《孫子兵法》在社會上的公開地位受到壓抑，其流傳是被嚴格限制的。

但這並不說明西漢統治者對《孫子兵法》不重視；相反，這正是他們高度重視這部兵書的另一種表現。他們認識到，《孫子兵法》既是自己奪取天下的法寶，也會成爲別人推翻自己的武器，在道家“不可以利器示人”和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論的指導下，他們才對之採取了貶和禁的措施，但他們只是不讓人民“知之”，而自己卻是不可不知的。漢朝對兵書進行了三次較大的校理編錄，即說明了這一點。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第一次校理兵書是在高帝時，由“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時間大致在韓信被貶（漢高帝六年，前 201 年）至被殺（漢高帝十一年，前 196 年）這五六年之間。所謂“序次”，當有編排目次和校理本文之意，是否撰有評介性序言，則不可得而知。漢朝廷讓張良和韓信來主持這項工作，足見其對兵書整理工作的重視。後來“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這一方面說明，這些兵法是嚴格保密的，即使“諸呂”平時也無權拿到，可想而知，社會上就更不會允許它流傳了；另一方面也說明，藏者和盜者對這些兵書價值都極端珍視，否則，也就藏者不需如此藏，盜者不必那樣盜了。據載，這次序次兵法共得 182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這 35 家具體是那些，難以確定，但《孫子兵法》在其中當是不成問題的。

第二次整理是“武帝時，軍政揚僕摺摭遺逸，紀奏兵錄”。此“兵錄”既是

“摺摭遺逸”，大概在張、韓定著之 35 家之基礎上有所增益，但《漢志》稱“猶未能備”，是還有缺遺。第三次是孝成帝時，“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這四種分別是“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論次”當有評論性文字，並編排目次。《漢志》對四類兵書的評論大約就取之于任宏之“論”。其論兵權謀類說：“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可知兵權謀大致為談論較高層次的軍事謀略之書，是將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等內容綜合考慮在內的。

西漢對兵書的三次整理無疑對《孫子兵法》等兵書的整編、保存、流傳具有重要意義。曹操撰《孫子略解》即是以漢代傳本為底本進行校注的；宋人又以曹注本為基礎，校編成《武經七書》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此後流傳的孫子書又以此兩本為祖本進行校注刊刻，從而形成了孫子書兩個基本傳本系統。我們目前見到的孫子書多屬於這兩個系統。1972 年銀雀山出土漢簡《孫子兵法》，經整理出版後，目前也在社會上廣為傳佈，成為孫子書的又一傳本族系。可見漢代人對《孫子兵法》的流傳是有重要貢獻的。

### 初期校理時期--秦漢(3)

另外，從漢代的一些統治者的言行中，也可看出其對《孫子兵法》的重視。如漢武帝“勇武知兵法”，他要求霍去病學《吳孫兵法》，可見他對這部兵法的重視。這裡的《吳孫兵法》不應是指《吳子》和《孫子》，而應是《漢志》載《吳孫子兵法》的簡稱。世人雖將孫、吳並稱，但沒有把《吳子》置於《孫子》之前者。這為漢代有《吳孫子兵法》傳世提供了又一佐證。漢代一些將帥在討論軍事問題時也多引用《孫子兵法》，將《孫子兵法》的軍事原則做為決策的理論依據已蔚成風氣。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墓出土《孫子兵法》佚文，也說明了墓主人生前對這部兵法的珍視。1981 年山東省兗州博物館在該縣西關外農機學校內發掘一漢代墓葬，出土畫像石數方，其中一方有孫武畫像，圖像右上角題刻有“孫武”二字，其身旁還有二人，其中一人身材與孫武相當，似與孫武身份相仿佛，另一人身材較小，可能是隨侍人員。據專家推斷，墓主下葬年代可能在西漢末到東漢初。看來墓主人生前也是孫武的尊奉者。這些都說明，孫子和《孫子兵法》在當時的統治層中是深受重視的。

三、《孫子兵法》原本十三篇，但漢代另有八十二篇圖九卷本流傳；銀雀山出土漢簡《孫子兵法》有重要文獻價值。

《史記》稱《孫子兵法》為“十三篇”，漢簡孫子佚文《見吳王》中也明確講到“十三篇”，大通縣上孫家寨漢墓出土木簡中也寫有“孫子曰：夫十三篇”的字樣。可見，《孫子兵法》原本十三篇無疑。但《漢書·藝文志》卻著錄為“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較《史記》等所載十三篇多出六十九篇圖九卷，是孫子後學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所附益。

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在孫子本傳中兩言“十三篇”，非出無意。銀雀山漢墓出土《吳問》等十三篇之外的雜篇既然是漢初抄本，司馬遷就應當見過。孫子

佚文《地形二》中有“右負丘陵，左前水澤”句，與《史記·淮陰侯列傳》所引“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澤”相近；《見吳王》內容與司馬遷所記孫武吳宮教戰之事大致相同，當是司馬遷寫孫子本傳所據史料之一。這些足證司馬遷對這些材料進行過研究。研究過這些雜篇，而在寫孫子本傳中又將其排除在孫子親著之外，這就只有一種解釋：他認為只有“十三篇”才是孫武所著，其餘則非出自孫武之手。為防二者混淆，故兩言“十三篇”以強調之。

《漢志》著錄的《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可能是根據劉向、劉歆《七略》著錄，而《七略·兵書略》又是據任宏“論次”的兵書而來。此書在漢初大概就已流行，它是十三篇與六十九篇圖九卷的合編。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七錄》雲：“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必有所據。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圖九卷很可能就是其所說的中、下二卷。東漢時，此書還在流傳，故班固據以著錄。高誘言孫子書為“兵法五千言”，亦當是針對六十九篇雜篇而言，他的觀點和司馬遷相同，認為孫子所著書僅“五千言”（即“十三篇”，現傳世本為 6000 餘字）而已。他們代表了漢代一派學者的看法；而任宏、劉向父子、班固則取的是另外一說，將當時流行的《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分別著錄於各自的書中。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漢代流行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是包括十三篇在內的，《漢志》之所以未單獨著錄“十三篇”，而只著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原因就在於此。

至曹操時，他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使其得以廣泛流傳。其餘則陸續散佚。杜牧《注孫子序》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這話除“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有些不妥之處，其餘沒什麼錯誤，曹操“削”（刪除）六十九篇之“繁剩”，“筆”（校、注）十三篇之“精切”，乃是事實。但主張“削其繁剩”的卻早有人在，司馬遷，高誘即是。曹操是這一意見的實行者。

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圖九卷大部分當是戰國時人所作。因其已經散佚，我們已很難將其篇目臚列完全。銀雀山漢墓出土《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五篇，在六十九篇之中，當是不成問題的。上孫家寨出土漢簡佚文中有“牡陣”字樣，似與《隋書·經籍志》著錄“吳孫子牝牡八變陣圖二卷”有關，若此，亦可將其列入六十九篇之中。《隋書·經籍志》另外著錄的《孫子八陣圖一卷》、《孫子戰鬥六甲兵法一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通典》卷一五九引“吳子問孫武”（《武經總要》、《太平御覽》、《十家注孫子九地篇》何氏、張預注中亦有摘引，或稱“吳王問孫武”）的一些內容，清人畢以?認為，這些“皆在八十二篇之內也”。這些雜篇和圖，有的闡釋“十三篇”內容，有的記述孫武事蹟，有的講陣法，有的談雜占之術；有的反映有騎兵作戰的戰法等內容，均明顯證明這些雜篇不是出自孫武之手。如此，我們所知的所謂孫子佚文僅有二十餘篇、卷，遠不足六十九篇、圖九卷之數。至於《舊唐志》著錄的《孫子算經三卷》、《蘇州府志》著錄的《孫子兵法雲氣圖一卷》、目前尚存的《孫武子行軍氣色雜占》等，出現甚晚，則不當在八十二篇圖

九卷之中。

#### 初期校理時期--秦漢(4)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孫子兵法》，後經整理小組整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題名為《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此書對我們瞭解漢初（或略早）流傳的《孫子兵法》的情況極有說明。

漢簡《孫子兵法》殘留內容與傳本有關內容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異，其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個別篇題及其順序有異。如傳本《虛實篇》，簡本木牘題為《實虛》；傳本《勢篇》，簡本木牘題為《七勢》。簡本《行軍》在《軍爭》之前，《實虛》在《行軍》和《軍爭》之後，《用間》在《火攻》之前。傳本則相反。二是因假借字、文言虛字造成異文。如《計篇》，簡本“故輕之以五，效之以計，以索其請”，其中“輕”、“效”、“請”分別為“經”、“校”、“情”的通假字。《孫子兵法》開篇首句，傳本均作“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簡本“事”後有一“也”字，語氣上有所變化。三是因避諱造成差異。如簡本《實虛》“兵無成勢，無恒形”，《九地》“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句，傳本大約為避宋真宗趙恒諱，改“恒”為“常”；《軍爭篇》簡本“……旌旗者，所以壹民之耳目也”句，傳本可能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民”為“人”等。四是傳抄校勘有改動，如《行軍篇》，簡本作“合之以文，齊之武”；傳本《孫子兵法》均作“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九地篇》，傳本“非霸王之兵也”，“彼霸王之兵也”，簡本“霸王”均作“王霸”，其義勝於傳本。《形篇》傳本“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句，簡本為“守則有餘，攻則不足”等。但簡本也有些不足，如，《用間篇》“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句後，有“燕之興也，蘇秦在齊”等語即是。說明漢簡本《孫子兵法》在傳抄過程中有人增補，並非盡善盡美。總之，簡本《孫子兵法》為我們更為準確地校讀《孫子兵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也使我們對漢初流傳的《孫子兵法》的情況增加了瞭解。

四、從兩漢時期存世文獻看，漢人注意了對《孫子兵法》思想的闡發；其對孫子其人其書的評介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存世漢代軍事著述不多，較有代表性的是《淮南子·兵略訓》。這篇軍事文論將《孫子兵法》的思想與黃老學派思想相融合，集中論述了自己的戰爭觀、戰略思想、作戰指導原則和治軍思想等，提出了“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的戰爭起源說，“兵之勝敗本在於政”的政勝思想，“乘眾人之智”的將才思想，重視因勢“權變”的作戰指導思想和賞罰嚴明的治軍思想等。文中對《孫子兵法》之文多有徵引和闡發。如其中講到：“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國之寶也，上將之道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等。這些話有的是直接引用《孫子兵法》原文，有的師其意而改其言。還有的對《孫子兵法》的思想有所詮釋或闡發，如文中所舉用兵上、中、下三策即是對孫子“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思想的闡發，“十指之更彈，不

若卷手之一?；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是對孫子集中兵力思想的形象比喻。“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則是對孫子“將能而君不禦”思想的補充。《淮南子》所言用兵“八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也是對孫子“七計”（“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的修補。總之，《淮南子·兵略訓》在沿襲繼承孫子思想的基礎上有一些新的發展。

另外，《鹽鐵論》中也論述了一些軍事問題，其中“故兵者兇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論功》）的慎戰思想，“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險固》）的備戰思想，“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同前）的避實擊虛思想，“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本議》）的貴謀賤戰思想等，與孫子的一些觀點相同或相近。該書《論功》引《孫子》之言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不見今本《孫子兵法》，不知引自何處。

東漢時期，自光武帝起即實行偃武政策，官方在兵學研究上未見有什麼積極舉措，當然也就沒有大的建樹可言。一些儒家學者對《孫子兵法》進行嚴厲的抨擊，其觀點集中反映在《漢書·刑法志》中。他們對《孫子兵法》的貶斥態度和觀點對宋人和清人有較大影響。但東漢時期的許多學者仍注意對這部兵法進行深入研究，並給予中肯評介，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其中較為突出的是王符的《潛夫論》。該書卷五之《勸將》、《救邊》、《邊議》、《實邊》是闡述邊防問題的專論。文中提出的早定戰守之策，選用“明於變勢”的將帥，以“利”激勵士卒，遷內地人民實邊等觀點，都很有見地。文中數引孫子之文，對考察《孫子兵法》在漢代流傳情況及校勘《孫子兵法》本文有參考價值。如《勸將》引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與今本“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有異，是其所據本與今本不同。《救邊》中說：“攻常不足，而守恆有餘”，與《漢書·趙充國傳》、《後漢書·馮異傳》所引孫子之文意同，漢簡本亦如此，而與傳本“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語意相反。是漢代流傳之《孫子兵法》多為如此。另外，黃老帛書《經法·君正》中說：“以有餘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亦是師孫子之意。

#### 初期校理時期--秦漢(5)

另外，在東漢時期其他一些學術著作中，也載有與孫子其人其書有關的言論，反映出這部兵學著作對學術界的影響。如鄭玄注《周禮·春官·車僕》引有孫子佚文：“孫子八陣，有蘋車之陣。”說明注者對孫子之文比較瞭解。王充《論衡·量知篇》中說：“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陳（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強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認為知或學《孫子兵法》者勝，不知不學者敗，對這部兵書的軍事價值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揚雄《揚子法言》對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也評價極高，該書《問道》中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堯舜也。”東漢時期已有人將孔子和孫子及其著述並

稱，如《後漢書·光武帝紀》載：“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乘弊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後漢書·馮衍傳》載有“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等。將儒學經典和孫子吳起之策作爲將相或文武的代表並提，使之互補而不是將其對立起來，這無疑是很有見地的觀點，與當時流行的以孔斥孫、以儒貶兵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一認識影響到後人對孔、孫的看法，如三國韋曜《博奕論》中說：“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亦將二者並提。今人爲孔子、孫子題聯曰：“齊魯名勝地，文武兩聖人”等，都是對這一觀點的肯定和進一步概括。世人將關羽作爲武聖，與文聖孔子並提的做法出現甚晚，遠不能與孔、孫並提相比。孔子和孫子的著述，做爲中國儒學文化與兵學文化的傑出代表，既有對立的一面，更有統一、互補、滲透的一面，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兩條主線，是支撐國家大廈的兩根立柱，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兩個車輪。它們本身的理論價值及文武分爲“二途”這一客觀現實，使孔子和孫子的理論必然不能偏廢其一，其中無論是誰的理論，即使以後再經貶點，都會並行不悖、“傳之至於無窮”的。

五、兩漢時期重視對《孫子兵法》的實際運用，在戰略籌畫、作戰指揮等方面有較高成就

漢人在戰略謀劃方面表現出通攬全域、高瞻遠矚、運用多種知識進行綜合、分析、判斷和進行決策的思維能力，較春秋戰國時期有了較大進步。從這些言論和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孫子兵法》基本理論對當時的實際決策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如上所言，韓信是精通《孫子兵法》的，他的“漢中對”即是對孫子“知彼知己”思想的高明運用。他對當時“霸天下而臣諸侯”的項羽的分析可說是透徹見底，入木三分；對當時力量還較弱小的劉邦也揭示了其本質方面的長處。韓信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的措施和“舉而東”，“定三秦”以爭天下的戰略目標，也是對孫子“知勢”、“造勢”、“任勢”思想的具體運用。再如，賈誼認爲，國家平時時期的一項戰略性任務是防止藩強割據乃至反叛朝廷。他認識到，“勢”是超越人們主觀願往的決定事物發展的客觀力量，在戰略決策上應注意從“勢”上把握和駕馭局面的發展。他說：“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階級》），認爲諸侯王是否造反，並不決定於他們個人主觀的善惡，而是決定於客觀形勢，“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藩強》）。因此，要消除藩強，就必須創造有利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的態勢以制約他們的心理，而不僅著眼於其個人的品質因素。這種制定戰略的出發點與孫子的“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的思想一脈相承，可以說是在維護國家統一、防止民族分裂這一大戰略層面上對孫子任勢哲學思想的具體運用。

在作戰指揮方面，漢代人強調對《孫子兵法》的原則要精思熟慮，得其真髓，靈活運用，以達到出其不意、以奇致勝的目的。韓信背水爲陣堪稱是這方面的範例。他成功地運用了孫子“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的原則，巧於運籌，大膽決策，在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斷己退路，迫士卒自發死戰，

最大限度地發揮部署的戰鬥潛能，並使用正兵相持、奇兵襲後（即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的謀略，取得了對敵作戰的勝利。這一戰例成爲盡人皆知的千古佳話。漢代的軍事指揮人員在討論制定作戰方案時，多以孫子的語錄立論或反駁對方，《孫子兵法》成了他們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如趙充國在平羌戰役中，其意見與朝廷不一致，他在向皇帝申辯自己的理由時多處引用《孫子兵法》之文，如“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等。實踐證明了趙充國意見的正確。再如，《後漢書·皇甫嵩傳》載有皇甫嵩與董卓關於作戰方案的爭論，雙方都以《孫子兵法》的語錄互相駁難，反映了《孫子兵法》在他們頭腦中的權威地位。另外，《漢書·婁敬傳》載婁敬建議劉邦從“全勝”出發，建都關中；《漢書·衛青列傳》載正閔、長史安引孫子“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論證刑罰問題；《漢書·陳湯傳》載其用“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的思想進行決策；《後漢書·楊賜傳》載楊賜與掾劉陶討論用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理論對付黃巾起義等。這些都說明了漢代已將《孫子兵法》的軍事原則廣泛而靈活地運用到了軍事指揮之中。

#### 初期校理時期--秦漢(6)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孫子兵法》在秦漢時期雖然受到禁錮，但由於其自身的價值，仍在社會上不脛而走，流傳不息，正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其在統治集團內部，倍受青睞，精心整理者，奉若神明者，深摩細研者，繼承闡發者，靈活運用者等，大有人在，他們對於傳播、發展、深化《孫子兵法》的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4. 《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是《孫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時期，曹操《孫子略解》是孫子研究進入這一時期的里程碑。這一時期的孫子注爲後人注解和運用《孫子兵法》奠定了基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兵書側重於軍事上的實際應用，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某些思想；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和學術著述折射出這部兵書對社會其他領域的深刻影響。《孫子兵法》在魏晉南北朝較兩漢更受重視；其理論被廣泛運用於軍事實踐之中，從而指導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的上演。

##### 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1)

一、魏晉南北朝是《孫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時期，《孫子略解》是進入這一時期的里程碑，這一時期的孫子注爲後人注解和運用《孫子兵法》奠定了基石

早在魏晉之前，就應已經有人注解《孫子兵法》了。曹操《孫子兵法序》中說，“世人”對《孫子兵法》“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可見在他注《孫子兵法》之前的“訓說況文”已然甚多，只不過由於其學術價值

不高，很快就被歷史的長河淹沒了，所以，這些注本早已不見流傳。甚至連史志中也沒有關於它們的記載。這些“訓說況文”的出現，並不標誌著《孫子兵法》注解時代的開始，充其量只是為這一時代的到來做了必要的學術準備而已。《孫子兵法》注解時代開始的標誌是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這是孫子研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孫子兵法》注本，除了《孫子略解》外，見於記載的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二卷，賈詡《鈔孫子兵法》一卷，曹操、王淩集注《孫子兵法》一卷，張子尚《孫武兵經》，晉無名氏注《孫子》，南北朝梁《孟氏解詁》等。另據明趙庭《孫子取衷》、清朱墉《武經七書匯解》等載，晉杜預也曾注解過《孫子兵法》，但《隋志》、《唐志》等書目不載。可見《孫子兵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有不少注本，已真正進入早期注解的階段。

《孫子兵法》注解時代之所以在這一時期到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當時激烈的軍事鬥爭的需要。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的大分裂時期，歷經 300 餘年，先後出現過 30 個王朝，這就是三國時期的魏、蜀、吳；西晉；北方十六國與南方的東晉；南北朝時期北朝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和南朝的宋、齊、梁、陳。在這 300 餘年中，在中國這一廣袤的大地上，戰爭頻仍，作戰樣式複雜、激烈、多變，爭鬥各方都迫切需要先進的軍事理論作指導，於是，《孫子兵法》就成了他們制勝的法寶。但這部兵書博大精深，言簡義賅，人們很難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掌握其思想內涵；加之從春秋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時間相隔已久，有些語言文字的含義發生了較大變化，必須對兵法中的這些字詞進行訓解，人們才能理解其本義，進而掌握各句、段、篇的思想。正如曹操在《孫子兵法序》中所說，《孫子兵法》“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為了讓人們正確地理解和掌握這部兵法，就需要對之進行準確地注解。這種客觀形勢的需要是注解《孫子兵法》之書在這一時期陸續出現的首要原因。其次，當時注解《孫子兵法》也有了充分的條件。經過長期的軍事實踐和軍事理論研究，魏晉南北朝人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軍事經驗，軍事理論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們從前人訓解儒學經典的方法中受到啓示，很容易將這些方法移植到兵書注釋工作中來；東漢末以來，兵書逐步從被禁錮中解放出來，《孫子兵法》的流傳管道有所拓寬，人們見到這部兵書的機會多了；魏晉人的思想從兩漢經學的束縛中逐步解脫出來，進入了比較解放活躍的時期，所謂“漢人守經，魏晉人執權”，即反映了這一變化。這為注釋《孫子兵法》提供了思想上的條件。總之，形勢需要，條件成熟，《孫子兵法》的早期注釋時期應運而至。

下面我們就對這一時期出現的《孫子兵法》注本做些考察。

#### （一）《孫子略解》

此書後人或稱《魏武帝注孫子》、《曹注孫子》等。《魏武帝注孫子》此書名顯系後人所加，曹操不可能自稱為“魏武帝”。曹操自序稱其注為“略解”，曹注的本名似應為《孫子略解》。又《隋志》著錄“《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到《新唐志》就直書為《魏武帝注孫子》三卷，書題似是唐人

所改。後人簡稱其為《曹注孫子》。此書作成時間已不可詳考，注中舉有作者擒呂布之例，此事在建安三年（198年），書成必在此後。成書的下限已很難做出準確推斷。杜牧認為曹注孫子簡略，是因為他想“自于《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后盡解其書”。如果杜牧此言不錯，那麼，《曹注孫子》應寫成于《新書》之前。據傳，曹操曾將《孟德新書》給張松看，似在劉備入蜀（211年）之前，《新書》就已寫定。那麼，《曹注孫子》又應在此前了。如是，曹注作成應在198年至211年之間。當然，這些只能做為一種推測和參考。

《曹注孫子》原刊本已不可見。《隋書·經籍志》著錄為二卷，並注：“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十三卷；《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作三卷；《郡齋讀書志》則作一卷。可見此書版本甚多。此後各代官私書目一般都有著錄。可知其一直流傳不衰，歷代均受重視。至宋神宗時，頒行《武經七書》，只有《孫子兵法》有曹注，其餘六書均無注。《武經》本《孫子兵法》後來成為孫子書流傳的一個重要版本系統。另外，各代流傳的《孫子兵法》集注本中都有曹注，主要有：《曹操、王淩集解孫子》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曹（操）蕭（吉）注孫子一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曹（操）、杜（牧）注孫子三卷》（《宋史·藝文志》著錄），《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五”當為“三”之誤）。《十家注》本後來逐漸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又一重要版本系統。可見，《武經》本《孫子兵法》、《十家注》系統各本都是在曹注本基礎上形成的。除此之外，曹注單行本自身也做為《孫子兵法》的一個重要版本而繼續流傳。存世主要版本有：明陳錫校訂《魏武帝注孫子》三卷本（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刊《孫子吳子五卷》合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明刊《武經七書》本，清嘉慶五年（1800年）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影宋刊《孫吳司馬法》本等。

## 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2)

查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影宋刊《孫吳司馬法》本有曹注312條；而《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則有曹注321條。是《十家注》本有所增衍，或平津館本有所脫漏。如《作戰篇》“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句下，《十家注》本有曹注百餘字；《孫吳司馬法》本此處無注。曹注主要特點：一是其注受漢儒治經的影響，重名物訓詁；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有“禦軍三十年”之經驗，更重實際應用。因此，其注《孫子兵法》理論性、實踐性兼備，是諸家注中較全面者。二是訓解簡潔而多能得其要旨。如注《勢篇》“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句說：“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注《行軍篇》“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句說：“文，仁也；武，法也”；注《作戰篇》“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句說：“鈍，弊也；屈，盡也”。文字簡煉而切要，對於後人理解《孫子兵法》本義具有開創性意義，後來注家多依其說。三是少量徵引他書言論、史例及個人實踐體會等闡發《孫子兵法》義旨，有的有新的發揮。如《作戰篇》“取敵之利者，貨也”句，注引《三略》之言說：“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注《謀攻篇》“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句：“《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使之互相

印證，不須另言，已足可令讀者舉一反三，深悟其意而有回味無窮之感。同篇“用兵之法，十則圍之”句下，注雲：“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等而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這種參證、例釋雖不多，但開後來《孫子兵法》注家參證和以例釋義之先河；其不拘泥章句的思維方式則可啓智益慧。四是曹注本在文字校勘方面有很大價值。其注中有“一雲”、“一作”、“一本作”之類的話，說明曹操曾用不同版本的《孫子兵法》進行過參校，因而成爲後人最爲信賴的本子之一。宋《武經七書·孫子》就是以曹注本爲底本進行校勘的；《十家注》本也深受其影響。曹注本、《武經》本、《十家注》本三本相較，曹注本仍有獨勝之處。如《勢篇》曹注本“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武經》本無“圓”字，不如曹注本；《十家注》本《九地篇》臆增“焚舟破釜”，則較曹注本劣甚。但曹注也有不足，其主要問題是對孫子思想從戰略上注解不足，而只從戰法、戰術上著眼；有的注釋因過於簡略而言不盡意；有的則訓詁不夠準確，如注《計篇》之“官道”爲“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將“官道”分開解釋，在“道”前臆增“糧”字；注《用間篇》“行火必有因”爲“因奸人爲內應”，失之偏狹，“因”不獨指“內應”，更不僅指“內奸”，還包括其他可利用的客觀條件。又謂《形篇》之“九天”、“九地”是指天時、地利，亦誤。

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孫吳司馬法》本《孫子》校勘精審，刊刻亦好，是曹注之善本。此本據宋本《孫吳司馬法》重雕。原書由清顧之逵小讀書堆收藏，得之“華陽橋顧氏”，由顧廣圻摹寫上版。黃丕烈《黃顧遺書·蕘圃藏書題識續錄》稱此摹本與原書“纖悉無二樣”。此本分上、中、下三卷，每頁 11 行，行 20 字。原宋刊本已不知去向，此重雕本遂成爲《曹注孫子》的重要傳本。此書《孫子兵法》本文與《武經七書》本基本相同，但個別地方略有差異。如《作戰篇》，孫雕本“力屈財殫”，與明刊《武經七書》本同，而《續古逸叢書》本無“財殫”二字；《軍爭篇》“故夜戰多火鼓”，明刊《武經七書》本“火”作“人”，而《續古逸叢書》本“火”作“金”，以“火”爲善；《行軍篇》，孫雕本“雖無武進”，明刊《武經七書》本同，《續古逸叢書》本“雖”作“唯”等。

## （二）其他《孫子兵法》注本

沈友撰《孫子兵法》二卷，佚。此書《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吳錄》中有載。《隋志》、舊新《唐志》、《通志》均著錄此書，但史料中未見有徵引此書內容者，故其內容不詳。此書的成書時間大約與《曹注孫子》相前後。沈友（176-204），字子正，吳郡（今蘇州）人，一說豫章（今南昌）人。博學善著文，兼好武事，又辯于口，時稱筆、舌、力“三絕”。被孫權聘請到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獻並荊州之計，被孫權採納。後遭庸臣譖毀，被孫權所殺，年僅 29 歲。

賈詡《鈔孫子兵法》一卷，佚。此書《隋志》、《通志》有著錄。《日本國見在書目》作“孫子兵法一卷，巨詡撰”，“巨”當爲“賈”之誤。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肅武威）人，知權達變，史稱其爲“（張）良、（陳）平之亞”。

官渡之戰時，曾勸說張繡投降曹操，獻計打敗袁紹，後又謀破韓遂、馬超等。此人足智多謀，當得益于《孫子兵法》甚多。魏文帝時，官至太尉，進封魏壽亭侯。年 77 卒。此書當不止是抄錄《孫子兵法》原文。《日本國見在書目》稱之為“撰”，應有作者撰寫之內容。

曹操、王淩集注《孫子兵法》一卷，佚。這是所見著錄最早的《孫子兵法》集注本。王淩（？-252），字彥雲，魏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漢司徒王允之侄。曹丕稱帝后，拜散騎常侍。領兵征戰，多有戰功，布政施教，亦甚有綱紀。司馬懿誅殺曹爽，被進為太尉。後陰謀廢立，謀泄，司馬懿領中軍進討，王淩迎降。後飲藥死。時在嘉平三年（25 年），成書當在此前。孫星衍《孫子十家注序》說，疑《通典》“用曹公、王淩諸人注，故有‘王子曰’，即淩也”。從《通典》所引“王子”注看，其注側重闡發義理，而不在訓詁，較為通俗，善用比喻，語言也較洗煉。如注《計篇》“士卒孰練”句說：“士不素習，當陣惶惑；將不素習，臨陣暗變”；注“賞罰孰明”說：“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注《計篇》“卑而驕之”句說：“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注《虛實篇》“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句說：“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等。《長短經》卷九《還師》中所引“王子”之言，亦有此特點。

### 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3)

張子尚《孫武兵經》，佚。此書《隋志》著錄為二卷，《通志》作三卷。張子尚，事蹟不詳。有人因《隋書》始著錄其書，視其為隋人，不可靠。查《隋志》將此書著錄于魏武、王淩集解《孫子兵法》和賈詡鈔《孫子兵法》之間，其前、後之撰者均為三國時人，故從位置上看，是將張子尚列為三國時人。近人支偉成《孫子兵法史證·序》中說：“魏王淩、張子尚、賈詡，吳沈友並有注，今均亡佚。”稱張子尚為魏人，當亦據此。以“兵經”名孫子書者，子尚為第一人。這表明，《孫子兵法》在這一時期的社會地位已有了很大提高。

敦煌晉寫本孫子注，此書僅存相連兩頁的下半部分。此殘頁原由日本大穀光瑞（一說香川默識）《西域考古圖譜》收錄。羅振玉將其編入《漢晉書影》中，稱之為“晉代孫子注殘紙”。此殘頁中間有橫向界欄，上下各 8 行，兩頁共 16 行。1-13 行是《孫子兵法·謀攻篇》的結尾，第 14 行可能是空行或注文，第 15 行應是《形篇》篇題，因寫在上半頁而缺。第 16 行為《形篇》開頭的下半句。每行 14-16 字不等。有雙行夾註兩條。此殘頁之文與存世孫子書在內容上有些差異。如第 1 行注文“隙”寫作“ ”；第 4 行“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今本“軍中”作“三軍”，《通典》卷一五五、《御覽》卷二七二引文卻與此同。第 4-6 行“不知三軍之任而同三軍之權則軍士疑覆矣”，其下有注：“覆，敗也”，今本“任”“權”二字互倒，且無“覆”字。第 10 行“將能而君不禦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今本兩句互倒。這說明，此書不同於今存所有版本，是已經佚失的又一《孫子兵法》注本。注者已不可考，不知其與前人所說的杜預注孫子有

無關係。

《孟氏解詁》二卷，此書或題《孟注孫子》、《孟氏解孫子》，南朝梁孟氏注。《隋志》、《通志》、舊新《唐志》均有著錄。《宋志》著錄《五家注孫子》三卷中有其注，此書及孟注單行本均亡。其注現存《十家注孫子》系統各本中。孟氏，失名，事蹟不詳。《隋志》著錄為“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後人因謂為南北朝時梁人。《郡齋讀書志》在《紀雙注孫子》條後言其為唐人。誤。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多將其注置於杜牧之後，有的則在諸唐人之後，宋人之前，比較混亂。孫星衍校《孫子十家注》始將其定位于曹注之後，唐人之前。

查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存孟注僅 68 條，是注文數量最少的一家，似有佚失。其注偏重文字訓詁，較少思想闡發，是諸家注中訓詁派的代表者。其注文大多可采。如注《虛實篇》“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句說：“策試敵情，觀其施為，則計數可知”；注“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為“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甚得其義。注《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之“道”為“權術”，與諸家注異，可為一家之言。明人趙本學謂孫子之“仁義”為“詭譎之辭”，與孟氏這一觀點相通。總之，其注對後人理解《孫子兵法》本義有一定影響。但有的注釋則明顯不妥。如《地形篇》“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孫子明言寧可違君，不違“戰道”，孟氏卻解為“甯違於君，不逆士眾”。“士眾”與“戰道”相去甚遠，此注顯然未逮其意。

從我們所見到的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注文內容看，此時之注偏重文字訓詁。王淩注雖已顯露闡發義理的端倪，但可惜所留佚文甚少，難以窺其全貌。總之，魏晉南北朝是《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在注釋內容和方式上具有開拓性意義，但又有不盡完善之處，因而為後來注家留下了可供思考的廣闊天地。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兵書側重於軍事上的實際應用，其中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某些思想；一些文學作品和學術著述折射出這部兵書對當時整個社會的深刻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存世兵書甚少，從這些兵書的內容和存目兵書的書題看，這一時期的兵學著作側重於實際運用，理論創新不是其關注的重點；論述戰役戰術和軍事技術如關於陣法、火攻、軍令、射法、雜占等內容的書較多，講戰略基本理論方面的著作較少。晉人司馬彪雖撰有《戰略》一書，但從其內容看，也只是選收有關軍事謀劃方面的言論事例等，並非論述戰略的基本理論，他的“戰略”和我們今天說的“戰略”在概念上有很大不同，大體可解釋為關於戰爭和作戰的謀略。有的著作則受玄學的影響，內容過於抽象玄虛，走到另一極端。（如《陰符經》就大概成書於這一時期），有些兵書內容注意祖述和發揮《孫子兵法》的思想，有的有所發展。

下面我們就對這一時期與《孫子兵法》有關的兵書作些介紹。

《兵書接要》，佚。《隋志》著錄為十卷，注“魏武帝撰，梁有《兵書接要別本》五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新唐志》作七卷，署作者為“孫武”，“孫”當為“魏”之誤，即此書的撰者是曹操（魏武帝），而不是孫武。《三

《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既是“抄集諸家兵法”，其中當有《孫子兵法》。曹植疏陳舉之義雲：“揚風後之奇，接孫吳之要”，亦可為佐證。古“接”“捷”通，“接要”謂掌握兵法要領之捷徑。此書內容可能有似於現在的兵法語錄類編。《太平御覽》卷八、卷十一分別引有此書語錄數段，為風候雜占之語，說明書中抄有這一類內容。一說，“接”是續接之意，“接要”謂續接孫吳兵法之精要。《隋志》另著錄魏武帝撰《兵法接要》三卷，未知二書異同，很可能為一本。

#### 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4)

《續孫子兵法》二卷，佚。《隋志》始著錄，魏武帝撰。新《唐志》、《通志》、《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同。此書內容很可能是《孫子兵法》十三篇之外的雜篇，曹操將其從《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中剔除後，另編成二卷，取名為“續”，是為使之有別于《孫子兵法》，明其為孫武后學所續，而非孫武所作。但此書亦有可能是曹操本人撰述。

另外，司馬彪《戰略》中也載有與《孫子兵法》有關的內容。如《傅嘏》中記其論證征吳之事，較《三國志》為詳。論中講到，“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主張派出間諜，瞭解敵情，並引《孫子兵法》之文：“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根據“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的原則，提出使吳“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的策略，要求“計于全勝”，“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等。這些引文無疑都直接或間接地取之于《孫子兵法》。

舊題黃帝時大臣風後撰《握奇經》，後附晉平虜護軍、東羌校尉馬隆撰《八陣總述》一卷，總述中講到，“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兵體無形，形漏必潰”，“上兵伐謀，其下用師”，“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等，亦由《孫子兵法》之言脫胎而來。

舊題為諸葛亮撰的《便宜十六策》和《將苑》也多有祖述和闡發《孫子兵法》軍事思想之處。《便宜十六策》，《三國志》所列諸葛氏集目錄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有《武侯十六策》，當即此書。今本有的內容為《太平御覽》所引。據舊、新《唐書》中《馬周傳》及《資治通鑒》等史料記載，馬周曾為中郎將常何撰“《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不知其“《便宜》二十餘事”是否與此書有關，今本《便宜十六策》或是其遺存，也未可知。此書中即有對《孫子兵法》思想闡發的內容，《治軍第九》中就多有明引、暗引、闡釋《孫子兵法》之文。如“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智者先勝而後求戰，暗者先戰而後求勝”，“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五間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等，均源之于《孫子兵法》。《將苑》，亦稱《新書》、《心書》，《遂初堂書目》始見著錄，當是後人偽託之作。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諸葛亮的思想。此書《兵權》、《揣能》、《情勢》、《察情》等篇中多有肯定、修補、發揮《孫子兵法》思想的內容。此書是我國古代論述將帥修

養的專著，強調將帥要有“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壹意而已”（《將志》）的良好品質；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和軍事才能；要善於選賢任能，強調法制；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戰誠》）等，較《孫子兵法》關於任將問題的論述更為具體，且有一些發展。

《孫子兵法》對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和學術著述也有一定影響。《文選》中有些篇章講到孫子，或其用典出自《孫子兵法》。如左思《吳都賦》“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強楚于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魏都賦》：“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朝無印，國無費留”，其中“奇正”、“費留”均取之《孫子兵法》。張華《鷦鷯賦》：“翳蒼蒙籠，是焉遊集”，注雲：“《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籠’”。張景陽《雜詩》：“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是從《孫子兵法》“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句變化而來。又，《晉書·殷浩傳》：“論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庾信《周齊王憲神道碑》：“六韜九法不用吳起舊書，三令五申無勞孫武先戒”，等等。這說明當時的許多文化人也曾學過這部兵法，對其中的詞語能信手拈來，用於文學創作之中。有些學術著作也有《孫子兵法》影響的痕跡，如魏劉劭撰《人物志》講“謀廟勝”（《流業》），談“法制”、“分數”（《接識》），論“攻守”（《材理》）等；《意林》卷四引：“孫子曰：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引文不見“十三篇”，當是孫子後學所為。晉傅玄撰《古今畫贊》中有《孫武畫贊》，其贊雲：“孫武論兵，實妙於神，奇正迭用，變化無形。”此贊言簡意賅，道出了《孫子兵法》的精要，說明作者曾對《孫子兵法》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據《孫子兵法》“廟算”及“地”、“度”、“量”、“數”、“稱”、“勝”之說敷衍而成的數學演算法之書《孫子算經》，大概出自北周數學家甄鸞之手。另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讚說：“孫武兵經，辭若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程器》）北齊劉晝撰《劉子·兵術》中大量引用《孫子兵法》之言或闡發孫子思想。如“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等等。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中，也有《孫子兵法》引文。這些都說明，《孫子兵法》在這一時期的影響有了進一步的擴大。

#### 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5)

魏晉時的文化人之所以研讀《孫子兵法》，固然與他們為在著述時追求文字的奇瑰、對偶等而獵奇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侯外廬等先生指出，魏晉社會有四個戰場：一是農民或流人的暴動；二是五胡入侵；三是名族的政爭；四是概念世界的名理賭場。所謂“名理賭場”，就是清談、論辯。此風在當時十分盛行。論辯勝負對論辯者個人名聲、地位、前途等影響甚大，葛洪說：“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以刺，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劉劭說：“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

傑，以讓敵為回辱，以陵上為高厲。”顏之推說，爭辯者即使“埋伏”，也要“辭勝”。說通俗些，就是無理也要攪三分。可見當時人在辯論中爭強好勝情況之一斑，他們較之戰國時辯士，更注重口舌之爭的一時勝負，為此而玩弄概念遊戲，講究詭辯技巧，並不太顧及這種辯論結果對社會的影響如何。從某種意義上說，《孫子兵法》是關於鬥爭藝術的學說，其理論對於所有的鬥爭，包括唇槍舌戰在內，都有指導意義。這些文化人為在“往返詰難，依方辯對”中取勝，在“政爭”中獲得主動權，研讀這部兵法，揣摩“理賭”之道，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孫子兵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較兩漢倍受重視；其軍事理論被廣泛運用到作戰指導和軍隊建設之中，從而導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

由於兩漢時期經學和神學占統治地位，嚴重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孫子兵法》在社會上遭到嚴厲貶斥，其流傳受到嚴格限制。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階級對社會的思想統治有所減弱，人們的學術思想得到了一定解放。加之這一時期戰事不斷，各政治集團都在極力尋求戰爭致勝之道。《孫子兵法》因此受到高度重視。一些帝王不但自己帶頭學習研究《孫子兵法》，身體力行，而且要求部署也這樣做。如曹操親自注解《孫子兵法》，還經常對將士進行言傳身教；孫權要求呂蒙、蔣欽“急讀《孫子》”；後漢主劉淵“尤好《春秋左氏法》、《孫吳兵法》”。從晉和南北朝的一些開國帝王的言論和有關史料記載中，可知他們也大都學習過此書。如宋武帝劉裕謀略出眾，用兵多合於《孫子兵法》，他的言論中有“吾等既為‘同舟’”，“兵貴神速”，“眾寡”、“虛實”等詞彙，可知他精通此書之道。再如，後趙主石勒目不識書，就請人代讀史書，其用兵善於出奇制勝，晉將劉琨稱讚他“暗與孫吳同契”。一些謀臣武將，從實戰需要出發，極重視《孫子兵法》，這一點我們下面專門講到。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孫子兵法》軍事運用最為輝煌的時期之一。滄海橫流，英雄輩出，《孫子兵法》更顯現出它的兵經本色。運用《孫子兵法》突出者，如曹操、諸葛亮、司馬懿、滿寵、鄧艾、鐘會、羊祜、杜預、劉裕、崔浩、慕容恪等。概括起來，他們在運用《孫子兵法》方面有這樣幾個特點：

重視謀略致勝。眾所周知，《孫子兵法》在作戰指導上崇智尚謀。這一思想深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軍事家們所重視。如曹操用兵以詭詐著稱，諸葛亮稱他“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後出師表》）。在獎賞方面，他提倡“慮為功首，謀為賞本”。諸葛亮是著名的謀略家，被人們視為智慧的化身，多謀的象徵。司馬懿老謀深算，詭詐不遜於曹操，在征公孫文懿時提出“兵者詭道，善因事變”的主張，其指揮作戰，以詭詐取勝的事例甚多。魏晉南北朝軍事史中可說是奇謀迭出，變化莫測，讓人目不暇給。貴謀尚智已成為當時時代的風尚。

直接用《孫子兵法》的謀略指揮作戰的典型事例也很多，反映了這一時期軍事指揮員對這部兵經內容的閑熟。試舉數例：用於敵情判斷：西元 234 年，諸葛亮率軍伐魏，司馬懿堅壁不出。諸葛亮用計激司馬懿出戰。司馬懿為控制部隊的求戰情緒，採用借旨逼將之法，請皇帝下令不准出戰。諸葛亮分析其心理說：“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

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此分析可謂鞭辟入裡，一語中的。“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即乃孫子之名言。西元 537 年，東魏高歡為報潼關之敗，率眾渡河涉洛，至於沙苑攻打西魏宇文泰，西魏將盡皆失色。宇文泰族子宇文深分析說，高歡“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所謂“忿兵”，即孫子所說的“怒而興師”、“慍而致戰”之兵。事實證明宇文深的這一分析是正確的。?用於欺騙：三國魏將滿寵為誘騙東吳水軍登陸，達以己之長擊彼之短之目的，上表建言：“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福生於內矣。”滿寵用此計亦獲得成功。?用於奇襲：三國魏將鄧艾攻蜀，建言由陰平入蜀，以“奇兵沖其腹心”，並引《軍志》之言：“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掩其空虛，一戰破蜀。“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見於《孫子兵法計篇》。三國魏將毋丘儉、文欽反，謀士王基向司馬師進言：“兵聞拙速，未睹工遲之久”，勸速進兵征討。司馬師想等各路軍集合齊後再出發，王基說：“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於是先敵進據南頓（今河南項城西），毋丘儉果然來爭，聞王基先到，只好退保項城。?用於圍困：十六國時，前燕大臣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今山東益都），圍而不攻，眾將請戰，慕容恪說：“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慕容恪因此亦獲得成功。“十圍五攻”即《孫子兵法謀攻篇》中“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的簡略說法。

#### 早期注解時期--魏晉南北朝(6)

講究伐交藝術。《孫子兵法》是多極鬥爭時代的產物，其思想適用於多極戰略格局下軍事的、外交的、政治的等各種形式的鬥爭。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錯綜複雜的三角乃至多極鬥爭為《孫子兵法》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多極鬥爭中重要的鬥爭方式是“伐交”。為此，《孫子兵法》提出了“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論斷；主張結交諸侯，爭取盟友，“衢地合交”；認為要結交諸侯，首先須知其謀，“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強調要有威懾力量和善於使用威懾手段，孤立分化敵人，“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等。孫子的這些論述為多極格局下的伐交鬥爭提供了理論武器。三國時魏、蜀、吳之間的三角鬥爭，或蜀吳聯合以抗魏，或魏挑起吳蜀之爭而坐收漁利，或蜀為聯吳抗曹而實行“略其讐情，求犄角之援”的策略等，將三角下的伐交藝術推向了極致。南北朝時的伐交鬥爭也是異彩紛呈，如石勒以伐交手段分化晉軍，攻滅王浚；劉裕挫敗後秦的虛聲恐嚇，堅持攻打南燕並取得勝利；崔浩為實施先北後南戰略採取聯友分敵手段；宇文泰制定西輯北撫方針等，都體現了伐交與伐兵相結合的思想。

注重攻心戰是三國時期伐交鬥爭的一個重要特點。諸葛亮實行“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的攻心策略，並取得成功，已是盡人皆知的故事。另外，司馬氏統一三國，實行了“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的手段。鐘會在蜀將薑維投降後的上言書中講到：“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根據孫子的這一思想，他禁止士卒抄掠，虛己誘納蜀人。晉將羊祜“尤好……孫吳兵法”，爲邊將時，“與吳人開布大信”，“綏懷遠近，大得江漢之心”。吳將陸抗認爲，“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告誡諸將：“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雙方展開了以“信義”和“德量”爲武器的政治攻心戰。三國時期以攻心爲重點的伐交鬥爭，配合軍事手段以取得對敵鬥爭的勝利，這在中國軍事史上頗具特色，從而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伐交思想。

用以指導治軍。魏晉南北朝人注意運用《孫子兵法》的理論指導治理軍隊，在有些方面對《孫子兵法》的思想有所發展。如，諸葛亮攻魏，因失街亭之罪而將守將馬謖斬首，蔣琬等爲馬謖講情，諸葛亮說：“孫吳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堅持依法從事。孫子過分強調將帥的作用，而對士卒的作用有所忽略。諸葛亮則提出，“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這是對孫子上述觀點進行“矯枉”而採取的“過正”說法，目的在於強調法制和士卒的重要，這一思想較孫子的說法有所發展。

孫子主張將帥要“智、信、仁、勇、嚴”兼備，以“智”爲首；治理軍隊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既強調“視卒如愛子”，又反對“愛而不能令”，要恩威兼施，以得其死力等。這一時期的許多君主將帥都實踐了這些思想。他們在選拔人才上都主張任用謀略型人才。如曹操要求“舉賢勿拘德行”，“舉士勿廢偏短”，劉備三顧茅廬邀請諸葛亮出山；苻堅得王猛，稱“若玄德之遇孔明也”；石勒建“君子營”，重用張賓等，都說明了他們對謀略型人才的高度重視。這與孫子“智”爲“五德”之首的思想相一致。這一時期在治軍上賞罰嚴明、恩威並施的事例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注解和運用《孫子兵法》方面均有重要成就。這些成就上承秦漢之餘緒，下開隋唐之先河，對後來的《孫子兵法》研究和運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5. 《孫子兵法》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

孫武在隋唐五代時期大致處於兵學“亞聖”的地位，但其兵書《孫子兵法》的理論價值實際上被視爲當時諸兵書之首。這一時期是《孫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時期，注家蜂起，異彩紛呈，內容、形式均有創新。這一時期頗多建樹，特別是在唐代，其戰爭指導藝術堪稱是冷兵器時代的一個高峰。

### 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1)

一、孫武在隋唐五代時期大致處於兵學“亞聖”的地位，但《孫子兵法》的理論價值實際上被視爲當時諸兵書之首

孫武在隋和五代時期的兵學地位，史籍中未見有具體記載，但其理論價值爲此兩代所重視，是確定無疑的。《隋書·經籍志》載有以“孫子”命名的兵書七種，《通志·藝文略》另載有《蕭吉注孫子》一種。無“孫子”之名的兵書中，也很可能包含有《孫子兵法》的內容。孫子書在當時不但種類較多，而且其在諸兵書中的位置也是被擺在前面的。五代時期戰亂頻仍，對兵書在內的古籍無暇整理，故這一時期留下來的兵書極少。顧氏《補五代史藝文志》僅錄五代兵書一種；《通志·藝文略》又錄二種。且均已散佚。《宋史·藝文志》另錄有張昭《制旨兵法》十卷，從有關史料看，此書多闡發《孫子兵法》本旨的內容。五代將帥用兵，亦多有稱引《孫子兵法》者。由於戰爭實踐的需要，孫子及其兵書較承平之世更受到當時人們的重視。

孫武在唐代被統治者明確置於兵學“亞聖”的地位。《新唐書·禮樂五》載，唐人以姜尚爲兵家的代表人物，並試圖以其與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相並列，用於宣揚國家文武並重之意。這反映了當時人們提高兵學地位的心理要求。貞觀時，曾下令在?溪（在今陝西寶雞東南，傳爲太公垂釣處）立太公廟。到開元十九年（731年），朝廷令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漢張良配享。後由於天下戰亂，軍事日益受到重視，姜尚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幅度提高。到上元元年（760年），詔尊姜太公爲武成王，以太尉獻祭，祭奠規格與被封爲文宣王的孔子相同，並仿文宣王下設“十哲”的做法，于武成王下亦設“十哲”，稱爲“亞聖”。其中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于左；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列於右。孫武只是被視爲太公十個弟子中的普通一員，其地位尙未突顯出來。到建中三年（782年），又於“十哲”之下，列古今名將64人圖形配享。朝廷的這些舉措，引起了一些大臣的非議，其主要觀點是，姜尚本是殷臣，“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封其爲王，與當時弘揚“立節死義”以維護唐廷的宗旨相悖；另外，姜尚主張使用權謀，“使武成之名，與文宣爲偶；權數之略，與道德齊衡，恐非不刊之典也”，建議去掉武成王封號，恢復只在?溪立太公廟的規定。但一些武將不同意，他們說，“兵革未靖，宜右武（推重軍事）以起（弘揚、培植）忠烈。今特貶損，非勸也”，“文武並宗，典禮已久，改之非也”。皇帝沒辦法，只好將兩種意見折衷，命將原來的太尉獻祭改爲將軍獻祭，其餘不變。但到貞元二年（786年），又命去亞聖“十哲”之名，唯享武成王及留侯張良。到天 二年（905年），又規定，武成王之“制度配享，皆准故事”。可見，武成王在唐代的地位因時局變化而不斷浮沉，作爲兵家“亞聖”之一的孫武自然也隨之而低昂。

姜尚是兵家鼻祖，將孫武置於其下尙好解釋；張良系漢代謀臣，在孫武之後，亦將其置於孫武之上，表明了當時人們在公開場合尊崇“政兵家”甚於“正兵家”的傾向。孫武在唐代的名份雖低於姜尚和張良，但其兵書《孫子兵法》已成博大精深之兵學理論體系，其理論價值高於當時流行的諸兵書，因而，實際上已被人們視爲兵書之冠，倍受兵家重視。從新舊《唐志》看，唐代注疏《孫子兵法》者甚多，而對被認爲是姜尚所作的《六韜》等兵書注疏者明顯少於此書。李世民、李靖等人論兵，對《孫子兵法》推崇備至，對其理論多有闡發，如，李世民說，

“朕觀讀兵書，無出孫子”，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等，其中“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皆取之《孫子兵法》。書中載李世民君臣對其他兵書論及較少。從現有史料看，唐人雖沒有象宋人那樣，給當時流行的幾部重要兵書排列序位元，但從論述情況看，無疑是將《孫子兵法》擺在首位。

李世民認為，天下可“逆取”，但必須“順守”，即取天下時可以不擇手段，一旦達到目的，就必須用仁義禮信之說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在和平時期，唐王朝同其他王朝一樣，對公然宣傳“兵者詭道”的《孫子兵法》不會公開給它很高的社會地位，更不會將它作為治國的經典。當時的一些儒家學者對姜尚尚且主張貶抑，對孫武也就可想而知了。另從有唐一代兵學的發展情況看，其大致呈“興—衰—興”馬鞍形狀。唐代初期，兵學興盛，出現了一批兵書。究其原因，一是經過戰爭實踐的人們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二是建國後比較安定，為對軍事進行理論總結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三是當時統治者懂得軍事的重要，較重視武備。太宗之後至安史之亂前這一時期，兵書為史籍所著錄者甚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人們在承平日久的情況下對軍事問題的輕視和忽略。杜牧在《注孫子序》中說，士大夫以談兵為恥，即反映了這一社會狀況。後來發生了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人們才又懂得了軍事的重要，於是談兵者又多起來。所以，安史之亂後，又出現了不少的兵書。《孫子兵法》作為兵學的代表作，其命運與這一“馬鞍形”亦應是一致的。

## 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2)

二、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時期，注解的內容和形式均有創新。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是《孫子兵法》注解時代的發端時期，那麼，至隋唐五代就達到了高峰，注家蜂起，異彩紛呈，內容、形式均有創新，為宋明《孫子兵法》疏解闡發時代的到來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注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注孫子》、《孫鎬注孫子》、《紀燮集注孫子》等。從流傳下來的注解內容看，這一時期的注孫子之書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現將這一時期幾個主要注本分別簡要介紹如下：

《蕭吉注孫子》，隋朝蕭吉（？—約 615）注。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蕭懿之孫，後歸順隋朝，官至太府少卿，加位開府。此人性情孤峭，博學多通，精於陰陽算術。除此書之外，他還另著有《金海》三十卷。《蕭吉注孫子》，佚。《通志·藝文略》始見著錄，一卷。《宋史·藝文志》著錄同。《國史經籍志》則作三卷。《宋史·藝文志》又雲：“或題曹、蕭注”。如此，則應是曹操與蕭吉的集注本。《崇文總目》作“蕭古注”，“古”乃“吉”之誤。民國蕭天石撰《孫子戰爭理論之體系》稱，作者曾于蘭陵書院見過此抄本，後不知其所終。因此書已不可見，故已難知其詳。

《李筌注孫子》，唐朝李筌注。李筌，道號達觀子，生平事蹟不詳，約為玄

宗至代宗時人。《直齋書錄解題》謂李筌撰《闔外春秋》，于“天寶二年上之”。巴黎圖書館藏敦煌本《闔外春秋》殘卷進書表末署“天寶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與《直齋書錄解題》所記時間相符。應是比較可靠的。這說明李筌在天寶二年（743年）時還是個普通百姓，並在今河南少室山隱居。《集仙傳》說他有將略，官作到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後入山訪道，不知所終。今傳本《太白陰經》前有李筌自序及進書表，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永泰無“四年”，永泰二年十一月即改元為大曆。如不是傳抄刊刻錯誤，則可肯定此序為後人偽託。《李筌注孫子》，《新唐志》著錄為二卷，《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郡齋讀書志》則作三卷，單行本已不可見，其注現存《十家注孫子》系統各本中。《郡齋讀書志》說，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李筌注孫子》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他較早注意到從整體上把握《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探討十三篇各篇次序與其思想脈絡的關係，而不僅僅是解詞釋字，為後人系統理解《孫子兵法》的思想開闢一新的思路。二是他的注解也有一些新的發明。如《虛實篇》“飽能饑之”句，曹注“絕糧道以饑之”，失之偏狹。李注“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並舉三國司馬景王征討諸葛誕之謀，高 所獻疲弊陳朝之策，李密打敗宇文文化及之事以證之，認為“但能饑之則是”，比曹注更符合孫子本意，也更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三是他較早注意運用更多的史例解釋《孫子兵法》抽象的軍事原則，對於人們理解《孫子兵法》精義很有幫助，對後來的注解者有較大啓示和影響。另外，用《遁甲》作注，是《李筌注孫子》的一個顯著特點，反映了我國古代兵陰陽家的一些情況，在諸家注中自成一家，對我們研究古代兵陰陽家的情況有一定史料價值。

《賈林注孫子》，《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均著錄為一卷，《國史經籍志》則作三卷。《郡齋讀書志》有“唐紀變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是其注曾收入紀變集注本中。此書與賈注單行本俱亡，其注現存《十家注孫子》系統各本中。據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載，賈林曾為李抱真參謀，于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曾多次奉抱真之命遊說王武俊，使王武俊與李抱真、馬燧結盟，並去偽號。學界對賈林與賈隱林的關係有不同看法。據考證，賈林與賈隱林非是一人。賈隱林乃原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從子，在783年朱?之亂時，他已為永平兵馬使，率眾扈行在，立有戰功，不在李抱真營中，并于興元元年（784年）二月去世。而賈林則在興元元年五月說服王武俊與李抱真合軍，大敗朱滔于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北）。《宋史·藝文志》著錄《五家注孫子》注者有賈隱林，其可能性有二：一是輯者將賈林誤作賈隱林，所謂賈隱林注實乃賈林注；二是賈隱林亦撰有注《孫子兵法》之書，曾被輯入《五家注孫子》書中。其中第一種可能性較大。從《資治通鑒》載賈林遊說王武俊的說詞看，此人頗有見識，且能言善辯，有縱橫家的某些特點。其注在《十家注孫子》中保留較少，多具思辨特色，亦時有新見。他率先提出，《用間篇》之“因間”應為“鄉間”，張預、劉寅均贊同此說，櫻田本《孫子兵法》即作“鄉間”。他在講《計篇》將

帥五個條件時說：“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講清了將帥五個條件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辯證關係，甚為精警嚴謹。他注《九地篇》“是故散地則無戰”句說：“地無關闔，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不拘成說，執其兩端，顧此而不失彼，有利於防止讀者理解此句時產生片面性和絕對化的傾向。

### 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3)

《杜牧注孫子》，此書寫成後曾獻于宰相周墀，杜牧在《上周相公書》中專門講到此事。周墀為相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至三年四月。可知其注成書當在此間。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杜佑之孫，唐代後期著名詩人。曆官監察禦史、宣州團結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中書舍人等職，剛直有奇節，“慨然最喜論兵”。杜牧自言，其《注孫子》中仍保留曹注，如此說來，此書實為曹操、杜牧二人集注。《新唐志》、《郡齋讀書志》皆作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文淵閣書目》、《竹堂書目》則作三冊。此書後又被收入《五家注孫子》、《孫子十家注》中。傳世單行注本尚有《石室秘笈兵書》五函本（北圖）、清抄本（北大）等。杜牧注孫子在十一家注中，不但數量多，品質亦比較高，故有稱其為曹操之後第二大注家者。杜牧對《孫子兵法》在總體上認識比較全面、準確，認為“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較有些學者只見其詐不見其仁即進行褒貶為有見。另外，他注意從當時實際出發，總結新的經驗，對《孫子兵法》的軍事原理進行注解，所謂“某所注孫武十三篇……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因而多有發明。再次，他大量徵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闡發《孫子兵法》本旨，彌補了曹注過於簡略的不足。如《作戰篇》“殺敵者，怒也”句，曹注只有“威怒以致敵”五個字，杜牧注：“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人剽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不但較曹注具體，而且對如何實現《孫子兵法》提出的軍事原則作了進一步闡發，對人有啓智益慧之效。歐陽修《孫子後序》稱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博”和“詳”確是杜牧注孫子的兩個主要特點，為其他各家所不及。但其注也有不足，有的不夠準確，陳?認為其注“闕疏”，在己注中間或能攻中其短。

《陳?注孫子》，《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均著錄為一卷；《郡齋讀書志》、《國史經籍志》則作三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五家注孫子》中有陳?注。此書已不可見，單行本亦佚。其注現存《十家注孫子》系統各本中。陳?事蹟不詳，約與杜牧為同時代人或略晚于杜牧。《郡齋讀書志》說，陳?“以曹公注隱微，牧注闕疏，重為之注”。歐陽修在為梅堯臣所作《孫子後序》中將其注與曹操、杜牧注並稱為“三家注”。其注雖在數量和品質上均不若曹、杜，但也有不少糾謬補闕的新見。如《軍爭篇》“餌兵勿食”句，李筌、杜牧都將“食”解為敵人造設的毒水、毒食、毒酒等，要求軍隊對此不要飲食。陳?指

出，“餌兵非止謂置毒也”，謂“敵若懸利，不可貪也”，做出了正確的解釋。再如，《火攻篇》“行火必有因”句，曹操、李筌皆謂“因奸人”為內應以起火。失之偏狹。陳注：“須得其便，不獨奸人”，可使人廣開思路。其注《行軍篇》“兵非多益，惟無武進，足以並力、料敵、取人而已”句說：“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可廝養中並力、取人，亦可破敵也。”似是對唐廷借吐蕃、回紇之兵平叛教訓的一種總結，強調應儘量依靠自己國內力量破敵，說明作者注意了總結新的經驗教訓並用於注解《孫子兵法》。

另外，《郡齋讀書志》著錄有《紀變集注孫子》（衢本作《紀變注孫子》，此據袁本），並言“唐紀變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如此，該書應為《孫子兵法》的集注本。日本《官板書籍解題略》著錄《十家注孫子》中有孫鏞注，置其名于陳■之後，梅堯臣之前。《新唐書·藝文志》有“孫 注吳子一卷”，“鏞”“ ”字形相近，疑二者為一人。如是，亦應為唐人。

總之，這一時期《孫子兵法》注本較豐，各俱特色，多有發明，從而將注解《孫子兵法》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準。

三、一些兵學著述大都以《孫子兵法》為宗，同時吸收總結了當時的新鮮經驗，因而繼承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

存世的唐代或反映唐代軍事思想的兵學著述大都以《孫子兵法》為宗，在繼承其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吸收總結了當時的一些新鮮經驗，從而將冷兵器時代的軍事思想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神機制敵太白陰經》等著作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或稱《衛公兵法》、《李靖兵法》。《通典》多稱《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此書新舊《唐志》中均無著錄，但《通典·兵典》中保存了它的部分內容，說明在唐代確有此書。作者為李靖亦素無疑問。《通典》稱：“《衛公兵法》，悉出《孫子》。”它實際是《孫子兵法》軍事理論與當時軍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書中提出的“料彼我之形”的 12 個方面，即“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乃是對孫子“五事”“七計”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化，這十二個方面較“五事”“七計”增加了經濟因素，對其他因素的論述也更為具體，可操作性更強。書中提出的“十五形可擊”（新集、未食、不順、後至、奔走、不戒、動勞、將離、長路、侯濟、不服、險路、擾亂、驚怖、不定），是對孫子關於行軍察敵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帥有十過”（勇而輕死、貪而好利，仁而不忍、知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潔而愛人、慢而心緩、剛而自用、懦志多疑、急而心速），是對孫子“將有五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間之道有五”（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因其仕子，故泄虛假令告示；因敵之使，使矯其事而返之；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佯緩罪戾，偽露我偽情俘計，使亡報之），是對孫子用間思想的深化闡發。該書提出的“用兵上神，戰貴其速”，是在當時輕騎兵取代重甲騎兵的條件下，對《孫子兵法》速戰速決思想的發揮和發展，李

靖指揮的平東突厥和征吐谷渾等戰役，均體現了這一思想。但同時此書又提出了持久戰的問題，認為對“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之敵，應“避其鋒銳，與之持久”，這是對唐初一些戰爭經驗進行總結得出的結論，從而將持久與速決統一起來，使孫子的戰爭指導理論進一步完善。總之，《衛公兵法》既“悉出《孫子》”，又發展了《孫子》。

#### 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4)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或稱《唐李問對》、《李衛公問對》，簡稱《問對》，是以唐太宗李世民與衛國公李靖討論兵法的形式寫成的問答體兵書。按《郡齋讀書志》的記載，其頒行時的書題似應為《李衛公對問》，從書中內容看，也確系李衛公“對問”，而不是李衛公“問對”，即是他回答唐太宗提出的問題，而不是他提問題，由唐太宗回答。對此書的作成年代，自宋以來，聚訟不已，一說作成于唐初貞觀時，一說乃北宋仁宗天聖時進士阮逸偽託之作。查書中所載許多言論與史實不符。如霍邑之戰時，李建成統左軍，李世民兵統右軍。該書卻稱李世民統左軍，李建成統右軍；李勣之名乃唐高宗時所改，此前唐太宗一直稱其為“李世勣”，該書中卻讓唐太宗稱之為“李勣”；安北都護府系高宗總章二年（669年）改置，此時唐太宗和李靖已去世 20 年，該書卻讓他們提前講出了這一都護府的名字等。這些都說明，此書絕非貞觀時作品。從目前所見史料看，此書應是宋神宗下詔、官方組織人力集體“提舉修撰”“散見”的李靖兵法而成的一部反映唐太宗與李靖軍事思想的兵書。此書大約在神宗熙寧後期間世，經王震、朱服等人修撰校正，于元豐三年正式頒行。此書作者對唐太宗、李靖事蹟及其軍事思想進行過深入研究，成書經過官方嚴格審修，其中雖仍有違背史實等錯誤之處，但基本上反映了唐太宗和李靖的軍事思想，是對他們軍事思想的總結和闡發，應將此書作為反映唐代軍事思想的著作來研究，正如《新唐書》雖出於宋人之手，但卻是研究唐史的重要史料道理一樣。

如果說，《衛公兵法》側重于對《孫子兵法》實際應用研究的話，那麼，《李衛公問對》則側重于對《孫子兵法》的理論闡發，其中特別是對致人、奇正、虛實、主客、攻守等軍事範疇論述較詳，有些有獨到的見解。如該書認為，兵法的核心是“致人而不致於人”，即爭取戰爭主動權的問題。認為孫子奇正理論的精髓是“奇正相變”，反對那種只知“以奇為奇，以正為正”的形而上學的理解，強調“臨時制變”，做到“無不正，無不奇”，從而達到“正亦勝，奇亦勝”的目的。《問對》還認為，虛實也是達成“致人”的重要原則，“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識敵虛實的目的是以奇正之術打擊敵人，“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這樣，就可無往而不勝。《問對》對孫子提出的攻守範疇也作了進一步闡發，提出了“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的觀點。《問對》對《孫子兵法》某些範疇的論述多有高於前人之處。

李筌著《神機制敵太白陰經》也在許多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思

想。其突出的一點是，將《孫子兵法》與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結合起來，既強調“主有道德”，又認為，“善用兵者，非仁義不立，非陰陽不勝，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由於此書吸收了兵、道、儒諸家之長，因而彌補了《孫子兵法》的某些不足，如對戰爭性質的認識上即有所進步。另外，該書強調“太上用計謀，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戰伐”，並列舉了多種“陰（或作“順”）傾之術”，即用陰謀之法達傾敵社稷之目的，從而對如何實現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策略。該書還對《孫子兵法》中的某些範疇進行了發展和發揮，如認為“形”（物質）與“神”（精神）是對立統一的關係，應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革依于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這一論述發展了《孫子兵法》關於“形”的理論。再如，作者從“兵者詭道”的觀點出發，對“心”與“跡”這對範疇也作出了獨到的論述，認為“謀藏於心，事見於跡。心與跡同者敗，心與跡異者勝。”強調軍事欺騙與嚴格保密的重要。總之，此書是唐代的一部綜合性兵書，對《孫子兵法》既有理論性闡發，又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方法和措施，是一部學術性和實踐性都較強的兵書。

史載李光弼撰有《統軍靈轄秘策》五十章。已佚。《郡齋讀書志》載，此書末雲：“呂望智廓而遠，孫武思幽而秘，黃石寬而重斷，吳起嚴而貴勇，墨翟守而無攻，老聃勝而不美。今擇其精要，雜以愚識，為一家之書。”可知此書也輯有孫子之言，並有作者的融匯與闡發。

從施之美《七書講義》中可以看出，五代後周時的《張昭兵法》對《孫子兵法》亦多有引解和闡發之文。《宋史·藝文志》著錄有《張昭制旨兵法》十卷，此書大概就是《七書講義》稱引的《張昭兵法》。張昭在周世宗時曾為兵部尚書，其兵法即在此時奉旨所撰。《舊五代史·周世宗本紀》載，顯德三年（956年）二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准詔撰集兵法，分為十卷，凡四十二門，目之為《制旨兵法》，上之。優詔褒美，仍以器幣賜之。”《宋史·張昭傳》中亦有類似記載。可知此書成書于周世宗時，應屬五代時著作。此書已佚。《七書講義》引用此書之文開頭有“張昭論權謀之法曰”、“張昭安營壘法曰”、“張昭應機決戰篇曰”、“張昭擇地利法有曰”等，由此可知此書中的一些篇名。此書對《孫子兵法》的一些理解有值得注意之處，如認為《孫子兵法》的主旨是“以權謀而輔仁義，先智詐而後和平”，較為全面深刻。其釋“九天”“九地”句說：“九地以藏形之深，使敵不可測，得機而發，疾若雷霆，勢如天落。九，數之極也。”甚得其旨。此書對《孫子兵法》中有關地形的內容多有論述，有的有新的見解和發揮，似作者對兵要地理有較深入的研究。

#### 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5)

總之，這一時期的兵學著作對《孫子兵法》不但祖述，且有發展，從而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兵學的內容，推動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進步。

四、一些非軍事著作中也載有《孫子兵法》的內容，透露了此書在不同階層

和領域流布的資訊；《孫子兵法》在唐代開始傳入國外

隋唐五代時期，《孫子兵法》不但在一些兵書中被注釋和闡發，而且，在一些非軍事著作如類書、史書、文集、詩歌中，也有記載，透露了一些關於此書在這一時期研究和流傳的情況。

虞世南在任隋秘書郎時輯成的我國存世中最早的類書《北堂書鈔》的《武功部》中，多處摘引《孫子兵法》之文，如其中《謀策》輯有“上略伐智，下略伐勢”，“始如處女，後如脫兔”，“不動猶山，難知如陰”，“動如震雷，住如嶽立”，“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等。這些引文對於考察唐代《孫子兵法》傳本情況、校勘《孫子兵法》之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領修的《藝文類聚》也是一部按類摘引古文獻資料的圖書，其中卷五十九《武部·將帥·戰伐》，卷六十三《居處部·櫓》，卷八十《火部·火》，卷九十六《鱗介部上·蛇》等類中，都分別摘有《孫子兵法》之文。

唐諫議大夫魏征主編的《群書治要》卷三十三中摘有《孫子兵法》之文近千字，無篇題，一以貫之，並帶曹注，選錄的主要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慎戰、愛卒、唯民是保、知彼知己等；作戰指揮的內容所摘甚少，對“兵者詭道”之類的內容一無所取。作者編撰此書主要是給皇帝看的，故有此取捨；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對軍事問題的一些主張。此書所摘《孫子兵法》之文與傳本有一些差異，為後人考察《孫子兵法》在唐代的流傳情況提供了參考依據。

作成於開元四年（716年）的《長短經》是一本論述王霸經權之變的著作。作者趙蕤，博學韜鈴，長於經世，不應辟召。此書卷九《兵權》專門論兵，其中多引《孫子兵法》之言，保存了《孫子兵法》的一些異文和佚文，對考察《孫子兵法》在唐代流傳情況，研讀校勘《孫子兵法》有參考作用。如書中《禁令》引《孫子兵法·行軍篇》“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專親而罰不行，則不可用矣”，與多數傳本有異，而與簡本相近。

杜佑撰《通典》有兵典 15 卷，共 136 個子目，各目多以《孫子兵法》闡述的軍事原則為題，如“出其不意”、“擊其不備”、“以逸待勞”、“師不遠襲”、“餌敵取勝”、“先奪其心”等，正文則取歷代史例及他人有關言論對這些軍事原則進行解釋，以講述兵略和兵法要義，書中對有些所引孫子之言進行訓釋，後人將其訓釋收入《孫子十家注》中。其釋文多同曹注，間有個人闡發。書中保存了《吳子問》等部分孫子佚文，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另外，在一些注疏、文集、奏議、詩歌中，也多有言及孫子其人其書者。如《毛詩》孫穎達疏，《左傳》孔穎達疏，《周禮》賈公彥疏，《後漢書》李賢注，《文選》李善等注，《管子》尹知章注中，都有明引或暗引《孫子兵法》之文。杜牧《樊川文集》、陸贄《陸宣公奏議》等書中，亦引有孫子之言。杜甫常以詩論兵，晚唐詩人羅隱認為他可與孫武說用兵（《耒陽》）。另如王翰詩：“報國每慚孫武策，匡時空草賈生書”；楊巨源詩：“料敵知己在方寸，不勞心力講《陰符》”（《寄太原李光祿》），其中“料敵知己”即由孫子“知彼知己”演化而來。這說

明，《孫子兵法》在當時的文學藝術領域也有一定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從李善等人的《文選注》看，有些現在看來屬於《孫子兵法》中的引文，李善卻注為出自《司馬法》。如潘嶽《關中詩》注釋引文“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潘岳《馬督誅》注釋引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火攻有五”；潘嶽《射雉賦》注釋引文“始如處女”等，均被注為出自《司馬法》。《後漢書·皇甫嵩傳》中引文“窮寇勿追，歸眾勿迫”，也被李賢注為引自《司馬法》。這說明，唐人對《孫子兵法》中一些觀點的出處進行了考辨，證明《孫子兵法》在寫作過程中，吸取了前人的一些兵學理論成果，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創造和發展，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迥異于古者《司馬法》的獨樹一幟的軍事理論體系。

另據《續日本紀》載，唐開元四年（718年），日本奈良時代著名學者吉備真備（693—775）來唐留學，735年回國時，將《孫子兵法》等典籍帶回日本，並在軍隊中傳授，此後這一研究在日本經久不衰。又據日本兵學家佐藤堅司稱，《孫子兵法》傳入朝鮮的時間可能更早，在663年之前，就有百濟人將《孫子兵法》傳入了日本。

五、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軍事實踐方面頗多建樹，唐代作戰指導藝術堪稱為冷兵器時代的一個高峰

隋唐五代時期的軍事家們十分重視運用《孫子兵法》指導軍事實踐，在用以指導戰略的制定、戰爭指導思想的實施、治軍原則的貫徹等方面，均體現了很高的水準。

從戰略的制定方面看，隋對突厥採取的“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之策，是對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和“用間”思想的成功運用；其對陳朝採取的先疲後打的戰略，也體現了孫子“上兵伐謀”、“逸而勞之”的謀略思想。李淵領導集團為奪取天下制定的“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戰略，符合孫子“避實擊虛”、“致人而不致於人”的原則；唐平安史之亂中，郭子儀、李光弼建議“北取范陽，複其巢穴”的策略，也體現了孫子“以迂為直”的軍事思想。

#### 注釋高峰時期--隋唐五代(6)

這一時期的軍事指揮者在將《孫子兵法》用於戰爭指導方面創立了輝煌的業績，其中最傑出的代表者是李世民和李靖。李世民指揮作戰，必“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在敵力量強大、利在速戰的情況下，採取“持久弊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的方略；與敵交戰時，多採取正兵接敵、奇兵襲後的戰術；認為“兵法尚權，權在於速”等，他運用這些原則先後取得了對薛仁杲、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人作戰的勝利。這些原則大都來自《孫子兵法》，又在某些方面發展了《孫子兵法》。李靖用兵“臨機果，料敵明”，他指揮的平蕭銑之戰、平東突厥之戰、征吐谷渾之戰等，都採取了示形欺敵、遠程奔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等戰法，是對《孫子兵法》軍事原則的成功運用。宋人葉適認為：“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無出其上。”應當說，他們

不僅在“言兵”、而且在“用兵”上，都達到了當時的高峰。

唐代政論家陸贄提出，對邊遠少數民族的侵襲要採取以己之長擊敵之短的指導原則，如“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對脆弱之敵，要“奪人之心”；對堅強之敵，則“觀釁而後動”。這些策略都包含著孫子的思想，有的直接引用了孫子之言。唐武宗平劉稹時，杜牧提出了扼險、“搗虛”、“速擒”的謀略，為宰相李德裕所採納，史稱“澤潞平，略如牧策”。他還建議，為防禦回紇、吐蕃擾邊，可選擇在敵人自恃天寒地遠、認為唐軍不會進攻他們時發起攻擊，“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以達積極防禦之目的。這是對孫子避實擊虛、出奇制勝思想的靈活運用。蘇定方平定西突厥，李愬襲蔡州，都堪稱是孫子“並敵一向，千里殺將”思想的傑作；張巡守睢陽所用草人借箭、真兵殺敵之法，已將有無相生、虛實變化之術用至極致；郭子儀單騎說降回紇、用騷擾之術嚇退吐蕃、智敗僕固懷恩、平定河東等，則已將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運用得出神入化。五代晉梁柏鄉（今屬河北）之戰中周德威向李存勗提出的“以逸待勞”、“因其將退而擊之”的建議等，亦與孫武思想合。概而言之，這一時期在作戰指導上體現的正兵相持、奇兵襲後的擊潰戰思想；兵貴神速、乘勝追擊的殲滅戰思想；正確料敵、“一舉兩克”的圍城打援思想；水陸協同、多方誤敵的渡江攻城作戰思想；避攻堅城、野戰殲敵的反客為主思想；因常而異、虛實相生的避實擊虛思想等，均符合《孫子兵法》關於作戰指導的基本原則，又有所創新和發展。

唐人對陣法也多有創新。如《衛公兵法》中對陣的基本戰鬥單位（隊，或稱大隊）編制的規定，對七軍兵力編組和一般使用原則的規定，對七軍陣形及其變化等，都有詳備而明確的論述。他們對軍陣的布列既有嚴格的要求，又不象宋人那樣拘泥於陣法，而是主張因情因勢靈活用兵。李世民、李靖等都是活用陣法的高手。如李靖的六花陣就有多種變化形式；其橫陣和豎陣也可以因敵而列；行引方陣也可據情變化；其隔隊抽隊的撤退陣法也體現了孫子所說的既“踐墨”（遵守法度）、又“隨敵”（靈活應變）的指導原則。

在運用《孫子兵法》理論指導治軍方面，這一時期亦有建樹。如《衛公兵法》將孫子的治軍原則具體化為一系列法規、制度和條令，對軍隊的編制等作了適應當時戰法的具體規定，從而較好地實現了孫子“治眾如治寡”的要求；對賞罰作出了嚴明的規定，體現了孫子“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思想；為實現“令素行以教其民”的要求，該書十分強調嚴格訓練，對如何進行訓練，做了詳明的規定。另外，裴行儉提出的“撫士貴誠”的治軍思想；陸贄的恩威並用以管理邊兵的建議；杜牧主張根治軍隊中“不搜練”、“不責實料食”、“賞厚”、“輕罰”、“不專任責成”等“五敗”的觀點等，都符合孫子的治軍原則，是用其治軍理論解決當時實際問題而提出的可行主張。

總之，《孫子兵法》在隋唐五代時期流傳廣泛，影響深刻。這一時期的軍事家、將帥和軍事理論研究者們繼承了《孫子兵法》的精髓，並較大幅度地發展了孫子的思想，對中國兵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 6.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

宋元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上承三國隋唐冷兵器時代孫子研究之傳統，下開明、清冷熱兵器並用時代研究之先河，是孫子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被官方正式列為《武經七書》之首，“七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學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

###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1)

一、宋代《孫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成蕭條、復興和以應用研究為主三個階段

宋朝政治上高度集權；國家由興漸衰；軍事上戰亂不止，亟需先進的軍事理論指導；北方游牧民族軍事文化衝擊著宋朝傳統的軍事思想；經濟上積貧，軍力上積弱；學術上理學興盛，文人積極參與論兵；科技上有較大進步，火器已成爲戰場上重要的殺傷武器，活字版印刷術已運用於出版業等。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宋代《孫子兵法》研究的發展。

宋代《孫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一) 仁宗中期以前，是《孫子兵法》研究的蕭條時期。趙匡胤建國後，總結了唐後期藩鎮割據的教訓，採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並修文偃武，將兵書列爲禁書，兵學因而受到禁錮。趙匡胤雖兩次大敗於遼軍，但仍認爲“外憂”事小，“內患”事大，對兵書未見有放寬之舉。這一指導思想一直影響到仁宗朝前期。劉敞《送梅聖俞序》中說：“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郡齋讀書志》稱：“仁廟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習兵……”即反映了這一情況。這一時期有關《孫子兵法》研究的成果很少。

(二) 仁宗中期至神宗朝，爲《孫子兵法》研究的復興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遼與西夏崛起，宋軍在與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屢屢失敗，從而刺激起宋朝乃至整個社會對兵學的重視。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命修大型軍事專著《武經總要》，慶曆三年（1043年）建立武學于武成王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對兵學態度的轉變。社會上對兵書的研究也漸趨熱烈。《郡齋讀書志·王皙注孫子三卷》說：“元昊即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可知孫子研究在這一時期已相當興盛。至神宗時，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號“武經七書”，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七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孫子兵法》實際位居“武經”之首。這使《孫子兵法》研究更趨興旺。這一時期的孫子研究，官方居領導地位；著述者多爲文人；理論色彩較後期爲濃，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可能在此時或更早，《孫子兵法》被譯成西夏文。現存西夏文《孫子兵法》殘本，爲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本。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少數民族文字《孫子兵法》譯本。金朝國內亦有孫子書流傳，施子美《七書講義》即刊行于金朝。

(三) 北宋末至南宋亡，為《孫子兵法》以應用研究為主的時期。這一時期戰事不斷，加之印刷術的進步，有關孫子的書刊刻甚多，大都是為時而作。如張刊印《杜牧注孫子》，乃是因“夷虜盜據神州”，取“(杜)牧當時之意”。王彥著《武經高抬貴手·孫子》，以歷代事例闡釋《孫子兵法》中的軍事原則，目的在於使將官領悟《孫子兵法》精義，以用於戰爭指導。故孝宗“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陳直中所撰《孫子發微》主張“兵事尚變”，反對“以訓詁求之”，可知也是著眼于實際應用。成書于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亦應是為適應當時的軍事鬥爭而輯刻。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成果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但多數著作因戰亂等原因而佚失。

《孫子兵法》研究在宋代總的發展狀況是由冷而熱，這與宋朝國力由盛而衰恰恰相反。孫子書在歷代的命運大都是承平日久遭貶斥，戰亂之世受重視，這似已成為孫子研究在封建社會發展的一條規律。

二、宋代《孫子兵法》研究成果甚多，編校刊行《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家孫子會注》是其對孫子研究作出的重大貢獻，另在注解講義、專題研討、分類輯編等方面均有成果

史籍所見宋代研究《孫子兵法》的主要著作近 20 種，論文 10 多篇。在版本校勘、注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

#### (一) 兩個版本、一大貢獻

《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家孫子會注》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乃至對中國兵學做出的重大貢獻。

宋人將《孫子兵法》與其他六部兵書合刻，稱為《武經七書》，做為官方頒行的軍事教科書。需要注意的是，他們認識到了《孫子兵法》在兵學理論領域中的首領地位，故將其列為“七書”之首，從而體現出兵事尚智、首重權謀的編纂指導思想。同時也認識到了它的局限性，故以另外六書與之互補，從而又體現出努力使兵學理論體系趨於完善和全面培養將帥的頒行宗旨。如本書第三篇所言，《孫子兵法》是“正”兵書，是培養將帥型軍事家的乳汁；《六韜》、《三略》是“政”兵書，培養目標是“王者師”型的軍事家；《司馬法》亦屬於正兵家之作，側重於講統攝；《吳子》儒家特色甚濃，又較《孫子兵法》“切近”而“明白”；《尉繚子》是對先秦諸子進行初步綜合、俱雜家特徵的談兵之作；《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則是闡發《孫子兵法》某些重要軍事原則便於武人閱讀的通俗兵書。可見《武經七書》不是簡單的七書合編，而是一有機的整體，它的頒行，標誌著以軍事謀略為主體，軍事政治、軍事經濟、軍事外交、軍事文化兼備的中國古代兵學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它適應了歷代統治者對高層兵學理論的需求。加之此書校勘精審，頒行鄭重，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因而久傳不衰。

####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2)

關於此書頒行的時間，尚無確切說法。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元豐三年

(1080年)四月，神宗詔朱服等校訂七書，“鏤版行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丙辰，朱服建議七書“宜去注行本書，以待學者之自得”，神宗詔：“《孫子》止用魏武帝注，餘不用注。”是在此時《武經七書》的編纂體例才最後確定下來。《郡齋讀書志》謂：“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對問》頒行武學，令習之，號七書雲。”神宗于元豐八年二月寢疾，三月去世。《武經七書》既是在“元豐中”頒行，則其頒行的時間當在元豐六年(1084年)十一月至元豐八年之間，其在元豐八年年初的可能性較大。因七部兵書從正式編校到刻版、印刷、審校、裝訂等，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完成。

《十家孫子會注》，《宋史·藝文志》著錄為吉天保輯，無注者姓名。輯者事蹟及此書的編輯、印行情況，史籍無載。但成書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的《通志》著錄了鄭友賢《孫子遺說》，說明《遺說》作成於1161年之前，而《十家注》又應在《遺說》之前，則《十家注》成書不會晚於紹興年間(1131-1162)甚明。此書可能在紹興年間刊刻過(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避高宗諱“構”)，但不能肯定就是初刻。初刻時間更早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現存《十家注》中注家為曹操、孟氏、李筌、杜佑、賈林、杜牧、陳?、梅堯臣、王皙、何氏、張預，共十一家。孫星衍，畢以?，餘嘉錫等均認為現存《十家注》即是吉輯本。書中實收注家之數與書名所記之數不侔，其說有三：一說杜佑本不注《孫子》，其注乃《通典》之文，去佑不數，正合十家；一說吉輯原本十一家注，書名取其成數，故稱“十家”；一說吉輯原本十家，鄭友賢“輯且補之”為十一家，並附己《遺說》於其後。這三種說法均帶有推測的性質，有待進一步考證。又，日本昌平阪學問所有另一種《十家注孫子》，無輯者姓名，十注家為曹操，王淩，張子尚，賈詡，李筌，杜牧，陳?，孫鎬，梅堯臣，王皙，與現存《十家注》本注者出入較大，不知其與吉輯本有無關係。

《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十一注家的排列順序比較混亂，或將孟氏排在唐人之後，或將杜牧置於其祖父杜佑之前等。《宋史·藝文志》著錄《五家注孫子》的注家是曹操、杜牧、陳?、賈隱林、孟氏。亦將孟氏置於諸唐人之後，這說明，《十一家注》很可能是在《五家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幾家擴編而成。輯者對注者的情況不甚瞭解，編輯時對此有所忽略。但他將各家之說集在了一起，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使此書具有了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鄭友賢說：“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于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可謂公允。但書中有的注家注文不多，似輯者對之有所取捨。另外，輯者將各注家的本子彙集在一起時，對各本所存異文必須決定取捨，總的看，由於其參照比較的本子多，有利於取優去劣，所以此書在《孫子兵法》文字校勘上也有較高的價值，是孫子書最重要的版本之一。

## (二) 注解講義，多有發明

宋代人注解《孫子兵法》的十餘家中，成就較大者當推梅堯臣，張預，鄭友

賢，施子美，他們的注解代表了宋代注解《孫子兵法》的水準。現分別簡論如下：

《梅聖俞注孫子》，查《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有梅注 484 條，數量僅次於張預。其注重視探究《孫子兵法》本義，時能糾謬補遺，語言亦簡潔洗煉，頗顯詩人遣字用詞功力。如《計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句，曹注“官道”為“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將“官道”分開解釋，在“道”前臆增“糧”字，甚為不倫不類。但李筌、杜牧因襲其說。梅注始將“官道”聯繫起來，注為“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較曹注為佳。《行軍篇》“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句，前人多將“眾”解為敵人，梅注認為是“先行乎嚴暴，後畏其眾離，訓罰不精之極也”，解釋為內部管理上的問題，始切本意。其注《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後存”句說：“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存之本也。”言簡語粹，甚為精彩。歐陽修對其注釋評價甚高，認為當與曹操、杜牧、陳? “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聖俞多焉”。朱熹則認為其注不及杜牧。據載，天津圖書館藏有明末梅士生刻《梅堯臣注孫子》單行本一冊。

《張預注孫子》，《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有張注 530 條，是十一家中注釋條數最多者。其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于《孫子兵法》義旨多有發明，博而切要，文字亦好，堪為杜牧之亞。其注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注意研究《孫子兵法》各篇之間的內在聯繫，而不單是孤立地注解其某些字、詞。如，其《作戰篇》解題說：“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注意到了《計篇》、《作戰篇》之間的內部建構關係。2、對《孫子兵法》一些詞、句的訓解多有新見。如《軍爭篇》“朝氣銳”句，張預注“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糾正了杜牧“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于申”的說法。他對將有“五危”的解釋，講清了各條之間互相制約的關係，反對“守一而不知變”，認為“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從而糾正了理解上的片面性和絕對化。3、徵引史例貼切精煉。如注“計者，詭道也”句說：“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制勝也。”與何氏注引史例比起來，顯得尤為簡煉精切。這當與他熟悉歷代將領事蹟有關。另外，其注中引錄了較多的孫子佚文和諸葛亮、李靖等人的言論，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3)

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此書的突出成就是從哲學的高度考察、闡發《孫子》本旨，把它視如“儒者之《易》”，而不僅僅將其作為一部兵書看待，故常能發諸家之未發。他對“常法”與“變法”的闡發即是如此，提出：“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對《孫子兵法》中所闡述的一些軍事原則做了辯證的分析。如認

爲：“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頗得《孫子兵法》妙諦。其次，《遺說》是在努力融會貫通《孫子兵法》整體思想的基礎上闡發其具體觀點的，故有高屋建瓴之勢，給人以“能識廬山真面目，只因站上最高層”之感。另外，《遺說》關於校勘《孫子兵法》之文的有些意見也值得重視。

《施氏七書講義》，此書在我國流傳不廣，國內一些學者對之評價亦不高。但它在日本卻多次刊刻，傳播甚廣，有的又回傳我國。這種狀況有引人注意之處。此書初刻于金貞祐壬午年（1222年），是最早爲《武經七書》講解義理的書，每篇篇題下有解題，講此篇要義；正文採取分段講解的形式，集字注、句解、段析、章講於一體，而以闡發義理爲主，開武經闡發講義之先。《講義》徵引大量宋以前史例，以例釋義，所選事例大多貼切，能啓人意智，從而將《孫子兵法》的一些抽象理論形象化，通俗化。講解多借鑒《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太白陰經》、《通典》、《張昭兵法》等書的一些觀點，亦時有自己的新見。對於前人在同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分別予以介紹，然後加以評說，表明作者個人的觀點，宜於讀者比較、鑒別。讀者有此一冊在手，前人研究之主要成果多有，這亦是此書經久而不廢的一個原因。應當指出的是，此書主要的不是寫給學者們看的，它更注重對前人成果的總結，著眼於軍事上的實際運用，這是孫子兵學研究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方面。我國的兵學研究歷來有重抽象、輕應用的傾向，介於基本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應用性理論研究一直是個薄弱環節，國內一些學者至今仍對此有所輕視。而有些外國人對這一環節的研究卻非常重視，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從軍事應用學的角度衡量，它應得到更適當的評價。

在文字校勘方面，《王皙注孫子》值得順便一提。《郡齋讀書志》謂王皙爲宋仁宗時人，並稱：“皙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王注單行本已不可見，其“以古本校正闕誤”，在《十家注》中偶有顯露，如《作戰篇》“近于師者貴賈”句，王注“師”爲“市”；《勢篇》“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句，王注謂“必”當作“畢”。均與簡本《孫子兵法》合。《郡齋讀書志》所言當有所據。

關於《何氏注孫子》，《郡齋讀書志》著錄爲三卷。《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均題爲何延錫注。何延錫乃五代時南唐兵馬都監，于周世宗顯德三年（956年）被趙匡胤率軍擊殺於渦口（今安徽懷遠東北）。若此，何氏應爲五代時人，不應在梅堯臣、王皙、張預等諸宋人之後。但《十一家注孫子·行軍篇》“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句下有何氏注曰：“梅氏之說得之。”是何氏又在梅堯臣之後，其與南唐的何延錫應爲兩人。《郡齋讀書志》稱何氏“未詳其名，近代人也”，不取《崇文總目》之說，當有其原因。目前尚難遽斷何氏即五代南唐之何延錫。如其確系五代時人，其在諸注家的位置亦不應排在第10位，而應在梅堯臣之前，諸唐人之後。何氏究竟爲何人，有待進一步考證。何氏注理論挖掘較少，徵引事例繁細。如《軍爭篇》“銳卒勿攻”句，其注詳列陸遜抗擊劉備等6例；《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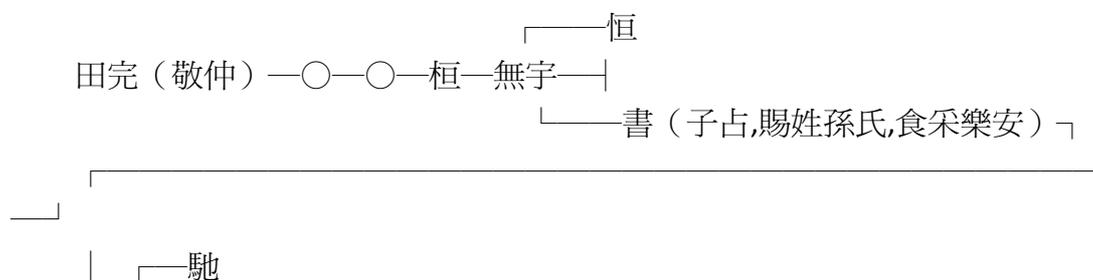
篇》“投之亡地然後存”句，亦細述韓信背水為陣等多例。其注亦偏重于武人運用，對於普及《孫子兵法》有益。

### （三）熱門話題，不囿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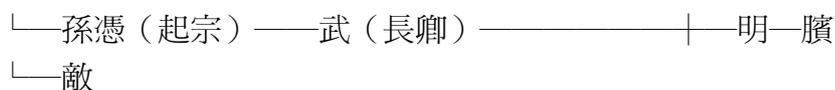
宋人對孫子其人其書作了許多專題性探討，提出了一些新說。這些新說有的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有的則不盡正確，有的尚待進一步考證。這些新說的價值不僅僅在於觀點的對錯，還在於這些問題提出本身。它說明宋人對有關孫子的文獻進行了比前人更為深入的研究，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孫子研究的深入。

宋人對孫子其人其書的熱門話題，大致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及成書。宋人在唐林寶撰《元和姓纂》的基礎上，對孫武世系作了進一步考證，其成果體現在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中。《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孫武世系圖示如下：



###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4)



這一記載成為後人考證孫武世系及其故里的重要史料依據。但亦有疑其不可靠者。對孫子書的作者與成書，宋人多認為是孫武所作，成書於春秋末年；但也有一些不同觀點。如，梅堯臣認為《孫子兵法》之言乃“戰國相傾之說”，陳振孫因孫武事不見於《左傳》，提出“不知果何時人也”；葉適疑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等。這些問題的提出，促進了對孫子其人其書的研討，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關於“詭”“詐”。宋人對《孫子兵法》“兵者詭道”、“兵以詐立”的觀點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一種意見對這一觀點予以全盤否定，代表者有陳師道、葉適、高似孫等。陳師道稱孫、吳之書是“盜術”，要求朝廷“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卻兵家之圖書”；葉適稱：“非詐不為兵，蓋自孫、吳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高似孫說：“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澤矣！”蘇洵、蘇軾對此也基本持否定說。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對敵詭詐是戰爭指導必須遵循的一個原則，詭詐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行“仁”，“仁者”要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在軍事鬥爭中使用詭詐。堅持這一觀點的有李觀、鄭友賢、黃震等。鄭友賢說：“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

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為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于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權與間，實同而名異。”黃震提出，《孫子兵法》言兵“終始未嘗言殺，而以久於兵為戒”，其所言“詭道”，“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詐之比”。這兩種觀點中，無疑後者是正確的。爭論起到了磨礪、宣傳真理的作用。

關於“將能而君不禦”。宋人對《孫子兵法·謀攻篇》裡這句話的討論多為有的放矢，非空泛之言。梅堯臣借機批評“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的現象；何氏認為“禦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葉適認為“春秋時固無中禦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語遂為砭石”，也承認這句話是切中要害之論。需要注意的是，他們對《孫子兵法》這一觀點的闡釋，已不單是對前人注解的重複，而是具有了時代的特點，是對宋代“將從中禦”做法的批評，其中已經總結了一些新鮮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蘇軾則對此持完全批評態度，提出“天子之兵，莫大於禦將”。認為“不力”之將比寇仇、敵國危害更大，並舉唐後期朝廷對邊將失去控制造成藩鎮割據為例說明之。蘇軾對這句話的批評是從君將之間的政治關係角度講的，而孫武則說的是戰場軍事指揮問題，二者不是一回事。戰場上情況瞬息萬變，將帥沒有專斷權，凡事都要聽不瞭解戰場情況的國君的旨令辦事，必然要打敗仗。即使講戰場軍事指揮問題，孫武也沒有說對國君的話一概不聽，只是反對那種“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的瞎指揮。蘇軾對孫武的原意不會不明白，他是故意曲解其意以批駁之，借機宣傳自己的觀點，為宋初實行的“將從中禦”做辯護，為加強當時朝廷對邊將的控制造輿論。國君把自己的將帥看得比寇仇、敵國危害還大，此亦是唐末藩鎮割據的重要原因之一，君、將相疑，患莫大焉，決非國福。蘇氏此論，失之偏頗。

關於孫武吳宮練兵殺姬。對此事宋人也做了一些頗有意思的探討。何去非《何博士備論·陸機論》認為，孫武練兵殺吳王寵姬，是想“借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他從闔廬不恤二姬之死而任己為將中，“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為其將，故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而吳以強霸”。作者宣傳這種猜測性說法的目的是為了強調君、將之間互相信任的重要；誠信固方能成大事；否則，良將就不會為其所用。這似對宋代“禦將”的做法含有委婉的批評。李新則認為，孫武此舉是為了激闔廬“有為之志”，“除其惑志之本”。這是一種“清君側”之術，可為後人所仿效。李新此言，亦似為有感而發。

#### （四）總結闡發，不拘一格

宋代處於冷兵器時代結束、冷兵器火器並用時代開始的時期。宋人在唐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前人研究《孫子兵法》的成果進行了進一步的總結和提高。為適應這一需要，其研究方法和著述方式也有一些新的發展。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幾種：

兵書合刻 將《孫子兵法》等幾種不同的兵法合刻為一書，大概在宋初就已經出現。《太平御覽》所引書目中的《兵法七書》即是。此書已不可見，不能肯

定就是後來《武經七書》中的七部兵書。目前所見最早的《孫子兵法》與其他兵書的合刻本是《武經七書》。如上所言，這種合刻體現編輯者在軍事理論研究和軍事人才培養上的指導性主張，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古代兵學中較高層次的理論體系。這無疑是宋人的得意之作。

分類輯編 《武經總要》前集卷一至卷十五大量引用《孫子兵法》之文，各節內容多是結合新的經驗分條闡發《孫子兵法》的軍事原則。其後集“故事卷”中所設子目多以《孫子兵法》之語為題，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多方以誤之》等，然後舉例銓釋，體例仿佛《通典·兵典》而有所發展。《百戰奇法》則是將作戰指導原則概括成 100 條，分條論述，“其命名立法，多出《孫武子》”。《太平禦鑒》卷二七〇至卷三二四《兵部》門中將《孫子兵法》語錄與所摘其他典籍之文分類編輯，亦屬總結性工程。《冊府元龜·將帥》門編纂體例與之相似，只不過由於選錄的原則不同，《孫子兵法》在《冊府元龜》的地位大為下降。

###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5)

集注匯解 這也是宋人彙集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種著述形式。在《十家注》問世之前，已有幾種《孫子兵法》集注本，但規模都比較小，編纂體例已不可見。到了宋代，注家有所增加，也有不少新的創見，為《十家注》的編輯準備了條件。此書對《孫子兵法》分句、段注解，將十一家的意見相對集中在一起，便於讀者研究比較，有很強的集成性和實用性。讀者有此一本，不必再去尋、翻其他注本，就可知諸家見解之異同。此書一出，單注本多被淘汰，這當是一條原因。《施氏七書講義》成書於《十家注》之後，亦是彙集前人觀點而參以己見之作。

評述人物 利用撰寫軍事人物評論集或人物傳評集闡發《孫子兵法》的軍事原理，也是宋人的一個創造。前人雖有這方面的零星撰述，但未見有專集。何去非撰《何博士備論》是我國第一部軍事人物評論集，書中多以《孫子兵法》思想為準則評論古人得失，在闡發、宣傳《孫子兵法》思想方面具有形象、生動、深刻等特點。張預的《百將傳》則是最早的軍事人物傳評集。《郡齋讀書志》卷十四《百將傳十卷》說：“預觀歷代將兵者所以成敗，莫不與孫武書相符契，因擇良將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而以武之兵法題其後”，可知闡發《孫子兵法》思想是此書的一個重要目的。

另外，《虎鈴經》注意系統闡發《孫子兵法》思想，側重研究如何實現《孫子兵法》提出原則的方法問題，注意了對應用理論的探討，也是值得肯定的。

研究和著述方法問題是《孫子兵法》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方面，宋人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三、宋人研究《孫子兵法》的主要特點是：文獻研究成績突出，軍事理論研究進展不大；對《孫子兵法》推崇與貶斥均達到了高峰；在對《孫子兵法》宣傳和運用上正確與荒謬並行；兵儒鬥爭激烈，思想融合深刻；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

宋代《孫子兵法》研究的特點我們上面講到了一些，如，其總的發展狀況是由衰而興；在有些方面注意總結，有所創新；後期研究比較貼近現實等。但宋人研

究《孫子兵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從而又表現出一些矛盾性特點。

(一) 文獻研究成績突出，軍事理論研究進展不大。宋人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的成就已如上述，可謂是碩果累累。但他們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研究，多為零散的注解和對某個問題的闡發，缺乏整體的、系統的、深刻的揭示和論述；對火器運用於戰場後如何實現《孫子兵法》軍事原則的應有理論研究，對如何吸收北方少數民族軍事文化，改造充實中原傳統兵學理論以適應現實鬥爭的研究等，沒有明顯建樹，表現出理論反映實踐過於遲鈍的特徵。論兵者多無實踐經驗，大都把《孫子兵法》只做為一門學問看待，而不是將其作為軍事實踐的指南；將《孫子兵法》等兵書尊為“武經”，提高了兵學的地位，但同時，一旦被冠為“經”的東西，就會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繩索；宋人習慣於按祖宗家法思考問題，排異性強，致使其研究基本是在封閉狀態下進行的近親繁衍等，是其軍事理論進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其後期的孫子軍事理論研究雖注意了貼近現實，但由於人們思想受舊觀念的束縛，故仍未見有突破性進展。

(二) 對《孫子兵法》推崇與貶斥均達到高峰。宋廷將《孫子兵法》等七書定為“武經”，《孫子兵法》居首，其地位可謂至高無上。但同時一些學者對孫子其人其書又貶斥極烈。這兩個褒貶截然相反的高峰都出在宋朝，是由於當時戰事頻仍、客觀現實亟需《孫子兵法》指導，然而排他性很強的理學又高度發達這種特殊社會環境中出現的特有現象。貶斥者對《孫子兵法》中一些不符合儒家思想的觀點進行激烈抨擊，而另外一些明智務實的學者、將帥等則因軍事鬥爭的需要而主張廣泛普及《孫子兵法》，於是貶之者愈烈，用之者愈尊。以致貶斥《孫子兵法》頗為偏激的葉適也認識到，《孫子兵法》雖經貶黜，“猶傑然尊奉逮今，又將傳之至於無窮，此文武所以卒為二塗（途）也”，承認《孫子兵法》是打不倒的。

(三) 對《孫子兵法》思想的宣傳和運用正確與荒謬並行。象《武經總要》、《虎鈴經》等這樣有較大影響的軍事著作，一方面能比較正確地闡發《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另一方面又有許多與《孫子兵法》思想相違背的占候遁甲之類的東西。《太平御覽》卷三二八引有《孫子占》之文；《九賢秘典》又有《孫武子行軍氣色雜占》，《琳琅秘室叢書》認為此書是“大約宋初人所為”。《宋史·藝文志》中也著錄了大量的這方面的兵書。可見這些荒誕不經的說教在宋代很有些地位和影響。宋欽宗時，郭京等使“六甲正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守城致遭慘敗，並非偶然，它與宋代兵學較深地陷入這一誤區有很大關係。另外，宋人對陣圖（有的陣圖書也冠以“孫子”之名）的看法和運用也多有片面荒謬之處。

(四) 兵、儒鬥爭激烈，思想融合深刻。兵儒之爭，無代不有，宋朝更為激烈。爭論的結果既有消極的影響，也有積極的作用。其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兵學研究的排斥和羈絆上。而積極作用則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思想撞擊，迸發出新的火花，人們對有些問題的認識有所昇華，起到愈辯愈明的作用。如對“詐力”與“仁義”的爭論即是如此。二是促進爭論雙方對《孫子兵法》等兵學著作進行深入研究，並在研究中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對方影響，如，宋人注解《孫

子兵法》有較濃重的倫理色彩，反映出理學對兵學的浸潤。同時，許多儒家學者也因研究兵學而影響到個人的著述和經歷。兩宋時期的“儒將”和“將儒”比較多，當與這種兵、儒結合比較緊密的軍事文化在他們心理上的積澱有著重要關係。三是起到了宣傳、普及《孫子兵法》等兵學著作的作用。兵、儒對《孫子兵法》某些觀點的爭論促進了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的注意和研究。宋代文人學者參與論兵的極多，除了我們上面講到的外，還有沈括、范仲淹、徐積、陳規、李綱、辛棄疾、陳傅良、陳亮、王應麟等，從他們留下的著作和史傳記載的言論看，他們對《孫子兵法》都做過深入的研究。這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孫子兵法》在宋代學術界的影響程度。

#### 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元(6)

(五)有些進步理論，不能認真執行。在宋人的軍事理論中，也不乏進步的論述，但有些卻被束之高閣，得不到真正的實行。如，宋人對《孫子兵法》“兵非多益”的訓誡非不能理解，他們主張精兵的論述俯拾皆是，但實際上卻一直實行冗兵政策。“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這就是宋人宣傳精兵的實際效果！再如，對從嚴治軍這一理論，宋人認識亦算得深刻，但實行起來多是背道而馳，出了問題，大都以“姑息”處置，甚至對犯死罪者也“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以致“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辛棄疾的《美芹十論》等對如何收復失地亦多有良策，但亦未能付諸實施。北方幾個新興起的少數民族政權雖兵書不如宋多，軍事理論也不如宋系統完備，但他們策得輒行，有法必依，軍隊的戰鬥力反而在宋朝之上。這種現象的出現，根本原因在於政治。它反映了兵學理論的實行對政治的依賴。

四、元代立國時間較短，但在《孫子兵法》研究和運用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成績

元代立國時間較短，但其朝野上下都很重視《孫子兵法》研究。在元代流傳的主要是《武經七書·孫子兵法》，另外還有一些《孫子兵法》的單行本。

目前所見元代《孫子兵法》版本，一是上海圖書館藏的“元鏗《武經七書》”。此書與宋本《武經七書》相比，有很多不規範的異體字，如將“舉”寫作“𠂔”，將“𠂔”寫作“𠂔”等。；且每頁 14 行，行 25 字，與存世宋版《武經七書》每頁 11 行、行 20 字不同；另外，此書帶魏武帝注，而存世宋刊陌宋樓《武經七書》都是白文無注。二是解觀撰《武經注》，此書已佚，光緒六年（1880）刊《江西通志》著錄，注者解觀，名子尙，字觀我。注文內容不詳。三是佚名校《武經七書》，《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著錄。這說明，元代承認宋朝確立的《孫子兵法》等七書的“武經”地位，《武經》本《孫子兵法》在社會上流傳版本較多。

元代流行的《孫子兵法》單行本，目前所知有兩種，一是潘可大撰的《孫子釋文》，已經佚失，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中有《潘可大孫子釋文序》，知有此書，成書大約在元朝初年。潘可大，名衍翁，元天臺（今屬浙江）人，戴表元之友，20 歲時作成此書。據戴表元序稱，此書折衷《孫子兵法》之意，“稱仁人

之兵，主於除天下之害，其殺之也，所以生之”，“本《孫子》所未講，而學《孫子》之家所未悉”，認為《孫子釋文》一書“其心仁，其術慎，其於詐利也遠矣”。作者突出強調《孫子兵法》的“仁”字，似與時代背景有一定關係。

元代另一《孫子兵法》單行本是張賁的《孫子張賁注》，也已佚失。明代劉寅《武經直解》著錄並引用其注文。張賁大約生活於元末明初。據《武經直解凡例》說：“《孫子張賁注》論‘道’字甚重，諸家說得極略，《軍爭》、《九變》錯簡處，賁皆訂正”。從劉寅《孫子直解》所引張賁注文看，其校注多不苟同於前人，如注《計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句說：“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而不失其義。”校《虛實篇》“作之而知動靜之理”之“作”為“詐”，並注雲：“謂或誑之以言，或誘之以利，或示之以害，多方以詭道欺之，則敵之動靜可知。”認為《九變篇》“絕地無留”之“無”應為“勿”，此句與《軍爭篇》“高陵勿向”等八句應相連屬，合為“九變”。而《九變篇》中的“圯地無舍，衢地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戰”乃《九地篇》之文。劉寅、趙本學等多遵從之。日本櫻田本《孫子》有可能與《孫子張賁注》有關。

另外，元人對《孫子兵法》中的一些重要觀點注意作進一步探討。如隱士陳櫟（1252—1334）探討“避實擊虛”問題，提出，劉秀破王尋、王邑，李光弼敗史思明，從表面看是擊其最堅處，但昆陽（在今河南葉縣）之戰，劉秀是以精銳擊怠惰；李光弼破史思明，則是以死戰決勝負，乘敵困憊而萬眾齊奮，出其不意，故能摧堅陷強。從本質上看，二者仍是以實擊虛，只不過採取了活法而已。這種通過實例討論《孫子兵法》觀點、著眼答疑解惑的方法，可進一步加深讀者對《孫子兵法》理論的理解。

元代雜劇發達。這一戲曲形式對孫子事蹟也有反映，據《孫子書目彙編》載，僅《孫武子教女兵雜劇》在元代就有兩種。

元代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軍事實踐方面，突出者當推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成吉思汗用兵多與《孫子兵法》相合，如凡決定征戰大計，他必先舉行“忽裡台”（大聚會），進行充分討論，做到先計後戰；他強調在“未入敵境之前，必先偵其國內情況”；強調“不見利不進”；在作戰指導上主張“來如天墮，去如電逝”，“敵分亦分，敵合而合”；在治軍上，強調“智勇兼備者為之典兵”；一方面要求愛護士卒，“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一方面強調從嚴治軍，“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這些論述均符合《孫子兵法》的治軍用兵原則。忽必烈在治軍上主張“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而惟行”；在作戰指導上強調“事當從宜，毋拘常制”，贊成“兵貴神速”、“以奇取勝”、“以聚攻散”等方略，善於集中兵力打擊主要敵人，發揮蒙古軍長于騎戰、吃苦耐勞的特點，使用遠端奔襲、迂回突擊等戰法，取得作戰勝利。記錄成吉思汗鐵木真、元太宗窩闊台等 500 年間戰爭史的《蒙古秘史》（或稱《元朝秘史》）具有豐富的謀略思想和治軍思想，在許多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元代初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戰爭實踐方面，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朝代之一。

## 7. 《孫子兵法》疏解闡發時期--明代

西元 1368 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明王朝。隨著明朝衛所軍制的確立，衛所武學的創立和發展，作為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精髓的孫子思想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明代的《孫子兵法》研究從文獻形式到思想內容，都與前代有許多不同之處，其最突出的特點是由前代的偏重注字解詞變為以疏解闡發孫子思想為主，出現了一大批講解闡發孫子軍事思想的著作和論文。

### 疏解闡發時期--明代(1)

#### 一、明代《孫子兵法》研究文獻數量眾多，形式多樣，多具特色

與中國歷代其他王朝相比，明代兵書數量最多，門類最全，是中國古代兵學發展的第二個高潮期。其中《孫子兵法》研究亦頗具特色，並在當時兵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

##### (一) 各種兵書數量眾多，《孫子兵法》獨領風騷

劉申寧的《中國兵書總目》中，共收入我國自先秦到清末歷代兵書 4221 部（內有重複和交叉的書目）。其中，明代 1165 部。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統計，中國歷代兵書 3227 部（不含民國以後兵書研究著作 153 部，也有個別因著錄不同而重複的）：分為現存兵書 2155 部，存目兵書 1072 部。其中，明代現存 777 部，存目 948 部，合計 1725 部，占兵書總數的 53%。

從以上兩個數位可以看出，明代兵書之多，在古代是空前絕後的。可以說，繼春秋戰國時期之後，明代是中國古代兵學發展的又一個高峰。又據于汝波主編的《孫子學文獻提要》統計，在明代 1000 多部兵書中，有關《孫子兵法》的兵書 200 多部，約占明代全部兵書的二成。從中可見《孫子兵法》研究在明代兵學中所處的地位及其特點。明代研究《孫子兵法》的學者在 50 人以上，而且像劉寅、張居正、趙本學、李贄、王守仁、王世貞、俞大猷、戚繼光、孫承宗、茅元儀、黃獻臣等著名的政界、軍界、學界人士很多，研究成果顯著，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可見，孫子研究在明代兵學中處於主導和領先的地位。

##### (二) 《孫子兵法》文獻內容豐富，形式多樣

明代研究《孫子兵法》的文獻不僅數量很多，而且內容豐富，形式新穎多樣，五彩紛呈。

以研究《孫子兵法》為主體內容的各種明刊本《武經七書》。目前能夠查到和雖然已經失傳但有文獻記載的這類圖書有 30 種左右，著名的有：劉寅《武經直解》，趙光裕《新鑄武經七書標題正義》，沈應明《新鑄注解武經》，臧應驥《新鑄武經標題佐義》，謝弘儀《新鑄武經標題七書》（或題《武經七書集注標題正義》），陳攻學《新鑄增注標題武經七書》，王守仁《新鑄武經七書七種》，張居正《武經直解》（一名《鼇頭七書》），李清《武經七書集注》，沈際飛《武經七書合箋》，李贄《七書參同》，黃獻臣《武經開宗》，何守法《武經七書》，孫履桓《武經商鷺》，王升《武經七書講義》，王圻《武學經傳句解》，汪本源《武經七書題旨明說》等。

專門研究《孫子兵法》的各類單篇學術著作。這類圖書在明代甚多，主要有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趙庭《孫子取衷十三篇》，李騰芳《新編孫武子十三篇說印》，鄭二陽《孫子明解》，薛應旂《孫子說》，陳珂、陳天策《孫武子斷注》，郭良翰《孫武子會解》，談愷《孫子集注》，李棣《孫子集注》，黃邦彥《孫子集注》，李材《見羅先生讀孫子》，黃潤玉《孫子綱要》，鄭士元《孫武子注》，鄭靈《孫武子十三篇本義》，黃智《孫子會通》，周鑒《孫子緯》，王崇獻《孫子釋疑》等。

明代的一些綜合性兵書，也都有對《孫子兵法》闡述、發揮、發展的內容。如《草廬經略》、《投筆膚談》、《兵 》、《兵經百篇》等。這些兵書結合新的戰爭經驗，對《孫子兵法》的思想進行了更爲精煉的概括，以關鍵字或關鍵字爲綱，分條闡發古典軍事思想，史略結合，以史證略，以略講史，從內容和形式上均有所創新。

在諸子著作合輯的圖書中選收《孫子兵法》。如《諸子匯函》、《諸子玄言評苑》、《新鐫諸子拔萃》、《諸子綱目類編》、《諸子類語》、《諸子類雋》、《百家類纂》、《百子金丹》等，都輯有《孫子兵法》。

### (三) 研究《孫子兵法》的文獻體裁新穎活潑，不拘一格

明代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創造了多種形式，如注、評、標題、批點、直解、備旨、參同、引類，輯錄與淺說等。現擇其主要者說明如下：

注：注文的形式，從總體上說有考注、類注、集注、箋注、約注數種。從注文的對象上說，有篇名注、段落注、句注、字注、用典注等；從注文的內容上說，有釋文性注、解字性注、注音性注、校勘性注、引文性注、用典性注、評論性注等；從注文的行文形式上說，有篇後注、文中夾註、旁注、單行小字注、雙行小字注等；篇中或篇後集中注釋文字，一般下正文一字，用同樣大小的字體，或用單行或雙行小字。

評：評論、評價性文字。有卷首總評，卷尾總評、眉評、文章旁批性評。評論的內容主要有評論《孫子兵法》論兵之得失，評論《孫子兵法》之旨要，評論孫武其人用兵之得失，評論《孫子兵法》的地位與價值，評論前人論《孫子兵法》之當否，評論《孫子兵法》語言文字之精妙，等等。

標題：《孫子兵法》標題有兩種：一是對《武經七書》中《孫子兵法》所作標題，如王守仁批、胡宗憲參評、孫元化標題、茅震東考訂刻印的《新鐫標題武經七書》，趙光裕的《新鐫武經標題正義》，謝弘儀的《武經七書集注標題》，臧應驥的《新鐫武經標題佐義》等；二是科舉考試中有關《孫子兵法》的策題，以及參加武科考試的武士子策題答卷。

## 疏解闡發時期--明代(2)

批點：批，指批語；點，指點解。它與講義和直解那種全面的解釋不同，是對《孫子兵法》要點的指明或解釋。

輯錄：是將《孫子兵法》十三篇原文，按照作者設置的具體類目，尋章采句，

依類歸宗，以便讀者檢閱的一種文體。如《諸子玄言》、《諸子奇賞》、《諸子匯函》、《諸子拔萃》、《諸子類雋》等。

參：一是參同，即引證相同的論述與相關的事例作參考；二是合參，即綜合諸說以供參考，與參同的意思差不多。

直解：以通俗語言解釋《孫子兵法》原文含義，有忠實原意、直截了當加以解說之意。

#### （四）明人評價孫子其人其書的主要觀點

1、關於孫武其人的身世與功績。胡應麟、李贄等對此作了考評。胡應麟對宋人葉適懷疑孫武為《孫子兵法》作者的觀點提出質疑，基本肯定孫武為《孫子兵法》的作者。他認為，左丘明對孫武事蹟的記述，“不應盡沒其實”，然而也有“為說文之”的成分。朱元璋也認為：“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王世貞引述司馬遷的話說：“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明人對孫武業績多持此種看法。

2、關於《孫子兵法》一書的真偽、版本與價值。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中肯定“《孫武》、《尉繚》亡無疑者”，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看法。有些學者亦有論及《孫子兵法》的成書時間及後世《孫子兵法》文獻的版本問題者。關於《孫子兵法》的理論價值，大多數評價很高，歸納起來有：（1）《孫子兵法》為《武經七書》之首。理由是成書早，論述精，價值大；（2）《孫子兵法》為空前絕後之巨作。孫武十三篇為“百代譚兵之祖”，“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3）奉《孫子兵法》為武學教範。有明一代，《孫子兵法》居於兵學正統地位，以為武學教範，不僅要求將帥必讀，武官子弟亦必讀，並列為武科考試策題標準和主要考試內容。（4）《孫子兵法》為諸子之精萃，諸品之上品，古文之奇賞，韜略之奇書，被諸家經典大師、文學大師推崇備至。（5）《孫子兵法》切合實用，為經時濟世之良方，養兵用兵之寶典。遇國家有難而用兵，方知《孫子兵法》之可貴。“欲有智而多謀，善將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備武而守國，舍是書何以哉！”戚繼光根據自己的養兵、練兵和用兵實踐，將《孫子兵法》比作武庫，用兵時用《孫子兵法》如同到武庫中取用兵器一樣，或將其比作藥鋪，良將用兵如同良醫治病，用兵時用《孫子兵法》如同到藥鋪中取用藥材一樣。（6）部分儒家學者則貶抑《孫子兵法》為“變詐之術”，不足與于仁義之師，基本是對宋代一些儒家學者觀點的重複。

二、明代在建軍治軍方面對《孫子兵法》的繼承和發展主要體現在精兵與良器並重上，其要點是選練精兵，培育良將，改善兵器

#### （一）選練精兵

《孫子兵法》的治軍思想中包括“兵非多益”、“兵有六敗”的論述，對此，明人多有闡發，並注重將其付諸實踐。朱元璋認為：“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何良臣在其軍事著作《陣紀》中首論選募，指出“兵非精選，無以得用”，主張“募貴多，選貴少”的選募原則。明初實行軍戶制，軍兵來源有二：一是老軍戶，即大量接收原元朝軍戶中的漢軍軍戶。老軍戶世代出兵，具

有一定的軍事素質，起用老軍戶，不僅使明初軍兵來源有了基本保障，而且軍兵的軍事素質也具有一定的基礎。二是新軍戶，即將跟隨朱元璋等反元起義的從軍將士永隸軍籍，將歸附明軍的敗軍軍士等收籍為軍，將“抽籍”和“垛集”的民戶充為軍戶。明初軍戶實行屯田，保證了軍戶的經濟收入，並供給軍需，使軍兵無後顧之憂。明中期以後，屯田制遭到破壞，軍戶制也隨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募兵。招募軍兵主要依靠領兵將領和地方豪紳。為保證軍隊兵員品質，一些將領十分重視軍兵的選募。戚繼光認為選兵是練兵的基礎，“其法惟在精”。他要求選拔鄉野老實之人，不收城市遊滑之徒。注意招募物件的體格、相貌和精神。何良臣也說募兵“最喜誠實，獨忌遊閑”。鄭若曾主張選用土著之兵，提出“以一方之食，養一方之兵，支一方之患”（《江南經略》）。

為選練精兵，必須把好選鋒關。《孫子兵法》說：“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將選鋒看作是將之至任。明人對此有所發展。如何良臣在《陣紀》中提出“選貴少”，“選務精”。他認為選鋒的標準是：能舉鐵石器，而且耳目伶俐，手足便捷者為中選；其中膽藝過人者為上選；身驅偉大，膽氣武技倍者為頭領，其他條件一樣；力不能舉重涉遠者為下選。

為選練精兵，明人注意強化部隊訓練，努力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戚繼光在練兵過程中遵循由理論到規則、由規則到訓練、由訓練到實踐的轉化過程。將各種訓練要求編寫成冊發給士卒，使訓練成果條令化。讓“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各要記熟”。他還制定許多具體的可執行的號令，如《對壘號令》、《舟船號令》、《發船號令》、《行泊號令》、《水戰號令》等。他通過各種號令、條教等軍事規章體現《孫子兵法》思想，經過訓練又把孫子等兵家的思想化為將士的具體行動，最終使軍事理論轉化為戰鬥力。因此，他訓練的戚家軍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屢摧大寇”，聲振天下。另外，明代還建立了組織赴京集校、班軍京操、京營團練等項訓練制度，以強化對部隊的訓練。

### 疏解闡發時期--明代(3)

為選練精兵，明人注重改革訓練內容。明代在繼承以往訓練傳統，加強冷兵器演練的同時，根據作戰的需要和武器裝備的發展，改革軍事訓練內容，增加了使用兵車、火器等新裝備的訓練；在注重技術訓練的同時，還增加了戰術訓練的內容，將練習操法與練習陣法結合起來；在注重體能和技巧訓練的同時，還增加了學習兵書和作戰條令的內容，既練體能、練技巧，又練思想、練氣節。戚繼光在薊鎮練兵，寫出《練兵實紀》，他規定的訓練內容包括：練伍法、練膽氣、練耳目、練手足和練將。鄭若曾提出的訓練內容為：練膽、練藝、練陣、練地和練時令，練陣就是訓練戰術運用。

俞大猷曾師從趙本學，學習《孫子兵法》，他結合學習心得和練兵、作戰實踐，寫出《兵略對》、《大同鎮兵車操法》、《廣東選鋒兵操法》，集中探討練兵問題、車戰問題和選鋒問題等與部隊的訓練、作戰有關的戰術與技巧。戚繼光的《練兵實紀》與《紀效新書》在理論上都閃爍著孫子思想的光輝，同時又有他自己的

風格，他能結合新的形勢與特點，研究新問題，而且能把高深理論具體化爲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式方法，務真求實，不尚空談。如孫子曰：“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這樣一句話要變成戰鬥力，就得轉化。戚繼光把它具體化爲“練伍”、“練耳目”與“練將”等，強調將士要對旌旗金鼓發出的號令，做到“人人明習，人人屬守，使此身可棄，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拼，此節不可不重，視死爲易，視令爲尊”。

爲選練精兵，明人注意改革訓練方式。名將戚繼光是明後期練兵的典型人物，他根據當時火器和冷兵器並用的時代特點，認爲：“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因而大膽改革訓練辦法，正確認識精兵與精器即人與物的辯證關係，將部隊的戰術訓練與技術訓練、練膽與練藝、練兵與練將緊密結合起來。在武器技術的訓練與運用上，他主張“長以救短，短以救長”，根據沿海地形和抗倭鬥爭的實際需要，創造了 12 人鴛鴦陣法，在訓練中，使長、短兵器互相配合、冷熱兵器互相配合，發揮整體作戰威力。後來，爲了防禦北方的韃靼部落和崛起的後金軍隊的南侵，戚繼光移鎮薊州。他又根據北方敵情特點，創制車營陣法戰術訓練部隊。作戰時，以裝備有火炮的戰車居前，掩護步、騎兵作戰。當距敵 50 步時，車內火器突然一齊開火，等敵人逼近戰車，再出動步兵。步兵第一行用長刀斫敵馬腿，第二排用木棍將敵人打下馬來，後面持槍、鈚的士卒向前衝殺，並以騎兵作爲機動兵力，相機調用。史稱戚繼光在薊州 16 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

## （二）以《孫子兵法》與儒學經典相結合培育將才

明代將《孫子兵法》作爲軍事學校的主導教材，使圍繞《孫子兵法》的學術研究活動與軍事教育緊密結合起來，不僅促進了軍事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也使《孫子兵法》學說得到了普及和推廣，在繼承《孫子兵法》思想的基礎上有了些新的發展。

明代的軍事教育制度是建立在明初衛所制基礎之上的。明初制定軍衛法，實行衛所制。與此相適應，自洪武十七年（1383 年）開始，在衛司和都司設置儒學，編配教授和訓導，負責教育武官子弟。洪武二十年（1386 年）禮部曾奏請設立武學、武舉，朱元璋認爲設立專門武學不利於培養文武全才，不肯批准。至建文四年（1402 年）始置軍事專業學校京衛武學，至永樂中停辦。正統初，朝廷命太子太保朱勇選拔有文武全才的禦史負責選拔都指揮等武官，學習《孫吳兵略》和《歷代臣鑒》等。朱勇及禦史朱鑒等向朝廷呈送《請設京衛武學疏》，提出：應襲替的文武官員子弟及幼官，趁其年少，選送武學，習讀《歷代臣鑒》等書，講解武經，孫吳等法。凡弓馬嫻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遠，文武雙全者，量加升賞，錄名聽用。正統六年（1441 年），英宗正式批准“開設京衛武學”，接著向全國推廣，形成衛所武學教育體制。

明代武學與武科考試走向制度化。凡京師各衛武學與在外地的各衛所武學，各設教授一人，訓導一至二人，負責教授諸衛幼官及武臣子弟的武藝和文化。這是明代世兵與世襲軍官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他們在未從軍或承襲、襲替軍官職務

之前，首先接受軍事教育。初期武學所讀大都是市肆版孫子書舊注，爲了統一武學教材，官方規定將劉寅的《武經直解》刊印行世，作爲衛所武學的正式軍事教科書。該書序稱：“太祖高皇帝有旨，俾軍官子孫講讀武書，通曉者臨期試用。寅觀孫武舊注，數家矛盾不一，學者難於統會……於是取其書，刪繁撮要，斷以經傳所載先儒之奧旨，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格言。”可見，《武經直解》本身就是爲武學生學習兵法韜略而作。

爲適應武學科考的需要，一些學者將《孫子兵法》等兵書的思想理論觀點抽選出來，作爲武生考試的試題。於是，社會上大量刊印帶有孫子策題的標題性兵書。這種參考書大體分爲三類：（1）孫子十三篇標題。如謝弘儀的《武經七書集注標題》（又稱《新鑄武經標題正義》、《新鑄武經標題七書》）。全書八卷五冊，其中《孫子兵法》一卷由謝氏輯錄，分上下兩欄。下欄有雙行小字注文；上欄標題，以小字批註。標題分爲四種：一正題；二副題；三小題；四策題。其中正、副標題有注，小題、策題無注，正題以圓圈爲標誌，策題以問字開題。如《孫子兵法·始計篇》策題：問孫子首言令民與上同意，吳子亦首言先和而能造大事。曰同曰和，果皆人和之旨非歟？正題：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注：道就行師有道言。令民同意即是上下同欲也……。副題：將者智信仁勇嚴。注：將有五者，則道天地法皆兼舉矣。然人君信任不專，亦難成功。結宜責孫子所論不及太公“勇智仁信忠”之言。（2）孫子策題。明代在應付科舉考試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孫子策題，如令民與上同意、上兵伐謀、安國全軍之道等。戚繼光在《止止堂集·策問》中，直接問到《孫子兵法》的有兩個策題：一，“問兵法有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寡。’薊鎮十區，延袤逾二千里，主客軍足十五萬，歲費僅百萬，茲欲無所不備而不致無所不寡，有何道歟？”二，“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薊鎮官軍每枝不過三千，胡馬動稱十余萬，將圖小敵能堅而不爲大敵所擒，豈無策歟？”針對這些策問，戚繼光不是直接回答問題，而是結合實際軍事地理形勢和當時邊防的敵我雙方情況，向通過武科考試來求取功名的諸生提出問題，讓他們獨立思考；不是引導諸生照搬孫武的現成理論，而是引導他們活用古法，即所謂師古而不泥古。他這種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的方法，得到了後世兵家的好評。

#### 疏解闡發時期--明代(4)

孫子策題等應付科舉考試的兵書的出現，固然有其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但是，將《孫子兵法》的研究成果用於教學和科舉考試，推動了《孫子兵法》的普及，使明人對《孫子兵法》思想的研究更加系統化、條理化，有利於深化軍事教育內容的改革和軍事教育品質的提高。

另外，爲普及《孫子兵法》原理，明人還注意以孫子言論評論兵略、將略。明代不僅翻刻宋人張預的《百將傳》，而且進行續編，明景泰年間何喬新撰刻《續百將傳》，續選名將 40 位，編成四卷，體裁一仿張氏舊例。明代還推出一種新的傳略《古今將略》（馮孜撰），在各個名將事蹟中附有《孫子兵法》等《武經七書》

有關軍事論點，以便讀者將理論和事例結合起來，加深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理解。

### （三）實現重道輕器的傳統兵學向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的轉變

中國傳統兵學重道輕器，重理論輕技術。所以，《孫子兵法》關於武器裝備的論述不多，其中最典型的一句話是“兵眾孰強”。意思是說：哪一方的武器裝備精良，是衡量其作戰能力大小的標準之一。明代兵家能夠從孫子這一思想出發，並轉變坐而論道的經院式軍事學術風氣，務真求實，進一步認識精兵與良器即人與物的辯證關係，重視加強武器裝備建設，以良器取得戰場上的優勢地位。

明代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宋以來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不僅使明代傳統的冷兵器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且為明代火器的發展提供了契機，使管形火器的研究和製造進入了比較成熟的發展階段。戚繼光說得好：“彼以何器，我必求長於彼”，“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明朝統治者為佔據軍事上的有利地位，十分重視武器裝備的研究與製造，而且兵器研製特別是火器的研製，受到中央的嚴密控制，專門設立軍器局和兵仗局進行集中管理。兵家重視武器裝備建設的社會實踐，結果寫出大量有關兵器等製造技術與運用方法的兵書。如《手臂錄》、《少林棍法闡宗》、《蹶張心法》、《長槍法》、《單刀法選》、《名劍記》、《車營百八叩》、《車營圖制》、《軍器圖說》、《神器譜》、《司兵便錄》、《軍中醫方備要》和《西洋火攻圖說》等。

以火器為重點堅持精兵與良器並重的建軍原則。明代高度重視火器的製造與運用，把發展火器看作是富國強兵的一個重要條件。明代兵學著作的發展突出反映出重視火器的傾向，僅論述火器製造與火攻的兵書便有 10 餘種，如《神器譜》、《火龍神器陣法》、《火龍經》（一名《火攻備要》）、《火攻紀要》、《火攻擊要》、《火器圖》、《火器圖說》、《西洋火攻圖說》和《備邊屯田車銃議》等。徐光啓認為：“大炮至猛至烈，無有他器可以逾之。”趙士禎在《神器譜》中指出：火器“攻城陷陣，致遠摧堅，鋒不可擋”，發展火器“可致兵強，兵強斯望國富”。洪武初即開始設計製造銅火銃，以後改進製造銅碗口炮，永樂年間成立了專門的火器部隊神機營，更加緊了對火銃和火炮的製造和裝備。《神器譜》一書介紹的各種銃槍、火箭、火藥等火器有 20 多種。明朝不僅自行研製火器，還從西方引進人才和火器技術。自正德年間開始，佛朗機、火繩槍和紅夷炮相繼傳入中國，在仿製的基礎上加以改造，製造出一批形制新穎的火器。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就被朝廷聘用，向中國的火器專家傳授火器製造技術。除了中央製造外，經過皇帝批准，一些地方也負有製造冷、熱兵器的職責。如戚繼光曾經創制新型冷兵器狼筈、火器賽貢銃和木發■。

貫徹從實戰需要出發發展武器裝備的發展戰略。為了對付北部邊境的軍事壓力和沿海倭寇的襲擾，明朝堅持從實戰需要出發，先急後緩的發展方針，積極研製戰車和戰船，以運用於中原和東南沿海。其中戰車先後有獨轆車、武剛車、火車、偏箱車、獨輪小車、軍隊小車、雙輪全勝車等，多為冷熱兵器混合編組、搭配使用的重型軍事裝備。軍事技術引起軍事思想、軍事編制和戰術的變化。明嘉

靖年間，俞大猷根據其練兵作戰經驗，寫出《兵略對》、《大同鎮兵車操法》，對戰車的形制和戰術運用作了詳細的描述。明天啓二年（1622年），孫承宗就任兵部尚書經略薊、遼。他在練兵屯田，修堡防邊，與文武大吏和部屬探討車營戰法，以抗擊後金軍事進攻的軍事實踐中，將研究《孫子兵法》、籌畫邊防的心得，寫成《車營叩答合編》一書。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車營編制和車營陣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明創造出來的。

三、明代在國防戰略與作戰指導上對《孫子兵法》的繼承與發展：建立大縱深、多層次的國家防禦系統；辯證認識久速；重視冷熱兵器並用、陣地防禦與陣法訓練

明代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建軍治軍思想，而且對《孫子兵法》的作戰理論也有所創新和發展，從而豐富了對外防禦的國防思想（含海防思想）與對付內部動亂的作戰指導原則等戰爭理論問題。

#### （一）安國全軍、積極防衛的國防戰略

明代的國防戰略，是根據明王朝當時面對的國際環境、周邊關係和《孫子兵法》“安國全軍”的思想制定的防禦戰略。這種防禦戰略是大縱深、多層次的防禦戰略，其重點是北方九鎮邊防與東南沿海海防。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據此，我們可以透視整個明代國防。

#### 疏解闡發時期--明代(5)

鞏固邊防重鎮，加強縱深防禦。明初，為防止元朝殘餘勢力及以後的蒙古族瓦剌部和韃靼部襲擾犯邊，根據孫子“守其所必攻”的思想，朱元璋、朱棣兩朝以長城為依託，建立前哨衛、所，以加強防禦正面，加大防禦縱深，朱元璋又命諸王各統重兵分頭鎮守北平、大寧、宣府、大同、太原等邊防重鎮。朱棣繼位後，曾先後五次主動出擊，實施以長城為依託深入漠北的軍事行動，打擊蒙古貴族的勢力，以確保北部邊境的安全。同時，加強九邊包括長城在內的防禦工程的建設，以及部署在九鎮的軍事力量。對於遏止來自北部的安全威脅，發揮了明顯的作用。著名將領俞大猷在受誣陷發配山西大同鎮時，協助巡撫李文進經略邊防，領導造出獨輪兵車，並由李文進上奏朝廷，創建兵車營。俞還提出利用兵車營，協同步、騎、炮兵作戰，實行多層防禦的防禦作戰思想。為了防止敵人騎兵長驅直入，主張于京郊大量植樹，招集流民墾荒建堡，遲滯和防禦敵人的進攻。明代研究邊鎮防禦作戰理論的軍事著作還有楊時甯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劉效祖的《四鎮三關志》和胡獻忠《九邊形勢圖》等。

籌畫海防，抗擊倭寇。中國古代的海防思想與海防體系是在明代建立起來的。明初本著孫子“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思想，確立了積極防衛的海防政策。其具體部署是：打造戰船，以舟師巡海；修築城堡，固守島嶼；增設沿海衛、所，扼守海岸、海口，構成阻攔敵人的海上縱深防禦體系。為了加強沿海防禦，做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許多有識之士如鄭若曾、徐光啓、茅元儀、焦勳等，精心研究沿海軍事地理，瞭解倭寇活動規律，研製新的火器技術和使用技術，

先後推出了軍事地理學和防禦作戰理論的著作《籌海圖編》、《江南經略》，研究禦倭的有郭光復《倭情考略》一卷和王口口《禦倭條款》一卷，探討海防學術問題的有徐明達《乾坤一統海防全圖》，王在晉《海防纂要》十三卷圖一卷，李汝華《溫處海防圖略》一卷和張兆元《海防圖議》一卷等。這一大批軍事理論著作，為沿海的抗倭鬥爭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資料。其中鄭若曾的《籌海圖編》提出了禦海洋、固海岸、嚴城守的縱深防禦戰略體系理論。俞大猷根據自己長期抗倭鬥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優先發展水軍和多兵種協同作戰的海防思想。關於發展水軍，他認為水軍應當占海防兵力的七成，陸兵應當占海防兵力的三成。關於作戰方法，他認為海上與陸上配合，內河與內陸配合，水軍與漁民配合；在海上、海岸、內河與城鎮設置多層次的縱深防禦體系。

經略遼東，佈防山海關。明末後金勢力崛起，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朝廷以重兵防禦，先後多次欽派大員經略遼東，其中不乏有識有為的將領，如袁崇煥與孫承宗等。孫承宗、鹿善繼、茅元儀等還在督防遼東的軍務繁忙、戎馬倥傯之中，研究《孫子兵法》，討論戰法，撰寫《車營百八扣》和《車營百八答》等書，以軍事學術理論指導國防建設實踐。名將袁崇煥在長期鎮守遼東的軍事實踐中，提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的作戰方法；實施以和議為掩護、緩敵修守的軍事策略；堅持“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擊瑕以為用”，且築且屯，且守且戰的積極防衛戰法，先後取得了抗擊後金的輝煌戰果，豐富與發展了孫子的防禦作戰理論。明代兵家何良臣的《陣紀》、呂坤的《守城秘要》和《城守驗方》、錢梅的《城守籌略》和程開祐的《籌遼碩畫》等兵書，反映出明代兵家重視研究軍事鬥爭實踐經驗，特別是城市防禦作戰的作戰指導理論原則問題，對《孫子兵法》均有所繼承和發展。但是，由於朝廷政治腐敗、用人不當及農民起義武裝的衝擊，明王朝在遼東邊防的防禦體系未能抵擋住努爾哈赤的隊伍。

## （二）拙速與巧久變通運用的作戰指導原則

明代一些兵家研究《孫子兵法》著眼於創新，能夠破除舊的思維框框，大膽提出新的作戰指導原則。《孫子兵法·作戰篇》有一句名言：“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明代抗倭名將俞大猷對此提出異議。在他的《正氣堂餘集》卷四《洗海近事》及《正氣堂續集》卷四《雜文》有《拙速解》上、下兩篇文章專論孫子“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一語的戰術思想。上篇作於明隆慶二年（1568年），作者認為戰國時期，諸侯紛爭，作戰惟速，不嫌其拙；而今天下統一，堂堂正正地打仗，十圍五攻，應講究巧而不嫌其遲了。或者拙速，或者巧久，要視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各得其宜。“速而果拙，何貴於速；遲而果巧，何嫌于遲”。在下篇，作者認為《孫子》的拙速論僅適合於戰國時期列國相爭的歷史條件。後世則為“堂堂討罰，有征無戰之兵，必為萬全之畫”；後世之人為圖速成之功，“視三軍之命如草芥”，“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勝計”，都是由於孫武子一言“誤之”。歷代統治階級用正規軍隊對付個別武裝叛亂和小股農民起義武裝，最拿手的辦法就是以靜制動，讓對方充分暴露自己的弱點，如圍而不打，攻心為上，待敵自亂、自破，再一舉殲滅。所以，俞大猷根據歷代統治階級的用兵經驗，對《孫

子兵法》“兵聞拙速”的歷史結論，作出了自己的評價，而不是一味盲目地重復舊說。他提出的用兵持重、謀定而後戰、以收萬全之功的作戰指導原則，具有理論創新的價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普陀島殲倭之戰，俞大猷率舟師以一部佯攻，一部利用夜暗隱蔽接近普陀島，達成突然全部登陸的作戰部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向倭寇發起猛烈攻擊；當敵人逃往茶山后，他又適時組織左、右、中、後四路圍攻，運用萬全之策，全殲逃敵。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平息甯王朱宸濠叛亂作戰，一開始並不急於發兵，而是運籌謀略，大張聲勢，派遣間諜，進行離間，瓦解敵人；然後採取圍魏救趙戰法，與敵周旋，調動敵人，造成不利於敵而利於己的作戰態勢，順利地取得了平叛作戰的徹底勝利。這些，都體現了先計後戰的作戰指導原則。

## 疏解闡發時期--明代(6)

### （三）重視火攻戰法與冷熱兵器的混合運用

《孫子兵法》以專篇論述火攻戰法，提出了“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的論點。其所論水、火，都是自然之水與自然之火，論述人類如何將水、火的自然力量因勢利導，運用於戰爭。到了明代，火攻武器的發展，火銃、火槍、火炮、火車（裝有易燃物的戰車）等火器的大量使用，為發展孫子的火攻思想提供了物質基礎，先後推出《火龍神器陣法》、《火攻備要》、《火攻擊要》和《西洋火攻圖說》等一系列論述火攻戰法的兵書，《武編》和《武備志》等綜合類兵書中也收錄了有關火攻的內容。據《火龍神器陣法》序稱，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戰爭中運用火龍神器，發揮了巨大威力。所以，明代開國以後一直十分重視火器的製造與作戰運用。明代雖然火器有了很大發展，但還不可能完全取代冷兵器，這就決定了明軍的裝備是冷熱兵器混合編組。這一物質技術條件和軍事編組制度，引起了明代戰術戰法的深刻變革，在軍事訓練中反覆演練冷熱兵器混合運用的技巧，在戰場上，將火器部隊與步、騎兵部隊梯次部署，協同作戰。首先發揮火器的火力優勢，以火炮、火箭、火車等壓制敵人，掩護步兵和騎兵運用其他冷兵器與敵人展開拼殺。特別是火銃這種便攜火器的發展，廣泛地裝備到步、騎兵部隊中，實現冷熱兵器的混合編組，更使冷熱兵器的混合演練和協同運用成為明代軍事理論研究與作戰實踐的一大課題。

明代關於火器的戰術運用原則：一是兵器與火器互助，遠、近、長、短相兼。“火炮、火銳、火彈，此遠器也，則與長槍、大刀相間；火槍、火刀、火牌、火棍，此近器、短器也，則與長弓硬弩相間”（《火龍神器陣法》）；“長技與短技間迭而出，兵器與火器互相為助，擊法與衛法兼資以用”（《火攻擊要》）。二是長器短用，抵近射擊。指出火器雖為遠器，但遠近要適度，不可輕放。能射三四百步的重火器，要等到距敵五六十步再開火，能射百余步的輕火器，要等到距敵二三十步再開火，抵近射擊，才能更有效地殺傷和震懾敵人。三是揚長避短，量敵制器。這是對孫子“因敵變化”思想的具體運用和發揮。火器雖然是精器、利器，但還要強調製器得法、用器得當，即根據不同敵人的不同弱點，製造不同的

火器，運用不同的火器，或以大擊小，或以長勝短，或以多鬥寡，或以精敵粗，或以善用對付不善用。四是上應天時，下因地利。如果運用火器不得其地、不得其時，不僅不能發揮火器的威力，反而會造成士卒棄器而走，“徒資寇敵也”（《火龍神器陣法》）。

#### （四）重視陣地防禦與陣法的作戰運用

中國陣法起源很早，《孫臏兵法》中有“八陣”與“十陣”之說，《後漢書·禮儀志》有“孫吳兵法六十四陣”的說法。《孫子兵法》中也有不少論述：“勿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究其大意不外：兵陣易守難攻，佈陣不過奇正，用陣首尾相顧。宋代就十分重視陣法的演練和運用，明代亦然，這可能與宋、明採取防禦戰略有很大關係。

明代像《陣紀》、《陣法直指》、《秘授金鎖八門陣圖要訣》、《八陣圖說》、《八陣辨證》、《飛鳴園陣法答客問》、《陣法全圖》、《營陣圖說》、《握機經》等大量論述佈陣練兵與用兵的兵書，對《孫子兵法》的陣法思想作了充分的論證發揮和創新發展。明代重陣用陣，與宋代的最大區別在於重實用、重火器；重車戰、重協同。

重實用、重火器。就是不擺花架子，結合實戰需要，採取火器佈陣進行陣法演練。宋代多用大陣，明代多用小陣。如戚繼光在抗倭作戰中運用的鴛鴦陣，亦可演變為三才陣，就是由配備火器與冷兵器結合的 12 人組成的軍陣。戚繼光在教練陣法時強調“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反對練花法、演虛套。戚家軍在抗倭作戰中巧妙運用鴛鴦陣法，屢屢獲勝。俞大猷師從趙本學，學習陣法，並運用於作戰實踐當中。宋繼祖在俞大猷的《續武經總要》後跋中說：“觀俞公八羅山之捷，似自某陣而變者也；五指山之捷，似自某陣而變者也。化某陣於交阯，而南夷靖；化某陣於浙直，而東倭平。不泥其跡而師其意，孰非自韜鈴中來耶？”

重車戰、重協同。明代在京師保衛戰中，名將于謙將神機營等專門的火器部隊與步兵和騎兵部隊的作戰運用結合起來，協同作戰，有效地抗擊了瓦剌軍的進攻，保衛了京師，形成有明一代城市陣地防禦作戰的特殊戰法。明軍佈防遼東作戰中，重視城堡防禦作戰。天啓三年（1623 年），袁崇煥奉孫承宗之命駐防寧遠城，他根據實戰需要，積極研習修築城壘方法，親定築城規則，實施以台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的城堡防禦作戰原則，建成了屏障山海關的軍事、政治與經濟重鎮。在與後金的作戰中，他多次憑城固守，運用火炮和陣地，配合步、騎兵遂行防禦作戰，強調駐於城內、守於城外，與敵周旋，屢立戰功。明代為了揚長避短，重視運用車兵營來抵擋後金的強大騎兵部隊。著名兵家何良臣在《陣紀》中以專篇論述車戰戰法，強調車、步、騎協同作戰，發展了孫子的車戰思想。他說：“雖曰步不勝騎，騎不勝車，然有騎無車，則一騎不能當一卒也。務使步不離車，騎不遠轂，進退有制，迴圈反覆，得用車之法也。”

## 疏解闡發時期--明代(7)

四、科技進步，政治間歇性穩定，經濟相對繁榮，對科舉考試與軍事教育的重視，民族憂患意識等，是明代孫子研究發展的主要原因

明代《孫子兵法》研究的範圍廣泛，研究隊伍龐大，研究形式新穎，理論聯繫實際，認識深刻，成果豐富，學術創新多，對後世影響大。造成明代孫子研究大發展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 (一) 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對孫子研究發揮了促進作用

科學技術進步是推動生產和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推動學術和文化發展的動力。首先是宋元兩代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明代的影響。宋代將火藥運用於軍事，製造出了火藥箭、火球、火蒺藜、火槍。宋代兵書《武經總要》對此作了詳細的記載。到元代又出現了火銃，並用於作戰。以上火器的製造和使用，不僅為明代製造和使用火器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產生了一系列介紹火藥和火器製造技術方面的兵書，如《火器圖》、《火龍神器》、《神器譜》等，而且，明代在總結前人火攻作戰經驗的基礎上，更產生了新的火攻技術，寫出了專門探討火攻戰法的兵書《火攻陣法》、《火龍經》、《火攻擊要》等。活字印刷技術的發明，也為這些兵書的形成和傳播發揮了實際的作用。明代本身不僅繼承前代火器，而且對火銃等火器的製造有了新的改造和發展，創造出了各種各樣的新樣式新性能的火器。正德以後，還從葡萄牙人那裡學習並仿製了新的火器佛郎機。這些新式火器的出現，改變了部隊的裝備狀況，使部隊的編制體制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作戰方法也要隨著這一變化而變化。於是，兵家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開始研究軍隊的編制制度和訓練方法，以及適合火器使用的合同陣法，摸索出了一套火攻戰法。這些火攻戰法不僅吸取了當年《孫子兵法·火攻》中的思想，而且對孫子火攻思想作出了創新發展。

(二) 國家政治、經濟局部性、間歇性的穩定與繁榮為孫子研究發展提供了可能與條件

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建立明朝政權後，進一步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在二百七十餘年裡，沒有出現大的政權更迭和動盪。同時，大力發展屯墾、興修水利，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在元朝的基礎上有了相當規模的新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因素的早期萌芽。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對軍事思想的活躍和孫子研究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 (三) 科舉考試與軍事教育事業對孫子研究起了推動作用

《武經七書》是宋代適應科舉需要而頒行的兵法彙編。自從宋代將《武經七書》列為武學教科書之後，《孫子兵法》等七部兵書，便從名山走進了官辦的武學堂。到了明代，為了適應武士子學習的需要，劉寅等首先開始對《武經七書》作直解。一部《武經七書直解》，於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問世了。不僅《武經七書》廣為流行，而且又出現了標題本《武經七書》，這是明人在科舉方面的新創造。不但《武經七書》有標題本，其他兵書也有標題本，如《新鐫標題百將

傳》等。作為科舉過關考試的輔導材料，這些書的編撰與刊刻意圖是再明顯不過了。以後，隨著科舉考試的不斷發展，《孫子兵法》等武經不僅成為武學的必修教材，而且也成為想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那些士子們的入仕門徑之一。各種各樣注釋《武經》的兵書，以及為《孫子兵法》等兵書出題考試的著作，紛紛面世。一些書商為了謀利而刊刻大量專門為考生準備的各種標題性參考書。不管是出自何種目的需要，它們都在客觀上擴大了對《孫子兵法》等兵書的傳播，推動了對《孫子兵法》等兵書的普及教育。

#### （四）民族憂患意識是明代孫子研究發展的內在動力

明人經過宋遼金元諸民族的反覆競爭，進一步激發了民族自尊心和競爭意識。除了中華民族內部的矛盾紛爭而外，中國更面臨外敵入侵的局面，如倭寇的侵擾等。“多難興邦”，馳騁疆場的愛國將士俞大猷、戚繼光、王守仁、于謙、袁崇煥等，開始認真總結軍事之成敗，從事軍事理論研究的兵家積極探索復興之方略。就連那些文人學士如趙本學、李贄、王世貞、茅元儀、尹賓商、鄭若曾等，也紛紛加入軍事理論研究的行列，尋求強兵興國的良方，為孫子研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 8.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

孫子兵學作為中國傳統兵學的核心部分，在清代經歷了一個重要發展時期，其傳統的理論體系再一次得到完善，並隨即開始了它的解體過程。人們在這裡既可以看到傳統孫子兵學的最後輝煌，也可以看到它在繁榮外表之下的凝滯；既可以感受到它在進入近代之後的休眠，也可以感受到它在近代條件下的再造。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1)

一、清代《孫子兵法》研究，大致可分為清初武闈研究、中期考據研究和晚清休眠與再造三個發展階段

清初《孫子兵法》研究上承宋明，繼續居於兵家顯學的地位。並隨著清朝政治、軍事和社會文化的變化，以及西方近代軍事的衝擊，而呈現出明顯的發展階段性。大致說來，清初順、康、雍三朝為第一個發展階段；清中期的乾隆、嘉慶至道光初年為第二個發展階段；鴉片戰爭以後至清朝滅亡為第三個發展階段。

##### （一）清初的武闈《孫子兵法》研究

在清初第一發展階段，《孫子兵法》研究以為武科應試服務為宗旨，以撰輯武闈讀本為特色。清代存世的關於《孫子兵法》的第一部著作是陳裕輯著的《武經全題匯解·孫子》，刊刻于順治十四年（1657年）。該書即為武科應試讀本。根據統計，順、康、雍三朝共計有 41 種關於《孫子兵法》的著作刊刻行世，其中 30 種屬於武科應試讀本，占居明顯的多數。

既是以服務于武科應試為宗旨，這一階段的大量孫子研究著作在形式和內容上便帶有明顯的共同特徵。從形式上看，這些著作一般都分為上下兩欄。下欄為《孫子兵法》十三篇本文，多採用雙行夾註，並有圈點句讀。夾註主要用於解釋

十三篇的文字，間或有文字校訂。上欄各書名稱不一，或稱“開宗合纂全題匯解”，或稱“明解”，或稱“直解開宗合參”，或稱“秘擬鄉會兩闈標題主旨”，或稱“合纂全題衷旨”，等等。究其上欄的具體內容，大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孫子兵法》十三篇各篇篇旨、節旨以及重要文句的闡述、注解；二是根據以往武闈試題的特點，模擬出各種新的試題，然後標明題源（出自《孫子兵法》本文的哪一段文字），提供簡略的答題思路，以及答題時需注意把握的一些訣竅。在總體風格上，這些著作都追求文字淺顯，語義簡明，以適應武科應試讀者文化水準不高的特定需求。

在這一時期大量的武科應試讀物中，與上述各書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一定差異，並稍具學術色彩，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朱墉輯注的《武經七書匯解·孫子》和丁洪章輯注的《武經七書全解·孫子》。

朱墉所輯之書，在形式上無上下欄之分，而是將十三篇各分爲若干大段，每段之後低一格雙行注解。其注解兼采群說，卷首開列之“徵引書目”多達 91 種。所徵引的內容主要包括兩類：一是曹操、杜牧、李筌、賈林、梅堯臣等歷代著名注家之說；二是明代和清初各種《武經》“直解”、“明解”、“開宗”、“合參”、“醒宗”、“題炬”、“正義”之文。由於各說並存，不僅保存了一些後來佚失的《孫子兵法》注文，而且爲讀者比較鑒別各家之說提供了方便。該書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問世之後頗受讀者歡迎，後曾多次修訂重刊，並引得眾家效尤。

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孫子》亦初刊於康熙二十七年。該書具有體例完備、內容豐富的特點。它借用明、清兩代注解《四書五經》之法以注解《孫子兵法》：有“全旨”以提其綱；有“節旨”以契其領；有“注”以逐字訓其義；有“疏”以逐句釋其理；有“參訂”以選錄歷代注家之言，並加發揮以究其理；此外還有“考證”備載有關的戰例和人物事蹟，以佐證《孫子兵法》的理論。該書與朱墉之書一樣，也是爲武科應試讀者服務的，書中附載有《射譜》、《武闈鄉試條約》、《棘圍事宜》等內容，特別是大量的“論題”和“題解”，已超出了武闈的需要，而對《孫子兵法》學術研究有所裨助。

清初能夠擺脫武闈讀物的套路、主要從學術的角度探討《孫子兵法》的，總共只有謝文、鄭端、鄭達、王、王又喬等數家。謝文著《兵法類案》，取《孫子兵法》十三篇之要語爲綱，如“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能而示之不能”等語皆爲其所取。每綱之下複取歷代名君名將之言論實跡爲目，或二三目，或十餘目不等。通觀全書，所選之綱綜括了《孫子兵法》的主要思想，所列之目則多歷代治軍用兵之精華。鄭端有《孫子匯征》（一題《孫武子集解廣義》），採擇前代注家之說及古來談兵之言以注解《孫子兵法》；鄭達有《孫子附解》，據道藏《孫子十家注》輯纂，爲清人對道藏本《孫子》首先予以重視之作，惜其書已佚；王有《武經三子集注·孫子》，兼采各家之注，證以歷代戰例，注意十三篇之間的邏輯聯繫，重視對各篇內容的總體把握；王又喬有《孫子集注》，乃校訂《孫子》十三篇文字之作。此數書雖非武科應試讀物，但由於作者用力不夠，對《孫子兵

法》的學術研究並無大的建樹，因而其影響不大。

清初孫子研究著作真正表現出一定理論水準的是鄧廷羅所著之《孫子集注》、《兵鏡或問》和《兵鏡備考》三書。其中《孫子集注》側重于對《孫子兵法》十三篇文句的注解，雖亦引前代注家之言，但更重視自己的發揮。特別是各篇末後之總論，尤見作者研討《孫子兵法》之心得。其論《勢》篇曰：“兵之勢生於奇正”，而“眾者易寡，強者易弱，正忽變為奇，奇忽變為正也。”《兵鏡備考》則有如謝文的《兵法類案》，將《孫子》十三篇比作“治病之方”，將歷代帝王將相之戰功言論視為“名醫之案”。他廣征博引，要以“案”證“方”，以“案”論“方”，藉以發掘《孫子兵法》的兵學精義。《兵鏡或問》對《孫子兵法》以及中國古代兵學中的31對常用範疇分別進行論述。這些範疇既有關於戰爭觀的，如“王霸”、“天人”等；也有關於治軍之道的，如“用舍”、“人勢”、“道法”等；又有關於用兵之道的，如“奇正”、“虛實”、“強弱”和“主客”等。綜而觀之，鄧氏三書乃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將對《孫子兵法》的歷史論證與理論闡釋密切結合在一起。該三書在清代曾先後6次刊印，影響甚大。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2)

清初的孫子研究著作一般都以《武經七書》為藍本，對《孫子兵法》的本文文字未曾給予必要的重視。所以，這一階段所刊印的種種《孫子兵法》本文訛誤甚多。鄧廷羅、王又喬雖曾在各自的著作中校改過《孫子兵法》文字，但皆無確切依據。鄧氏將《作戰》與《謀攻》兩篇位置互換，又將《九變》篇改為《軍變》篇，且對《九變》、《九地》兩篇中的文句多有竄改。在沒有文獻依據的情況下，作這種改動，有欠妥貼，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殊嫌竄亂舊文”。至於王又喬的《孫子集注》，則竄改刪節更多，讓人無法卒讀。

因此，從總體上看，清初的《孫子兵法》研究水準是不高的，有價值的東西較少，而共同的缺陷卻很明顯。

### (二) 以考據見長的清中期《孫子兵法》研究

清中期幹、嘉兩朝至道光初年，《孫子兵法》研究為武闈服務的風氣漸衰。在這一時期成書或刊印的20多種《孫子兵法》研究著作中，只有6種仍屬武闈讀物。其中有4種出自張權時一人之手，另有一種為艾欽的《武闈三子詳解》。它們在形式和內容上皆因襲清初同類作品，缺乏創新。

與此同時，不少有關《孫子》的著作將讀者物件轉向武闈應試者之外，或在所謂“窮鄉俗儒”之中尋求讀者，或為清軍將領提供服務。由於新的讀者群或財力不豐，或文化水準不高，或讀書時間較少，所以，這些作品大都篇幅很短，再也看不見大段大段的“直解”、“合參”、“醒宗”、“全旨”、“參訂”之類的文字，就是《孫子兵法》十三篇正文有的亦只是節錄。這類作品在這個時期計有近10種。其中比較典型的，如任兆麟在《任氏述記》中選輯的《孫子》，包括計篇、謀攻篇、形篇、勢篇、虛實篇、軍爭篇和九地篇中各數段文字，偶有雙行夾註；再如湖廣總督馬慧裕所輯著的《武備集要》，全書僅1.5萬字，其選錄的

《孫子》文句不及千字；又如徐經的《孫吳子兵法》，亦是將《孫子》與《吳子》的有關內容分類選排，共得 12 目，試圖以此教導清軍將領。

真正代表清中期《孫子兵法》研究水準的是孫星衍、畢以?、章學誠等考據學者對孫子其人其書的考據。當時在孫星衍的周圍集結了包括畢以?、洪頤、吳人驥等在內的學者，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孫子研究中心。受幹、嘉考據之風的影響，他們不再像有的清初作者那樣盲目地懷疑、竄改《孫子兵法》，而是從大量的古代典籍之中廣泛地搜集關於孫子其人其書的記載，進行細緻的考訂。尤其是孫星衍，他以孫子的後人自稱，對這項研究工作抱有極大的熱情。他搜集孫子的遺物，並對孫子墓葬之地進行實地考察。針對有關孫子其人其書的許多疑點，不少學者還展開了激烈的爭鳴。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學者們依據史料說話，敢於與不同意見進行交鋒的學術態度卻是極其可貴的。正因為如此，清中葉的孫子考據學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成績。

清中期孫子考據學作品多以論文的形式出現，前後共 20 多篇刊印傳世，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可謂洋洋大觀。特別是畢以?的《孫子敘錄》一文，長達萬餘字，是對歷代《孫子兵法》研究零星文獻的總匯，為後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這些論文討論和研究的範圍相當廣泛。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下列六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關於《孫子兵法》一書的作者及其生平。《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否是孫武？當時有兩種不同意見。全祖望、章學誠和姚鼐等人承襲宋葉適的觀點，公開表示懷疑。章學誠謂《孫子兵法》的作者難以斷定就是孫武，主張將該書列入撰人闕疑之類。懷疑者的主要論據就是詳于吳國之事的《左傳》一書未記孫武之事，因而認為司馬遷在《史記》中是誤采“不根之說”而為孫武立傳。肯定派最堅定的代表是孫星衍和畢以?。他們根據《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姓氏辨證書》、《淮南子》、《新序》、《漢官解詁》等書的記載，不僅肯定《孫子兵法》系孫武所著，且大致勾畫出孫子的生平及家世概況。

二是關於《孫子兵法》一書的成書時間。孫星衍在《孫子略解序》中認為《孫子兵法》成書于列、莊、孟、荀之前，為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斷為春秋時代的作品。《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據《孫子兵法》一書“文筆簡妙”而堅信其為先秦典籍。章學誠和姚鼐則採取主體思想論斷法，判定《孫子兵法》成書于戰國時期。姚鼐提出兩條論據：首先，春秋時大國用兵戰車亦不過數百乘，而《孫子兵法》稱興師十萬，顯為戰國之事；其次，《孫子兵法》稱國君為“主”，此系戰國時之稱謂，“主”在春秋乃為大夫之稱。《孫子兵法》的成書年代至今仍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姚鼐等人的這種思路應該是對我們有所啟發的。

三是關於《孫子兵法》的篇數和內容。由於漢以後各書著錄《孫子兵法》篇數不等，特別是《史記》記為十三篇，而《漢書》反謂有八十二篇、圖九卷，給後人造成了很大的混亂。杜牧曾斷言世傳之《孫子兵法》為曹操所刪定。章學誠、紀昀、孫星衍、畢以?等人認為，傳世之十三篇並未經過曹操刪節。章學誠指出，失傳部分乃是孫子論形勢、陰陽、技巧等“法度名數”的專門篇章。畢以?指出，失傳者還有孫武見吳王時的答問之辭，以及《戰鬥六甲法》、《三十二壘經》等。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3)

四是對《孫子兵法》十三篇的文字校訂和注釋。如孫志祖在《讀書脞錄》中指出《行軍篇》有脫句；洪頤■在《讀書叢錄》中校改《計篇》文字；汪中在《述學·內篇》中指出《孫子兵法》各篇中的數位多為虛數，不可以實數視之，為解開《孫子兵法》中數位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

五是對《孫子兵法》佚文的輯錄。這方面的事情主要是畢以?做的。他從《潛夫論》、《北堂書鈔》、《通典》和《太平御覽》等典籍中輯錄十三篇以外的佚文，並考校其真偽。

六是對《孫子兵法》的評價各家褒貶不一。孫星衍、畢以?等人予以全面肯定；紀昀、汪紱等人則承認《孫子兵法》為兵家用奇之最，但以其違背儒家的王道、仁義之說而極力貶斥。張九鐔就《孫子兵法》與《吳子》、《司馬法》等古兵書進行比較，指出《孫子兵法》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擺脫了仁義的束縛，所以可以“出奇無窮，以貴速、不戰為能，攻城、破軍為下”，認為這正是《孫子兵法》所以勝諸家，成為古兵書之最佳的關鍵。

清中期孫子考據學不僅形成了一批有價值的論文，而且出現了集大成性的專著，這就是孫星衍校訂的《孫子十家注》。孫星衍以華陰《道藏（北藏）·孫子》為底本，主要依據《通典》、《太平御覽》等書進行校訂。認為《道藏·孫子》所據原本即《宋史·藝文志》所著錄之宋吉天保輯《十家孫子會注》，所以直接將所校定之書題為《孫子十家注》。《孫子十家注》的校改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原本所錄十一家注文在編排次序上的錯亂現象進行了訂正。原本各家注文的編排順序為：第一曹操，第二李筌，第三杜牧，第四陳?，第五孟氏，第六賈林，第七杜佑，第八梅堯臣，第九王皙，第十何氏，第十一張預。其中孟氏系南北朝時梁人，卻被置於李筌等唐人之後；杜牧本杜佑之孫，反被置於杜佑之前。孫星衍參照《宋史·藝文志》所記載的順序，將其一一訂正。訂正後第二至第七的順序為：第二孟氏，第三杜佑，第四李筌，第五杜牧，第六賈林，第七陳?。這種排列，雖仍有可考校之處，但已較原書有了很大進步。其次，對《孫子兵法》十三篇正文以及各家注文進行文字校訂。由於主要依據《通典》和《太平御覽》進行參校，而近年漢代竹簡《孫子兵法》的出土已證實該二書中的《孫子兵法》比世傳之《武經七書》本和宋《十一家注》本更接近于《孫子兵法》原貌，所保存的各家注文亦較可信，故孫星衍的校改多數可取，糾正了不少錯誤。如改《虛實篇》“出其所不趨”為“出其所必趨”，即與漢簡文同。

《孫子十家注》于嘉慶二年（1797年）初刊之後，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與重視，至民國年間先後共刊印近30次，創下了歷代孫子研究著作刊印次數的最高紀錄。它不僅成為宋《孫子十一家注》到清代以後最主要的流傳版本，而且改變了宋以後《孫子兵法》主要靠《武經七書》本流傳的格局。它使《孫子兵法》正文與各家經典注文配套流傳，有利於世人加深對《孫子兵法》的理解，對促進孫子研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孫子十家注》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其誤校《孫子兵法》正文以及各家注文的現象不少，尤其是在刊刻方面出現了重大疏忽，以致有將大段注文整頁漏刻的現象出現。

另外，這一時期在《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領域應用研究方面，出現了徐大椿的《用藥如用兵論》。此文在其所著《醫學源流論》中。徐大椿是乾隆年間太醫院的太醫，“學博而通”。他在該文中提出：“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他用兵學原理闡釋醫理、藥理，比較貼切而極富哲理，是將《孫子兵法》用於醫學領域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 （三）晚清孫子研究的休眠與再造

清代孫子研究在進入晚清之後，由於近代西方兵學的衝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休眠時期。在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孫子研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既乏新的著作，又少有價值的論文。這一時期刊印的為數不多的《孫子兵法》多系節錄本。孫星衍的《孫子十家注》在這一時期雖被各省官書局多次重印，但對原刊本中的重大刊印錯誤都未予糾正，於此亦可見這一時期學術研究之粗疏與浮躁。

相比之下，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孫子研究著作為左樞的《魏武帝注孫子左箋》。該書除了對曹操的注文進行刪改外，又以“箋曰”的形式發表左氏自己的見解共約 40 條，其中頗有獨到之心得。如謂“上兵伐謀”在於“杜其謀，使不生心”；又謂“先奪其所愛”，乃指“沖其中堅”，使敵軍急救主將，則必亂而敗。另外，日本德川幕府中後期著名學者物茂卿（徂徠先生）的《孫子九地問對》第一次被從日文回譯為中文，於 1884 年在上海獲得刊印。

到了甲午戰爭前後，休眠的孫子研究終於開始復蘇。這種復蘇雖然姍姍來遲，但它是與孫子兵學的再造聯繫在一起的，因而具有明顯的新意，表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1884 年，楊琪光刊印了他的《百子辯證》一書，其中有一篇《讀孫子》的短文。文章指出：《孫子》十三篇誠為勝兵之術，“倘不濟以盈盈武庫之兵械，如邱如阜之糧糈，亦必不能戰勝攻取”。楊氏主張用謀應與強本並重，不可偏廢，否則不戰而先自餒，必致為敵所乘。他又說，對《孫子兵法》人多能道其一二，但真正掌握這種兵學精義的卻寥寥無幾，否則西方列強就不可能對中國肆無忌憚地侵凌了。楊琪光的話雖不多，但就孫子研究的發展問題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命題，具有特別的意義。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4)

1900 年，顧福棠的《孫子集解》問世，這是晚清第一部開始用新思路研究《孫子兵法》的專著。顧氏以孫星衍的《孫子十家注》為底本，仿顏師古注《漢書》例，剪各家注文之繁蕪，刪其不切，而取其義之精者，間多附以己見。其總論《孫子》曰：“言約而意博，始于計而終於反間，經之以形勢，緯之以火攻、奇權、秘算，悉舉天下古今之兵說包括於其中。此誠千古兵家之祖，兵家之師也。”該書在學術上突破前人之處甚多，綜而觀之，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將對《孫子兵法》的注解與近代軍事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如注《計》篇中之“陰陽”、“寒暑”，即論及近代槍炮在不同的光照環境下的瞄準誤差問題，以及風力對彈道的影響等。又注“其次伐兵”謂：“論昔日之事尚以伐兵為次，論今日之事則尤以伐兵為先。炮臺、鐵甲、槍炮、水雷日新月盛，精益求精，非一國所能悉造，亦非一時所能猝辦。若非備之於先而一旦臨險危之勢，自造則無人無料，購辦于局外之國，則或格於公法不能出售，或又為敵船守其海口，不能往來，勢必至有備者猛厲無前，無備者血肉相抵矣。”

二是列舉了大量的歐美戰例以映證《孫子兵法》的作戰理論。其中有拿破崙戰爭、美國獨立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普法戰爭等。全書先後數十次引用這些戰爭戰例，而且頗為得體。這標誌著對《孫子兵法》的研究開始與世界軍事史研究相結合，具有明顯的開拓性意義。

三是對歷代《孫子兵法》校釋中的一些疑點、難點發表了自己獨特見解。如將“守其所不攻”校改為“守其所未攻”，即謂在敵人未發動攻擊之前便設防固守。此為長期爭論的問題，但爭論者不言“不攻”，即言“必攻”，顧氏講“未攻”，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路。又如，將“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解釋為：“地”指戰場，“度”指遠近廣狹，“量”相當於測量，“數”為“演算法之總名”，“稱”為權錘之柄。意謂：度其戰場之形勢，修築工事以便攻守，且測敵之遠近，以求命中得失之數，以知敵我之輕重，以達獨操勝算之目的，亦可謂一家之新說。

無疑，顧福棠的《孫子集解》是一部開拓性的孫子研究著作，散發出較強的近代兵學氣息，對促進孫子研究與近代兵學的融合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無獨有偶，在清末還有一部類似的著作，這就是黃鞏的《孫子集注》。黃鞏反對清中期以後“孫子考據學”斤斤于古本文字之異同，轉令讀者尋數行墨而遺其旨要的做法。他認為，《孫子兵法》十三篇與《管子》兵法相表裡，《管子》論其正，而《孫子兵法》則正變皆全，可謂“本末完備，仁勇兼資，變化存神，規矩在匠”。又稱《孫子兵法》論兵，“全在精神氣志上振作”。他注《孫子兵法》，一改《十家注》雜糅雷同、支離割裂的弊端，首重其大旨，專注於其精神。他還批評當時所流傳之西方兵法僅得其步伐之粗，主張將《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近代戰法結合起來。他強調，如果真正實行了二者有機的結合，神而解之，必能更有出於西法之上者。可以說，這是對晚清東西方兵學結合問題的高層次思考，儘管還只是初步的，但卻是很有意義的。

這一時期，對《孫子兵法》的注解形式也有所創新，出現了以陳任《孫子十三篇直解》和廣東將弁學堂組織編寫的《孫子白話演義》為代表的白話文本。陳氏的《孫子十三篇直解》是應兩江總督劉坤一之邀，專為清軍官兵編寫的白話夾註本。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將注文與《孫子兵法》原文聯為一貫，而以大小字區別之。單讀大字則為《孫子兵法》原文；聯看小字，則成白話譯文。既不失原文之度，又能使之通俗化。廣東將弁學堂編寫的《孫子白話演義》，系以通俗文字，意譯《孫子兵法》十三篇，開《孫子兵法》白話翻譯之先河。該書對《孫子

兵法》的內容亦有所發揮，推演出一些對近代軍官富於教益的道理。如謂孫子以博學而獲知兵之名，凡為武將者都應像孫子那樣博學，顯系有感而發。

在清末孫子學復蘇過程中，還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校勘文章。其中：葉大莊的《偕寒堂校書記》，有關於《孫子兵法》的校記 18 條，根據音義移改十三篇文字多處；于 的《香草續校書》，共出與《孫子兵法》有關的校記 65 條，多涉十三篇正文以及十家注文之難點、疑點；俞樾的《諸子平議補錄》，錄與《孫子兵法》有關的校解文字 8 條，主張改“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一句中之“卒”字為“詐”等；彭蘊章的《讀孫子書後》，釋《孫子》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等文句多能廣征博引，推敲精審，受到後來學者的重視。

二、孫子兵學內部結構和方法，當時的武舉制度，哲學文化，軍事科技水準和戰爭實踐是制約清代孫子研究發展的主要因素

將清代孫子研究放到中國兵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進行考察，我們會發現，清代孫子研究在總體上仍是中國古代孫子研究的延續。在清初和清中葉的近 200 年時間裡，孫子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都是承襲宋明之舊，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這一時期的孫子研究主要做了兩件工作：一是對《孫子兵法》及其有關文獻的搜集和考訂；二是對《孫子兵法》文義的解說。在這兩項工作之中，雖然也取得一些新的進展，但對於整個孫子研究而言，這些都屬於修修補補，是對舊有的孫子兵學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要對清代孫子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給予適當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必須要看到其局限性，並對這種局限性進行深入的分析。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5)

從 17 世紀中葉到 19 世紀中葉，西方是近代兵學理論的產生和形成時期。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若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建立起西方近代軍事科學理論體系之時，中國的孫子研究卻仍熱衷於文獻考據和字句注釋。東西方兵學正是在這一時期明顯拉開差距的。如果聯繫這種大的背景，我們對清代孫子研究的歷史地位便更需要以謹慎的態度進行評價。

清代孫子研究作為宋明孫子研究的延續而長期不能獲得突破性發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宋、明、清各朝孫子研究缺乏創新的共同原因，又有清代孫子研究所特有的原因；既有孫子兵學自身的結構、方法方面的因素，又受到當時社會的軍事制度、哲學文化和科學技術背景方面的影響。

##### （一）孫子兵學內部結構和方法的制約

中國古代孫子兵學的內部結構主要由三大板塊構成：一是孫子文獻學，二是對孫子兵學的理論研究，三是對孫子理論的普及應用。這三大板塊相互之間存在著一種明顯的依存關係。從總體上看，它是通過對《孫子兵法》古文獻的詮解和發揮這種特殊的形式所進行的兵學理論研究、普及和應用。在這一點上，清代孫子研究與秦漢以後的經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宋明以來，由於《孫子兵法》已被視為兵學公理，“述而不作”之風禁錮了

人們的頭腦。人們注釋《孫子兵法》，旨在幫助人理解《孫子兵法》，而不是積極地去發展《孫子兵法》。孫子兵學的內部結構也因此發生了畸變，孫子文獻學和對孫子兵學理論的普及、應用突出發展，而對《孫子兵法》的真正理論研究卻漸顯萎靡。在方法上則表現為重考據，重注釋，輕理論探討，尤其缺乏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

正是由於這種結構性偏差和方法上的局限，使宋以後的孫子研究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孫子兵法》的地位很高，長期居於《武經七書》之首，孫子研究始終是兵家顯學，注釋考究和誦習它的人很多，撰刻的著作和論文也不少，僅清代就有百餘種。另一方面，它們雖在對《孫子兵法》的文獻考訂和理論闡釋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對孫子兵學理論的發展卻沒有做出突出的貢獻。且不說對整個孫子兵學理論體系的突破，就是對孫子兵學的重要原則都無大的創新。清代孫子研究上承宋明，結構一貫，方法依舊，其收穫和缺陷也就一脈相承。

## （二）武舉制度的影響

自宋代以後，武舉考試據《武經七書》命題。在武舉考試的刺激下，人們對《武經七書》的興趣越來越濃。特別是明中期以後，隨著武闈成爲定制，各種《武經七書》注釋本也就大量出現。此風一直影響到清代，並對清代孫子研究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清朝規定，從武秀才到武進士，每次考試都有一場策問，策問題目出自《武經七書》。清初沿襲宋、明，《武經七書》包括《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三略》、《六韜》等七書。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刪去《尉繚子》以下四書，仍保留《孫子兵法》、《吳子》和《司馬法》三書，稱《武經三書》。嘉慶二十年（1815年）又改試策爲默寫《武經》文字，並再次刪去《吳子》、《司馬法》，而僅保留《孫子兵法》一書。清朝的這種具體規定，使得《孫子兵法》在清代武學之中處於長期受寵的特殊地位。應試者不得不買《孫子兵法》，讀《孫子兵法》，書商爲牟利願意刊刻《孫子兵法》。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士紳應武闈之需，將他們的論兵積極性投向《孫子兵法》等書。這是清代孫子研究著作數量很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武闈對《孫子兵法》的需求是低層次的，它並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應試者對兵學有很深的造詣，而只是要求他們能理解和記誦其文句，掌握一些最重要的軍事理論原則。清初武闈試題便已漸趨固定，常常是：“《孫子·軍形》篇曰‘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軍勢》曰‘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一喻形一喻勢，其旨何如？”“治氣治心治力治變之說，其旨何如？”“《孫子》言地形有九，其實何如？而隨地以制宜者，其事又何如”之類。而對這些策題的答案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套路，且答卷的篇幅有限，除去前後套語，正文長不過200字上下。答卷是不會有新思想和新理論的。因此，有關孫子研究的著作也就不以發展和創新爲趣旨，而是停留在一般的疏義、講旨的層面上。

在清代《孫子兵法》研究著作中，有1/3以上的屬於武闈讀物，共約40多種，這些作品內容空泛，其總體水準低於其他非武闈讀物。如果與這一時期有關

孫子研究的論文相比，其水準更顯差距。

### （三）哲學、文化背景的影響

軍事學術和軍事思想的每一次大的發展和突破，總是與其特有的哲學、文化背景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先秦時期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以及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是中國兵學第一次大發展的重要條件。秦漢以後儒學成爲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學自身幾經發展到了宋明以後，仍以理學形態支配整個社會思想界。到清代出現了具有反理學傾向的漢學。但無論是理學還是漢學，都是建立在傳統的哲學觀念之上的。這種哲學觀念與《孫子兵法》產生時代的哲學觀念並無質的區別。他們都未能提供足以促使清代孫子研究發生質的飛躍的新的觀念和思想方法。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6)

理學家標榜王道，推崇仁義，認爲只有在德治仁政失敗的情況下才不得已而用兵。他們對兵學的興趣遠不如其對道德仁義的興趣之大，常常將其視爲一種萬不得已而備用的知識。他們有時也論兵，也涉及《孫子兵法》，但常常重在王霸之辨，而其基本態度又總是否定兵家，斥責《孫子兵法》的詭詐理論。清初芮長恤對宋鄭友賢將《孫子兵法》與《論語》、《易》並列，而置於《孟子》、《荀子》之上大不以爲然。他將《孫子兵法》與好戰、霸道等同起來，評價甚低。康熙皇帝聲稱：“《孟子》雲：仁者無敵。又雲：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是王道。與其用權謀、詐僞、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而敵兵自敗矣。‘王道’二字即是極妙兵法。”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允禮親王亦稱，《孫子》雖系兵家之最，但不合于聖人之道，不宜推崇，甚至“毀棄之可也”。《戊笈談兵》的作者汪紱也主張“用兵之法，仁義爲先”，“節制次之”，“機權爲後”。他批評《孫子兵法》知機權之制勝，而不及國家之本，說它“譎而匪正，機詐悉矣”。

理學家這種以王道、仁義統領兵學的思想，雖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顯然非常不利於兵學理論的發展。一方面，它有悖於兵學理論自身的發展規律。理學側重於探討軍事與政治的關係，並用封建仁義的枷鎖重新套住兵學，以爲只要行王道、重仁義，就可以勝兵無敵。另一方面，在理學思想的支配下，人們也難以產生研究孫子兵學的積極性。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宦場顯達的官紳，更是鄙視孫子兵學，致使清代《孫子兵法》的研究隊伍層次偏低。據統計，在可考稽的近 90 位清代《孫子兵法》研究著作作者中，出身進士的只有鄭端、孫星衍、魏源、馬慧裕等 8 人，出身舉人的也只有數人，其他皆爲秀才或無任何功名者。又據統計，在這些著作者中，稱得上是清代知名學者的更是寥寥無幾，只有汪紱、孫星衍和魏源等數人。清代孫子研究的作者隊伍主要由一批初級文人儒士組成，這些人既沒有領兵作戰的閱歷，又缺乏深厚的理論功底。因此，他們的作品整體水準都較低。本來，宋明以後，在兵學研究中便出現了文武分途的趨勢，文人學士主要研究以《孫子兵法》等《武經七書》爲代表的經典兵學，而一批接觸軍隊建設和戰爭實踐的軍隊將領則成爲發展訓練、陣法和邊海防等非經典兵學理論的中堅。

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清代，但清代的經典兵學研究隊伍比宋明時代的層次更低，孫子研究的水準也就顯現出一種後不如前的衰落景象。

清中葉出現的漢學，又稱考據學，它的興盛與理學的衰落有關，同時也與清王朝的文化高壓政策有著直接的聯繫。這股考據之風吹遍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各個領域，孫子研究自然也要受到考據之風的強烈影響。這種影響具有明顯的雙重性。從積極的方面看，它確實促進了孫子文獻研究的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這在孫子研究發展的一定階段是必要的，值得肯定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孫子文獻學畢竟只是孫子研究的一個方面，而且還不是它的主要方面，乾隆、嘉慶時期孫子考據學斤斤于古本文字之異同，有得同時也有失。它的最大的不足就在於使清代孫子研究繼續停留在較低的層面上，缺乏思想上的創新、理論上的突破。關於這一點，清末黃鞏在他的《孫子集注》中便已提出過尖銳的批評。

#### （四）清代軍事科技水準與戰爭實踐的影響

任何一種軍事理論的發展，最終都要以一定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戰爭實踐的刺激為前提。在清代中期以前，孫子研究所依恃的軍事科技水準與明代相比，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與兩千多年前孫武寫作《孫子兵法》的時代相比，雖已由冷兵器時代進入了冷兵器與火器並用時代，但這種技術的局部進步只能對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產生局部的影響。清代人曾指出《孫子兵法》的火攻之法“皆是虛文”，說明當時人基於火器技術的發展，感到孫子的這一部分理論確已過時。但在總體上，清人並沒有感覺到孫子兵學理論與他們所面臨的軍事科技水準有什麼不適應的地方。這當然也與《孫子兵法》的主體理論是高層次的戰略理論，與具體的軍事技術聯繫不很直接有相當的關係。但無論怎樣，清代中期以前的孫子研究者沒有從軍事技術的進步方面獲得創新孫子兵學理論的強大動力。

同一時期的戰爭實踐也對孫子研究產生了同樣的效應。無論是清初的統一戰爭和對外反侵略戰爭，還是清中葉的鎮壓國內人民反抗的戰爭，清軍在作戰指導方面始終沒有遇到更為高明的對手。也就是說，戰爭實踐並沒有證實以《孫子兵法》為核心的中國經典兵學理論需要發展，並沒有給清代孫子研究者提出突破孫子兵學理論的任務。這也是清代孫子研究缺乏理論創新的重要原因。

這種狀況只有到了清代孫子研究發展的第三階段才完全改觀。西方列強恃其船堅炮利，成為中華千古未遇之強敵。自此以後，中國在對外戰爭中開始處於一種弱者劣勢的境地，這與孫子兵學是建立在大國爭霸基礎上的強者的理論發生了明顯的不一致。新的戰爭實踐開始呼喚新的戰爭理論。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的侵略，促使中國人加緊引進西方近代軍事技術。晚清 70 年間，中國軍事技術的進步儘管步履艱難，但它與中國幾千年的古代軍事技術的發展相比，不僅速度很快，而且帶有明顯的突破性質，由冷兵器與火器並用時代進到了火器時代。新的軍事技術開始需要新的兵學理論，而這種新的兵學理論又早已被西方人發展起來了，並且已大量地被輸入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孫子兵學的總體結構和不少具體的內容，便開始被認識到已經過時。改造孫子兵學，使之與近代兵學相結合的任務終於被提出來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晚清孫子研究在經過了一個休眠期之後開始

了它的再造。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7)

三、清代孫子研究是中國古代孫子研究的最後一個發展時期，近代以來，傳統的兵學體系經過再造，被納入了近代兵學體系之中

清代孫子研究作為中國古代孫子學的最後一個發展時期，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這就是，它是與中國傳統兵學體系的終結聯繫在一起的。具體說來，晚清孫子研究的休眠和再造的過程，是與中國傳統兵學體系的終結過程相重疊的，而且前者還是後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孫子兵法》是經典兵學作戰指導理論的主要代表，孫子研究也就成為明清時期經典兵學的核心。在戰爭指導方面，這一時期的經典兵學特別強調謀略，重視《孫子兵法》“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孫子十三篇中關於作戰指導的幾對主要範疇如虛實、形勢、攻守、奇正、動靜、勞逸、饑飽、遠近、利害、強弱、眾寡等，成為當時經典兵學理論思維的關鍵支撐點，受到廣泛的重視。《孫子兵法》的邏輯思維方法、原始辯證思想方法，以及定量分析方法和樸素的系統分析方法，繼續支配著這一時期的孫子研究和整個經典兵學。儘管由於《孫子兵法》主張兵者詭道，而遭到官紳的不斷批評和譴責，但他們都無法否定《孫子兵法》在兵學上的地位，明代理學家丘濬的態度至為典型。他說：“武書一切以變詐奇詭為說”，大悖於“理道”。但他同時又說：“武經七書，以《孫子》為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為最精，諸家皆莫及也。”清代的唐甄、允禮親王、芮長恤、汪紱、方浚頤等人都是這種態度。允禮親王說“春秋以來，談兵者凡數百家，而孫武子十三篇、吳起兵法為最。然其愈精，而其心愈忍矣。”所以，他們一方面貶斥《孫子兵法》，另一方面又看重《孫子兵法》，根本無法動搖《孫子兵法》在經典兵學乃至整個傳統兵學中的顯著地位。

《孫子兵法》在傳統兵學中的這種顯著地位一直延續下來。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兵學體系開始逐漸解體，孫子兵學在這個過程中繼續扮演了一個傳統兵學代表的角色。當時，在近代軍事科技和西方兵學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衝擊下，中國傳統兵學體系中的非經典部分，包括訓練和陣法理論、邊海防建設理論很快便失去了立足之地，代替它們的是與洋槍洋炮等新式武器裝備相適應的訓練和陣地理論，以及以建立近代海軍為中心的海防理論。1875年張之洞著《書目答問》稱：“《太白陰經》、《虎鈴經》之屬，詭誕不經，不錄；《登壇必究》、《武備志》多言占候，所言營陣器械，古今異宜，不錄。”又稱：《克虜伯炮說》、《水師操練》、《防海新論》等翻譯之西方兵書，“皆極有用”。這就很清楚地表明瞭當時人的態度。

這是在中國傳統兵學理論體系中打開的一個缺口。自此以往，中國傳統兵學體系便失去了它的完整性。但這並不等於傳統兵學理論的終結。關鍵就在於這一時期的兵學變革還未能觸動以孫子為代表的中國經典兵學的體系。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便對《孫子兵法》等書存而不論。雖然人們對《孫子兵法》的興趣明

顯下降，使清代孫子研究出現了休眠狀況，但是，中國的兵學界一時又還接受不了一種可以替代《孫子兵法》等經典兵學理論的高層次近代兵學理論。甲午戰爭以前，清朝官紳和清軍將領曾與歐洲軍隊有過頻繁而密切的接觸，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若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卻未能引起他們的重視。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經典兵學，就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條件下消極地生存著。

《孫子兵法》等經典兵學的消極生存，給晚清的兵學變革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它制約著這一時期中國兵學的總體變革水準，並使之表現出一種“中體西用”的特色。中國傳統的軍隊建設理論和用兵謀略藝術與西方近代訓練、陣法以及海防理論不協調地同時並存。而前者又給後者以很大的影響，使得清政府在這一時期所引進的訓練理論、陣法理論和海防理論都被嚴重扭曲。它們往往具有西方近代兵學的外形，卻沒有西方近代兵學的實質精神。這一點在清軍的陣法和訓練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鄭觀應在當時就曾指出：清軍用西法練兵，“惟延人教習口號，步伐整齊、槍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緒餘。”甲午戰爭前清軍的戰術和訓練水準不高，這是一條很重要的原因。

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人在深刻地反省之餘，開始對西方兵學理論進行比較系統的引進。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馬漢的《海權論》以及《軍制學》等高層次的近代兵學理論著作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年之後逐漸翻譯過來。隨著人們對近代兵學理論認識的加深，部分官紳開始從近代兵學的角度對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經典兵學提出批評。陳昌龍輯《中國兵略指掌》，說“孫子論兵多玄空微妙”；鄭觀應增訂《盛世危言》、陳澹然著《權制》，都對《孫子兵法》提出過批評。1898 年，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使孫武“生命之世，必早已習其（按指西人）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提出了改造孫子兵學理論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再造孫子兵學的轉機。

再造孫子兵學就是在孫子理論之中注入近代西方兵學的新精神，也可以說是對傳統孫子兵學理論的辯證否定和改造。孫子兵學發展到這一步，中國古代兵學體系的最後一根支柱便已不復存在，它宣告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兵學體系的終結。

#### 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再造--清代(8)

孫子兵學被納入近代兵學體系之後，不再居於核心或骨幹的地位。但它仍然保存著自身的特色，這也正是它的獨特價值之所在。它是作為一個被重新詮釋的傳統而被納入近代兵學理論體系的。它的語言和思維特徵、它的獨特的性格，使它不可能完全被消融於近代兵學之中。近代軍人和學者結合當時的軍事實際去研究《孫子兵法》，吸取它的智慧營養，同時也發展《孫子兵法》理論。但在孫子兵學再造過程中出現的那種試圖把《孫子兵法》的理論完全套改成近代戰略戰術體系的做法，後來被證明也是不成功的。

## 9.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間《孫子兵法》在與西方近代軍事思想的碰撞中獲得新的生機，不論對《孫子》義理的闡發，注釋形式的變化，還是實際的應用，都有別於以往歷代，標誌著中國古代孫子研究的終結和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成為《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

### 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1)

#### 《孫子兵法》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

一、民國《孫子兵法》研究，在與西方軍事思想的融合中，從內容到形式均有所創新，為古代孫子兵學向現代“孫子學”過渡架起了橋樑

自 1912 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中華民國誕生，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 37 年間，中國大地上戰爭始終未絕。民國初年的北伐戰爭和後來的軍閥混戰，中期的日本入侵及我全民抗戰，末期的人民解放戰爭，以及在此期間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使此間成為中國歷史上戰爭最為頻繁劇烈的年代之一。戰爭使民眾蒙受災難，同時也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大批新式武器應運而生，出現了飛機、坦克，乃至航空母艦和原子彈。新式武器的使用，對傳統軍事理論提出了挑戰，又促使人們探尋與此相適應的新的軍事理論。於是，大量西方資產階級軍事著作被介紹到中國。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正是在中國傳統兵學思想和西方現代軍事理論的碰撞中獲得新的生機的。儘管當時社會嚴重動亂，著述、出版條件極為困難，但仍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有關《孫子兵法》的研究著作。據統計，民國時期已知出版的《孫子兵法》著作近 80 種，尚不包括大量影複排印的明、清刊本。按出版孫子書的年平均數計算，這一時期大大超過了歷史上注釋《孫子兵法》最多的明代（據《孫子學文獻提要》統計，明代 276 年間共刊刻《孫子兵法》125 種）。不僅如此，在孫子書的內容和形式上，也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能否將產生于冷兵器時代的兵書運用到近、現代的軍事理論研究和戰爭實踐中，這是民國研究《孫子兵法》首先遇到的問題，對此多數研究者的答覆是肯定的。認為“戰術雖有新舊，戰理因無古今，孫子乃論理而入深微者，此其所以曆百世而莫能易也”，堅信《孫子兵法》在火器時代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此提出了“使孫子現代化”的口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民國間多數孫子書研究者，積極探尋適合現代讀者需要的著述內容和形式。

#### （一）引入西方軍事思想和現代史例，不囿傳統的注字解詞

改變只重視對《孫子》字詞校勘注釋的傳統做法，而突出對孫子軍事思想的闡發，並大量引用近、現代戰例史實和西方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加以詮解，這是民國時期研究《孫子兵法》的顯著特點。出現了諸如蔣方震、劉邦驥的《孫子淺說》、許有成的《孫子與現代》、葉慕然的《孫子兵法新詮》、周傳銘的《孫子兵法古今釋例》、錢基博的《孫子章句訓義》、陳華元的《孫子新詮》等一批面貌一新的孫子書。如《孫子淺說》，將《孫子兵法》各篇篇題，用近代軍事理論進行詮釋，

將《計篇》冠以“論軍政與主德之關係”、《作戰篇》為“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等，並創分段注釋，按節解說的新體例，多為後人所效仿。再如《孫子章句訓義》，在集古注精華的同時，又取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有關論述和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戰例，對《孫子兵法》義理予以闡發說明，極便現代讀者理解。

### （二）摒棄注釋舊體例，著力揭示孫子軍事思想體系

爲了提煉出適合現代戰爭需要的孫子軍事原理原則，民國時期不少研究者將《孫子兵法》放到近代戰爭的環境中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如蕭天石的《孫子戰爭理論之體系》一書，將孫子的戰爭指導理論概括爲國家指導原則、政治戰指導原則、經濟戰指導原則、外交戰指導原則、精神戰指導原則、間諜戰指導原則，以及先知、目的、計畫、安全、速戰速決、殲滅戰、包圍戰、統禦和任將等 30 個方面，並認爲孫子的這些原則已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兵學理論體系。再如，公羊壽著《孫子兵法哲理研究》以近代軍事理論爲綱，將十三篇的相關內容按定謀、命將、出師、審形、窺勢、料敵、接戰、攻守、因敵和用計等 10 個方面重新進行組合，系統論述《孫子兵法》的兵學體系。並強調這 10 個方面是孫子戰爭論的骨架，它們所涉及的都是一般的戰爭原理，故有超越時空的特徵。李浴日著《孫子兵法新研究》則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爲先知、計畫、自然、求己、全存、主動、利動、迅速、秘密和變化 10 大原理。此外，像郭化若著《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楊傑著《孫武子》、徐慶譽著《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爭》等著作，對孫子的軍事思想也都作了具有近代軍事理論特色的系統論述，爲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 （三）白話文和標點的出現爲《孫子兵法》的普及創造了條件

“五四”新文化運動推行的白話文和新式標點，也爲注釋《孫子兵法》提供了宜於廣大讀者接受的著述形式。故此間眾多《孫子》譯注者轉而採用白話譯注《孫子兵法》，從而把孫子書從學者書齋中解放出來，成爲普通民眾和士兵的讀物，爲普及《孫子兵法》創造了條件。如葉玉麟譯《白話譯解孫子兵法》，在清孫星衍校《孫子十家注》基礎上，將各篇原文採用不分段的直譯方式譯成現代白話，通俗、流暢、簡練，開白話文譯注《孫子兵法》之先河。此書注釋形式，多爲後來注家所仿效。再如，袁韜壺著《新式標點孫子十家注》，採用現代標點符號注，對傳本《孫子十家注》全書進行標點，並對書名、人名等加標符號，引徵文字用引號標明，使全書清晰醒目，標點完整統一，較之早期只作斷句的排印本更便於現代人閱讀。由於民國間出版的孫子書大部分採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易於普通民眾接受，因而使《孫子兵法》得到了更爲廣泛的傳播。

## 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2)

### （四）多種著述形式的出現，適應了近代人的閱讀特點

爲了更好地揭示《孫子兵法》內涵，適應近代人的閱讀習慣，有些研究孫子的著作在著述形式上還進行了創新改造，使注釋《孫子兵法》的樣式豐富多彩。例如，徐容溥《孫子表釋》，將十三篇每篇內容編制成圖表，“選輯每篇之精要，

注以適新之論述，編組成表，以免役于文墨而資探其奧諦”。此書首創用圖表注釋《孫子兵法》新形式，因其具有簡潔直觀，重點突出，便於記憶等優點，不僅在民國間多為他書所仿效，如王明長《孫子選注》所附“十三篇表解”、吳鶴雲《孫子兵法新檢討》、溫晉城《孫子淺說補解》和饒中文《運用孫子兵法新義》的每篇附表等，而且至今仍在一些《孫子兵法》著作中被採用。此間出現的另一種著述形式，是專門用戰例史實注解《孫子兵法》，這種形式始見於支偉成編《孫子兵法史證》一書。在以後出版的周傳銘《孫子兵法古今釋例》一書，則在《史證》一書的基礎上，增加古今中外戰例，對孫子原理原則詳加分析，更易讀者領會。因其具有以史鑒今的作用，至今仍是注釋《孫子兵法》者樂於採用的形式之一。

二、民國間《孫子兵法》被廣泛應用，驗證了其在現代戰爭中的指導作用，同時也展示了在非軍事領域的借鑒價值

(一) 自上而下的學習熱潮，推動了《孫子兵法》的實際應用

民國時期戰事不斷，各個政治集團都極力尋求戰爭制勝之道，因此對《孫子兵法》倍加重視。軍政要員不但自己帶頭學習研究，身體力行，而且大力宣導，出現了自宋神宗頒行《武經七書》列為武生必讀書以來，又一次自上而下大規模研讀《孫子兵法》的熱潮。民國初年，袁世凱令飭解說《孫子兵法》，並以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出版了《孫子淺說》（蔣方震、劉邦驥合著），將其“頒之學校，專立為科”（《徐世昌序》），“尊為兵經，列為官學。佈告海內，使莘莘學子家喻戶誦”（《呈文》）。時任北洋政府國務卿的徐世昌在為《淺說》所寫的序中，稱“此書（指《孫子兵法》）有功於吾國甚偉，並名之曰‘孫子兵經’，蓋亦未嘗不可，……醫國之方，其在是歟？”此後，《孫子淺說》又被收入《軍學叢編》一書，下發軍隊作為官兵必讀書籍。繼之，北洋政府臨時執政（大總統）段祺瑞不但為《蘇氏孫子注解》題辭“大將心機”，並且為之“校正”，吳佩孚為該書作序。其對《孫子兵法》重視程度於此可見一斑。蔣介石對《孫子兵法》更是推崇備至，讚譽有加，不但“指定《孫子》、《吳子》、《六韜》為軍事學校專習必修之課”，而且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多引用孫子言論以為經典。他在廬山軍訓會議講話時說：“我們中國兩三千年以前的《孫子》和《孫吳兵略問答》這類書，到現在還是同樣的有價值，並且意義亦與日俱新”，並認為《孫子兵法》中“所講的東西，有很多就是現在外國人最新最進步的戰術原則”。在國民黨軍政要員中也不乏注釋《孫子兵法》者，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積極參加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的反共頭目何鍵，親自手抄眉批《孫子選注》（夏壽田撰），並在序中稱《孫子兵法》“猶食之解饑，衣之禦寒”，“其詞簡而旨遠，繹之而長，味之而雋，正而能奇，奇不失正，予心好之。初以為治兵之典，又以為馭事之則，資之可以立身，運之可以為政”，對孫子崇拜之情溢於言表。民國著名軍事家、曾任陸軍大學校長的楊傑將軍，為使更多的人“瞭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不以大家撰寫小冊子而不為，欣然參與編寫通俗讀物《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寫成《孫武子》一書，對孫子的生平和思想進行全面的介紹，被譽為“國內以通俗文

字闡揚兵學始祖孫子學說之第一人”。民國間《孫子兵法》的廣泛影響，也使得為《孫子》著作題簽書名、撰寫序跋一時成為時尚，軍隊將領、社會名流紛紛為之。例如，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為《新注孫子兵法直講》題簽書名；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孫子與現代》封面題字；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為《孫子兵法新檢討》作序；湖南省政府主席陳誠為《從孫子兵法證明日本必敗》手書序言，等等。從中可以看出軍政要人對《孫子兵法》的推崇與重視。

此間軍隊重視《孫子兵法》的程度，可以從陳光中為《蘇氏孫子注解》所寫的序中窺其一斑。陳氏以其從軍數十年的親身體驗向部下推薦《孫子兵法》，他說：“平時之治軍，戰時之應敵，一以孫子為圭臬，輒能以少勝多，化險為夷，愈覺孫子之言，近而可守，簡而易操，躬行之而立有效，其有裨於實用者。……印刷若干冊，分發各團、營、連長，按時誦用，俾知有軌轍可循。”除軍事以外，或為應付“世界競爭”潮流而著述者如《評注孫子讀本》；或為富國強兵“懷匹夫有責之義”而著述者，如《孫子兵法史證》。反映了人們對《孫子兵法》的渴求和其在現實生活中發揮的作用。

## （二）緊密結合戰爭實際，新著刊印異彩紛呈

蔣介石政權統治時期，中國完全處於戰爭狀態，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為配合全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一批直接用於抗戰的《孫子兵法》研究著作相繼出現。如《孫子與現代》，出版之時，正值“一二八”淞滬抗戰之際，作者在該書卷首自題《拔劍起舞圖》詩，並在書中插頁寫有警語：“毋忘一二八，誓雪國恥，東北不保，中原無寧日，領土主權，亟起收復。”又在《自序》中稱：“今者強寇日逼，禍患日深，正可出而問世，用以造成高尚之將才，作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此餘急欲刊印是書之本旨也。”可見，作者撰寫此書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再如，李則芬的《以孫子兵法證明日本必敗》，則針對抗戰時局，運用孫子軍事原則，分析中日雙方戰場形勢，論證日本侵華“在《孫子兵法》中找不出日軍勝利的條件”，並由此得出“日軍敗亡的前途”是註定了的。此書的出版，起到了鼓舞民心士氣的作用。李浴日在其撰寫的《從孫子兵法分析敵人進犯粵北的潰敗》一文中，用孫子軍事思想對國民黨戰區對日作戰取得的粵北大捷進行了分析，指出導致日軍潰敗的原因，在於日軍“將軍驕橫，不知己彼，計畫錯誤，地形困阨”等，並指出“孫子鐵一般的原理原則，在這次大戰中同樣閃耀著它的光輝”。作者運用《孫子兵法》分析抗戰形勢，無疑對指導抗日戰爭多有助益。這期間以抗戰為目的而出版的著作還有朱懷冰著《讀孫子十三篇陣中箋釋》。該書作於前線，故有“陣中箋釋”之說，書中引用大量抗戰實例，闡釋孫子思想，用以指導軍事行動。韓一青著《孫子兵法十三篇淺釋》，此書卷首題岳飛《滿江紅》詞，在序言中作者大聲疾呼：“我華這次被日本侵略……人人都當充任鬥士，可是軍事知識當人人具備，才可與敵人疆場相見，因取《孫子》十三篇加以淺釋”，抗日之激情躍然紙上。馮家勳著《新譯孫子兵法》，此書出版之際，正值日軍侵華氣焰囂張之時，作者在題為《獻給中華民族勇士及全國民眾，迎接勝利年》的附言中，引用孫子語句，揭露日軍侵

華伎倆，號召民眾“手執勝利之旗”去打敗敵人。利用《孫子兵法》動員民眾投身抗戰，也是這個時期政治宣傳的內容之一。例如，利用廣播電臺講解《孫子兵法》，提醒人們“今之中國，乃在雪恥圖強之秋，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同時指出，“時代戰法雖殊，而攻守目的仍不出《孫子》……以今日吾國情勢，設為與假想敵之對立，應如何謀劃？如何備戰？如何攻守？如何制勝？概用《孫子兵法》”。特別強調《孫子兵法》在抗戰中的作用，極有針對性。

### 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3)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也非常重視《孫子兵法》，並對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36年底，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把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上升到“孫子的規律”，“仍是科學的真理”，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不但自己研究《孫子兵法》，而且還是解放區學習《孫子兵法》的發起人。1939年，毛澤東根據當時全國抗戰形勢，提出要學習古兵法，並把注釋兵法的任務交給郭化若，同時就如何研讀《孫子兵法》提出具體意見。在毛澤東的關懷和指導下，郭化若撰寫出《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首次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孫子兵法》進行系統論述，開用唯物辯證法研究《孫子兵法》之先河，為準確揭示孫子思想，普及《孫子兵法》作出了貢獻。人民解放軍其他高級將領，如劉伯承、葉劍英、陳毅、彭德懷、林彪等，也都對《孫子兵法》有精到的研究，並在各自的軍事生涯中發揮作用。被譽為“論兵新孫吳”的劉伯承不但熟讀《孫子兵法》，而且能背誦全文，在實戰中運用孫子謀略克敵制勝，屢建奇功。如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指揮129師在山西七亘村三天之內兩次設伏，狠狠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劉伯承在總結這次戰鬥時，依據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軍事原則，指出，此次“重疊設伏”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於我們摸透了日軍的脾氣，他們為了完成作戰任務，往往“記吃不記打”，所以才連連上當被動挨打。精通《孫子兵法》，是他成為人民解放軍優秀指揮員、著名軍事理論家的原因之一。

《孫子兵法》在抗戰中被廣泛應用，驗證了孫子軍事思想在現代戰爭中的指導價值，因而在社會上得到充分的宣傳和普及，並把這一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 (三)《孫子兵法》哲學思想的提出，為孫子研究開闢了廣闊的天地

《孫子兵法》蘊涵的軍事哲學思想，是孫中山最早提出來的，他指出：“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那中國的軍事哲學。”在孫中山這一思想的啓發下，民國出版的一些孫子書中，或多或少都有對孫子哲學思想的探討。如公羊壽的《孫子兵法哲理研究》，雖未就孫子哲學思想展開討論，但作者認為，“《孫子兵法》實為我國軍

事哲學之書”。而《孫子兵學評論》一文作者櫻鐵郎則進一步把孫子稱作“古代之封建的哲學者”，認為“孫子所謂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實生虛，虛生實，利害無限的相交，虛實無限的相生等等，為其根本思想，即各在矛盾之發展中而被發現，各在矛盾之發展中而被捕捉，在此處的哲學有其特點”。並指出“孫子用兵的方法，正是黑格爾正——反——合的三段辯證法”。在《孫子淺說補解》一書中，作者專設一節《孫子的社會背景及其哲學》，對孫子哲學思想進行了討論。認為，“孫子的方法——方法論——是辯證法，孫子的價值標準——實踐哲學”，並指出正是由於《孫子兵法》“與宇宙萬物進行的法則相符合的，是一種辯證的方法”，才使《孫子兵法》曆千年而不衰。然而，這些著述對孫子哲學思想的研究尚停留在提出問題的階段。對孫子哲學思想揭示最為深刻、貢獻最大的應首推毛澤東，他高度評價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孫子的規律”，“科學的真理”；指出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毛澤東正確揭示孫子的知行觀，為孫子哲學思想研究指明了方向。郭化若依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對孫子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在 1939 年為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所作的報告提綱（即《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專辟一節《〈孫子兵法〉中唯物辯證法的因素》，從七個方面系統地概括了《孫子兵法》的哲學思想。得出“《孫子兵法》在基本上是唯物辯證法戰爭論，但是樸素的，並帶有某些觀念論與機械論的觀點”。明確提出孫子的軍事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辯證法基礎上的，所以才能有強大的生命力。郭化若這篇文章，以其唯物論的觀點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將孫子哲學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為以後的孫子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特別是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他因此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孫子兵法》的學者，奠定了他在孫子研究領域學科帶頭人的地位。《孫子兵法》哲學思想的提出不僅深化了孫子研究的內容，擴大了研究的領域，而且從根本上揭示了《孫子兵法》綿延兩千多年常用不衰的“千古之謎”。

#### （四）非軍事領域借鑒《孫子兵法》初見端倪

《孫子兵法》在軍事領域應用的同時，不少研究者從《孫子兵法》舍事言理的特徵中，看到了它的通用性，並出現了將《孫子兵法》向社會生活領域擴展的趨勢。有些學者即認為《孫子兵法》“不但可作古代兵書讀，還可以作為現代的戰略戰術，政治哲理，政治寶典，治國經義，外交原則來讀”。“《孫子兵法》不僅是軍事學，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在現時代是人們所必修的一門學科”。在非軍事領域借鑒運用《孫子兵法》的專著，始於張廷灝的《從孫子兵法到做事的方法》。作者根據本人對《孫子兵法》的理解和對社會的體驗，在該書《導言》中說：“十三篇中提示的許多原理，固然是就當時的戰爭而言，但何嘗不能用於政治、外交、社會、處事和其他含有競爭性的各種比賽？”根據這一想法，作者嘗試將孫子有關自強、先知、秘密、詭變、統禦、組織等用兵原則與人們生活中的為人處事結合起來，並較好地解決了借鑒移植中遇到的問題。

如對孫子“詭道”原理，作者從人際關係與軍事鬥爭性質的不同性，和孔子、老子對人生的態度，將“詭道”解釋為人們在做事中一種靈活變通的做法。如此處理，既不失孫子原意，又使孫子思想在借鑒運用中得到昇華，較好地解決了軍事鬥爭與社會生活二種不同性質矛盾的結合問題，至今仍不失其指導意義。儘管此書尚存在許多不足，但由於其開創性的工作，使《孫子兵法》在非軍事領域的應用得以實現，使《孫子兵法》這一國之瑰寶能夠在更大的範圍內造福於人類。

#### 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4)

三、民國間豐碩的研究成果和國際交流的開展，不僅為《孫子兵法》的研究注入了活力，也為孫子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民國的《孫子兵法》研究，一方面，緊密結合社會現實，積極反映和滿足時代的要求，體現了《孫子兵法》經世致用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孫子兵法》研究傳統課題上也較前人有所深入，不論是研究的範圍，還是研究的深度，都有較大的拓展，特別是以《孫子兵法》外文譯本出版為契機的國際交流，為《孫子兵法》研究注入了活力，也是民國間《孫子兵法》取得不俗成績的重要因素。

##### (一) 傳統課題研究有所深化，成果累累

民國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由於一些知名學者的參與，對傳統的課題研究，不論是原文校勘、詞語解釋，還是對著作真偽、作者考辨，以及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的探討等，都取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在原文注釋方面，出現了一批有一定學術價值的新校本。如陸懋德《孫子兵法集釋》，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曹家達《孫子菁華錄》，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啓天《孫子兵法校釋》等。在校勘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陸懋德《孫子兵法集釋》，多有發前人所未發之言，並對《孫子兵法》原文訛誤糾正多處。易培基的《讀孫子劄記》，多引古書以參證，追根溯源，對曹操等十一家注提出質疑，且多有發明。蔣方震、劉邦驥合著的《孫子淺說》不僅開新注釋先河，而且在校勘方面也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果，其論多為後人所沿用。特別應指出的是易培基的《孫子雜紀》，其校勘成果最為顯著。易氏對《孫子兵法》中的 63 句原文重新進行校勘注釋，一些校勘與銀雀山漢簡相合；其釋文對曹操等十一家舊注大膽質疑，且多有發明。民國間上述校勘成果不僅推動了當時的孫子研究，而且多數成果被後來《孫子兵法》研究者所採納，成為現代和當代校勘《孫子兵法》的重要資料。

此外，圍繞《孫子兵法》成書時間、孫武世系、版本流傳等孫子文獻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發表了一批學術價值較高的文章。如齊思和的《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以大量春秋典籍和《孫子兵法》自身內容，對清代以來盛行的孫子和孫臏一人說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同時也指出了《孫子兵法》內容中的戰國時代特徵，成為民國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余毅恒的《論孫子》，全面論述了歷代有關《孫子兵法》作者的不同觀點，明確指出“《孫子》十三篇系孫武所著，不過後人對原書有所刪削”，強調“孫武用事于吳，未可懷疑”。其他如錢穆《孫武辨》、陳啓天《孫子兵法考證》、李丕基《孫子十三篇釋疑》、金典戎《孫子評論》

等，都對《孫子兵法》及其作者進行了多角度的考證。這些文章擺脫了清末考據學的樊籬，引征豐富，儘管有些爭論未能得到統一，但無疑推動了《孫子兵法》的研究。

## （二）研究領域拓展擴大

民國間的《孫子兵法》研究，不僅在傳統研究領域成果累累，而且還擴大到過去從未涉及的其他領域，尤以《孫子兵法》文獻研究最為突出。如陸達節編著的《孫子考》，是第一部研究《孫子兵法》的目錄學專著，此書著錄上起魏晉，下迄民國間見於公私書目的《孫子兵法》著作 141 種，日本孫子書 42 種，以及論文雜記等，第一次較全面反映了兩千多年來《孫子兵法》的刊刻出版情況。此書資料收羅豐富，首開編制《孫子兵法》專題書目之先河，為後世研究《孫子兵法》提供了便利，同時也為“孫子學”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另外，李浴日編輯的《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收錄有關《孫子兵法》和《戰爭論》的研究文章 15 篇，集中反映了當時對此二書的研究情況。此書不僅是第一部以《孫子兵法》為研究物件的論文集，也是首次將《孫子兵法》與國外軍事名著進行比較研究的著作，對後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對《孫子兵法》文獻的整理、版本刊印也取得可喜的成績，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孫子書。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續古逸叢書》，將清代流失于日本的宋本《武經七書》予以影印，使國人有機會目睹宋刊武經本《孫子兵法》的面貌。軍用圖書社影印的劉寅《武經七書直解》，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叢書集成》和《評注諸子菁華錄》、世界書局的《諸子集成》、大眾書局出版的《孫吳兵法》等，至今仍是學者們案頭的必備書。總之，民國間的《孫子》文獻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孫子兵法》研究內容，也為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創造了條件。

## （三）外文譯本的出版，推動了國際間學術交流

中國歷代的《孫子兵法》研究，多以輸出中國著作為主，至明清間雖有少量影複的日本孫子書，也大多以訓點漢籍的形式出現。日本明治維新大力宣導西學，受其影響，《孫子兵法》的研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研究成果在有些領域明顯超過了中國。因此，翻譯介紹日本《孫子兵法》著作，便成為民國孫子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最先進行這項工作的是來傳良和孔藹如，他們合作翻譯的日人阿多俊介著《孫子之新研究》（1931 年南京共和書局出版）不論從內容和形式上，都與日本傳統著述方式不同，代表了日本近代孫子研究的方向和水準。如果說《孫子之新研究》僅是個人的專著，尚不能反映日本《孫子兵法》研究的全貌。那麼，李浴日編著的《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一書，則是對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成果作了綜合反映。在這本書中，作者大量編譯日本北村佳逸《孫子解說》、大場彌平《孫子兵法》、尾川敬二《孫子論講》、福本椿水《孫子訓注》等十餘部著作，攝取各書之精華，益以個人研究之心得，並引用英國賈爾斯等人的言論，匯輯眾說，對《孫子兵法》有些內容作了新的解釋。此書的出版，開闊了國人的視野，特別是外國對《孫子兵法》的高度評價和在世界的影響，成為推動民國《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要因素。

## 與近代西方軍事融合時期--中華民國(5)

與此同時，兩種英漢對照文本《孫子兵法》的出版，也是過去孫子研究中從未涉及的領域。這兩本書，一是重慶南方印書館出版的在賈爾斯所譯英文基礎上，配以相應的中文，以供讀者英漢對照閱讀的《孫子兵法》。另一種是鄭麟編譯的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英譯先秦群經諸子叢書·孫子兵法》。此書將《孫子兵法》全文翻譯成英文，並糾正了賈爾斯譯本的某些不足。此書也是首次由中國人將《孫子兵法》翻譯成外國文字的著作。此兩種英譯本的出現，標誌著中外孫子學術交流向更深的層次發展。

民國時期由於長期的戰亂，造成物資匱乏，特別是印刷出版條件極為困難。因此，已出版的《孫子兵法》著作，不僅印數少，印裝品質差，而且保存下來的也不多，查閱這時期的《孫子兵法》出版物，甚至比明、清以前的古籍還要困難。因此，廣泛搜集，加強保護這批《孫子兵法》著作，也就成為當前孫子研究的一項緊迫任務。

## 10.大普及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掀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同時，也迎來了《孫子兵法》研究的春天。在半個世紀的歲月裡，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20多年裡，《孫子兵法》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孫子兵法》得到了空前普及。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部分——“孫子學”已經形成，其影響所及遍佈全球，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孫子熱”。這一時期，成為《孫子兵法》研究歷史上最具有成就的時期。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1)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三個階段，並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

#####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

50年代初，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在醫治戰爭創傷的同時，一批身經百戰、深諳《孫子兵法》的將軍們，便對《孫子兵法》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50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剛剛成立，時任院長兼政治委員的劉伯承，就積極宣導研究《孫子兵法》，將《孫子兵法》作為“戰役法”課程的指導教材，組織人員對《孫子兵法》原文進行注釋，親自校改《兵勢篇》，並登臺為學員講解。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把《孫子兵法》列為高級幹部必讀書籍，將《武經七書》影印下發部隊，列入軍隊軍事教育訓練的重要內容。1958年，葉劍英擔任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他上任伊始，在組織編纂《中國軍事史》的同時，積極宣導對古代兵書的研究，並把對《孫子兵法》等兵書的研究納入前期工作，編輯《中國古代兵法選輯》一書，下發全軍供部隊基層幹部學習之用。

郭化若繼 30 年代寫成《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又于 50 年代初完成了對《孫子兵法》十三篇的注釋和用現代漢語翻譯的工作，出版了《今譯新編孫子兵法》，首啓現代注釋《孫子兵法》之新風。此書的問世，不僅提供了適合現代讀者閱讀的新注本，對普及《孫子兵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以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嚴謹的學風，對後來的孫子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期出版的另一部孫子書，是楊炳安的《孫子集校》。此書作者在廣征博采的基礎上，索隱發微，審其得失，對《孫子兵法》原文進行了全面的校勘整理，於書中多有創見，成爲現代校勘《孫子兵法》的一部力作，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此間另一重要事件是任繼愈發表《〈孫子兵法〉中的辯證法的因素》一文。此文從中國哲學史的角度，對《孫子兵法》的哲學思想給予高度評價和肯定，並較全面地論述了《孫子兵法》蘊含的辯證法思想。以此爲發端，《孫子兵法》哲學思想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關鋒《孫子軍事哲學思想形究》便是這方面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該書從孫子軍事哲學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辯證法思想，以及孫子軍事哲學中包含的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統一的思想等方面，對《孫子兵法》進行了系統地分析和論述，並對其哲學思想的局限性作了探討，成爲研究孫子哲學思想的首部專著。這一時期對孫子哲學思想的研究也波及哲學界，引起研究中國哲學史學者們的重視，開始在他們的哲學著作中增辟介紹孫子哲學思想的篇章。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等，都設專章論述孫子的哲學思想及價值，從而確立了孫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同時，也帶動了對《孫子兵法》其他學科的研究。

60 年代，雖然有關《孫子兵法》的論著出現的不多，但品質較高，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如《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此書採用上海圖書館藏南宋刻本爲底本影印，並根據北京圖書館藏本補綴文字 20 餘處，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可信的版本，對提高《孫子兵法》的校勘品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爲該書附冊的《孫子今譯》，集郭化若多年研究成果之大成，把《孫子兵法》的注釋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另外，五、六十年代在我國港、臺地區《孫子兵法》研究也取得甚爲可觀的成就，著述甚豐。其校釋者多爲當年軍隊的高級將領，他們通過對過去戰爭的反思，運用現代軍事理論注解《孫子兵法》，或修改增補舊作，或用現代戰例解說，或對古注予以新解，從內容到形式均有一些創新。如李浴日著《孫子兵法總檢討》、柯遠芬著《孫子兵法講授錄》、楊家駱主編《孫子集校》、魏汝霖著《孫子兵法今注》等，無論在校勘訓詁，還是注釋解說，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是《孫子兵法》研究隊伍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 （二）“文革”時期

自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拖進十年動亂時期。這期間《孫子兵法》研究同其他文化事業一樣，被塗抹上濃重的政治實用主義色彩。孫武成爲法家代表人物，“批儒”的英雄，因而這期間出版了一大批受“左”的思想影響的有關《孫子兵法》的書籍。《孫子兵法》豐富多彩的內容被局限在一個固定的模式之中，因此不可能展示《孫子兵法》的活力，更談不上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這些書大多數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儘管如此，這期間由於《孫子兵法》書籍的大量印行，客觀上使較多的人開始接觸《孫子兵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的作用。同時，也有少數注本，因作者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在學術上對之進行深入探討，因而其作品經受了時間的檢驗，至今仍在再版重印。如郭化若《孫子今譯》、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研究部《孫子》注釋小組《孫子兵法新注》、齊光《孫子兵法評注》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敖其爾翻譯的蒙古文《孫子兵法新論》，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現的第一部用少數民族文字注釋的《孫子兵法》譯本，具有特殊的版本價值。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2)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不僅在我國考古史上佔有異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孫子學史上也是劃時代的重大事件，因此引起世界性的轟動。吳孫子和齊孫子兩部孫子書的同時出土，不僅平息了聚訟兩千多年的有關爭論，證明孫武、孫臏各有其人，各有兵書傳世，而且為校勘《孫子兵法》提供了難得的文物資料。《孫子兵法》竹簡的出土，猶如一石擊水，為沉寂多年的孫子學界注入了活力，出現了一批整理竹簡和用簡本校勘《孫子兵法》的著作。如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一)孫子兵法》、郭化若譯《孫子今譯》、吳如嵩著《孫子兵法淺說》、唐滿先譯注《孫子兵法今譯》、吳九龍著《銀雀山漢簡釋文》等，以及多篇論述竹簡的文章。與此同時，有些學者利用漢簡提供的豐富材料，對《孫子兵法》的成書年代及作者等長期爭論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孫子兵法》為春秋末期孫武自撰，但在長期流傳中不排除後人加工整理和附益的可能。

### (三) 改革開放以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黨工作重點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使各項事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孫子兵法》研究也進入了歷史上最為活躍的時期，研究成果數量繁富。據統計，截至1999年底國內大陸地區共出版有關《孫子兵法》的圖書320多部，發表論文630多篇。專家、學者、業餘愛好者紛紛推出自己的精心之作。郭化若對其《孫子今譯》進行了修訂，出版了《孫子譯注》。此書除對序言作了較大的修改外，還補充了部分內容，增加了對十三篇篇名和各篇中心思想及主要內容的解釋，對每個段落加寫了“試箋”，對《孫子兵法》本文的校勘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對孫子思想的闡發更加充分、完整，成為作者的傳世之作。陶漢章根據劉伯承當年講授《孫子兵法》的筆錄，益以個人長期研究的體會，出版了《孫子兵法概論》一書。此書側重對孫子戰略思想的研討，多為他人所未發，受到普遍的好評，出版後不久即被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並被列為美國80年代軍事理論暢銷書。據說在海灣戰爭中，美國海軍陸戰隊使用的就是這個本子。楊炳安在原《孫子集校》的基礎上對《孫子兵法》全文重新進行校勘，出版了《孫子會箋》。此書參校諸家版本、兵書多達40餘種，箋注博

採眾長，辨訛正誤，對歷代各家之說進行了總結和梳理，通校出一個完備的箋注本。此間還出版了始於 60 年代初，後因“文革”而耽誤的《武經七書》。參加該書注釋的作者，多是對古兵書頗有研究的專家、學者，經他們校勘、整理後的《武經七書》，在對中國傳統兵學思想的揭示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此外，還有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唐滿先《孫子兵法今譯》、龐齊《孫子兵法探析》、張文穆《孫子解故》、朱軍等《孫子兵法釋義》、黃葵《孫子導讀》、鈕國平《孫子釋義》、黃樸民《白話孫子兵法》、李零《吳孫子發微》、田昌五《孫子兵法全譯》、楊炳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等。這些著作，內容豐富，新意迭出，不論在注釋校勘，還是思想研究方面，均有所突破，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

1989 年，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成立後，積極組織專家、學者，依靠集體力量，出版了一批處於學科前沿、學術水準較高的《孫子兵法》專著。如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組織編輯的“孫子兵法大全叢書”，就是孫子研究史上的一項大型工程，從已出版的《孫子校釋》等書觀之，不論是作者的遴選，還是作品的內在品質，均達到了各自學科研究的較高水準。如吳九龍主編《孫子校釋》，集國內一流作者，對《孫子兵法》進行全面的校勘注釋，提供了一個比較權威的新的《孫子兵法》版本。謝祥皓、李政教主編《兵聖孫武》充分挖掘現有史料，較全面地反映了孫武的一生。于汝波主編《孫子學文獻提要》，著錄《孫子》文獻 1849 種，考竟源流，提要勾玄，成爲《孫子兵法》研究必備的工具書。此外，學會編輯出版的四屆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反映了當代世界孫子研究的最新最高水準。

此間還出版了幾部影響較大、學術水準較高的孫子書。如《孫子兵法連環畫》，爲青少年讀者提供了一種喜聞樂見的《孫子兵法》讀本，兩年間多次重印，印數達 23 萬套，並榮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陳學凱著《制勝韜略》，對孫子哲學思想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並由此深化了對孫子軍事思想的認識。吳如嵩主編《孫子兵法辭典》，對孫子兵學進行百科全書式的整理、歸納，爲研讀《孫子兵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謝祥皓、劉申甯輯《孫子集成》，囊括歷代《孫子兵法》重要版本，爲研究《孫子兵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此外，楊善群的《孫子評傳》和黃樸民的《孫子評傳——一代兵聖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劉春志的《孫武傳》和周興的《孫武本傳》等孫武傳記，對孫武生平和思想作了系統地論述，從不同角度向讀者展示了兵聖的風采。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對外交往的增加，《孫子兵法》的國際交流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987 年，日本民間《孫子兵法》研究家服部千春，將自己 40 餘年潛心研究《孫子兵法》的成果——《孫子兵法校解》書稿交由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實現了他將吉備真備一千多年前帶回日本的《孫子兵法》，以扶桑島國研究的成果，敬還給孫子故鄉的心願。服部此舉，爲中日友好及《孫子兵法》交流史寫下了重重的一筆，一時傳爲佳話。此後翻譯外國的孫子書也逐漸增多，如韓國鄭飛石的《孫子兵法演義》，日本藤塚鄰等的《孫子兵法奧妙深探》，日本兵法學家佐藤堅司的《孫子研究在日本》，日本學者豐增秀俊的《孫子兵法》

等，這些孫子書的翻譯出版，向國人傳遞了國外《孫子兵法》研究的資訊。同時，數種外文譯本《孫子兵法》的出版，也為外國讀者提供了閱讀便利，擴大了《孫子兵法》在世界的影響。如《孫子校釋》書後所附英、法、俄、日、義大利、阿拉伯六種文字的《孫子兵法》本文，不僅可以滿足世界主要語種廣大讀者的需要，而且在一書中同時以六種文字出版，這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罕見的。薄元明譯《白話英譯孫子兵法》、潘家玠等譯《（漢英對照）孫子兵法》、程鬱等譯《孫子兵法》、鐘譯《孫子十三篇》等譯本，還對賈爾斯的英譯本存在的問題作了糾正，使英譯內容更加接近于《孫子兵法》原意。謝國良等著《孫子兵法與評述（英漢對照）》，以英漢對照的形式，對孫子思想予以解說。吳如嵩等譯著的《孫子兵法與養生治病》譯成英、日兩種文字同時出版。大量外文譯作的出現，擴大了《孫子兵法》在世界的影響，于中外讀者裨益甚多。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3)

作為《孫子兵法》重要載體的圖書，80年代以來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繼承傳統著述形式的基礎上，出現了字帖、畫冊、印譜等形式多樣的圖書。如李鐸書寫的《孫子兵法新校字帖》、王正良書《孫子兵法鋼筆字帖》、王重傑等的《繪畫本孫子》、遲癡編繪的《漫畫孫子兵法》、單寶桐篆刻《孫子兵法印譜》等等，此類《孫子兵法》圖書達30多種。同時，還出現了諸如錄音磁帶、光碟影碟等現代傳播載體，以及仿竹簡書、絲綢書、金版書等《孫子兵法》藝術版本。這些不同樣式《孫子兵法》圖書的出版，極大的豐富了《孫子兵法》的載體樣式，對宣傳和普及《孫子兵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描寫孫武生平事蹟的小說、電視劇本也相繼出版，例如黃堯德的《孫子傳》、楊書案的《孫子》、韓靜霆的《孫武》等有六七部之多，同期還上演了話劇和歌劇《孫武》，中央電視臺播映了十集電視系列片《孫子兵法》及電視劇《孫武》。這些小說及文藝節目的出版和演出，為普通群眾接觸和瞭解孫武及其兵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幫助，同時也擴大了《孫子兵法》的影響。

二、《孫子兵法》的思想、原理被廣泛運用到社會生活領域，《孫子兵法》的非軍事應用研究成為孫子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80年代以來，《孫子兵法》在國內外倍受關注，以至出現了世界性的“孫子熱”。《孫子兵法》不僅被西方戰略學家運用於熱核時代的戰略研究，處理國際關係和維持世界和平，而且被廣泛借鑒應用到諸如企業管理、商業競爭、體育競賽等社會其他領域。與此相適應的《孫子兵法》研究組織也相繼成立，國際性學術會議不斷召開，有關《孫子兵法》的圖書、影視、戲劇等，層出不窮。《孫子兵法》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空前普及的局面。

#### （一）《孫子兵法》學術組織紛紛成立

1989年5月，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在山東惠民率先成立。研究會在聯絡《孫子兵法》研究專家，組織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和進行學術攻關外，還積極指導、協調國內其他研究機構的活動，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隨後，中國孫子與齊文化

研究會在山東成立，國內一些省、市也相繼成立《孫子兵法》研究機構。如遼寧省兵法學會、黑龍江孫子兵法研究會、山東社會科學院孫子研究中心、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惠民縣孫子研究會、廣繞縣孫子研究中心，以及中國孫子兵法應用諮詢中心等。在國外，馬來西亞、日本等國先後成立孫子兵法學會、武岡戰略經營研究所等。各群眾性研究組織積極活動，學術交流蓬勃開展。

正是在國內外孫子研究處於高漲的背景下，1989年5月，“首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在山東省惠民縣召開。來自日本、美國、法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及港、臺地區的專家、學者與國內代表共聚一堂，探討現代社會應用《孫子兵法》，維護世界和平等問題。通過各國學者廣泛的學術交流，切磋與互補，進一步促進了彼此間的合作，加強了孫子研究和宣傳工作，進一步拓展了學術研究領域。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是孫子研究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它標誌著《孫子兵法》研究從此走上了組織化、國際化的道路，“孫子學”成爲世界性的一門顯學。在此後召開的第二、三、四、五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參加會議的人數越來越多，海外代表由首屆的四人增加到十幾人，近百人，會議規模由幾十人增加到300多人。影響也越來越大，黨和國家領導人李鵬、李瑞環等親切接見與會代表；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張萬年、遲浩田，政協副主席洪學智等到會講話，新聞媒體進行了廣泛的報導。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總理李鵬等爲研討會或孫武故里題詞。五屆國際研討會的召開，以及各地舉辦的諸如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管理國際研討會、海峽兩岸孫子與齊文化學術討論會、孫子兵法與海軍學術報告會等會議的召開，既擴大了《孫子兵法》的知名度，又推出了一批最新研究成果，先後結集出版了《孫子新探》、《孫子新論集粹》、《孫子探勝》、《孫子兵法及其現代價值》、《孫子研究新論》、《孫子與齊文化》、《孫子兵法與海軍》、《孫子兵法與市場經濟》等十多部會議論文集，把《孫子兵法》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 （二）《孫子兵法》應用類圖書異彩紛呈

在“孫子熱”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孫子兵法》思想的通用性，並嘗試與各自的行業相結合，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並有大量研究成果問世。據統計，各類《孫子兵法》應用專著達百餘部、論文300餘篇，內容涉及企業管理、商業競爭、金融投資、社會治安、體育競賽、醫療衛生、人生處世等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其中又以企業管理、商業競爭方面的爲多。自李世俊等1984年出版《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以來，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出版70多部，發表的文章逾百篇。這些著述討論的問題，幾乎涉及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大到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國企改革，小至股票操作、廣告策劃，尤其是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論著更是層出不窮，並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如李世俊等編著的《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一書，連續重印15次，累計印數達30萬冊。同時，一些大專院校，紛紛開設《孫子兵法》課程，將學習《孫子兵法》納入現代企業管理學的教學內容，並在教學科研中產生一批具有較高水準的專著。如著名管理學家、教授陳炳富，致力於《孫子兵法》管理思想研究十餘年，先後發表論文20餘篇，並出版

了英文版《孫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應用》(合作)一書。南京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週三多,在該院開設的工商管理碩士戰略管理課的教學中,引入《孫子兵法》管理思想內容,受到外籍學生的歡迎。他還以此教材為基礎,出版了《孫子兵法與經營戰略》一書,對《孫子兵法》經營管理思想作了深層次的探討。中國人民大學楊先舉教授連續出版《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合作)、《兵法經營十謀》等著作,並發表論文多篇,對《孫子兵法》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運用從理論上作了有深度的研究。其他如暴奉賢《孫子兵法與現代企業經營謀略》、唐突生《孫子兵法與市場謀略》、夏書章《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藍天出版社的《孫子兵法與商政謀略》、管正的《孫子兵法與行政管理》等都各具特色。由於專家、學者的不斷努力,使《孫子兵法》的應用研究超出了簡單類比的初級階段,開始從現代管理科學的高度系統地借鑒、應用《孫子兵法》,並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代東方管理理論,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關注。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4)

應用《孫子兵法》的另一種現象,是一大批企業管理者,自覺地把《孫子兵法》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身體力行並嘗到了甜頭。天津市河東區建設開發公司霍建訓、張澤田經理,在房地產開發建設中運用孫子謀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們不無自豪地說:“學習運用孫子的謀略思想,指導天津市河東區開發建設工作實踐 30 年,先後搞了 100 多項基建工程,也算得上是‘百戰不殆’。”為了把自己的體會與同行共用,使更多的企業受益,他們與“電大”聯合舉辦多期廠長、經理管理幹部《孫子兵法》應用培訓班,介紹他們的做法。哈爾濱市兵法商戰謀略應用研究所,自 1993 年成立後,以弘揚《孫子兵法》謀略思想,為社會發展服務為宗旨,多次舉辦“兵法商戰謀略應用”專題講座,聽講人數近萬人。印發《孫子兵法·三十六計兵法要義精選》等讀物,出版《兵法商戰謀略全書》,並為多家企、事業單位和政府部門提供諮詢策劃服務,收到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被當地新聞媒體廣為報導。在群眾性的學習、運用《孫子兵法》的熱潮中,湧現出一批既能著書立說,對《孫子兵法》進行理論探索,又能親自經營管理的企業家,他結合個人的親身經歷,撰寫文章或出版著作,暢談自己在商品大潮中運用《孫子兵法》的經驗體會。據瞭解,在已出版的 70 多種將《孫子兵法》運用到經濟領域的著作中,有近半數的作者是企業的廠長和經理,或從事經濟工作的人員。例如,《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的作者之一李世俊,《孫子兵法與經濟謀略》的作者邱復興,《新編孫子十三篇與企業經營管理》的作者張秦麓等。由於廣大群眾參與,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共同努力,使《孫子兵法》的應用研究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同時,也為探尋《孫子兵法》在其他領域的應用積累了經驗。

三、《孫子兵法》研究形成系統的內容體系,學科建設取得長足進步,孫子學得到確立

《孫子兵法》歷經二千多年的傳播,已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

軍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物件、內容和方法。進入 80 年代後，隨著世界性《孫子兵法》研究熱潮的興起。《孫子兵法》文獻急劇增加，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研究手段有所創新，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孫子學”，呼之欲出。

### （一）創立“孫子學”水到渠成

在 1989 年召開的首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許保林向大會提交了題為《建立“孫子學”芻議》的論文，首次提出創立“孫子學”的倡議，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重視和支持。於汝波在 1994 年出版的《孫子學文獻提要·前言》中對孫子學的定義、研究物件、研究成果、應用價值及發展前途等進行了系統論述。作為一門學科能否成立並存在下去，首先要看它對現實生活是否具有指導價值；其次是否具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對於這兩個基本條件，《孫子兵法》研究是完全具備的。前者，《孫子兵法》原理原則歷久而彌新，其價值不但影響中國的軍事思想，也受到世界軍事家、政治家的認可，已成為世界軍事寶庫的一顆明珠。對於後者，經過二千多年的積澱，有關《孫子兵法》的文獻資料，已達到 2000 餘種，特別是 80 年代以來，以每年出版專著十餘部的速度遞增。研究的內容也在不斷擴充，除傳統的注釋校勘、闡發考征、傳記輯佚外，還出現了大量應用類著作和工具書等。僅 1980 年到 1999 年，中國大陸出版、發表《孫子兵法》應用類圖書 134 種、論文 340 餘篇，且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孫子兵法與管理心理》、《孫子兵法與競技體育謀略》、《孫子兵法與企業公關策劃》、《孫子兵法股票入門》、《孫子兵法與人際關係》、《孫子兵法與現代科技管理中的應用》、《孫子兵法與保險經營》、《孫子兵法與學校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孫子兵法與現代公安管理》等。特別是作為學科建設重要內容的文獻整理和工具書出版，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先後出版了四種《孫子兵法辭典》和《孫子學文獻提要》書目、索引等，以及十幾種不同類型的論文集。這些研究成果，為孫子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隊伍近 20 年來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孫子研究者的地域分佈也在日益擴大。中國大陸作為孫子研究的主體，研究者、愛好者已遍及各行各業，特別是隨著一些大專院校開設《孫子兵法》課程，業餘愛好者更是與日俱增。如瀋陽體育學院，自 1990 年在本科班、專科班開設《孫子兵法》課以來，聽課人數達數千之多。在國外，《孫子兵法》研究者也在不斷增加，僅在我國發表論著的就有日本的服部千春、金谷治、平間洋一、加地伸行等，美國的白恩時、薛君度、史密斯等，法國的龍樂恒、魏立德等，韓國的金岩山、加拿大的江憶恩、波蘭的高利克夫斯基等，不乏著名的專家學者，其中服部千春因專攻此學而獲得了南開大學博士學位。

研究方法上，也有較大的突破，專家、學者積極引入現代科技手段，對古老的《孫子兵法》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如楊少俊等人，利用電腦技術對《孫子兵法》進行系統地研究，研製出“孫子兵法微機檢索專家系統”。該系統收入研讀《孫子兵法》必需的資料 80 多萬字，並按資料內容分類統計，形成極便檢索的資料庫，將《孫子兵法》的文獻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大連

陸軍學院黃志賢等研究的“《孫子兵法》研究電腦檢索系統”，實現了對《孫子兵法》全文多途徑電腦檢索，可以滿足對《孫子兵法》字詞、語法等研究的需要。電腦技術的引入，不僅為《孫子兵法》研究提供了現代化研究手段，而且也為未來的孫子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5)

### (三) 孫子學研究成績喜人

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表的關於《孫子兵法》的文章約1300餘篇。這些文章大多勇於探索，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傳統領域頗多建樹，而且開闢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績。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傳統課題和新領域研究兩個方面。傳統課題研究方面：

1、關於有無孫武其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自宋代葉適提出懷疑，至清代有全祖望、姚際恆等人附和，到民國則呼聲更烈，認為孫武“全為偽託之說”，更有人將孫武、孫臏合二而一，稱二人“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臏是綽號”。對此，新中國成立後學術界多持否定的態度。特別是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後，學術界對此取得了比較一致的共識，認為“歷史上孫子確有其人，無可懷疑”。

2、關於孫武故里的問題。孫武故里問題是歷史上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80年代這個問題又被重新提了出來，且新說突起，主要有以下五說：(1) 惠民說。此說根據《元和姓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辨證》等古籍，並結合譜牒記載，認為上述文獻中的樂安實指唐代樂安郡，又據唐代樂安郡治厭次，新莽時稱樂安亭，在今惠民縣境；而樂安亭的歷史淵源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恰與孫武的祖父孫書“食采于樂安”相合，故孫武的故里應在今惠民縣。(2) 博興說。此說認為，西漢是最早設置樂安縣的朝代，其所置之樂安郡與《新唐書》、《古今姓氏書辨證》中的齊樂安，具有因襲關係，二者在同一地理位置，即今山東省博興縣。依漢承秦制，秦承齊制來推論，博興應為孫武故里。(3) 廣饒說。此說認為，孫書“食采”之樂安應為一個廣闊的地域，而根據《水經注》、《左傳》杜預注和《資治通鑑》等史料記載，樂安的地面主體應在今山東省廣饒縣境。(4) 臨淄說。此說認為，孫武先祖田無宇為齊景公之上大夫，大夫當有食邑，但至昭公十年始受封高唐，此前並無食邑，故在此之前，無宇一直是隨侍景公左右而居於臨淄；孫武之父馮為齊卿，卿為朝中重臣，也不居於采邑，而必住臨淄。(5) 莒邑說。此說據《左傳》記載，昭公十年陳桓子在與鮑氏擊滅欒、高氏後，曾“請老於莒”，這說明莒不僅是他的封邑，而且也是他可以居家養老的封邑，因而應視為他的故里，而此時孫武已是少年，故莒應是他的故里。

3、關於《孫子兵法》成書年代的問題。這個問題，唐宋以前無人置疑，自宋代梅堯臣首啓“戰國相傾之說”後，《孫子兵法》的作成時間便成為頗有爭議的問題。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孫子兵法》是戰國時的作品，為孫

臚所著。另一種意見堅持《孫子兵法》為春秋末年孫武所作。這個問題經過幾代人爭論，前者意見佔據著優勢，幾近成為定論。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澄清了聚訟多年的疑案，肯定了春秋與戰國確有孫武與孫臏其人，各有兵書傳世。但爭論並沒有結束，有學者提出《孫子兵法》不是孫武親著，而是孫子學派軍事思想的記錄，經過長期整理，于戰國中期成書，並且孫臏也有可能參加整理工作。有的甚至認為其成書于魏晉時期。多數學者認為《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武，成書於春秋末年，但不排除後人校理時竄入某些字詞的可能性。

4、關於《孫子兵法》版本源流、優劣的問題。《孫子兵法》版本，何者為優及其源流，從有關考證文章和學者們提出的選本來看，竹簡本《孫子兵法》、影宋本《魏武帝注孫子》、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宋本《武經七書》、日本櫻田本《古文孫子》等版本最值得重視，也是引用較多的版本。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孫子兵法》，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版本，與其他傳世本相較，更接近于孫武手定的原本，其價值無可爭辯，故倍受學者的重視。也有學者認為影宋本《魏武帝注孫子》，其所據底本是《孫子兵法》最古老的注本，為後世各種傳寫本、刊刻本的祖本。此本雖與《武經七書》本屬同一系統，但年代更早，錯字也較他本要少，是校勘工作中不可忽視的版本。宋本《十一家注孫子》自影印出版後，成為多數注家首選的工作底本。

5、關於日本櫻田本《孫子》成書年代的問題。日本櫻田迪家藏古文《孫子》在中國影印，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並就此書的抄寫年代展開了爭論。日本有學者認為，此本“為魏武以前之書”，中國學者中一種意見認為櫻田本是“源於貞觀時期的一個寫本”；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櫻田本《孫子》可能是元末明初張賁校改的本子，傳入了日本；也有人提出，此書系日本學者以《武經》本《孫子》為底本，參照明初劉寅《孫子直解》整理的一個本子。還有學者從楊守敬對該書的批語“櫻田之所偽撰”，斷定櫻田本《孫子》系偽書。

6、關於“《孫武兵法》82篇”真偽的問題。1996年，西安傳出所謂“《孫武兵法》82篇”被發現的新聞，稱“最新發現的‘周書漢簡’《孫武兵法》82篇，是抄自漢簡的一部古兵書”，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八十二篇”。對此許多學者提出異議，發表了一批辨偽文章，並結集出版了《真與假的較量——〈孫武兵法〉82篇風波大透視》一書。該書從抄本的載體到內容，逐一進行辨偽，認為此本“純系偽造”，其抄本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抄寫的”。同時指出，這一做法不僅對《孫子兵法》研究形成嚴重的誤導，而且在廣大群眾中的欺騙作用和在国际上產生的惡劣影響都是不容低估的。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6)

其他如關於孫子兵學形成的思想淵源和社會背景問題、《孫子兵法》在歷史上的流傳及其影響問題、孫子軍事思想和體系問題、《孫子兵法》與西方兵學的比較研究問題等，學者們也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有關新領域研究方面的內容更是層出不窮，主要有：

1、關於《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雖然由來已久，但以現代軍事學術的觀點，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進行系統地分析、歸納，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後方有較大的進展，發表數量可觀的文章。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其軍事思想體系作出了不同的概括和闡發。有的從戰爭與戰略思想、作戰指導思想、建軍思想、研究戰爭的思想方法入手；有的將其概括為慎戰論、先勝論、全勝論、伐交論、突襲論、易勝論、致人論、任勢論、詭道論、陣法論、常法論、治軍論、將帥論、後勤論、軍事地理論、戰道論；有的從簡易原則出發，將其概括為先勝理論、全勝理論和戰勝理論三大塊。對《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體系進行的不同概括和闡發，有利於人們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體系認識的深化和把握的準確。

2、關於《孫子兵法》的哲學思想。近年來，對《孫子兵法》哲學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出版了像《制勝韜略》等一批品質較高的論著。一般認為，孫子哲學思想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二是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同時，對孫子哲學思想的局限性，有些學者也提出了善意的批評；但也有學者認為，不能以現代思想苛求古人。

3、關於《孫子兵法》的軍事經濟思想。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影響不斷擴大，對《孫子兵法》的經濟思想的探討也有逐步深入，並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1) 經濟實力是戰爭勝負的物質基礎。(2) 將經濟實力作為預測戰爭前途的基本條件，表現在“廟算”中將“主用”列為重要內容。(3) 強調要經濟地選擇後勤補給方式，提出了“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的補給原則。(4) 正確地選擇和利用軍事經濟環境，並將其列為選擇地形的重要條件。(5) 經濟地選擇作戰方式，可以以小的代價取得更大的勝利。學者認為，孫子這些經濟思想，對現代戰爭及經濟工作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4、關於《孫子兵法》的軍事管理思想。對孫子的軍事管理思想的研究，近年來得到了加強，普遍的看法是，《孫子兵法》深刻地論述了軍事管理問題，其中有諸多精闢的論述，揭示了軍事管理的某些客觀規律，其主要內容有：(1) 孫子正確地揭示了軍隊管理中的部分與整體、局部與全域之間的關係，體現了系統管理的思想。(2) 孫子把嚴格管理、嚴格要求作為將帥的“五德”之一，又在“七計”中把“賞罰孰明”作為判斷戰爭勝負的重要條件，體現了嚴格管理的思想。(3) 孫子把“仁”作為將帥“五德”的必備條件，強調將帥要像對待“嬰兒”和“愛子”那樣關心愛護士兵，體現了感情管理的思想。(4) 孫子把將帥以“智”為首的“五德”和“將孰有能”的能力，作為衡量軍隊管理水準和戰鬥力的重要標誌，體現了智慧管理的思想。此外，尚有資訊管理思想、定量管理思想、依法管理思想、心理管理思想、動態管理思想和辯證管理思想等。

5、關於《孫子兵法》的戰爭動員思想。有學者對《孫子兵法》中的戰爭動員思想作了專題研究，概括起來有四點：(1) 孫子關於“兵者，國之大事”的思想，體現了戰爭動員必須慎之又慎。(2) 孫子將戰爭動員作為“廟算”的重要內

容，提出了有備無患的戰爭動員思想。(3)孫子根據其所處時代的特點，提出“役不再籍”，“因糧於敵”的戰爭動員原則。(4)孫子圍繞“修明政治”、“發展經濟”、“注重邦交”、“加強武備”等方面，強調對多種力量的戰爭動員，以形成整體合力，從而震懾或戰勝敵人。

6、關於《孫子兵法》的軍事倫理思想。近年來有些學者以現代倫理學理論，對《孫子兵法》的倫理思想進行了研究，認為孫子把社會倫理與養兵用兵的實踐結合起來，從最基本的道德關係，即軍隊與國家、人民的關係入手，提出並系統地闡述了軍隊的價值理論、將帥道德規範及軍人道德實踐等一系列軍事倫理問題，形成了完整的獨具特點的軍事倫理思想體系。

7、關於《孫子兵法》的心理學思想。對《孫子兵法》中心理學思想的探討，是近年來才出現的，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少學者發現，《孫子兵法》已經觸及到軍事心理學所研究的許多問題，其心理戰理論是現代心理戰理論的基礎，認為孫武是“心理戰的鼻祖”。

8、關於《孫子兵法》的運籌思想。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孫子兵法》中的不少論述已有了早期樸素軍事運籌萌芽。有學者認為，“真正把古代運籌思想引入軍事領域的當首推孫子”。孫子樸素的運籌思想表現在整體性觀點、定量分析方法、模擬方法等。此外，對如何作出最佳決策，孫子也提出了一系列原則，說明《孫子兵法》中樸素的軍事運籌方法是非常豐富的。

9、關於《孫子兵法》的預測思想。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孫子兵法》的軍事預測思想產生濃厚的興趣，認為孫子通過對敵我雙方各種條件的分析對比來進行戰爭勝負的預測，同以往的預測方法劃清了界限，開創了唯物主義預測戰爭勝負的先河。同時，孫子還充分肯定戰前預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對軍事預測的根據和基本內容進行了歸納舉要，並強調經過預測作出決策之後，還必須充分發揮將帥的主觀能動性，使其發揮創造力，將勝利的藍圖變為現實。

#### 孫子學創立及大普及時期(7)

10、關於《孫子兵法》的系統思想。有學者認為，《孫子兵法》不僅從戰爭與國家、政治、經濟、外交等因素的整體關係上提出了戰爭的系統觀，並且為戰爭的決策創立了一個具有數字意義上的“經五事”、“校七計”的模型，並進行了系統分析。儘管《孫子兵法》中的系統思想和分析方法還是原始的、粗糙的，遠沒有達到現代系統科學的水準，但孫子可稱之為運用系統運籌理論的方法研究解決軍事問題的典範。

11、關於《孫子兵法》的資訊思想。在以往的《孫子》研究中，人們更多注意孫子的用間思想，近年來有些學者從資訊科學的角度發現，《孫子兵法》的資訊觀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科學性，當代的一些資訊觀念，可以從《孫子兵法》中找到它的基本原理。孫子對軍事資訊的認識已有相當的成就。

12、關於《孫子兵法》的決策思想。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兵法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研究決策的書，而在這些兵書之中，最傑出、最有價值、內容也最豐

富的，首推《孫子兵法》。孫子提出了一系列的作戰方法和決策原則。因此，在研究現代決策理論時，可以從《孫子兵法》中獲得不少有價值的啟示。

13、關於《孫子兵法》的修辭藝術。對《孫子兵法》語言學成就的研究，近年來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通過對《孫子兵法》豐富多彩的修辭方式，精湛無比的修辭藝術的研究，可以加深對其軍事學術思想的理解。同時，通過對《孫子兵法》韻例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掌握其音變合韻的規律，為解決成書時代等問題和校勘工作提供依據。

14、對《孫子兵法》中一些詞語作出新的訓解和闡釋。如于汝波提出，孫子的“全勝”是指謀全域、識全破、籌全策，力爭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黃朴民認為，孫子“伐交”的本義是指“通過布列陣勢、顯示實力、震懾敵人而逼迫其退縮或降服”。穆志超提出，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不”應訓為“未”等。這些新的訓解和闡釋對進一步準確理解《孫子兵法》某些語詞的含義及其思想是有益的。

此外，學界對《孫子兵法》的軍事地理思想、軍事後勤思想、政治思想工作、人才學思想、美學思想、領導學思想、行為學思想、對策學思想、邏輯學思想、情報學思想、數學思想等，也都有所涉獵，並有不斷深化、拓展的趨勢。有關孫子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如關於孫子兵學形成的思想淵源和社會背景問題、關於《孫子兵法》與西方兵學的比較研究問題、關於孫子思想的精髓問題等，也是近年來孫子研究中討論的熱點問題，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可以預見，隨著《孫子兵法》的進一步普及和研究隊伍的不斷擴大，孫子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定會更加完善，更加生氣勃勃。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經歷了一個不平常的過程，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某些不足，如“文革”期間把《孫子兵法》研究當作政治工具，影響了學術研究的價值。又如學者在爭論某些學術問題時，多有意氣用事的現象，影響了研究的深入。再如在將《孫子兵法》應用於非軍事領域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對“兵者詭道”缺乏準確的理解，在施用物件及方法上缺乏嚴格的界定，有些著述在社會上產生了誤導作用。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今後的研究中加以克服，按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懈努力，使《孫子兵法》研究更加繁榮，“孫子學”日臻完善。

## 11. 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 世紀至 19 世紀

《孫子兵法》最早傳入日本，大約在唐朝初期。史料記載，日本學者吉備真備在唐玄宗年間留學 18 年後將《孫子兵法》帶回日本。而研究《孫子兵法》的日本權威學者佐藤堅司推斷，《孫子兵法》引入日本的時間可能更早。長期以來，《孫子兵法》在日本是作為兵家的“秘笈”得以保存和傳承，在戰國時期（約 15 世紀末至 16 世紀末）和德川幕府時期（1603～1867），日本的兵家和學者對《孫子兵法》不斷進行研究與運用。

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 世紀至 19 世紀(1)

《孫子兵法》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 世紀至 19 世紀

一、《孫子兵法》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唐玄宗年間由吉備真備帶回日本，但另說早在唐高宗年間或以前朝鮮的百濟人就將此書傳入了日本

在日本奈良時代（710～784），著名的學者吉備真備（693～775）於 717 年（唐玄宗開元五年）受派為遣唐使，渡海到中國留學 18 年後，於 735 年（開元二十三年）回國時將《孫子兵法》等中國兵書帶回日本。據《續日本紀》第二十卷天平寶字四年（760 年）十一月丙申條稱：“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宿彌關城等六人於太宰府，就大貳吉備朝臣真備，令習諸葛亮八陣、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該記載證明了吉備不僅將《孫子兵法》帶回日本，而且對《孫子兵法》相當嫻熟。由此可見，將《孫子兵法》傳入日本的第一個日本人是赴唐留學的吉備真備。但《孫子兵法》傳入日本的最初時間和途徑可能更早，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著名學者佐藤堅司推斷，中國兵法傳入日本應在天智天皇二年（663 年）以前。因為根據《日本書紀》，這一年，來自朝鮮半島百濟國的四個兵法家到達日本，負責修築城池，並因“爛兵法”而被授予榮譽勳位。佐藤推測正是這幾位百濟人將中國兵法（包括《孫子兵法》）帶入日本。其依據是《日本書紀》中出現了“倏忽之間，出其不意，則破之必也”等語，這與《孫子兵法·計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虛實》篇的“趨其所不意”，在意思上和文字上完全吻合。之所以如此巧合，是因為《日本書紀》的編纂者舍人親王、太安麻呂等已熟知《孫子兵法》，並用《孫子兵法》的話來描述神武天王時代的戰法。倘若此說成立，則《孫子兵法》引入日本的時間比吉備真備早 70 多年，那時在唐高宗年間。與此同時，最早融入日本戰法之中的“出其不意”思想也成為日本傳統的軍事思想受《孫子兵法》影響的起點。

由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出，《孫子兵法》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可能更早。這方面的資料有待繼續搜集。

二、《孫子兵法》傳入日本後作為秘密的珍藏書並未迅速傳播，直至戰國時代才公開運用，到了江戶時期《孫子兵法》的研究和流傳達到了高峰

從日本的古代和中世紀到 19 世紀中葉，《孫子兵法》在日本歷經秘密珍藏、逐步公開和傳播到研究發展鼎盛時期的三個階段：

（一）日本古代和中世紀（1550 年前）《孫子兵法》自初唐傳入日本後一直作為朝廷與兵家的“密笈”不向外傳。長期以來，中國兵法在日本被一種神密主義的色彩所籠罩，特別是日本在中世紀時傳入中國兵陰陽家兵書，其日譯本書名為《訓閱集》共 120 卷，只有該書留傳於世，而傳入的《孫子兵法》、《六韜》、《三略》則視為秘不外傳的書籍。與此同時，兵陰陽家的迷信成份也嚴重地妨礙了《孫子兵法》的傳承與應用。甲州派兵法家香西成資在《武田兵述文稿》中指出：“大江維時（可能是假託的人名）歸朝以後，以文武輔佐於朝廷。於是兵家之徒，請學其法（指《孫子兵法》、《六韜》、《三略》）。大江維時秘此法而不傳於人，別以兵陰陽之書為日本文字，作《訓閱集》120 卷以傳於世。是所以欲惑人

之耳目而不使知兵法之實事也。”據稱，《孫子兵法》存于大江世家，後傳到了大江匡房（1041～1111）之手，匡房是一位漢學家，三朝為官。相傳，此後又從匡房傳到源義家，進而碾轉傳到甲州武田源氏。從此《孫子兵法》得以在甲州派中流傳、繼承和運用，其後裔武田信玄是其家傳兵法的繼承人，並在戰國時代的戰爭中充分運用了《孫子兵法》。

（二）戰國時代（1467～1573）日本的戰國時代是指室町幕府末期應仁之亂（1467～1477）之後的一個世紀。在長達 100 年的戰國時代，群雄割據，戰亂頻仍。在此期間，武田信玄（1521～1573）因與上杉謙信長期作戰而聞名，尤其於 1541 年信玄成為武田家族首領之後，在與謙信爭奪關東霸權時，威名大振，對織田信長形成一種威脅。信玄最後與信長作戰時負重傷而死。武田信玄在作戰中能充分運用《孫子兵法》，最著名的是他所制定的突擊旗，其上援引有《孫子兵法·軍爭篇》中“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 16 個大字。如今這面原旗仍保存在日本鹽山市雲峰寺中，或許是武田信玄於 1551 年在此出家為僧的原故。佐藤堅司認為，武田信玄所歸納的“風林山火”的戰略是表現出《孫子兵法》常變一體、靜動一元的特色。另外，武田信玄的兵法在慎戰、全勝以及不戰而屈人之兵方面與《孫子兵法》有共同之處。

戰國時代以豐臣秀吉（1537～1598）征服群雄、統一全國而告結束。在天正十二年（1584 年）的小牧戰役中，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1543～1616）的對抗被認為是“全部日本內戰史中精彩的最後一頁”。是役，豐臣秀吉並未以其 12 萬之眾強攻在戰術上占局部優勢的德川家康軍 1.8 萬人，而是滿懷自信地通過外交談判與德川家康和解並使其臣服，避免了打消耗戰，保存了雙方的實力。爾後又聯合起來攻克四國和九州等地統一全國。豐臣秀吉運用的戰爭謀略，被日本學者認為“是與《孫子·謀攻篇》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一脈相承的”。

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 世紀至 19 世紀(2)

（三）江戶時代（1603～1867）開創江戶時代的德川家康本人就是甲州派兵法的繼承人。這一運用《孫子兵法》的武田家傳的甲州派兵法因武田信玄之死而中斷，“幸虧有德川家康，才使甲州派兵法得以複生”。日本《武學提要》（1674 年）稱：“東照宮命井伊直政曰：國政可必隨三河先規，軍法可必用武田兵制也，是可見明君開基之時，用武田兵制為法則也。”在該書的序言中還聲稱：“采武田法，以定一代之成法。”由於德川家康是一位善用兵法的統治者，他完成了日本武士們百年來未竟之大業，給日本帶來了持久和平。在江戶時代，江戶已由昔日的漁村發展成對外通商的大城鎮，日本的經濟得到了發展，文化空前繁榮。日本的兵家與學者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十分活躍，人才輩出，出版的兵學著作甚豐，《孫子兵法》注釋一類的書籍多達四、五十種。如江戶前期，林羅山著述《孫子諺解》、《三略諺解》、《七書諺解》；小幡景憲譯著《武備陣法國字解》、《景憲家傳》；北條氏長著《孫子外傳》、《士鑿用法》、《慶元記》；山鹿素行著《孫子

諺義》、《兵法奧義》、《武教全書》、《武教要錄》等；香西成資著《武田兵法全書》（僅存全書序言）、《武田兵術文稿》（又名《武學提要》）、《兵法綱紀十四章》等；長沼澹齋著《兵要錄》（兵談、將略、練兵、出師、戰格）；荻生徂徠《孫子國字解》、《鈴錄》；新井白石著《孫武兵法擇》等；佐藤一齋的《孫子副註》和平山子龍的《孫子折衷》。在江戶後期，如松宮觀山著《學論》、《武學爲入門說》、《士鑿用法直旨鈔》、《乙中甲傳奧秘》等；德田邕興著《武學口授》、《孫子事活鈔》等；佐久間象山著《省侃錄》、《象山淨稿》、《佐久間象山書簡》等；吉田松陰著《戰法論疑》、《幽囚錄》、《孫子評注》等；櫻田子惠的《孫子略解》；伊藤風山的《孫子詳解》和恩田仰岳著《孫子纂注》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如下：

1.林羅山（1583～1657） 日本研究以《孫子兵法》爲首的《武經七書》的先驅。元和六年（1620年），林羅山讓其門人謄抄了我國明朝劉寅注解的《武經七書直解》，並親自爲該書加了若干注解。寬永二十年（1643年）在日本出版了劉寅的《武經直解》，這個刻本取名爲《武經直解七種》。與此同時，林羅山還講述過宋朝施子美所著《武經七書講義》，並於慶安二年（1649年）率先在日本寫出了《七書諺解》。前此，林羅山於寬永三年（1626年）奉德川家光之命著述的《孫子諺解》，對於推動日本的《孫子兵法》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傳播《孫子兵法》史上被認爲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2.北條氏長（1609～1670） 出生于慶長十四年的北條氏長在日本的《孫子兵法》研究者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爲他不僅研究了世間常見的《孫子兵法》，即日本所稱的《今文孫子》，而且他還是鮮爲人知的《古文孫子》的研究者。其所著《孫子外傳》就是對《古文孫子》的注釋。氏長在掌握了甲州派兵法之後，獨創了一個新的流派——北條派，從而與同樣在甲州派之中開創出山鹿派的山鹿素行齊名。佐藤堅司認爲，“日本研究《孫子兵法》自北條氏長以來，才真正步入正軌”。所謂《古文孫子》，北條氏長在其《孫子外傳·序》中說：“近視古文《孫子兵法》一編。以其爲禁秘之書，故諱言出處。”他還評論說：“蓋魏武、李靖之輩，不觀此本者歟？”他以爲魏武注《孫子兵法》不外乎是今文《孫子兵法》。而現在日本能夠見到的古文《孫子兵法》，是嘉永四年（1851年）秋由仙台藩士櫻田迪（子惠）校點刻印的，濟美館藏板。作序者稱，此櫻田本“爲魏武以前之書無疑”。此外，北條在其所著《士鑿用法》中引用了整篇的《孫子兵法》原文，特別是對《用間篇》作了詳盡而精闢的解釋。他深知以“用間”得出“知外”的要訣，進而提出“用間行人者，知外治內法也”。對該篇中的“先知者”與“上智之間”的內在聯繫，分析入微，注釋透徹，以至北條氏長在《用間篇》中文正文之前加了一小段日文譯文，並用了1830個漢字來說明“上智之間”。他視《孫子兵法》全書爲兵法思想的整體，將首尾兩篇有機地聯繫起來加以評論：“孫子之十三篇，終之用間者，非輕之也，益重之也。凡用戰者，知敵情。不知其情者，不可全勝，故必用間之義也。”

3.山鹿素行（1622～1685） 在日本被奉爲文武兼備、智勇雙全的戰爭哲學

家，堪與孫子和克勞塞維茨齊名。其所著《孫子諺義》是注釋《今文孫子》的佳作，也是第一個將“十三篇”作為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加以闡述：“愚謂，《始計》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綱大要也。《作戰》、《謀攻》者次之，兵爭在戰與攻也，戰攻相通，以形制虛實，是所以《軍形》、《兵勢》、《虛實》並次，此三篇全在知己。治己而後可軍爭，軍爭有變有行，故《軍爭》、《九變》、《行軍》次之，是料敵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時日者，天也。自《始計》迄修功未嘗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間》於篇末，三軍所恃而動也。然乃《始計》、《用間》二篇，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綱領，軍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戰》、《謀攻》可通讀；《形勢》、《虛實》一串也；《爭》、《變》、《行軍》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計》、《用間》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勢。文章之奇，不求自有無窮之妙，謀者不可忽。”此外，山鹿素行對《孫子兵法》中的慎戰思想及計謀權變等重大原則剖析有力，具有真知灼見。例如，將開卷的“兵”字解釋為“軍旅”即“戰爭”；將“詭道”視為臨戰應敵時順其形勢採取的靈活作戰手段，所謂“聖人用兵之際，亦必用詭詐。不然，戰必敗也”。

#### 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世紀至19世紀(3)

4.新井白石（1657～1725）其著作頗多，在日本史學史方面佔有很高的地位。所著《孫武兵法擇》和《孫武兵法擇副言》，不僅是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經典著作，而且在日本史學史上達到了新的高峰。白石研究《孫子兵法》的最大特點是，從《管子》中找到了二十多處《孫子兵法》的典據，除《火攻》、《用間》外，幾乎每篇都找出了這類和重要典據。他以《孫子兵法》頭三篇的用語與《管子》作對比，以便讓人瞭解《孫子兵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繼承發展了《管子》的思想。新井白石還在《形》、《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及《九地》諸篇中，進一步發現孫武採用《管子》的典據。從而得出結論：“管子之言，比之孫武，其詞簡，而其義盡矣。”

5.吉田松陰（1830～1859）日本明治維新之前最後一個最傑出的《孫子兵法》研究者。在拿破崙戰爭席捲整個歐洲的那個時代，松陰從很早就開始注意西方的用兵之術。他廣采博收，自幼學習《孫子兵法》，師承山鹿派兵法，並有重大發展。松陰認為武教的核心在於謀略、智略、計策和戰法。他在《武教全書》中指出：“謀略者，乃正心養氣，使攻城、立陣和主備均合其理。”即孫子所說“經之以五事”。“智略者，乃知外而謀事”，即孫子所說“校之以七計”。“計策者，乃設謀制勝，或用間，或納叛，依情而審虛實，易勝之法也。”即孫子所說“兵者，詭道也”。他認為，兵法的妙用雖有千變萬化，蓋不出此三本——謀略、智略、計策。顯然，他對兵法“三本”之一的“計策”即“詭道”，是從戰術的角度和高度加以闡述，以便為爭取全勝創造有利的條件。對《孫子兵法》素有研究的吉田松陰，在其《孫子評注》的注釋中，自稱“余深得孫子之妙”。他高度概括了《計篇》的“三綱領”。認為“五事以經諸內，計以較諸外，詭道以

佐諸外”。而對終篇的《用間》，他推崇備至，評價極高：“（《用間》）是‘十三篇’結局，遙應《始計》。蓋孫子本意，在知彼知己。知己篇篇評之，知彼密訣在《用間》。一間用，而萬情見矣，七計立矣。孫子開篇言計，終篇言間，非間何以爲計，非計何以爲間。間、計二事，可以始終十三篇矣。……按間者，兵之要，三軍之所以恃而動也。然必也上智如伊呂，而其君又如湯武，然後大功可至矣。下愚幽囚，妄談間事，心甚慚焉。嘗所著《幽囚錄》一書，略見其意也。”吉田松陰對《孫子·用間篇》崇拜得五體投地，幾乎達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對當時日本的鎖國政策所造成的國人無知狀況，深惡痛絕。提出要“下田踏海”，即要從靜岡縣東南的下田港口出發，航海去歐美各國以及澳大利亞、中國、朝鮮等海外國家，以考察實情。在吉田松陰提出“下田踏海”主張後四年，因企圖搭乘佩里準將的軍艦去美國，觸犯了禁令而被囚於獲野山獄。其《幽囚錄》一書就是在獄中所寫。1859年，吉田松陰因爲密謀刺殺幕府被處死，時年29歲。但深受其影響的人繼承其遺志，成爲推動明治維新的骨幹力量。其中包括“木戶孝允，推翻封建制度的重要人物；伊藤博文，明治憲法的制訂人；山縣有朋，日本現代軍隊之父”等。

三、迄19世紀末，日本千餘年來研究《孫子兵法》的特點表現爲：初期有神秘主義色彩；江戶時代空前活躍，成果巨大；日本的兵家、武士及學者高度重視在實踐中研究與運用《孫子兵法》

明治維新促進了日本向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在國內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浪潮。從明治時代初期開始，在日本陸軍中掀起過研究克勞塞維茨的熱潮。儘管如此，日本國內對《孫子兵法》的研究並未中斷，軍界的兵學思想仍然植根於“和、漢、洋”之中，即大和民族的傳統與中國的兵法以及西洋戰術技術相互結合。在19世紀末期與20世紀初的戰事中，《孫子兵法》對日本的軍事行動影響很大。例如，日本帝國大學主講包括《孫子兵法》在內的中國經典著作的教授山安介（1829~1896），對後來擔任要職的學生有所影響，其中包括乃木陸軍上將和東鄉海軍上將，後者是日俄海戰中的勝利者。

迄19世紀末，一千多年來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主要特點如下：

（一）《孫子兵法》傳入日本之初，就以“兵法要訣”在戰爭中被運用，並以秘密圖書珍藏於朝廷兵家。儘管受到兵陰陽學流傳的干擾，中國兵學被蒙上神秘的色彩，但《孫子兵法》文本的保存與傳承並未受到大的影響。在11世紀，《孫子兵法》傳到了大江匡房手裡，相傳此後傳到源義家、源義光兄弟，再從義光傳到甲州武田源氏。經過武田信玄的應用與宣揚，《孫子兵法》與日本的甲州派兵家融合。德川家康繼承了該流派，在江戶時代又得到山鹿素行等人的發展，甲州派或武田派實際上已成爲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主流學派。江戶時代兵學流派紛呈，有利於學術的繁榮，促進了《孫子兵法》的研究工作。

（二）在德川家康開創的江戶時代，日本對《孫子兵法》的研究空前活躍，人才輩出，出版有關《孫子兵法》的著作如雨後春筍，形成了日本歷史上研究《孫子兵法》的鼎盛時期。慶長十一年（1606年），日本出版了木刻活字版的《武經

七書》，從此研究《孫子兵法》在日本蔚然成風。德川家康為提高官兵的軍事素質，還下令專門出版《孫子兵法》用作軍訓教材。到德川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51～1680）時期，第一個日譯本《孫子兵法》付梓問世，進一步推動了《孫子兵法》在日本的普及與傳播。與此同時，日本學者與兵家仍不遺餘力地保存、引進及出版漢文原作的《孫子兵法》與其他兵書。迄今為止，在日本保存著不少完整的《孫子兵法》版本。例如，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宋刊本《武經七書》二十五卷三冊，該書列入靜嘉堂文庫在日本出版。又如，日本刊本的明崇禎九年（1636年）莆田黃獻臣（皇肱）輯《武經開宗》十四卷七冊，其中首先的內容是《孫子兵法》二卷。再如，日本寬文辛醜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日本嵩山堂刊本明張居正（泰嶽）輯注《武經七書》七卷，以及日本文金堂刻本張居正輯著、清汪淇纂《武經直解開宗》合參七卷五冊。此外，還有日本寬文（清康熙）須原屋茂兵衛等刻本明茅元儀輯《武備志》二百四十卷八十一冊；日本寬永二十年（1643年）刻本明劉寅解《武經直解七種》；日本文久癸亥年（清同治二年，1863年）亦西齋刊本明趙本學（虛舟）著《趙注孫子》五卷四冊；日本刊本清孫星衍等輯校《孫子十家注》十三卷二冊等。日本國內刊印和保存的《孫子兵法》版本，尤其是武經系列的《孫子兵法》，反過來為我國研究《孫子兵法》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版本，開拓了研究者的視野。例如，20世紀初，上海中華學藝社率先輯印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宋本《武經七書》，列為該學藝社輯印古書之十二。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列為商務印書館的《續古逸叢書》之三十八。從此，武經本《孫子兵法》在中國國內得到進一步的普及。

#### 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世紀至19世紀(4)

至於日本嘉永四年（1851年）的櫻田本《孫子兵法》，作為日本保存的一個《孫子兵法》版本當然不容置疑。但若認定“為魏武以前之書”從而稱為《古文孫子》，尚需斟酌。因為櫻田本出現時間很晚，已到了江戶時代末期。櫻田迪本人在刊印《古文孫子》正文同時發表的《略解·凡例》中稱：“言傳入餘家之舊《孫子兵法》正文一冊，古文《孫子兵法》也。其自何時自何處傳來，不可得知”。更重要的是，該版本作序人昌平學校教官安積信提出的論據不足。其依據都屬推論性質：其一、安積信認為，今本的《九變篇》開篇只論述了“五事”（即“途有所不由”等五個“不”），而櫻田本則論述了《軍爭篇》末“高陵勿向”等“九個“勿”（最後一個取自該篇中的“絕地無留”），這與孫武在《九地篇》中開宗明義地論及“九”種“地”完全一致。因此，櫻田本“優於今本”。其二、今本的《用間篇》稱：“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而櫻田本則“簡練明潔”地稱：“死間者，委敵也。生間者，反報也。”因此，櫻田本“過今本遠甚”。實際上，從櫻田本的影印件分析，其篇名標題與流行的《孫子兵法》（“十一家注”和“武經”系統）相比有較大差異；其文辭與通行本極近，無本質的差異，而與漢簡相比則差異很大。一些學者認為，

從櫻田本楷書中古體字和俗體字看，這些字都是出現在六朝至唐初，以及避諱唐高祖和唐太宗的名字判斷，它可能是一本唐代本《孫子兵法》，而唐代本《孫子兵法》是從漢代古本《孫子兵法》到宋代今本《孫子兵法》過渡的關鍵。櫻田本可能就是從古代本到今本的一個過渡形態的唐代本。亦有認為其是元末明初張賁《注孫子》者。

(三) 日本的兵家、武士與學者初期視《孫子兵法》為秘密的兵法要訣，在實踐中加以運用而不外傳。戰國時代以來，在作戰中運用《孫子兵法》又有所發展。日本的兵家學者不僅善於運用《孫子兵法》謀求作戰的勝利，而且重視用其思想分析和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例如，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曾分別於 1592 年和 1597 年兩次出兵侵略朝鮮，均未得逞。豐臣也因侵朝戰敗於 1598 年 8 月積鬱而死。對這場曠日持久的日朝戰爭，日本史書稱“文祿·慶長之役”，朝鮮史書稱“壬辰倭亂”，中國史書稱“萬曆朝鮮之役”。日本兵家香西成資在其所著的《武田兵術文稿》(1674 年)一書中，結尾壓軸的一篇是“豐臣閣下擊朝鮮國論”，正文用漢文寫成，共 4600 餘字，對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之役作了嚴厲的批評。主要有兩點：其一、以寡擊眾。在出兵遠征中，違背了也做不到《孫子·謀攻篇》所說的“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其結局只能是“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其二、久暴師於外邦。認為“秀吉的出征之舉是無謀之舉”，遠伐大明國是“以小國之力，擊大國之欠也”；何況久暴師于遼遠之外邦，貽害更甚。顯然，香西成資充分領會了《孫子兵法·作戰篇》的“久暴師則國用不足”的含義，否定了豐臣秀吉的持久作戰。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歷代的兵家、武士、學者以及軍界在研究《孫子兵法》時都十分重視《用間篇》。從德川家康、林羅山到吉田松陰、恩田仰嶽，歷代的兵家學者都注意在全面理解《孫子兵法》的基礎上，對該篇作了重點研究。深刻瞭解“先知者，必取於人”和“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的道理。正如山鹿素行所說：“上古之聖人，用上智之大賢，洞察敵國之情而天下興也”。崇尚“用間”已成為日本兵學的傳統之一，在明治以後這一傳統又與西方情報學相結合。日本政府和軍界不惜人力財力加強其間諜情報事業，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戰爭中取得勝利。

四、1772 年法國傳教士阿米奧將《孫子兵法》譯成法文並在巴黎出版，法譯本成為第一個西方文字的《孫子兵法》文本

由於地理和歷史等種種原因，《孫子兵法》傳入西方的時間比傳往東瀛的時間晚了千餘年。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才由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阿米奧譯成法文，並在巴黎出版。從此開啓了《孫子兵法》在西方傳播的歷程。

阿米奧的全名是讓·約瑟夫·瑪麗·阿米奧（Jean Joseph Marie Amoit）（1718～1793），中文的名字是錢德明，別名錢遵道，字若瑟。法國耶穌會士。1750 年（乾隆十五年）奉派來華，先到澳門，然後轉赴北京。因通曉滿、漢語文，深獲乾隆帝信任，賜氏職，居北京 42 年，從事學術研究。他介紹許多中國情況給西方，其著作大都見於《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錄》十六

卷(1776~1814)叢書中。錢氏還編有一部《韃靼滿法字典》三卷(1789~1790)。

阿米奧之所以要翻譯《孫子兵法》，是因為“奉當時國王路易十五的一名大臣貝爾東(M. Berton)的指示”。阿米奧在接到指示後，開始搜集材料。後來，他的一位朋友(可能是一名中國教徒)在幾名被貶黜革職的滿清官員的財產拍賣時，買到了一本滿文手抄本的《武經七書》。由於阿米奧精通漢、滿兩種文字，這對他使用漢文版本與滿文抄本相互對照翻譯《孫子兵法》帶來很大益處。1772年在他完成翻譯之後，巴黎迪多出版公司出版了阿米奧的《孫子兵法》法譯本。在這一珍貴版本的扉頁上寫著：“中國兵法 西元前中國將領們撰寫的古代戰爭論文集 凡想成為軍官者都必須接受以本書為主要內容的考試 附：當今皇帝的父親雍正皇帝對部隊提出的‘十誠’；有關中國軍隊操練、演變、服裝、軍隊和軍事裝備的板畫插圖。本書由在北京的傳教士阿米奧譯成法文，由德居尼先生校審和出版發行。”

傳入外國的初始時期--7世紀至19世紀(5)

《孫子兵法》的法譯本一經問世，立刻引起人們的注意，在當時的法國文學刊物上受到好評。有的評論家甚至說，在《孫子兵法》裡他發現了色諾芬、波利比尤斯和德·薩克斯筆下所表現的那一偉大藝術的全部原理。他認為，如果這一傑作能成為培養法國將領和軍官的教材，那將大有益於法國。因此特別希望，年青的法國貴族認真閱讀這位真正的將軍(孫武)的著作。同年(1772年)7月號的法文《新聞精神》和《特雷武回憶錄》兩種雜誌刊登了《孫子兵法》的內容摘要。10年後，即1782年，經法國國王特許批准，尼昂出版公司出版了《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錄》叢書，阿米奧的譯文作為叢書第七卷重新出版。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法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席捲了整個歐洲，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受到影響。“到19世紀，中國의思想和物品在法國沒有18世紀那麼流行。法國革命後到1900年這一段時間沒有人再提到孫子。1900年8月，法國前駐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在《新評論》上發表文章，強調需要重新研究中國古代軍事作家：‘今天和過去一樣，必須通過研究古代兵法家弄清中國官員的謀略。’”

阿米奧的法譯本開創了西譯《孫子兵法》的先河，幾百年來，法國保留了這個本子，從沒有修改過，也沒有新的譯本問世。但這並不說明該譯本足以永久流傳，因為其譯文有很多不足。誠然如錢氏在其“譯者的話”中所說：“於是我決定不逐字逐句翻譯，而是要表達出中國最優秀的兵法家的戰爭思想。在解釋他們的軍事原則時，我盡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他們原來的風格，又照顧到我們自己的語言；同時撥開比喻、模稜兩可、晦澀難懂的語言等層層迷霧，把這些迷霧籠罩下的思想講得清楚明白一些。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參考了前面提到的韃靼語手抄本，而且參考中國古代的和現代的注釋。”由於背離了翻譯以“信”為先的原則，錢氏在很多處將評注者的話與孫子的原文攪在一起，更不可取的是，譯者將傳教士的看法摻雜到譯文裡。結果搞出來的東西既不是翻譯，又不是完全正確的

解釋。英國的漢學家、《孫子兵法》的英譯者賈爾斯（Lionel Giles 1875~1958）認為，該書《勢》篇開頭一段的法譯文與原文（包括“分數”、“形名”、“奇正”、“虛實”等概念）的意思相去甚遠，以至尖銳地抨擊這位博學的、當時頗享盛譽的法國漢學家，指出：“阿米奧的所謂的《孫子兵法》譯本如與原文對照，馬上就可看出不啻是虛妄之作。因為譯文中有大量不是孫子所寫的原話，而孫子原話卻寥寥無幾。”

迄 19 世紀末，在西方文字中除法文譯本外，還有《孫子兵法》俄文譯本。1860 年（咸豐十年），俄國漢學家斯列茲涅夫斯基把《孫子兵法》譯成俄文，書名是《中國將軍對部將的訓示》。1889 年（光緒十五年），普佳塔教授撰寫了有關《孫子兵法》內容的“中國古代將帥戰略戰術原則”，刊載在俄國出版的《亞洲地理、地志和統計資料手冊》上。

## 12.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

20 世紀是充滿著戰爭、革命和改革的時代，也是人類社會空前發展與繁榮的時代。在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 40 餘年的“冷戰”之後，和平與發展已成爲“冷戰後”和新世紀的主旋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高科技、資訊網路技術的大發展使得人們相互間的交流與往來更加便捷和密切。

###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1)

#### 《孫子兵法》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

一、20 世紀初《孫子兵法》英譯本相繼問世，其中賈爾斯的譯本成爲西方文字譯本的佳作；該世紀上半葉日本出版了較多的《孫子兵法》注釋本

1905 年，日本東京出版了英國皇家野戰炮兵上尉卡爾斯羅普（E. F. Calthrop）翻譯的《孫子兵法》。這個首版英譯本依據的是日文版的《孫子兵法》。當時卡爾斯羅普是在日本學習語言，他在翻譯過程中得到日本人的大力幫助。對該譯本，卡爾斯羅普自己坦率地承認，沒有兩位日本先生的幫助，就不可能有這個譯本。漢學家賈爾斯指出，正由於是在日本人幫助下完成的翻譯，這個譯本才會如此糟糕。整個作品充滿著令人苦惱的日本味道，書名是日語拼法的“孫子”（Sonshi），連闔閭和孫武都扮成了日本的帝王將相。這個譯本不單是有嚴重錯誤的問題，因爲誰都無法完全避免。問題是省略和脫漏比比皆是，艱難的字句被任意曲解或一帶而過，而這類過錯是難以寬恕的。在任何一種希臘或拉丁經典版本中都不能容忍這類錯誤，翻譯中文經典作品應當堅持同樣的忠實于原文的標準。

1908 年，卡爾斯羅普上尉重新翻譯出版了《孫子兵法》英譯本。這一版本是由倫敦約翰·默萊公司出版，愛丁堡出版社印刷。該書的封面書名標題爲《兵書》，副題是“遠東兵學經典”，並在譯者署名處注明“根據中文翻譯”。1908 年的英譯本包括孫武和吳起的兩部兵法，並在全書尾附加了較詳細的英文索引。從全書看，譯文比較完整，十三篇沒有重大脫漏，也再沒有受日文版本影響的明顯痕跡。譯者在其前言結尾處聲稱，“蒙 J.C. 薩默維爾少校的幫助和指正，謹表

謝意。”由於譯者與審閱者均為軍人，修改本在翻譯兵學概念和軍事用語方面，頗多可取之處。如開篇的“兵者”譯為“戰爭”；兵學概念如“形名”、“奇正”、“虛實”等都給出了較恰當的譯文，而對有的專名如“陰陽”、“距堙”等則採取音譯法，另加頁下注；在注釋中也不乏佳句，如《謀攻篇》中的“軍”、“旅”、“卒”、“伍”的軍制，解釋明確。此外，不少有關作戰方面的辭句，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等，譯文正確。儘管這個譯本有很多不完善之處和差錯，但其譯文的一些長處（包括有的篇名的譯法）可供後來的英譯者借鑒或汲取。總之，卡爾斯羅普上尉的修改版譯本的最大特點，是反映了一個英國年輕軍官對中國古典兵學的崇敬，以及他敏銳地察覺到孫吳兵法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正如他在前言的第一部分中所說，中國古代兵學傑作“主要論述戰爭的根本原則，政治與人性對軍事行動的影響；並以最卓越出眾的方式表明這些原則是如何永恆不變的”。在前言的第二部分，譯者還指出：“如今孫吳的書已讓位給歐洲作者的科學著作，但他們的話已成爲格言，而他們的影響無疑有助於日本在最近的戰爭中取得勝利。”顯然，“最近的戰爭”指的是 1904~1905 年的日俄海戰。縱觀該譯本的全部前言，可見譯者對《孫子兵法》中的要旨，特別對攻守戰取等戰法方面是有所研究的。因此，對此修改版英譯本的價值不應抹殺。

1910 年，萊昂內爾·賈爾斯（1875~1958）的《孫子兵法》英譯本問世。這個由倫敦盧紮克（LUZAC）公司出版的譯本對在西方世界中傳播《孫子兵法》的思想起到了深遠的影響。由於英譯本是嚴格按照孫星衍的《十家孫子會注》本翻譯的，其譯文忠實于原作，行文流暢，且注釋詳盡。這部在總體上達到“信、達、雅”標準的譯作，不僅第一次比較完整準確地用英文表達了孫子的兵學思想，而且爲其他西方文字翻譯《孫子兵法》奠定了基礎。萊·賈爾斯（翟林奈）生於中國，是英國領事官、漢學家老賈爾斯（翟理思）（1845~1935）之子。翟林奈於 1900 年進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負責管理東方書刊和手稿。他潛心研究漢學，除《孫子兵法》外，還譯過《論語》等書。此外還編有《欽定圖書集成（按字母順序的）索引》（1911）。

翟譯本的主要特點有三：其一，翻譯之前作了充分而細緻的學術準備，爲保證譯文品質提供了堅實可靠的基礎。其二，採取漢英對照的方法，將正文分段逐句譯出；且注釋詳盡，而所有重要的注釋除英譯外均注明中文出處。這樣就便於讀者深入瞭解原作，對於懂雙語者來說更是如此。其三，“十三篇”的譯文在忠於原作的基礎上，通順流暢，形成賈氏的獨特風格。

（一）充分的學術準備 在譯本的《前言》中，賈爾斯表示，《孫子兵法》是中國兵學之精粹，不能因翻譯不當而使“《孫子兵法》蒙塵受辱，我深感有必要爲其正名”。儘管賈氏對法譯本和 1905 年的英譯本作過嚴厲的批評，但他還是實事求是地補充說：“我知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能在前人的基礎上稍加改進”。實際上，賈譯本的第三篇篇名“謀攻”的譯法是與 1908 年英譯本相同，都用了“Attack By Stratagem”。從長達 43 頁的譯本“導論”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賈爾斯在譯《孫子兵法》過程中所下的功夫，他研究了《左傳》、《史記》、《淮南子》、《漢

書》、《吳越春秋》、《太平御覽》、《四庫全書》等大量典籍，考察了“十三篇”成書的歷史背景和孫武其人。與此同時，他還研究了中國歷代的與現存的《孫子兵法》諸版本，並對歷代注釋家的生平著作作了概述。其研究《孫子兵法》的力度、廣度和深度，無疑有助於正確理解“十三篇”的內涵，為保證總體的翻譯品質奠定了基礎。

####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2)

由於《孫子兵法》版本流變複雜，如何選好版本是譯介中國兵學經典的重要前提。賈爾斯在研究了當時中國國內各種版本後，選擇光緒三年（1877 年）重刊的孫星衍（1752~1818）《孫子十家會注》為藍本進行英譯。由於孫星衍、吳人驥刊輯的《十家注》所具有的權威性，英譯本的依據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也是為何繼賈爾斯之後的英譯《孫子兵法》都以《十家注》為藍本的道理所在，只有英譯《武經七書》中的《孫子兵法》以武經本為底本除外。

（二）採取漢英對照法 賈爾斯效法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翻譯“四書”、“五經”的做法，將《十家注》基本上按孫星衍本分段逐句譯成英文。為了保持中國古籍的傳統，注釋格式為頁下注。出於尊重原著和表示漢譯英的特點，先出中文，後出英譯文，而且中英文完整地保持在同一頁上。與理雅各略有不同的是，每段《孫子兵法》中的長句或短句都加阿拉伯數字序號，以便於西方讀者閱讀。漢英對照的譯文不僅表示了譯者忠於經典原著的精神，而且便於懂雙語者對比檢驗。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樣做也有利於國人提高對古漢語或文言文的理解力，儘管這並不是譯者的初衷。賈爾斯對《十家注》的大量注釋作了精選，篇名後正文前的題注大部被略去，或作簡要的表述。難能可貴的是，所有引自中國典籍的注釋都附上原文，使讀者易感受到注解的真切，也便於從對比中深入瞭解原作的內涵。

解釋詳盡是賈爾斯英譯本的又一特色。首先，按照中國人“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的傳統，譯者對十一個注釋家分別作了簡介，概述其主要著作以及他們對《孫子兵法》所作注釋的特點。例如，對第十一個注釋家張預，賈爾斯指出：“名列最後的注釋家可能缺少傑出的獨創性，但他獨具天賦有著令人讚歎的解釋透徹的能力，他解釋簡約的曹注增益得當，發揮自如。沒有張注可以肯定地說，很多曹注將仍然是一團迷霧，因而變得毫無價值。”有關人物的介紹，包括中國歷代學者對《孫子兵法》的評價，譯者都寫在他的“導論”中，以便讀者開卷時就有所瞭解。其次，針對“十三篇”中的兵學概念、人名、地名、古漢語辭彙等加注，大都選自《十家注》的原注，但也有譯者自己的見解。例如，《孫子兵法·作戰篇》中有一句：“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原有注釋均不得要領，譯者聯想到漢尼拔與羅馬之戰，緊扣“拙速”字義，譯成“老實笨拙地進行速戰”（*stupid haste in war*），體現了孫武的速戰思想。李贄在《孫子參同》注稱：“甯速毋久，甯拙毋巧；但能速勝，雖拙可也。”英譯文基本符合此義。再次，對於“十三篇”的各家注釋能進行綜合分析，給出恰當的譯文。例如，《勢篇》的篇名，譯者綜

合了王皙所說的“積勢之變”和張預所注的“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縱觀通篇文字，給出了“ENERGY”的譯名，表示一種動態中的勢能。又如對“奇正”的概念，譯者還參考了《武經七書》中的文字，給出了恰當的譯名（direct and indirect methods）。與此同時，賈爾斯還在整個譯本中不時對早先西方譯本的譯法多所評論，這在一般的譯注中也是罕見的。

（三）譯文嚴謹，通順流暢，自成風格。從總體上看，賈爾斯英譯本在忠於原作的基礎上達到了“信、達、雅”的標準。譯文流暢，富有韻律感，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孫子兵法》原有的文章之美。例如，《計篇》中的一小段：“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英譯文是：“The general who harkens to my counsel and acts upon it, will conquer:--let such a one be retained in command! The general who harkens not to my counsel nor acts upon it, will suffer defeat:--let such a one be dismissed!”譯句押韻，文字長短也很均衡。儘管賈爾斯對原文中“將”字的理解採納了占少數派的孟氏的注釋，這點還可斟酌。

賈爾斯的譯本被公認是一部將《孫子兵法》介紹給西方讀者的佳作，正如美國湯瑪斯·R·菲力浦斯準將於1949年重版該英譯本時撰寫的導論中所說：“賈爾斯博士的譯文語義準確，遣詞凝練生動，其他英、法文譯本在這兩方面都顯得遜色。”賈爾斯的譯本使歐洲人能更好地瞭解《孫子兵法》，如英國坎大哈伯爵羅伯茨元帥（1832~1914）曾致函給賈爾斯稱：“孫子的許多格言完全適用於現在。國人最好記住他的話：‘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然而，賈爾斯的譯本也有不盡完善之處，缺點至少有兩點：其一，開卷的頭兩個字“兵者”被譯成“兵法”（art of war），顯然失之偏頗。這可能是譯者故意避開原先的法譯本和英譯本的譯法，儘管它們都已正確地譯為“戰爭”。因為賈爾斯在翻譯杜牧評《孫子兵法》時所說的“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之句，就將“兵者”正確地譯為“戰爭”（war）。其二，對原先的西文譯本過於苛求，在評論中有時尖刻有餘，切磋不足，這或許是一個重要的缺點。正如美國撒母耳·B·格裡菲思準將在其《孫子兵法》英譯本的附錄中所說：“如果這位著名的東方學專家不把筆墨浪費在貶低卡爾斯羅普的譯著上，而專心致志于自己的翻譯，他的譯著想必會更上一層樓。”

###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世紀(3)

1910年，德國的布魯諾·那瓦勒（Bruno Navarra）把孫子的“十三篇”譯成德文，書名是《中國古典兵家論戰爭的書》，但此書並未在德國軍方產生多大影響。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此書已告闕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有兩本《孫子兵法》的英譯本在國外問世。分別由馬切爾—科克斯（E. Machell—Cox）和薩德勒（A. L. Sadler）教授所譯。因戰時條件困難，譯得倉促，品質都不盡令人滿意，發行量都不大。與此同時，中國鄭麟翻譯的第一個《孫子兵法》英譯本

也告問世，此書作為英譯先秦群經諸子叢書之一於 1945 年在重慶出版，1946 年在上海再版。其英譯藍本是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之一的《孫子十家注》。

在 20 世紀上半葉，日本對《孫子兵法》的研究著作仍然不斷付梓問世，文人學者和軍人學者的著述都有。例如，阿多俊介著《孫子之新研究》（1930），北村佳逸著《孫子解說》（1934），尾川敬二著《孫子論講》（1934），公田連太郎譯、大場彌平講解的《孫子之兵法》（1935），藤塚鄰、森西洲合著《孫子新釋》（1943）。其中，《孫子之新研究》一書在十年內再版重印了 4 次。作者積十年的心血才寫成此書，其內容的主要特點是，結合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實並對照德國戈爾茨元帥的《全民皆兵》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評述《孫子兵法》。《孫子解說》一書是通過哲學加以解釋；《孫子之兵法》一書則是通過各國戰史加以說明；而《孫子新釋》一書最引人注目，該書長達 659 頁，內容分為孫子概說、孫子講讀、孫子原文等；第一部分孫子概說是由（上）緒言、（中）《孫子兵法》的結構、（下）《孫子兵法》的內容等構成的多達 170 頁的著作。

在 20 世紀初的日俄戰爭（1904~1905）中，日本海軍上將東鄉平八郎以善於運用《孫子兵法》著稱，首先做到“知彼知己”，通過日本的情報機構和偵察手段，掌握了羅日傑斯特溫斯基海軍上將率領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情況。對俄國艦隊的組成、實力、航程細節和艦隻性能乃至官兵士氣都瞭若指掌。其次，“以逸待勞”，預先集結兵力於設伏海域，用 99 艘日艦在對馬海峽攔截由 38 艘艦艇組成的俄國艦隊，終於在 1905 年 5 月 27 日一舉殲滅了俄國艦隊，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日軍侵佔了大部分中國領土，並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成功地偷襲珍珠港，以“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突襲手段取得了戰役和戰術上的勝利，但同時也犯下了致命的戰略上的錯誤。戰後日本的著名《孫子兵法》學家佐藤堅司在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作戰要務令》（1938）時，指出編纂《作戰要務令》的軍官大概沒有讀過《孫子兵法》，而是著重于應用克勞塞維茨的“相對優勢”理論，他說：“日本的戰敗以切身的體驗證實了《孫子兵法》的價值。不僅如此，與《管子》‘至善不戰’（《幼官八》）相同的《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謀攻篇》），在不戰主義和全勝主義方面，在戰爭只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進行這一點上，是超越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之上的。”美國研究《孫子兵法》的軍人學者格裡菲思在其《孫子對日本軍事思想的影響》一文中，也評論說：“雖然日本人孜孜不倦地研究孫子，但他們對孫子的理解仍是膚淺的；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講，他們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他們的廟算不是客觀的，同時他們還忘卻了孟子的至理名言：‘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顯而易見，外國的學者以“成敗”論 20 世紀上半葉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狀況，這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學術研究方法。

二、20 世紀下半葉，美國出版了多種不同的《孫子兵法》英譯本，其中格裡菲思的英譯本影響最大，索耶所譯《武經七書》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兵學；俄、德等文字的譯本也紛紛出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初期，美國軍事出版界連續出版發行了《孫子兵

法》的英譯本，當時採用的仍是賈爾斯的譯本，只是刪去了全部漢語及大部分考證性的注釋，只保留有軍事價值的注釋，並由湯瑪斯·菲利浦斯準將撰寫長篇“導論”。美國哈里斯堡軍事出版公司曾分別於 1944 年、1949 年和 1953 年出版發行了這個英譯本，從而促進了美國軍界對《孫子兵法》的重視和研究。但隨著戰後形勢的急劇變化，時代需要新的《孫子兵法》英譯本來替代或補充 20 世紀初的譯本，因為賈爾斯譯文中的錯誤與不足需要訂正，其文采也顯得“古色古香”，有的英語辭彙已經過時。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撒母耳·B·格裡菲思（Samuel B. Griffith）根據孫星衍《十家會注》重新翻譯的《孫子兵法》英譯本終於在 1963 年由牛津出版社付梓。在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湯瑪斯·克利裡（Thomas Cleary）又重新翻譯並出版了另一《孫子兵法》英譯本，以及夏威夷大學羅傑·埃姆斯（Roger Ames）的新譯本，同時，紐約斯特林出版社出版了陶漢章著《孫子兵法概論》的英譯本。90 年代以來，至少又有一個英譯本在美國問世，那就是拉爾夫·索耶所譯《武經七書》中的《孫子兵法》文本。在 70 年代末經英國亞洲家世小說家詹姆斯·克拉維爾（James Clavell）推崇與贊助，再度出版賈爾斯的《孫子兵法》英譯本，並將其分別轉譯成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自費在歐洲出版。早在 1955 年，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出版了西多連科中校所譯的《孫子兵法》俄文譯本，隨後又被轉譯成德文。在整個 20 世紀下半葉，《孫子兵法》的西文文本以美國的英譯本為主，呈現了其他多種西方文本陸續問世的格局。

####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4)

（一）格裡菲思英譯本 譯者撒母耳·格裡菲思於 1906 年出生於美國匹茲堡，1929 年從美國海軍軍校畢業後為海軍陸戰隊少尉，1956 年晉升至準將。早在 30 年代後期被派往北平學習漢語，在此期間他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發生興趣，隨後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論《遊擊戰》。1946 年至 1947 年，他受第七艦隊之調遣來華繼續學習漢語。50 年代，美國軍事思想突出核威懾而忽視局部戰爭經驗和海軍陸戰隊的作用。對此格裡菲思深有感觸，決心為海軍陸戰隊尋求對付遊擊戰和小規模戰爭的“正確作戰方針”。他認為遊擊戰理論之源是《孫子兵法》。1961 年，在他 52 歲時被牛津大學授予博士學位，主修科目是中國軍事，並從事翻譯《孫子兵法》工作。顯然，格裡菲思翻譯《孫子兵法》的動因與他畢生研究遊擊戰理論和美國陸戰隊軍事思想有關，同時不滿足賈爾斯的譯文，也是一個原因。1963 年英國牛津出版其英譯本，當時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中國代表作叢書》，並在以後的歲月裡作為叢書之一多次出版發行。格譯本主要有三個特點。其一，中國古代軍事術語譯得較好，譯文富有軍事特色。例如，開篇的“兵者”訂正了賈爾斯的錯譯；其他軍語譯得也較準確，包括古代中國軍制、兵器等。其二，凝聚了譯者畢生尤其晚年時期研究《孫子兵法》的心血。除“十三篇”正文加注外，全書包含了較豐富的有關中國古代戰爭和《孫子兵法》在世界上影響等其他方面的學術內容。其“前言”和“導論”涵蓋了孫武其人、孫子時代的戰爭、孫子論戰爭、孫子與毛澤東等內容。附錄部分有《吳子》英譯文、《孫子對日本軍事思

想的影響》等 4 個專論，所有這些都值得一讀。其三，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1895～1970）爲此書作了精彩的序言。利德爾-哈特指出：“《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名著，其內容之博大，論述之精深，後世無出其右者。……與《戰爭論》相比，孫子的文章講得更透徹，更深刻，永遠給人以新鮮感。”在回顧個人學習《孫子兵法》體會時，利德爾-哈特就格裡菲思英譯本的意義作了這樣的概括：“人們早就感到需要一種《孫子兵法》的新譯本，更完整、更準確地解釋孫子的思想。在可能導致人類自相殘殺和種族滅絕的核武器研製成功以後，這種需要更爲迫切。鑒於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重新成爲一個軍事大國，出版這樣一種新譯版本的《孫子兵法》就更爲重要。”無疑，利德爾-哈特的序言不僅爲新的英譯本的問世造成聲勢，而且有力地促進了西方人士尤其是美國軍界人士對《孫子兵法》學習與研究的重視。例如，美國著名專欄作家 J.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在讀過該譯本後曾在其全國性的報紙專欄文章中多次讚揚該書；當時的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將領與反叛亂高級參謀官都讀過這本英譯的《孫子兵法》，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在讀後還將美國總統 L.詹森（Lyndon Johnson）1965 年春季行動的某些做法與孫子的論點進行比較，甚至連駐越美軍司令 W.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上將也抽時間研究孫子的名言，並思考孫子的思想與武元甲、毛澤東思想之間的聯繫。“格裡菲思的《孫子兵法》譯本促使美國領導人瞭解越南的革命戰爭，這是任何其他書籍望塵莫及的”。

儘管格裡菲思英譯本有其特色而且影響廣泛和深遠，但該譯本也有其嚴重的不足之處。缺點至少有三個方面：其一，自《軍爭篇》起沒有嚴格按照《十家會注》逐字逐句翻譯，在《軍爭》、《行軍》、《九地》諸篇中，多處隨意刪節和挪動，使譯文和原文相去甚遠，以致面目全非。其二，漏譯之處屢見不鮮，小的如個別譯句編號脫漏，大的如重要的句子漏譯。例如，《九地篇》中表述孫子反對迷信思想的兩句重要的話：“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竟被刪去；《火攻篇》末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其中後面的兩句也漏譯了。其三，有的篇名譯法欠妥，更爲突出的是正文中譯錯之處不少。多數是沒有弄懂原句就落筆翻譯，結果不是搞錯原意就是詞不達意。例如，《謀攻篇》中談用兵之法的最後兩句：“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被簡單地譯成：“for a small force is but booty for one more powerful”。譯者還注明，“小敵之堅”是指“小股部隊的實力，即其武器裝備。”而“堅”字分明是“堅守硬拼”之意。從全書看，譯者在前面幾章還是下功夫的，但越到後面譯文的失誤越多，顯得虎頭蛇尾。造成這類錯誤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格裡菲思的漢學功底不足，在這方面無法與賈爾斯相比。到了 1965 年，即其英譯本出版後的第三年，格裡菲思還讀不懂“以夷制夷”的成語。在 1968 年，他甚至向美國海軍陸戰口述歷史計畫人員說：“我一點也不想恢復認識漢字，我決不費心勞神了。”顯然格裡菲思無意再修改完善其譯本，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依然照舊發行，以致這個先天不足的譯本至今仍在廣爲流傳。

（二）80 年代的英譯本 1987 年，紐約斯特林出版公司出版了陶漢章著《孫

子兵法概論》的英譯本。封面的英文名稱《孫子兵法》兩側各有一個漢字“帝”，副題是“現代中國的解釋”，譯者為外交學院副教授袁士楨。該英譯本以 1985 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原作為藍本，主要內容是作者根據其戰場指揮經驗與課堂教學資料，對“十三篇”作出解釋和論述，在《導言》中還概述了劉伯承元帥論《孫子兵法》的精闢見解。譯文比格裡菲思的譯文有所改進，但未能完全擺脫其影響，如個別篇名譯法欠確切，在《謀攻》、《九地》、《火攻》等篇譯文中的一些脫漏現象和翻譯錯誤依然沒有訂正。由於中國軍內人士的著作譯本在國外出版實屬罕見，該譯本儘管印數不多，在國外還是有一定影響的。

####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5)

1988 年，美國哈佛大學學者湯瑪斯·克利裡（Thomas Cleary）翻譯出版了另一個新的《孫子兵法》英譯本。克利裡的譯本被列入美國“桑巴拉龍版”

（Shambhala Dragon Editions）叢書的道家著作類。譯者在其序言中聲稱：“我認為，瞭解《孫子兵法》的道家要旨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這部戰略經典著作不僅充滿著偉大的道家作品諸如《易經》和《道德經》的思想，而且它揭示了道家的基本原理乃是所有中國傳統武學兵經的最終之源。更有甚者，儘管《孫子兵法》在陳述原理方面無與倫比，但探索其戰略實踐的深奧底蘊之關鍵則取決於道家專注的心理展現。”譯者還在長達 40 頁的《導論》中首先用大量的篇幅將《孫子兵法》與《道德經》作比較。他將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與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和“無為”相聯繫。在《導論》的最後部分，有著 20 年翻譯經驗的克利裡還深有感慨地談到譯事之艱辛，他認為一部內容豐富的東方經典“至少會有三種可能的譯法”，而他翻譯《孫子兵法》方法的技術目標是，使譯本達到“血肉透明、骨骼鮮明”，“再創作一部富於讀者個人生活情景色彩的抽象之作”。為此，譯文中刪去了“次要內容的有關句子，諸如中國古代兵器”。

其實，譯者為了突出“骨骼”（道家思想），刪去的不止是“古代兵器”。例如，《計篇》的譯文中刪掉了“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一段。再如，《作戰篇》開頭一整段被刪去。又如，《用間篇》開頭描述戰爭影響的一段被壓縮成一句英譯文，完全忽略了《孫子兵法》所述實施“井田制”的時代背景。因此克利裡的英譯本不是嚴格的《孫子兵法》足本。從根本上說，將兵家經典列入道家著作也失之片面。譯者把孫子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與老子強調的“不戰”、“不爭”相比附也不恰當，因為孫子為了“屈人之兵”並不反對“伐兵”和“攻城”，這與老子宣導的“不爭而善勝”相去甚遠。雖然老子的“道”與孫子的“兵”有某些相似或共通之處，但就其實質而言，畢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和治世方略。至於譯本《導論》中談及的《孫子兵法》保留著的道家哲學內核及其可能的反戰思想，這個觀點也需商榷。因為《孫子兵法》強調的是“慎戰”與“全勝”，是一部探討智勝謀略和攻戰取勝的兵家經典，並不是一本反戰的典籍。儘管克利裡的譯本並非足本，但有其突出的優點，主要是譯文簡潔流暢，注釋得當，在篇名的譯法上也有新意。這個譯本在西方有其影響力。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不少西方學者在學術論文或著作援引克利裡的譯句，就是明證。

必須提及，經美國作家詹姆斯·克拉維爾（James Clavell）編輯和作序的賈爾斯英譯本在 80 年代曾先後連續 10 次出版發行，促進了《孫子兵法》在西方的傳播。80 年代的賈爾斯版重印本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軍事出版社再版的本子有相同之處，但也有差別。相同之處是，兩者都刪去了漢字及大量的注釋，加進編者簡要的評注，同時也各自寫出序言和長篇的導論。然而由於編者的軍人職務與文人身分的差異，各自注釋的要點不盡相同，導論的內容則差別更大。戰後版的評注完全立足於軍事的觀點，在“十三篇”正文的英譯文內不時加進一些提綱挈領式的小標題或“眉批”。例如，在《作戰篇》的“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的句子後，標出“閃擊戰”的字樣；《虛實篇》的“夫兵形象水”一段之前，小標題為“戰術是變動的”；《軍爭篇》的“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一段之前，標明“預則立”；以及在末篇中分別標明“間諜的分類”、“間諜的方法”和“用間的目的與目標”等。而 80 年代版的注釋則大不相同，編者克拉維爾更著重于人文的觀點，致力於解釋的通俗性，使《孫子兵法》更易被西方讀者所接受。其主要特點：**1.**注釋少而精，篇中要點的解釋簡明扼要；篇末所選的最後一個注釋往往能對全篇內容的概括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例如，《九地篇》後段：“踐墨隨敵，以決戰事。”編者概括了賈林的話，改寫為：“捨棄陳規。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為。”再如，《謀攻篇》末的注釋只保留了張預的兩句話：“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這樣有助於讀者瞭解“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原理。又如《勢篇》末，編者精選了《通典》的評點：“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從而將《勢篇》的中心意思勾勒清楚。**2.**對原作文字所涵蓋的歷史背景作出必要的說明，以及在簡化的十一家的原注中，作適當的增益以便西方讀者看懂。例如，《謀攻篇》中“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句之後，編者保留了賈爾斯的原有注釋，提醒讀者注意中國在春秋末期群雄割據的局面，破壞敵人的聯盟具有重大的意義。再如，《形篇》中“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之句，注釋只選用了何氏注，並簡化為三句：“烏獲舉千鈞之鼎，離朱百步睹纖芥之物，盲人音樂家師曠聽蚊行蟻步聲。”其中對師曠其人指出是盲人樂師。**3.**選擇既有意義又有情節的史實作注釋。例如，《勢篇》中“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注釋只取杜牧所舉的“馬陵道之戰”，介紹了孫臏的滅灶法引誘龐涓進軍遭伏擊身亡，用有情節的注釋以饜讀者。**4.**選用西方熟知的將帥或戰爭史實來注釋《孫子兵法》中的概念和辭句。例如，《用間篇》中“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編者指出英國鐵騎軍統帥克倫威爾善於用間，充分獲知敵情而取勝，是“人君之寶”。總之，克拉維爾在編輯重版賈爾斯譯本時對原譯本中的大量注釋作了精選，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必要的改寫，使之簡明扼要，與正文的搭配更加得當。從 1981 年至 1988 年，這個英譯本已印刷發行了 10 次。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6)

克拉維爾對《孫子兵法》情有獨鍾，他認為《孫子兵法》是為子孫後代求生存、謀和平的經典之作。在其所編英譯本的長篇導論中，克拉維爾熱情謳歌《孫子兵法》，指出：“孫子在 2500 年前寫下了這部在中國歷史上奇絕非凡的著作”，並真誠地希望大家要愛讀這部書，“我希望，《孫子兵法》成為自由世界裡所有的現役官兵，所有的政治家和政府工作人員，所有的高中和大學學生的必讀材料。……我強烈地認為，《孫子兵法》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它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保護，看著我們的孩子和平茁壯地成長。永遠記著，從古時起，人們知道：‘戰爭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克拉維爾對《孫子兵法》的酷愛並非文人墨客的心血來潮，也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推崇，如鄭厚在《藝圃折衷》中所言：“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人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用也。”克拉維爾從其切身體會中，尤其是反思二戰期間的戰俘經歷，領會到孫子的偉大智慧。這位美國籍的作家、亞洲家世小說家原是英國人。1943 年，他剛 18 歲，在英國皇家炮兵任少尉，被日軍俘虜，關進爪哇和新加坡昌吉戰俘營達 3 年半之久。他于 29 歲時移民去美國，進入好萊塢電影界，成為電影劇本作家、製片人、導演中的佼佼者，並加入美國籍。1973 年，克拉維爾為尋求創作靈感前來香港。1977 年他在參加香港“快樂穀”的一次賽馬會後的次日，香港賽馬總會幹事威廉斯送給他一本《孫子兵法》英譯本，當他閱讀這個賈爾斯的譯本時，立刻被《孫子兵法》充滿睿智的豐富內容和優美的語言所傾倒，從此與《孫子兵法》結下不解之緣。為了弘揚《孫子兵法》，他不僅編輯和重新出版英譯本，而且在他後來創作的《貴族之家》小說裡，讓書中的許多人物都對孫子極盡讚譽之辭。

像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宣導中國軍人要讀《孫子兵法》那樣，克拉維爾提出要把《孫子兵法》作為對全體軍官特別是將官的年度考核的內容，而成績好壞是晉升的法定依據。這一充滿熱情、富有浪漫色彩的呼籲是出自其內心的：“關於孫子：我的祖籍是英國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名英國皇家炮兵的尉級軍官，並被關在爪哇和新加坡昌吉的日本戰俘營裡達 3 年半之久。因此，我對戰爭有所瞭解，我更知道高級軍官的情況，他們幾乎個個都很蠢和缺乏軍事知識。自從我發現《孫子兵法》這本書以來，我每想起我所參與的戰爭，我的父輩們所參與的戰爭，或者任何一種偏離常規的戰爭，我就對孫子的法則沒有深入我們的心靈而感到憤懣——我年少時進入男子公立學校，大部分的入學者都是軍官的兒子，他們將來都要加入英國三軍當軍官。在 1939 年，我們是 15 歲或 16 歲。我們班總共約 80 人，其中只有 7 人在戰爭中生存下來。如果我們掌握了孫子的知識，就絕不會死那麼多人。”

(三)90 年代的英譯本 1993 年美國西視出版公司出版了拉爾夫·索耶(Ralph D. Sawyer)所譯的《武經七書》，其中包含了他的《孫子兵法》的英譯文。索耶的英譯本是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將宋本《武經七書》譯介給西方的讀者，這不僅填

補了東西方軍事文化交流方面的空白，而且標誌著“兵學西漸”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其學術意義令人矚目。作為《七書》主要內容的《孫子兵法》，其英譯文也反映了全譯本的主要特點：考證較充分，注釋詳盡和翻譯嚴謹。就其武經本的《孫子兵法》英譯文而言，索耶的翻譯有兩大特點：其一、仔細研究了《孫子兵法》的兵學概念，在汲取他人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並落實到具體的譯事之中；其二、充分利用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殘本，補正武經本的《孫子兵法》，使英譯文能更加忠實於原作。在“十三篇”正文之前，譯者綜述了《孫子兵法》的主要概念。他認為，孫子主張“慎戰”、“不戰而勝”和“全勝”；強調“理性的自我控制”，“決不允許因怕被指責為懦夫而倉促行事和個人怨恨情緒對國家與軍隊的決策產生不利的影響”；孫子的基本戰略是“奇正”與“權變”，這是制勝之道；基本原則是“詭道”，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知彼知己”是料敵制勝的必由之途，“用間”則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孫子論及將領統率軍隊的關鍵在於“氣”，能“靜以幽，正以治”，這與將領的意志和意圖以及士兵訓練有素、補給和裝備適當均有密切的關係，“治氣”還要“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求速決，“治軍”則要獎懲分明和“禁祥去疑”；最後，孫子力求在“軍爭”中將軍隊處於有利的戰術地位，使其攻擊力量即其勢“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部署善於“示形”，用兵“懸權而動”，集中兵力於主要目標，利用有利地形，激勵士氣，“並敵一向”直指決定性的目標。

對於《孫子兵法》中一些重要的兵法概念，索耶深入探索其含義，並不殫其詳地作出注釋。例如，“奇正”一詞，譯者結合《尉繚子》和《唐李問對》中的精闢論述，界定了該詞的基本含義，同時參考美國漢學家 D.C.勞 (D.C.Lau) 的抽象化的譯法 (勞翻譯過《論語》、《孟子》等經典，在《論孫子的若干注釋》一書中他將“奇正”譯為 *straitforward and crafty*，意思是“直截了當”和“詭計多端”)，索耶按語義概念直譯為 *Orthodox and Unorthodox* (意思是“正統與非正統”)，不失為一種另闢蹊徑的譯法。再如，“勢”字，譯者探索了中國兵家與法家著作中對“勢”字的理解，特別著重研究各個《孫子兵法》英譯本的譯法和注釋，其中羅傑·埃姆斯 (Roger Ames) 在其 1983 年的譯著 (取書名為 *Art of Rulership* 《統治的藝術》) 中對“勢”字所作的長篇注釋，引起了索耶的重視。埃姆斯認為，“勢”至少有三方面的含義：其一、“環境”或“條件”；其二、有關兵力部署的“具體配置”；其三、佔據優越的地位，從而能發揮該地位所賦予的潛在優勢。由於“勢”的概念與佔據優越地位發揮優勢緊密相關，埃姆斯將“勢”譯為一個“有意思的也令人費解的詞 *purchase*” (意思是“經努力而獲得”)，並對篇名採用音譯法，在漢字拼音後則附加注釋：*SHIH* [ *Strategic Advantage/Political Purchase* ] (意思是“戰略優勢/政治上努力獲取”)。索耶汲取其部分內涵但捨棄其譯名，將篇名譯為 *Strategic Military Power* (意思是“戰略軍事力量”) 並注明漢簡本只有一個“勢”字，譯名從武經本“兵勢”。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7)

如前所述，索耶譯文的主要優點之一是較為嚴謹，譯者按原文逐字逐句翻譯，為使譯文完整和具有可讀性而採用了增益法，即在英譯文中以方括弧表示補足用字。這是所有英譯本中前所未見的。另一個優點是譯文簡潔明快，如《作戰篇》：“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翻譯只用了 8 個英語辭彙：“No country has ever profited from protracted warfare.”再如，《用間篇》：“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譯文也很簡明扼要：“Armies remain locked in a standoff for years to fight for victory on a single day.其中的“locked in a standoff for”用語比較新穎生動。譯者將一些古代用語譯得富有現代氣息，可視為是一種創新意識，也可能出於使西方讀者容易看懂的目的。如將“反間”譯為“雙重間諜”（Double agents），將“死間”譯為“在戰爭中為特定目的而準備犧牲的間諜”（Expendable spies）等。

索耶譯文最主要的缺點是過分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有些直譯近乎死譯，沒有貫通上下文吃透意思做到“等值翻譯”，以致辭不達意甚至將原義弄擰了。如將《勢》篇中的“分數”硬譯成：“分數字的問題”（a question of dividing up the numbers），而此處“分數”應指部隊的組織編制，可譯為“organization”。將《軍爭篇》中“將軍可奪心”的“心”直譯為“心”（mind），而此處“心”應指意志、決心，或鎮定自若的心態。英譯文似可譯成determination，或decision-making，或presence of mind等。此外，索耶採用音譯法翻譯《孫子兵法》中的個別概念，如“道”音譯tao（威妥碼拼法），在《計篇》中未嘗不可，但對“十三篇”中幾乎所有的“道”字都音譯，就顯得生硬和文理不通。因為絕大多數的“道”字都可作“方法、途徑”解。索耶將“戰道”、“為客之道”、“安國全軍之道”等句中的“道”都採用音譯法，無疑是拘泥於一種方法，缺乏靈活性，沒有做到領會上下文，隨語而解，以致形成翻譯中的一個敗筆。

（四）二十世紀下半葉國外出版的其他文字的《孫子兵法》譯本 在英譯本不斷問世的影響下，其他西方文字的《孫子兵法》譯本也陸續出版，其中俄文譯本較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根據高等軍事學院學術史教研室建議，促使以賈爾斯英譯本為藍本而轉譯的《孫子兵法》俄譯本於1943年問世。戰後，前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於1950年出版了漢學家N.孔拉德（Konrad）的宏篇專著《孫子兵法的翻譯與研究》，該著作被當時蘇聯學術界稱為“對蘇聯軍事歷史科學的寶貴貢獻”。1955年，前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孫子兵法》俄文譯本，該譯本是以上海1936年印行的《諸子集成》中《十家注孫子》為藍本，由J.I.西多連科（Sidorenko）中校直接從中文翻譯，前蘇聯軍事理論家J.A.拉辛（Rasin）少將教授為之作序。前民主德國後來還根據這一俄譯本轉譯成德文，並作為東德軍事院校的教學材料。

拉辛少將在新版《孫子兵法》俄譯本的長篇序言中，指出古代中國的軍事理論家先于希臘和羅馬的軍事理論家，而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家中最傑出的是孫子。人們對《孫子兵法》的興趣之所以經久不衰，其原因在於“孫子研究了進行武裝鬥爭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戰爭的矛盾性，闡述了進行戰爭的法則。而古代其他的軍事理論家沒有給自己提出過上述任務”。《孫子兵法》中包含著許多關於武裝

鬥爭特點、關於戰爭和戰鬥特點、關於戰爭和戰鬥對統帥、軍事首長、士卒及整個軍隊要求的正確論述，其中不少至今仍很有教益。拉辛還認為，《孫子兵法》以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自發的辯證法觀點為基礎，達到了當時理論發展的較高水準。“孫子在古代中國軍事理論思想發展中所起作用之大，相當於古代世界的亞裡斯多德在許多領域發展的知識。”對於“十三篇”在理論上的貢獻，拉辛則從以下七個方面作了概述：關於戰爭的意義、目的及作戰方針；關於作戰手段；關於致勝的基本原則；關於知彼知己及用間；關於戰爭和戰鬥的計畫問題；關於戰略進攻思想；關於指導戰鬥的思想。

1957年，前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出版了《論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一書，1961年經修改後再版，書中保留了對《孫子兵法》的評價。作者認為，在古代中國軍事理論得到了特別高度的發展，孫子總結了當時中國奴隸主所進行的戰爭的豐富的實踐，奠定了古代中國軍事科學的基礎。該書指出，《孫子兵法》企圖給戰爭下一個完整的定義，並且企圖確定戰爭的意義，對於作為國家重要措施的戰爭已經做了一般的評述。孫子提出的某些進行戰爭的規則直到現在仍有一定的意義。該書進一步指出，孫子很重視軍隊的後勤保障以及要善於利用地形，《孫子兵法》中有4篇專門論述物質保障和地形問題。在誘敵深入、偵察和突然性等問題上，孫子也有極深刻的見解。首篇《始計》強調預先估計情況和計畫戰鬥行動具有決定性意義，預見是取得勝利的基礎。末篇《用間》說明，傑出的將帥之所以能打勝仗是因為他們“先知”，而有關敵人的情況不能求之於鬼神，應該從活人那裡得知。孫子認為偵察在戰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世紀(8)

至於法譯本，迄20世紀末，法國一直沿用阿米奧的譯本。1922年，巴黎出版了E·肖萊(Cholet)中校編輯的阿米奧譯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兵法。兩千年前的戰爭學。選自阿米奧譯本(1772)》，肖萊為自己的著作還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言。1948年，C·納欽(Nachin)編寫出版了阿米奧譯文的注釋本，其前言與導論頗有見地。1956年，法國羅歇·加盧瓦(Roger Gaillois)準將以《中國的兵法》為題，在《見證》季刊上摘要發表了阿米奧的《孫子兵法》譯文和評論。這篇文章強調的論點是：中國古代兵法家主要關心的是戰爭的道義方面。正如英譯者格裡菲思所指出的那樣，這一觀點“當然是非常錯誤的，而這一錯誤的根源是阿米奧的曲解”。阿米奧的譯本自1772年問世以來一直在法國流傳，始終沒有新的準確的法譯本出版。個中原因可能也如格裡菲思所說，是因為“法國的主要漢學家對中國的軍事經典都不感興趣”，例如，“馬斯佩羅(Masparo)在《古代中國》一書中，輕蔑地稱《孫子兵法》是一本關於兵法的小冊子。這反映了他的偏見，或說明他對中國文獻中重要部分——戰爭文獻的瞭解非常膚淺。”格裡菲思指出，如果法國的漢學家能把研究中國文化其他方面的刻苦勁頭拿出很小一部分來用以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某些軍事慘敗就有可能避免。

迄 20 世紀末，國內外翻譯出版的《孫子兵法》外語譯本已有：日文、朝鮮文、法文、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捷克文、羅馬尼亞文、荷蘭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越文、泰文、緬文、馬來文等譯本。

### 三、以《武經七書》為理論依據，探索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和大戰略

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加拿大籍學者阿拉斯泰爾·約翰斯頓（Alastair Iain Johnston）（中文名字為江憶恩）經過對《孫子兵法》等中國典籍的多年研究，於 1990 年 10 月第二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淺談西方對中國傳統戰略思想的解釋》的論文，指出西方著作中對中國傳統戰略思想認識不足，並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其論文開宗明義地聲稱：“論述中國傳統戰略思想的西方著作多認為，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均具有某些中國文化特徵：偏重戰略防禦，崇尚有限戰爭或有節制地使用武力，低估‘純暴力’在解決安全問題中的作用。筆者研究中國古代兵書後得知，中國軍事思想包含各種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主張，在崇尚戰略防禦的同時，又主張攻擊、摧毀或征服敵人；在強調‘義戰’和‘權變’的同時，又似乎對戰爭目標、範圍和方法的制約因素置之度外；為達成政治目的，在採取非暴力手段的同時，又強調使用暴力。”在縱觀兵書和統計分析用兵的字詞之後，作者指出：在中國兵書中，關於對敵採取合法行動的描述看來從頭到尾基本都是“入侵”和“摧毀”敵人一類的用詞，諸如：“討”或“伐”；秘密入侵敵國領土的“侵”；開進敵國首都的“入”；毀敵宗廟祀壇的“滅”；掠奪戰利品的“取”等。這一切似乎在戰略上都是可取的。這些用語在《司馬法》、《六韜》中比比皆是，類似的隱喻詞句在《孫子兵法》的《形》、《勢》等篇中也躍然紙上。至於中國兵書上所說的“義戰”和“權變”，江憶恩以為“義戰”消除了“有限戰爭”所強加在戰爭目的上某些制約因素，而“權變”本質上是一種絕對的戰略、戰術靈活性的概念。“權變”也是一種決策規劃，確定在面臨某一特定戰略形勢之時，它不受任何在道義上或政治上等方面的條件制約，而是放手讓人作出適當的選擇。它特別適用於義戰學說，因為它促使後者更加執著地找出和運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摧毀不義之敵。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名言在中國兵書中被當作理想化的戰略。江憶恩在該文中指出，孫子的這一名言作為一個理想化的概念，在兵書中確實沒有起到特別實際的作用。江認為，中國古兵書對運用“純暴力”並非完全反對，如《司馬法》所說的“馬車堅、甲兵利”，《尉繚子》所謂的“武”和“力”，《吳子》所強調的先發制人等，不是為了攻城掠地，就是為了克敵制勝，穩固江山。關於偏重詭道、謀略，或陰謀勝過“純暴力”之說，江以為中國古兵書的論述是含糊的，即使明確談及非暴力的謀略充其量只是有效地使用純暴力的前奏而已。《六韜》強調打敗敵人必須使用暴力，“文伐”篇雖論述了旨在削弱、搞亂和破壞敵人的 12 種外交謀略，但這些外交謀略的運用是為軍事行動服務的，一旦這些謀略行之有效，隨即到來的軍事行動就是攻擊敵人，以實現其軍事目的。《孫子兵法·計篇》在列出 12 種詭道之後，接著說的是兩種明顯的暴力的戰略，即“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顯然，實施謀略是為採用純暴力預作準備的，並非與“純暴力”不

相干。因此，“西方將中國傳統的戰略思想說成是‘謀略’或低估‘純暴力’的作用是輕率而淺薄的”。

1991年，江憶恩又根據對《武經七書》的進一步研究，向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送交了對上述論文的修改稿，充實和豐富了原論文的觀點和結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章的結尾處表明，中國古兵書的歷史背景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進攻性的征戰討伐是兵書中主流。但這是不是就意味著中國歷代的戰略思想家和戰略策劃者都自動地將這些“進攻性”的格言融入他們所奉行的戰略文化中去呢？情況可能並非如此。同樣，也不能設想墨子的“非攻”思想會自動地融入中國的戰略文化並遠源流長地付諸實施。只有在對中國戰略文化中的格言用語與各個王朝所作的實際決定進行詳細的比較之後，才能明確這些不同傾向的影響。顯然作者並不滿足於僅僅通過《孫子兵法》或《七書》來探索中國傳統戰略思想，而是要在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堅實的史料基礎上研究中國的戰略文化。

###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世紀(9)

1995年，時任哈佛大學助理教授的江憶恩完成了對中國戰略文化問題的研究，並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文化現實主義——中國傳統戰略文化與大戰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這本書(以下簡稱《戰略文化》)是江憶恩的博士論文，出版時已被列入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歷史與政治學研究著作之一。《戰略文化》一書的主要特點是：以《武經七書》為楔子，用較科學的方法，對翔實的明史進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確定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範式”和“戰略偏好順序”。

(一) “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是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中心思想

1.“戰略文化”概念和《武經七書》要義 《戰略文化》一書共分8章，約30萬字。作者首先從“戰略文化”的概念內涵談起，其次論述對此課題的研究方法，最後也是主要談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文化和大戰略，以及由此產生的中國歷史上的戰略選擇偏好等。“戰略文化”一詞最早出現於1977年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為蘭德公司撰寫的一份簡短的關於蘇聯有限核戰爭學說的研究材料中。1990年5月，美國科學院首次舉行有關戰略文化的研討會，以便修改完善戰略文化的定義和討論戰略文化對分析各國戰略行為的潛在作用。這個研討會吸引了眾多學科的專家，包括社會歷史學者、人類學學者、地區專家和主流的新現實主義戰略分析家等。儘管對戰略文化的概念尚待全面界定，但其主要含義是指形成戰略的歷史的文化背景，或“廣義地說，研究戰略文化就是研究文化與思維方式對戰略選擇的影響力。”研究戰略文化實質上是探討傳統文化氛圍中所形成的戰略思想，正如該書作者所說，戰略文化的內涵有兩個方面：其一，有一個“中心範式”

(central paradigm)能回答有關人間衝突的性質、敵人的性質和暴力的效用等三個基本的相互關聯的問題；其二，根據這些“中心範式”的論點從邏輯上推導出一套有先後順序的戰略偏好。作者之所以首先選擇《武經七書》作為分析研究的物件，是因為它是中國古典兵學的精粹，包含著古代中國的“治國之道、大戰略、

作戰戰略、戰術和軍事編制等”。《七書》中不僅有占主流的兵家思想，也有談仁義的孔孟之道（以《司馬法》和《三略》為代表）。但在“義戰”的情況下，儒家的思想也不排斥訴諸武力，屬於“不得已而為之”。作者通過對《七書》的深入研究和探討，特別是借助電腦對有關文句、詞彙、隱喻、比擬等作定量分析，得出《七書》的戰略文化的“中心範式”是“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作者認為：“中國的戰略文化基本上也是一種現實政治的偏好順序。此外，中國的戰略思想是極難預料的；先驗的戰略偏好順序的效應受到一種強有力的絕對靈活性觀念的影響。……這就轉化為一種戰略行為模式，在該模式中就會在力量相對有利的期間採取更加強制的戰略。實質上，可以說中國的戰略決策反映了一種基本上是在看時機、憑實力的現實政治的計謀。”

作者引證了中國臺灣學者魏汝霖、劉仲平對比中西戰略思想上的差異：西方的遊牧和商業文化傳統上強調通過戰爭謀求擴張和財富，而中國的農業和就地棲息的文化則歷來強調防禦、謀略和尋求和平。西方強調人類征服自然，而中國文化則強調天人合一。西方文化著重於成就、利益和使用純武力迫使對方就範，而中國文化則重視仁義和以德行促使對方自願屈服。在西方，對衝突的態度具有典型性的象徵是拳擊和武力的較量。在中國，這種典型性的象徵則是“太極拳”和“以柔克剛”。最後，西方文化強調軍事戰爭的頭等重要，而中國傳統則強調政治戰爭的頭等重要。對於魏、劉的這番議論，作者指出這與他研究所得的“認知圖”和符號分析結果是“大相逕庭”的。作者聲稱：“一般來說，‘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否就是《孫子兵法》的非暴力或儘量少用暴力核心思想的精髓，那是模稜兩可的。我的分析是，這一名言及其戰略推論都體現了應用暴力的因素。”他接著說：“‘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一種理想化的戰略方式，這與《武經七書》中大量篇幅所談的務實的、作戰的問題關係不大。”因此，它不能成為戰略選擇中的決定性的指導因素。從總體上看，《武經七書》儘管各文本內容不盡相同，但主題是攻戰取勝的兵學。《唐李問對》開卷就是談論外交接觸失敗轉而訴諸武力的問題，這是意味深長的。

2.以豐富的明史資料作為基礎材料，進一步探索中國“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戰略文化“範式”以及中國傳統的戰略偏好順序。作者選擇明史作進一步的研究，原因有三：一是在這段歷史時期內，當朝的決策者是中國“戰略文化的哲學與文本傳統和經驗遺產的自覺繼承人”；二是決策精英人士不受外界——非漢族的或西方的戰略文化的影響；三是明朝有關決策的文獻資料相對來說還是豐富的。作者對《明臣奏議》、《陣紀》等明史文獻和兵書作了仔細的研究。同時，分歷史階段統計對比發生戰事的頻率，明確蒙古族和明廷分別主動出戰的比率，尤其把明英宗年間的土木堡之役（1449年）作為一個分水嶺。此外，作者還從永樂至萬曆年間的有關明臣奏摺中，精選了足夠數量的明確的主戰與主和的詞彙進行數理統計。通過上述多種方法，作者研究的結果是：明朝的戰略文化“範式”和戰略偏好順序，基本上與《武經七書》的結論一致。

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時期--20 世紀(10)

明朝的決策者一般認為戰爭是歷史上的一個經常不變的主題，與蒙古人的衝突尤其如此。解決這類衝突必須靠優勢的軍事力量。明朝的“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思想決定了採取攻勢戰略在原則上是最佳選擇，因為非此即是一種示弱表現，只會鼓勵蒙古的侵略性。當然明朝的戰略家認識到，在明朝衰弱時，攻勢戰略不大可能取得成功。一旦作出這種判斷，中策的戰略就是傾向於靜態的線性防禦的純防禦性戰略。只有在戰略上處境十分困難，萬不得已時才做出“和親”的選擇。換言之，明朝的中國在其力量強盛時總是對蒙古族採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戰略；而當動員人力物力從事進攻的能力備受制約時，明朝的決策者就採取防禦性的或妥協的戰略。

《戰略文化》一書從嶄新的角度探討和研究了《武經七書》和有關明史的內涵實質。作者提出“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特色。這一高度概括的論點來自作者對中國兵書史籍的苦心鑽研，也是運用現代研究方法（包括科學的統計分析）的結果。有意思的是，作者將西方現實政治學中的一個拉丁文名詞“Parabellum”（“要和平就得準備戰爭”）譯成中國成語“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並將這些漢字作為該書封皮的襯底，頗具有中西合璧的意味。

3.獨特的研究方法 《戰略文化》是一本在較深層次上研究中國兵學的專著，作者在治學方面有其獨到之處。其一，廣泛佔有資料，認真鑽研原著，領會其精神實質。作者對《武經七書》、《明臣奏議》以及《陣記》、《草廬經略》、《投筆膚談》等兵書史籍，不僅認真閱讀，而且還對一些典籍進行了逐篇逐本的翻譯（如作者翻譯了《三略》、《司馬法》、《問對》三書以及《六韜》、《尉繚子》的部分內容），以便加深對原著的理解。即便是已有多種英譯本的《孫子兵法》，作者對孫子一些名句的譯法還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對某些重要的兵學概念如“權變”，不滿足於一般的釋義“隨機應變”，而是在鑽研《武經七書》的基礎上，結合當代西方學者的見解，確定“權變”是戰略戰術意義上的絕對靈活性，也是在戰略文化“範式”內改變“戰略偏好”的關鍵因素。作者能從海外不同版本的《明臣奏議》中校訂和互補于謙、曾銑等明臣奏摺的內容，使之更加準確，為電腦的分析運算打下可靠的基礎。至於西方有關中國兵學的論著和當代國際戰略著作，作者更是博覽群書，從費正清到亨廷頓等人的著作無所不讀。特別對研究長城起源的專家沃爾德倫（Waldron），作者不僅讀其書，而且與他多次交談，充實了有關明長城的知識，豐富了作者對明朝如何抵禦外患的感性認識。

其二，採用認知圖示法、符號分析和數理統計對兵書和史料作科學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認知圖示是一種對內容進行分析的實驗形式，旨在發掘在兵書中的某些原因和預期行為後果之間的聯繫。它有助於澄清在兵書中被長篇大論的文字或假像所掩蓋的戰略選擇偏好。不同文章的認知圖之間的相同程度有助於研究人員確定傳統戰略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保持前後一致的。為此，作者就《武經七書》和《明臣奏議》中有關說明對敵行動的古漢語的字詞，分為非暴力和暴力兩大類。後者又分為防禦性和進攻性的字詞兩個部分。全部共 131 個古漢語字詞，

作為電腦儲存的基本資料之一。此外，作者對《武經七書》中有關為了國家安全而使用武力的所有因果語句都進行編碼（共 2225 個），並輸入資料庫系統。這樣就能對與某一特定概念有關的所有因果關係進行分析。例如，只要輸入“勝利”結果概念，電腦隨即顯示出兵書中有關這一結果的全部原因概念。至於符號分析，作者認為對戰略文章中的“符號”（指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詞句）進行分析，可以極大地顯示兵書中戰略格言在實際行動方面的含意，即這些格言形成的戰略偏好順序。作者聲稱，已把《武經七書》中的這些符號分析的精粹補充到兵書的認知圖內。關於明朝與蒙古的交戰史，作者除了採用上述方法外，還進行了資料統計。用清單對比和曲線圖形象地顯示了明朝對蒙古 192 次較大規模戰爭的情況。明朝各個時期主要大臣和官員對蒙古外患的態度也一目了然。

其三，獨立思考和“古為今用”。作者在其“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該書論述的中心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的戰略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基本是連貫的和短暫的一致；另一方面，這一戰略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在歷史上運用武力對付外來“威脅”。以戰略文化為題，作者要運用有關衝突性質、敵人和決策者共識的中心範式論推導出“分級的大戰略偏好”。關於“古為今用”，作者有其志趣和抱負。他認為，不知道歷史的和文化的先例就無法瞭解中國的政治行為。探討中國戰略文化在中國行為方面的作用是有意義的。作者聲稱：“在我心目中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引用一位元前美國總統的話作為‘想像之事’：要從全部歷史上探討中國的對外行為，探討中國解決衝突的模式及其戰略理論等等，要像在國際關係材料中探討德國、法國、英國和俄國問題那樣普通平常。

誠然，《戰略文化》是一部論述中國傳統戰略思想的新作，其研究方法和“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中心範式都是有意義的，書中所談及的西方學者的種種觀點，其中也不乏參考價值。然而有些看法我們不敢苟同，特別是全書結尾“結論”一章中，除歷史部分外，現實方面的若干觀點，都值得商榷。

### 13.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

在《孫子兵法》西文譯本尤其是 20 世紀下半葉的譯本中，值得重視的一個現象是，各譯本的前言、導論和緒言都重視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對《孫子兵法》的意義和作用做出闡述和論證，多數著重於軍事意義（如菲力浦斯、利德-哈特、拉津等），也有從人文的含義進行論述（如克拉維爾、克裡利等）。20 世紀下半葉和世紀之交，《孫子兵法》的研究與應用轉向非軍事領域則是一個新的發展趨勢。

###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1)

####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理論研究

一、重視對“詭道”、“先知”等兵學概念的研究與應用，認為“詭道”是現代軍事欺騙學的先驅；“先知”則是現代情報學的基本原則

### (一) 對“詭道”的認識與理解

“詭道”一詞如果脫離《孫子兵法》或具體戰爭背景泛泛而論，極易與“陰謀詭計，狡詐善變”相混淆。《孫子兵法》西傳之後，到 19 世紀末列強入侵中國之際，一些有偏執之見的外國人就是把“詭道”曲解成中國官員“奸詐成性”的。例如，1900 年 8 月，法國前駐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M. de Cotenson）在《新評論》上發表文章，反覆指出：“中國兵法的特點”就是“將帥們奸詐狡猾，企圖用各種手段欺騙對方”，因此，法國指揮官“不應被中國將領們的信誓旦旦所欺騙”，這一點“極端重要”。這種偏見已經受到《孫子兵法》英譯者格裡菲思的批評，實際上任何真正的《孫子兵法》的外國學者或認真讀過該書的讀者，都不會同意這種曲解和偏見。

1. 就戰爭而言，從“俠義之道”到實施“詭道”是歷史的進步 對此西方研究中國兵法的學者看得很清楚。譬如，對《孫子兵法》素有研究的波蘭學者克裡斯托夫·高利考斯基（Krzysztof Gawlikowski）（中文名字石施道）曾撰文論述《左傳》中的戰爭觀與孫武思想的區別。在題為《孫武思想和中國的軍事傳統》一文中，石施道援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史料並作分析，在這場西元前 638 年的宋楚之戰中，宋襄公堅持“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致遭慘敗，這是因為宋國代表古代商朝的貴族傳統，這一傳統強調“君子不乘人之危”和“君子不攻擊不成陣勢的敵軍”。與世襲貴族的“俠義”戰爭觀不同，孫子的軍事思想大大前進了一步。他不僅主張“半濟而擊之”（《行軍篇》）和“勿擊堂堂之陣”，而且強調“窮寇勿迫”（《軍爭篇》）。因為“置於死地而後生”的道理對於處於絕境的敵人同樣是適用的。從戰術角度看，使敵人不再戀戰或負隅頑抗，更有利於取勝和減少傷亡。石施道在研究《左傳》與《孫子兵法》之間的關係時，還參照了馬克·路易斯（Mark E. Lewis）的學術見解。後者認為，從《左傳》和其他早期資料中得知，對世襲貴族來說，戰爭是威望和榮譽問題，打仗是為取得榮耀。從西元前 597 年的楚晉之戰和西元前 575 年的鄆陵之戰中看，都盛行著這種世襲貴族的觀點。晉國將領明知寡眾不敵，也不甘心在強大的楚兵壓力下撤退。石施道說，從《左傳》中可以看到，春秋末期在軍事問題上存在著兩個互相對立的派別：一派是堅持舊貴族階層捍衛俠義戰爭規範，把維持尊嚴看得比勝利本身還重要。另一派則摒棄這些規範，注重軍事行動的效果，宣稱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是個人或家族的光榮。因此，為了軍事上的勝利可以毫不猶豫地進行欺騙，對敵人實施突然襲擊。《孫子兵法》代表著後者的新興的軍事思想。由於“貴族思想傳統在中原各國根深蒂固，新的實用主義的方針首先由所謂‘蠻夷之國’採用，如吳、越、楚和秦，這些國家沒有那種矯揉造作的貴族傳統。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麼《孫子兵法》出現在吳國，而不出現在中原國家。石施道還認為，孫武繼承了《左傳》中的許多概念，並使之系統化。孫武在發展戰略思想方面的作用，堪與孔子在發展哲學方面的作用媲美。“他們的著作高度概括抽象，成為永恆的真理，有些觀念甚至放之四海而皆準。然而兩人之間又有重要的區別：孔子繼承了古老的傳統，包括貴族傳統中的各種因素，他的目標是以

一種新的形式把古老的傳統保持下去；孫武則不然，他摒棄貴族式的軍事傳統，提倡與之背道而馳的軍事原則，他絕不容許舊的榮辱觀左右戰爭進程和戰爭目標，他破除了舊的榮辱觀，而代之以爭‘利’的觀念，代之以建立在‘詭道’基礎之上的講究實際的戰爭行為規範”。顯而易見，孫子“以利動”的戰爭觀和實施“詭道”等一系列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中國戰爭史上的一個飛躍。

2.“以利動”是實施“詭道”的準則 關於“詭道”是否合乎倫理道德的問題，東西方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日本學者山鹿素行在《孫子諺義》中指出，聖人用兵之際，亦必用詭詐，不然戰必敗。可見其界定“詭道”概念時加了“聖人用兵”或“仁義之師”之類的大前提。而孫子論“詭道”的前提只是“兵”字——“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並無仁義道德之類的含意。對於“詭道”這一重要的兵學概念，西方學者有其獨特的見解。如波蘭學者石施道指出，孫武是第一個人認為“戰爭”不應受倫理考慮束縛的思想家。在孫武看來，戰爭的目的是有利於國家，衡量戰爭的唯一標準是勝敗如何。利用非倫理手段，使用詭道詐騙敵軍和己方的士卒是戰爭的基本法則。他進一步指出：“孫武得出了非常極端的結論：在戰爭中，對一切人都要用詭道和權謀，包括敵人、己方官兵、甚至最親密的合作者和己方的間諜人員，只有最高指揮一人可以瞭解真實情況和真正的目的意圖。所以，多少世紀以來，孫武的文章被貶為不講道德，其實他的著作只能稱作超越道德，無所謂道德不道德。”作為一家之言，石施道的這番話道出了孫武的功利主義的戰爭觀，也說明了實施“詭道”的基本準則。

##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2)

### (二) 美國《戰略軍事欺騙》一書論“詭道”

《孫子兵法》中的“詭道”謀略的意義已被古今中外的戰爭實踐所證實。但將“詭道”做為西方戰略研究的目標之一，並撰寫成軍事理論著作，那是近十幾年的事。1982年，美國佩爾格蒙出版社出版了由唐納德·丹尼爾和凱薩琳·赫爾比格編輯的《戰略軍事欺騙》(Strategic Military Deception Edited by Donald C. Daniel, Katherine L. Herbig Pergamom Press U.S.A.1982)一書。該書從戰略的角度闡述了軍事欺騙的重大意義以及在核時代與威懾的關係。其中有一章專門論“中國軍事欺騙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ticice of Chinese Military Deception”)，論文由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T. Strart)和威廉·托(William T. Tow)執筆。文章的目的是，“要從中國的理論著作中提煉出一種明確的‘欺騙方式’，並評斷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欺騙方法從1949年以來對北京的戰略謀劃有多大程度的影響”。文章的前半部著重談《孫子兵法》以及毛澤東軍事思想中的軍事欺騙；後半部側重分析朝鮮戰爭、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1969年烏蘇里江中蘇對峙和1979年中越戰爭4個戰例。作者認為，“詭道”歷來被中國的兵家視為統帥將領的一種才智。在中國傳統著作中，通常把敵對雙方都描繪成“善施詭道”，而最終成為英雄的必然是更精通“詭道”的一方。作者指出，中國的傳統戰略和“詭道”概念源自孫子。兩千多年來，《孫子兵法》已成為中國戰略家和軍事領

導人的一本主要參考書。

此外，作者還從理論上對“詭道”概念作了分析，認為：孫子著作中關於“詭道”的思想還與傳統的戰略思想中的一系列方面互相關聯。這些方面包括：(1) 預知有關情況是作戰的先決條件，即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2) 選擇時機和客觀環境因素，如地形和天氣，“攻其所不守”。(3) 不先“伐兵”、“攻城”，而先“伐謀”。(4) 誘敵深入，而我付出最小的代價，遇到最小的危險。所謂“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作者指出：“孫子認為，戰爭中衡量‘詭道’成功的最恰當標準是看它能否使領兵之將以最小的人力物力代價實現戰略目標，保護戰略利益，而所謂的風險又最小。在孫子的文章裡，詭道是制敵的若干因素之一，他總是強調知己知彼，然後才可交戰。”

2.“詭道”等兵法原則與毛澤東軍事思想 斯圖特爾和威廉·托都承認，毛澤東軍事思想與《孫子兵法》在軍事欺騙學說方面有多大的直接聯繫，還不很清楚。然而，在軍事欺騙的性質和目的以及通過欺騙來控制事件和最大限度地減少危險方面，毛澤東的著作和諸如《孫子兵法》之類古典戰略著作之間，無疑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作者認為，毛澤東於1936年12月所寫的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長篇文章，總結了歷年來紅軍作戰的經驗，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提出放棄“全線防禦”、“寸土不讓”的錯誤戰略，敢於拋掉“鏝鏝罐罐”，爭取主動；強調反包圍和對敵實施欺騙。毛澤東指出：“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作者進一步分析了毛澤東軍事著作與《孫子兵法》的不同之處，指出毛澤東的另一句格言：“各個歷史階段的戰爭規律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這與孫子大不相同。毛澤東主張“持久戰”，與孫子所說的“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是大相徑庭的。在實施軍事欺騙方面，作者的結論是：“毛當然不會採取荀子那樣完全摒棄‘詭道’的極端態度，但毛的著作和軍事行動都反映了在‘詭道’問題上，毛比孫子要保守得多。”

歷史證明，毛澤東根據敵我力量對比和中國抗日戰爭的具體情況，提出“持久戰”戰略是完全正確的。從表面上看，其“持久戰”與孫子的“兵之情主速”背道而馳，但從深層內涵探討，毛澤東主張“戰略上的持久戰，戰役上的速決戰”；而“持久戰”將由無數個小的速戰速決的戰鬥和很多局部的速勝的戰役所組成。這些都與孫子所說的“兵貴勝，不貴久”相一致。毛澤東提出的“持久戰的三個階段”符合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既有利於克服當時國內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的思想，又反過來對侵略者造成一種心理壓力。因為孫子所說的“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對軍國主義的日本來說同樣適用。總之，毛澤東軍事思想中有關軍事欺騙等理論與孫子的“詭道”、“兵貴勝”等原則是有著內在聯繫的。古今中外的戰爭要取得勝利，實施軍事欺騙均必不可免。西方的現代戰爭也不例外。

### (三) 對“先知”理論的認識

1. 日本歷來推崇“用間”、“先知”，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很重視《用間》篇

如前兩章中所述，日本兵家和學者對《用間篇》十分重視並素有研究，在實踐中獲得“先知”而制勝之例屢見不鮮。1984年我國翻譯出版了英國作家理查·迪肯（Richard Deacon）所著《日本情報機構秘史》一書，該書指出：“日本人搜集情報的靈感是受中國2450年前的戰略家孫子的影響”，《孫子兵法》中詳細闡述了間諜策略，孫子的名言諸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上兵伐謀”等，顯然一直是歷代日本諜報機構的座右銘。也可以說，《孫子兵法》為歷代日本諜報工作奠定了理論基礎和行動綱領，以至於成為日本從事間諜的經典。

### 20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3)

1963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W. Dulles）（1893～1969）在其所著《情報術》一書中，對孫子的《用間篇》十分讚賞，他在書中寫了這樣一段文字：“在中國歷史上的先秦時期，間諜就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對此孫子的觀點更加切實可行。他說：‘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在《用間篇》中，孫子闡述了西元前五世紀中國人所採用過的諜報基本做法，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仍在運用。……孫子所獲得的聲望，不僅歸功於他首次卓越地分析了諜報的方式，而且還歸功於他第一個對有組織的情報事業提出了書面建議。他指出諜報高手能使‘五間俱起’，並且將此稱之為‘神紀’，就如同一張‘綱舉目張’的魚網一樣。孫子的貢獻還不止於此。他論述了反間諜、心理戰、欺騙術、安全、假情報製造等。總之，論述了整個情報術。”《聖經》中的《出埃及記》中談到摩西派人瞭解迦南的情況，這是西方從事間諜活動的最早記載。艾倫·杜勒斯指出，古代西方雖然也搞間諜活動，但沒有達到東方那樣精深的程度。在西方的間諜活動中既缺少類似的謀略意識，也沒有任何書面的條規可以傳世。誠然，艾倫·杜勒斯在1953至1961年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期間有過“用間”的成功記錄。譬如，美中情局在1956年成功地搞到了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但是，1961年4月17日中情局所策劃和資助的“豬灣入侵”卻遭到了慘敗。同年秋，艾倫·杜勒斯不得不引咎辭職。

二、《孫子兵法》在戰略研究中的應用：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戰略論》；以《孫子兵法》批判“相互確保摧毀”核威懾理論；對冷戰後期地緣戰略的分析，以及美國《大戰略》一書對《孫子兵法》的評價與應用

西方國家的學術界和軍界人士在研究《孫子兵法》過程中的一個特點是，重視聯繫實際，著力於對孫子思想的現實應用。英美的一些戰略學家和國家戰略的決策人注意將《孫子兵法》用於現代戰略研究，核威懾戰略理論分析以及地緣戰略的運用。

#### （一）受《孫子兵法》影響的《戰略論》

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所著《戰略論》一書是西方的軍事名著，該書初版於1929年，原書名為《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1941年出了增訂本，改用《間接路線戰略》的名稱；1946年再版時仍沿用舊名。1954年經修訂後，改名為《戰略論》。以後該書多次增印，同時被世界各國廣為翻譯出版，其戰略理論被一些

著名的將領奉為經典，有些國家的軍事院校還將該書當作教材。

1.《戰略論》扉頁上大量援引孫子語錄 《戰略論》一書的扉頁上援引了 21 條與“間接路線”戰略有關的世界著名軍事大師的語錄，作為全書的理論依據。其中最前面的 15 條出自《孫子兵法》，所引用的孫子語錄的條數和字數分別占全部語錄的 70%以上。利德爾-哈特以《計》篇中的“詭道十二計”及“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一段作為首條語錄，隨後引用了《作戰》、《謀攻》、《勢》、《虛實》、《軍爭》和《九地》諸篇中的名句，其中引用《虛實》和《軍爭》篇的頻率最高，分別為 4 次。《戰略論》一書在卷首大量援引孫子名言作為警句，決非偶然。正如作者在 1963 年著文稱：“《孫子兵法》這部篇幅不長的書將我 20 多部書中所涉及的戰略和戰術基本原則幾乎包羅無遺。”

2.《戰略論》強調“最佳的戰略目的”乃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利德爾-哈特不僅在扉頁上引用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和“上兵伐謀”兩段名言，而且在書中充分肯定了這個觀點。在“戰略的理論”及“戰略和戰術的實質”等章中，作者反覆多次批評了克勞塞維茨所說的“在戰爭中，只有決定性會戰才是最主要的目標”，“只有在大規模的會戰中才能決定重大的勝負”的思想，以及“以流血方式解決危機”和儘量頌揚“絕對”戰爭的觀念的做法。在“戰略的目的”一節中，作者指出：“事實上，即使把決定性的會戰（戰鬥）看成是戰爭的主要的目的，而戰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這個會戰（戰鬥）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進行。不過，條件越是有利，則進行戰鬥的成分也就會相對地減少。所以，最完美的戰略，也就是那種不必經過嚴重戰鬥而能達到目的的戰略——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利德爾-哈特主張創造有利的戰略形勢和採取一定的戰鬥行動，來使敵人“自動崩潰”，從而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戰略。這是他真正領會了孫子“全勝”思想的真諦和精義。因為孫子強調“必以全爭於天下”，同時十分重視戰鬥行動中要“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以便減少損失，速戰速決。同樣，利德爾-哈特強調“戰略的目的就是要儘量減少抵抗的可能性”，“達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實際的戰鬥行動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還說要利用“運動”和“突然性”因素取勝，“要使永久性的損害儘量減少到最小的限度，因為今天的敵人，也許明天就會成為我們的顧客，而到後天，甚至還會變成我們的盟友”。

3.“間接路線戰略”的內涵很大程度上是運用了孫子的“奇正”思想 利德爾-哈特的“間接路線”戰略幾乎全部繼承了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和“先知迂直之計者勝”的思想。在《戰略論》第一章中，作者就開宗明義地寫道：“通過這樣的（對各個歷史時期的戰史）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個印象：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進行戰爭所採取的‘路線’，如果不具有某種程度的‘間接性’，不能從而使敵人感到措手不及，難以應付，那麼，也就難於使戰爭取得有效的結果。這種‘間接路線’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終歸是心理性的。在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達到目的的最短途徑。”顯然，“使敵人感到措手不及，難以應付”與孫子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一

脈相承的；而“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往往是達到目的的最短途徑”又與“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相合。

####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4)

利德爾-哈特非常強調“以正合，以奇勝”，主張把“集中原則”與“節約兵力”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對敵人的“以正合”。在“以奇勝”方面，他更重視“迂直之計”。認爲在戰略上破壞敵人的穩定性，就要採取 4 個方面的行動：一是破壞敵人的部署，迫使敵突然地改變正面，在兵力的組織配置上發生混亂現象；二是分割（切斷）敵人的兵力；三是威脅和危害敵人的補給系統；四是威脅敵交通線。對敵人後方施以壓力往往能產生重大的心理上的效果，破壞敵人的穩定性，使其自行陷入混亂，從而取得勝利。

孫子的“奇正”思想內容豐富。“以正合，以奇勝”和“迂直之計”，既表現在兵力的運用和具體的進攻方向上，又反映了作戰的主動精神。“出其不意”和“先其所愛”不僅能給敵人造成人員和物質上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嚴重打擊敵人的士氣。這種心理上的壓力往往會使敵人陷於被動而遭到失敗。從作戰的效果看，這種精神因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間接路線”戰略的制訂者的確從理論上充分闡述了這一深層次的涵義。

4.“理智控制戰爭”與孫子宣導的“靜以幽”的爲將之道 利德爾-哈特在《戰略論》中提出的“理智控制戰爭”與孫子的戰爭理性觀念是一致的。對於戰爭和作戰行動，兩人都十分強調統帥和將領要“理智”和“保持冷靜的頭腦”，因爲這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在《大戰略》一章中，作者寫道：“戰爭是一種違反理性的行爲，是在談判不能取得滿意結果時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儘管如此，戰爭的實行還是要用理智來控制，只有這樣，戰爭的目的才有可能達到。”作者接著列舉了 5 條理由，並強調在戰爭發動以後的各個鬥爭階段中，也要用理智來控制使用力量。他說：“要想在戰場上奪得勝利，戰鬥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對於這匹烈馬，一定要把韁繩拉得很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經常保持頭腦冷靜的人，比起那些盲目衝動之輩來，還是佔有上風。對於那些盲目衝動之輩，必須經常加以控制。一個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爲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制力。如果那樣，他就不能作爲國家的領導人，不能擔負身系國家安危的重任。”對照《孫子兵法》，類似的思想一目了然。其《火攻篇》末段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對於將帥的素質，孫子從正反兩個方面提出要求。在《九地篇》中，指出“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因爲“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篇》）。由此可見，兩人都認爲指揮戰爭和作戰行動的人必須“理智”，決不能感情用事。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處於核時代的今天，對於戰爭問題，凡是國家領導人和將帥尤其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 （二）《孫子兵法》在現代戰略研究方面的應用

1. 尼克森用孫子名言批駁美國的核威懾理論 隨著美蘇核武器的問世，美國的核威懾戰略應運而生。1961年，甘迺迪當選為美國總統，他採納了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及其研究班子所提出的“靈活反應”戰略。這一戰略還包含“確保摧毀”和“限制損害”的概念，而“相互確保摧毀”（MAD）是威懾的核心。尼克森於1980年5月在其所著《真正的戰爭》一書中，運用《孫子兵法》分析批判了這一戰略，他說：“相互確保摧毀”的概念在著三個嚴重的錯誤。首先是蘇聯我行我素，使這一概念成為泡影。其次，這一概念在戰略上和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它使美國在威懾一旦失靈時無合理的選擇方案；萬一發生戰爭，它也不主張選擇合乎理性的政治或軍事目標。一個合乎理性的威懾力量不能以非理性的反擊作為其基礎。例如，未來的美國總統難道能冒風險以犧牲紐約、費城、芝加哥和華盛頓的代價來挽救柏林嗎？第三個錯誤是這個概念有悖於道義。美國決不能自行陷入窘境，使其戰略暗示：蓄意屠殺平民是一個正當的目標。威懾不應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上述兩個基本的缺點，即戰略方面和道義方面，是相互聯繫的。西元前五世紀時，中國的戰略家孫子寫道：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尼克森進而認為，戰勝對手不能單靠軍事威懾，必須運用孫子的謀略，即“避實擊虛”、“以奇勝”。當時的蘇聯在軍事上強大，而其經濟並不強大，它能征戰卻難以持久。美國應抑制蘇聯的強點，打擊其弱點。他寫道：“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代的戰略家孫子提出這一原則：以正合，以奇勝。他的真知灼見是‘奇正相生’，奇正並用乃是取勝之道。在當今時代，我們別無選擇，只有‘以正合’——以我們的軍事力量對付蘇聯的軍事力量；保持我們的聯盟團結和加強西方的聯合力量。這是避免失敗之路；這是遏制蘇聯推進之途，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正如退潮之前必須停止進潮一樣。下一步——走向勝利，‘以奇勝’——緊接而來的是更加複雜、更為微妙也更加費力。但是西方仍然擁有最大的優勢，只要我們能夠妥為利用這種優勢。這需要耐性，需要持之以恆。蘇聯推進的方式總是進兩步，偶爾退一步。成功地逆轉其推進的方式將是退一步，進兩步。”

## 20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5)

尼克森所說的運用謀略——“以奇勝”，很大程度上是指依靠西方的經濟實力、精神力量和價值觀念逐步獲勝。當然，保持軍事實力，加強核威懾和取得軍控談判中的有利地位仍是實施謀略取勝的前提。這一點在他1985年所著《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說得更為詳細。

2. 布熱津斯基運用孫子謀略研究美蘇爭奪的地緣戰略 美國著名學者、前卡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茲·布熱津斯基在1986年出版了《運籌帷幄》（GAME PLAN）一書，其書名的副題是“指導美蘇爭奪的地緣戰略框架”（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在這本名副其實的堪稱冷戰時期的西方地緣戰略學代表作中，作者在全書最後一章的始末段，都引用了孫子的謀略思想作為結束冷戰的必由之道。該章標題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壓倒對方”，警示

的引言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在全書的結尾，作者寫道：“孫子說：‘上兵伐謀。’進行持久的歷史衝突，情況亦然。模仿孫子的話來說，美國欲在美蘇爭奪中不戰而勝，上策是挫敗蘇聯的政策和利用蘇聯的弱點。美國如果用地緣戰略論的眼光高瞻遠矚，這兩點都可以做到。”

布熱津斯基在該書中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前蘇聯和華約集團的強弱點。認為前蘇聯固然是一個超級大國，但在技術上有差距，特別是社會經濟問題嚴重，思想僵化，政治上缺乏活力。長期的“計劃經濟”制度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也嚴重挫傷了生產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高度集中而又嚴重官僚化的經濟，效益很差，在 80 年代中期前蘇聯的經濟水準被認為“只不過是發展中國家內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布氏認為前蘇聯本身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弱點，因而美國能“不戰而勝”。他還指出，美蘇爭奪中有 3 條主要戰線：歐洲的遠西戰線，東亞的遠東戰線，中東南亞的西南戰線。在各條戰線上分別有其“關鍵性”國家，其中波蘭在遠西戰線上尤為重要，因為波蘭在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方面舉足輕重。“如果波蘭取得比較自主的地位，那必然會破壞蘇聯對立陶宛和烏克蘭的控制。如果波蘭擺脫莫斯科的控制，分離主義傾向可能隨之加劇，從而破壞大俄羅斯人的支配地位。”

顯而易見，“關鍵性國家”（linchpin state）的概念在地緣政治鬥爭中，是與孫子所說的“得天下之眾”的“衢地”不謀而合。80 年代末席捲東歐的“風暴”之源起于波蘭，足資證明。從更廣義的角度看，“衢地”可以被視為世界範圍內舉足輕重的“關鍵性國家”。作者可能基於此，特地在中譯本序言中寫了這一段話：“我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引用孫子的一段話。中國的地緣戰略位置令人注意到孫子的另一段話。孫子在《九地篇》中說：‘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運用孫子的這段話，從更廣的範圍討論美國的戰略和美中關係的重要性，我認為那是最合適不過了。”

3. 《大戰略》作者高度評價《孫子兵法》 《大戰略》一書是美國在 1973 出版的一本較系統地論述美國戰略問題的著作。作者約翰·柯林斯（John Collins）是美國國會研究防務問題的專家、美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書中除重點敘述了當代美國的各派軍事思想和軍事戰略外，還討論了美國的對外政策等有關國家戰略的問題。值得重視的是，該書在戰略創新者、大戰略的含義、作戰原則、冷戰的性質以及越南戰爭的教訓等方面都援引了孫子的名言，對《孫子兵法》作了高度評價。例如，該書“代序”中的“公認的戰略創新者”一節裡開宗明義地說：“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孫子十三篇可與歷代名著包括 2200 年之後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沒有一個人對戰略的相互關係、應考慮的問題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認識。他的大部分觀點在我們的當前環境中仍然具有和當時同樣重大的意義。”在第三章《戰略的實質》中，作者談及大戰略的含義與利德爾-哈特的結論（即“大戰略”的“真正的目的與其說是尋求戰鬥，不如說是尋求一種有利的戰略形勢”等語）時，指出“這不完全是個新觀

點。孫子早已認識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在第四章《作戰原則》中，作者根據孫子與克勞塞維茨作戰原則以及富勒的現代作戰原則，綜合英軍、美國陸空軍、前蘇軍的作戰原則和要素，列出“目標”、“進攻”、“集中”、“節約兵力”等 18 項作戰原則。其中，《孫子兵法》占了前面的 6 項，包括“突然性”的作戰要素。可見，《孫子兵法》的思想仍對現代作戰行動起著指導作用。柯林斯用孫子名言對“機動”原則，尤其是戰略機動的實質分析得十分精闢。他說：“機動是實現集中的手段。機動是與思想上的僵化或物質上的靜態相對立的。它意味著將戰略重點迅速從一種方式轉到另一種方式的能力，這同在時間和空間上重新調整部署一樣重要。孫子在許多世紀前就指出：‘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根據計畫、壓力或意料不到的時機等情況，機動性不僅是軍事的，也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和心理的……”

作者還用孫子名言分析越南戰爭的教訓，認為美國當時陷入越戰的泥潭，是因為片面地強調“伐兵”，忽視了“伐謀”。他說：“我們過分依靠使用正規的軍事手段，致使我們忽略了本該同時運用的美國實力中的其他的有效手段。孫子說：‘上兵伐謀。’在越南戰爭情況下，‘謀’即革命戰略。美國忽視了孫子的這一英明的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戰鬥。我們過高估計了我方的能力，過低估計了敵人的能力。我們熱衷於使用武裝力量，其結果是很快產生了一個不起作用的目標：戰場上的軍事勝利。於是，政治目標和軍事目標又一次脫節了，使我們蒙受了損害。”

##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6)

三、《孫子兵法》在現代軍事領域中的研究與應用：1982 年美國陸軍《作戰綱要》；1921 年起美國的一些軍事院校曾將《孫子兵法》列為課程或教材；《印度軍史》以孫子名言總結第三次印巴戰爭；1991 年海灣戰爭中美軍的“左勾拳”

《孫子兵法》在軍事領域中的應用，歷來是國外軍事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戰前的日本是如此，戰後的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也不例外。

(一) 美國陸軍作戰條令以孫子名言為警句，並將孫子思想融合于作戰原則之中 1982 年 8 月 20 日，美國陸軍頒佈了新版《作戰綱要》(Operations FM100-5)，取代 1976 年的舊版本。1982 年版首次提出“空地一體戰”理論，並把它稱為“陸軍的基本作戰思想”。該理論認為，未來戰鬥沒有明確的戰線，強調火力和機動打擊敵人的全縱深，所有可以動用的軍事力量須協調一致地行動，以求達成統一的目標。

“空地一體戰”理論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主動、縱深、靈敏和協調。就在闡述這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二章論“作戰思想”的標題下，直接引用了孫子名言：“兵貴勝，不貴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這是貫穿於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心思想。所謂“主動”，即遂行一切作戰行動時要有進攻精神。下級指揮人員必須具有極強的臨機應變能力、主動性和積極進取的精神。這一點是與孫子所說的“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篇》)的原則相一致的。“縱深”是指時間、距離和

力量而言，包括在敵方縱深遂行戰鬥，以遲滯、打垮或殲滅敵方尚未投入戰鬥的部隊等。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與孫子所說的“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以及“並敵一向，千里殺敵”（《九地篇》）等原則相符。“靈敏”指高度的靈活機動性，它要求具有靈活的戰鬥編組和下級指揮人員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判明變化中的情況並迅速作出反應的能力。這一點與孫子名言：“夫兵形象水”，“兵因敵而制勝”（《虛實篇》）相一致。“協調”原則在空地一體戰理論中，不僅適用於美軍的常規部隊，而且也適用於核和化學武器；協調一致還是美陸軍與其他軍種和盟軍聯合作戰的特點。這一原則從廣義上講是與孫子的名言“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同舟而濟，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以及“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九地篇》）等相符。

瞭解 1982 年美陸軍《作戰綱要》制訂過程的前美駐華陸軍武官白恩時（Michael T. Byrnes）上校曾撰文，指出空地一體戰理論與《孫子兵法》的內在聯繫。在題為《〈孫子兵法〉對美國陸軍空地一體戰理論的影響》文章中，白恩時說：“為了制定新的作戰理論，在利文沃思堡基地司令部和參謀學院組織了一個由軍官組成的短小精悍的班子。這個小組研究了克勞塞維茨、迪皮克、若米尼、格蘭特、富勒、利德爾-哈特、隆美爾、孫子、成吉思汗和其他人的著作，以便創立一種適合於美國傳統、當前國際環境和現有武器的新的理論。目標很簡單，就是要在速戰中以少勝多。所選定的方法被稱之為空地一體戰理論。這一新的理論所體現的特點是：在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和孫子理論之間，在火力與機動之間，在直接手段與間接路線之間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動之間取得較好的均衡。”

由此可見，美軍空地一體戰理論基礎之一是綜合了《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的精華，融克氏的學說和孫子的原則於一體。這一理論反映了美軍既側重充分發揮其兵力兵器的技術物質優勢，又強調善於運用智謀，速戰速決，以較小的人員代價取得勝利的戰略追求。

（二）《孫子兵法》走進美國軍事學院的課堂和圖書館 據前西點軍校教官愛德華·奧多德的調查研究，早在 1921 年美國陸軍軍事學院就將《孫子兵法》列入 1921-1922 年度的授課內容，因為到 20 年代歐洲戰略思想家如利德爾-哈特和 J.F.C. 富勒都已熟知孫子的著作了。《孫子兵法》的講課提綱列為該校 1921-1922 年度講課內容的第 37 號指揮課程，授課提綱現存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美國陸軍軍事學院圖書館。

美國西點軍校直到 1946 年 3 月才收到第一本《孫子兵法》作為該校圖書館的藏書，這是由當時訪問該校的前國民黨將領康澤贈送的。據康澤在其《我的再清算》中回憶，1945 年 10 月康澤一行 4 人赴歐美考察，1946 年 3 月 4 日抵紐約，3 月下旬到西點軍校參觀訪問。“最後，到圖書館時，引導我們的人說：‘我們這個圖書館，世界各國的軍事學書籍都收藏得有。’我曾問：‘有《孫子兵法》沒有呢？孫子是中國二千餘年以前的一個偉大的軍事學家，他的書在中國軍事思想上發生了很長時間的支配作用。’他們馬上查書目，過了幾分鐘答覆說：‘沒有。’我說：‘我出國時帶有一冊，我願意送給貴校的圖書館。’他表示感謝。

我回到紐約後，另外裝了一個封面，用郵政寄去了。我當時爲什麼要這樣做？一方面是借此表示友好；另一方面是表揚中國在古代就有孫子這樣的軍事學家。”

1983年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編輯出版《軍事戰略》一書，該書彙集了古今名家學者的軍事論文，是供軍事院校用的一本重要的參考教材。書中第二章爲《孫子兵法》的摘要，由小亞瑟·呂克（Arthur F. Lykke, Jr.）上校編選。標題是《軍事戰略的演變——孫子的智慧》，文章開頭用了利德爾-哈特高度評價《孫子兵法》的話，接著指出“《孫子兵法》儘管成書於西元前五世紀，但該書論述戰爭的基本原理和原則，其思想至今猶有重大意義”。隨後根據與當前有關的題目，分十項精選出“十三篇”中的18小節。這十項分別是：1.兵法的“善之善者”，取自《謀攻篇》；2.用兵者的“善之善者”，取自《形篇》；3.用兵之法，取自《謀攻篇》；4.論戰備，取自《九變篇》；5.詭道，取自《計篇》；6.進攻方法，即奇正，取自《勢篇》；7.論機動，取自《軍爭篇》；8.論長久作戰，取自《作戰篇》；9.將有五危，取自《九變篇》；10.論大公無私，取自《地形篇》。編者選用“進不求名，退不避罪”這一段話作爲對指揮官的要求，同時作爲文章的結尾，意味深長。孫子的原話均採用賈爾斯的英譯文，利德爾-哈特的評價則取自格裡菲思的英譯本。1986年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軍事戰略》的中譯本。

## 20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7)

（三）《孫子兵法》在局部戰爭中的應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局部戰爭成爲戰爭的一種主要形態。史實表明，在局部戰爭中，勝利往往是屬於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孫子兵法》的一方。1971年的印巴戰爭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足以佐證。

1.第三次印巴戰爭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來，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後發生過三次戰爭。1948年和1965年的兩場戰爭均無最後的結果，惟1971年的戰爭印度大獲全勝，肢解巴基斯坦成功，孟加拉應運而生。對於這場戰爭，《印度軍史》的作者用孫子的思想總結了印軍取勝的原因。他說：“由於這一次戰爭的政治目的清楚明白，我三軍參謀長在我軍越過邊境之前已極詳細地制訂好計畫。因此，三軍協同臻于完善，三軍計畫的實施強勁有力。在東面，（東部軍區司令）阿羅拉按孫子的名言‘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行事。戰術計畫是包抄、翼側迂回，到達達卡；而不是因進攻邊境的築壘重鎮被箝制住。著名的軍事理論家J.F.C.富勒少將說過：‘正如我們目前的政策是摧毀敵人員那樣，我們新的理論應是摧毀敵指揮部。’阿羅拉以閃擊進取達卡真正做到了這一點。再一次援引孫子的話：‘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印軍在孟加拉的所作所爲的確確是照此做了。”

無獨有偶，美國1986年出版的《現代戰略創始人》一書中的《核時代的常規戰》一章，專門論述了印巴戰爭。有意思的是，文章提到利德爾-哈特的“洪水氾濫”理論，而利德爾-哈特自認爲其理論已被孫子的“夫兵形象水”概括無遺，文章還以畫龍點睛之筆將勝利歸於孫子的原則：“這場戰爭是遵循利德爾-

哈特‘洪水氾濫’理論的一場真正的閃擊戰，而該理論源出自德軍在 1918 年 3 月西線攻勢中所採用的戰術。它包括敵軍陣地的一切弱點，採取類似水流繞過河床障礙的樣式，穿插部隊，避開敵軍的抵抗。印度的目的是有限的，這場戰爭完全遵從孫子的原則達到了這一有限的目的。”

2.海灣戰爭 1991 的海灣戰爭起因于伊拉克於 1990 年 8 月 2 日侵佔科威特。這場戰爭開始於 1991 年 1 月 17 日，經過戰略轟炸和地面作戰兩個實戰階段，在 1991 年 2 月 28 日結束，伊軍戰敗，被迫簽訂停火協定並撤出科威特。美軍所實施的軍事行動計畫，其成功之處在很大程度上與孫子的謀略思想有著聯繫，即勝利的因素閃爍著《孫子兵法》的光芒。

(1) “沙漠盾牌”行動 (OP Desert Shield)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侵佔科威特後，美國迅速作出反應，因為美國已經為應付波斯灣危機制訂了計畫，7 月份中央總部司令施瓦茨普夫上將曾按計劃舉行了代號為“內部觀察 90”演習，對實施應急計畫的戰前準備有所嘗試。8 月 6 日美國總統下達第一道在海灣部署作戰部隊的命令。8 月 7 日中央總部開始部署戰鬥部隊，標誌著“沙漠盾牌”行動的開始。無論從軍事思想或作戰計畫角度看，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都做到了孫子所說的“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在戰爭指導方面，美國不僅憑藉其高技術武器的優勢，而且自始至終重視貫徹孫子的“上兵伐謀”思想。美國在戰前和戰爭過程中十分注意分析研究薩達姆的政治謀略和軍事戰略，充分利用其戰略上的失算和錯誤估計，實施有力的軍事打擊，粉碎薩達姆的戰略意圖，打亂其戰略計畫，摧毀其戰略指揮系統等。同時防止貿然行事，避免落入對方政治計謀的圈套。正如美國國防部在總結海灣戰爭的報告中所說：“總之，聯軍取得了孫子所說的最大成功，即‘上兵伐謀’。薩達姆的戰略是通過使聯軍遭受傷亡消磨其意志，通過使以色列捲入戰爭瓦解聯盟，通過使以色列遭受傷亡聲稱阿拉伯人取得了勝利。薩達姆本指望聯軍會落入其圈套，但他大失所望。……”

在意思的是，在海灣危機階段或臨戰前，美國輿論界的有識之士和海軍陸戰隊將領都很重視研究《孫子兵法》。例如，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副主編格林于 1990 年 12 月 16 日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稱：“我願意想像布希總統的床頭櫃上有一本《孫子兵法》，並且不時閱讀它，以便在海灣危機中對他加以指導。在我的想像中，我看到，孫子的一些話已經被標出來，並且還在書頁邊作了一些批註……。”接著他從“十三篇”中選出 10 句或 10 小段孫子名言並聯繫實際作了批註。再如，1991 年 2 月 18 日美國《洛杉磯時報》報導稱，《孫子兵法》是亞洲各軍事學校長期受到尊重的讀物，它的許多格言，已引起美國部隊的興趣，並對美國陸戰隊的基本戰術變革亦有貢獻。報導接著說，1990 年 8 月起，一本 90 頁的英譯《孫子兵法》，已經運往沙烏地阿拉伯沙漠，供應年輕的陸戰隊隊員閱讀。報導還說，陸戰隊指揮官凱利將軍已于當年將這本書列為年度讀物，即每個陸戰隊隊員都應該閱讀。凱利認為《孫子兵法》是所有機動戰的基礎。

(2) “沙漠風暴”行動 (OP Desert Storm) 標誌著戰爭爆發的“沙漠風暴”行動於 1 月 17 日凌晨開始。它不同於“沙漠盾牌”行動的“威懾與防禦”，而

是迫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這次行動至少有 3 點與《孫子兵法》的原則不無聯繫。其一，“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美國轟炸的首要目標是伊拉克的 C3I 系統和一體化防空體系，使伊拉克最高層指揮官喪失指揮能力，動搖其決心，挫敗其作戰意志。一旦指揮和通信系統陷入癱瘓狀態，巴格達和科威特戰區的司令官就會懵然不知所措。如簽訂停火協定時伊拉克副參謀長和第 3 軍軍長對戰俘概數和戰局進展，昏昏然一無所知，便是明證。其二，“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孫子所說的“治氣”之法在空中戰役的中後期也被採用。從“沙漠風暴”行動的第三周起美空軍攻擊重點轉向科威特戰區，與此同時對伊軍開展心理戰。美直升機通過廣播和散發傳單，號召伊軍投降，並告誡他們遠離他們的武器裝備，因為這些武器裝備正是聯軍空襲的目標。在散發的傳單上還畫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學校，說明薩達姆偏偏在這裡設置坦克、高炮等武器裝備；傳單要讓伊軍士兵知道是薩達姆正在故意危害他們的宗教和家庭。其三，“用間”手段在高技術戰爭中仍不可或缺。為實施精確打擊，衛星偵察、空中預警機對目標的搜索以及其他各種技術偵察手段，都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同時情報人員對目標的選定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沙漠風暴”行動精確打擊橋樑之目的，主要是摧毀伊拉克的通信系統。而完成這一任務得力於“用間”。

##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8)

(3) “沙漠軍刀”行動 (OP Desert Sabre) 從 2 月 24 日開始到 28 日的地面進攻結束了海灣戰爭。在 100 小時地面戰鬥的“沙漠軍刀”行動中，聯軍以極小的代價獲得全勝，除得益於空中戰役的戰果外，地面戰鬥計畫的制訂和實施均有其“成功出眾”之處。其一，用兵謹慎，“強而避之”。在制訂地面進攻計畫時，慎之又慎，經過作戰部門、年輕的“傑迪騎士”班子和中央總部司令的反覆研究，費時 3 個月才作出最後的作戰方案。即從原來擬定用 1 個軍的兵力從沙烏地阿拉伯向科威特實施正面直接進攻，更變為用 2 個軍的兵力從巴廷幹河以西，插入伊軍主力後方，實施主攻。1990 年 10 月 22 日，美參聯會主席科林鮑威爾敲定了這個方案，並形象地稱為“左勾拳”行動。其二，“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左勾拳”行動以第 7 軍為主力，第 18 空降軍配合。後者直插伊拉克縱深，切斷科威特戰區伊軍與後方的聯繫；第 7 軍在其東側平行北進，然後向東進攻，殲滅伊拉克共和國衛隊。由於伊軍在其西南部的沙漠地帶防守空虛，聯軍部隊“攻其無備”，長驅直入，進展神速。伊軍土崩瓦解，不到 5 天戰爭即告結束。其三，“兵者詭道”。“左勾拳”得逞關鍵是美軍實施了成功的軍事欺騙。美國防部長迪克·切尼在《海灣戰爭：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後報告》中稱，美軍的欺騙行動十分成功，一方面海軍陸戰隊在科威特沿海進行兩栖登陸演習，使伊拉克認為兩栖登陸是聯軍進攻計畫的一部分，從而牽制住伊軍幾個師的兵力；另一方面，美第 7 軍和第 18 空降軍從科威特以南的原集結地向西轉移了幾百公里後，美軍還發送掩人耳目的無線電信號，造成這兩個軍仍在原地的假像，使伊拉克對聯軍的“左勾拳”毫無準備。在聲東擊西中，打出的“左勾拳”真正做到

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而擊虛”，一鼓作氣達到了戰爭的目標。

四、《孫子兵法》在非軍事領域中的研究與應用：二戰結束後，日本率先將《孫子兵法》用於商戰；歐美國家與馬來西亞等國也有相關著作問世；在西方，孫子研究開始擴展到人文科學的領域

#### （一）《孫子兵法》在經濟領域中的研究與應用

1.日本 日本在戰敗的廢墟上重建自己的國家，經過約半個世紀的時間一躍而成爲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除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條件外，主要靠的是“日本人獨特的民族認同感，日本民族社會的凝聚力，日本社會喚起共同意向的特殊能力和堅韌不拔地追求較長期的戰略目標”。日本一貫重視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以振興其經濟，而融兵法於企業管理之中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也爲其發展經濟起了推動作用。在這方面，大橋武夫所編著的《兵法經營全書》十卷是代表之作。

（1）大橋武夫的“兵法經營術” 大橋武夫戰前爲日本陸軍中校、東部軍參謀，戰後出任東洋精密工業公司總經理、董事長，在一家東洋鐘錶公司瀕臨倒閉之際，毅然接管了其中之一的小石川工廠。他將《孫子兵法》運用於經營實踐，很快使企業起死回生。他重建的東洋精密公司也名聲遠播。他撰寫的《用兵法指導經營》一書，曾引起經營界的巨大反響。幾十年來，大橋爲企業作過數千次專題演講，寫出了 30 多本關於應用兵法經營的書，後來又編著了一部長達 10 卷的《兵法經營全書》。大橋武夫說：“這種（兵法）經營方式比美國企業經營更合理，更有效。”

作爲日本智力公司兵法經營塾長的大橋武夫，著作等身。其中一本篇幅不長的《兵法經營要點》已於 1989 年譯成中文。這是一本集東西方兵家名言及其他諸家警句於一體的手冊，可供企業經營者研究參考。全書分：企業經營的秘訣，企業主要領導人的經營體會，統率指揮，人才和組織，經營戰略，情報活動，市場作戰七章。選用了孫、吳、孔、孟及馬基雅維裡、克勞塞維茨等人的名言警句共 230 條，其中中國諸子（主要是兵家）之言共 156 條，占了大部分。大橋在該書的前言中十分強調兵家名言的啓迪作用。他說：“作爲經營者，有時會陷入一籌莫展的絕境，不得不在痛苦中掙扎。當已到達絕望的頂點時，突然如夢方醒，在反覆閱讀的兵書中發現了一副救命良藥——警句。這時深爲自己的無效努力羞愧不已。”作爲一個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大橋從兵書名言中得到不少啓迪。例如，依據《三略·上略》所說：“將可樂而不可憂，將憂則內外弗信。”大橋認爲企業處於困難時，經營者應當有“上場”亮相，明確表明自身存在的意識。不可憂心忡忡，而要紅光滿面，充滿信心，以便盡最大努力鼓舞部屬的士氣。再如，企業家在商戰中“不能莽撞而進”。這是根據孫子的名言“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提出來的。面對激烈的商戰和繁忙的工作，大橋的體會是：“我們搞經營企業的人，面對紛繁的工作，必須周密考慮安排。究竟什麼是馬上要做的？什麼是暫時可以不做的？應該如何去做？怎樣才能成功？”

（2）非軍人出身的日本企業家也很重視兵法經營 日本眾多非軍人出身的老

企業家也很推崇《孫子兵法》。例如，日本麥肯齊公司董事長大前研一將《孫子兵法》稱為“最高的經營教科書”。聲稱：“沒有哪一本書能像《孫子兵法》一樣為我們提供如此豐富的經營思想。它有著取之不盡的戰略思想，每次讀它，我都湧出無限的想像力。”再如，日本著名的松下電氣公司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刻意創新，力求產品“適銷對路”，發揚孫子的“攻戰取勝”的主動性，一旦定下決心就雷厲風行地貫徹，其作風有如孫子所說的“風、林、山、火”。1964年10月，松下決心不再推廣研究開發達5年之久、耗去巨額資金的大型電子電腦，因為他當時已完全意識到“小型化、大容量、高速度、低成本”是未來電子電腦的必然發展趨勢。松下當機立斷轉向開發積體電路的家用電器，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松下在其公司內部創辦企業文化也是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通過營造企業的文化氛圍加強對員工的管理教育，因為企業文化要塑造出該企業員工應持有的價值標準、信念、態度、作風和行事準則。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孫子在《行軍篇》中所說的“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只有通過企業文化養成高素質的員工隊伍才能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和生產出使“顧客滿意”的產品。

## 20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9)

歷經滄桑的八百伴超市公司，當年原是個蔬菜店，經營著以伊豆半島為中心的地方性的超級市場。面對強大的國際性連鎖店的銷售，八百伴承受著沉重的競爭壓力。八百伴董事長和田遵循了孫子的“圍地則謀”的原則，利用盛田昭夫的“間隙理論”，選准間隙並將這些“間隙”聯結起來，發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田立即著手計畫到國外開設地方性超市事宜，先在巴西，後在新加坡等地，逐步聯結起“間隙”。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八百伴的國外分公司已擴展到12家，員工達6千人，年營業額2.5億美元。90年代後，八百伴瞄準了我國上海浦東開發區，投資在浦東興建了一家大型的超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使日本企業界蒙受損失，八百伴也在劫難逃，宣佈倒閉。但由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形勢良好，金融風暴未能肆虐，八百伴的這家上海分支碩果僅存，逃過了劫難。

東京都八王子市綠町的和光一級建築士事務所是一家小型的企業，社長服部千春致力於《孫子兵法》的研究與應用。在日常工作中，他重視對員工用孫子名言進行管理和教育。在潛心鑽研《孫子兵法》多種版本之後，服部千春於1987年出版了《孫子兵法校解》，該書校勘嚴密，博得好評，也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他在日本國內還經常舉行講座，如發表題為“孫子與經營”的演講；在報張雜誌上發表有關孫子的文章，如在《總裁》雜誌1997年第1期發表《孫子兵法》研究的專輯等。1995年又在原《校解》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充實，編寫了《孫子兵法新校》，並作為博士論文交南開大學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經審定通過授予文學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摘要中，服部千春稱：“研究孫子學乃學生一生追求的崇高事業，今將歷經三十餘年潛心鑽研心得匯成本論文，今後仍將持之以恆，繼續探究《孫子兵法》之奧秘，並以此為新起點，期有所成。”一個日本的企業家對《孫子兵法》有如此執著的追求，並且學有所成，在校勘和應用

方面不斷取得成果，這是難能可貴的。

(2) 歐美國家 1989 年，加拿大學者與中國學者合著的《孫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一般應用》一書出版，具有寓意的是，這一年恰逢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成立和舉行第一屆研討會。該書的兩個作者分別為：加拿大馬克馬斯特大學金融、工商經濟學教授陳萬華 (M.W.Luke Chan) 和南開大學管理學系教授陳炳富。兩作者在“導論”中指出：“《孫子兵法》不僅是一本論述戰略管理的書，而且是一本涉及成本管理、銷售學以及人生哲學和通過競爭取勝的書。……儘管孫子談的是有關軍事問題，但其論述有著極大的普遍意義，他的理論和原則涵蓋了廣闊的時間和空間，因此完全適用於任何類型的商業活動。”該書根據“十三篇”結合現代商業活動特點，提出了《孫子兵法》在管理中一般應用的 6 項原則：最大最小原則，即以最小的人員和資金投入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有效產出；激勵原則；時間和效率原則；適應環境變化的原則；情報原則；組織原則。關於組織原則，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對此，諾貝爾獎得主 H.A.西蒙教授表示贊同，他認為，一個理想的組織就是該組織的全體成員表現出統一的意志。孫子的一條重要的組織原則是“治眾如治寡”，即簡明扼要。對此，西蒙也表贊同。

正如《孫子兵法》被推崇為管理理論的先驅那樣，美國的著名管理學家喬治在《管理思想史》一書中告誡管理者，“你想成為管理人才嗎？必須去讀《孫子兵法》”。在一些設有工商管理學碩士 (MBA) 學位的美國高等學府中也都將《孫子兵法》納入學生的閱讀材料。在現代戰略管理學中，有一個叫做 SWOT 的概念，它包含 4 個因素，即“強弱、機遇和風險” (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s)。“強弱”指優勢和劣勢，是與競爭者相比，組織在某些領域或某競爭手段上的強項或弱項；“機遇”能帶來重大的利益，但它較多地來自創新。而“風險”則指外部的威脅，會損害甚至斷送組織的利益，它經常涉及競爭對手。通過 SWOT 分析研究所形成的基本策劃是實現戰略管理的有效途徑，也是“知彼知己”制訂經營戰略的重要依據。來華講授經濟學的美國學者約翰·阿利 (John Allee) 從行銷學的角度，把 SWOT 分析法和《孫子兵法·虛實篇》聯繫在一起。他指出：“《孫子兵法》的虛實之分及其宣導的以實擊虛的效果，與現代 SWOT 分析方法的效果如出一轍。SWOT 分析法是行銷中流行的策略性方法。這種方法給出公司強弱的領域，給出市場的機會與風險。應用實力去追尋機遇的觀點可以說是《孫子兵法》的再版。這完全是換一種說法說出了我們計畫要做的事情。”阿利在研究《孫子兵法》與銷售戰略的關係中，特別重視“地形”、“詭道”和消費者諸要素。他認為消費者的需求是現代銷售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地形”可指動態的市場條件，而“詭道”則是銷售的必由之路。他在分析了 11 項詭計在商業中的應用後，指出“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在現代銷售中的含意是：尋找機會在消費者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向消費者進行宣傳，開展別人意想不到的推銷服務。要富於想像力，發現可以向消費者推銷而他們又毫無準備因而不會拒絕的東西。阿利接著指出，“詭道”是一門藝術，有著更廣泛的含義：“詭道是銷售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正如競爭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一樣。在叫做銷售學的這門學科內神奇方面和

世俗方面是密不可分的。沒有必要對此提出指責，更不要不好意思，情況就是這樣。”至於《孫子兵法》與現代商戰的關係，阿利認為，步入市場經濟的中國對此尤須重視：“在整個書中，孫子向我們指明如何利用土地（市場）提供的有利機會，如何運用做買賣的實際訣竅，以及如何智勝競爭對手。這些論述越來越具有現代意義。隨著中國本身也進入混合市場經濟，這部書對中國越來越切合實際需要。《孫子兵法》雖然古老，卻可能成爲未來的藍圖。”

## 20 世紀國外關於《孫子兵法》的應用(10)

英國研究經濟管理的學者也很重視孫子的原則在現代管理和商戰中的應用。香港大學的英國學者布賴恩·斯圖爾特和吉伯特·翁撰文稱，中國自己的傳統著作中充滿了管理方面的聰明見解。孫子提出的“五事”——道、天、地、將、法，與管理學相應的提法：政治、道德、法律環境，經濟氣候，市場與競爭，管理人員，方法，資源及本單位紀律，這五個方面是一致的。作者還認為，孫子所說的五個因素，前三個“道、天、地”是人生的外在條件，一個領導人必須研究和認識它們，卻無法改變和控制它們，他只能利用那些最有利的特點，在制定計劃時將它們考慮在內。後兩個因素“將、法”則是內在的，一個領導人可以在其企業內部培養、改變和創造它們。此外，“知彼知己”，至關重要，這關乎企業的決策和商業活動的成敗。搜集商業情報，充分利用大量公開材料進行市場分析研究，不可或缺。關於“詭道”，他們認爲是“遇到了一個複雜的道德問題”。不能排除在競爭中公關人員利用暗示的方法進行欺騙宣傳，也不能排除對手的商業諜報活動。因此，有必要保護商業秘密，包括各種商業思路和想法在內。

3.馬來西亞 在華族占 35%的馬來西亞，其國家文化具有多民族的特色。中國傳統文化在馬來西亞有著深遠的影響。據說，大馬首相馬哈迪（即總理馬哈蒂爾）一生最重視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孫子兵法》。在一次演講中，大馬首相對《孫子九地篇》情有獨鍾，將“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等句，演繹得入木三分。在馬來西亞不僅有“帛書”和孫子學專家鄭良樹，而且還有像呂羅拔那樣的學者兼商家。呂羅拔於 1991 年在吉隆坡組建大馬孫子兵法學會，任歷屆會長。十年來在民間講演從未間斷，在新、馬兩國作孫子及有關思想講演會 300 多場，撰寫講義 200 多篇，發表的有關論文 90 餘篇，著作有《我與孫子》、《孫子兵法散論》等。在吉隆坡每星期日下午的演講會，富有吸引力，經久不衰。呂的著作行文流暢，說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如《轉虧爲盈的新法則——探討〈孫子兵法〉的目光所及》一文，集古今中外的學問於一體，對從商者頗有啓迪。

### （二）《孫子兵法》在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與應用

與西方的軍事思想不同，孫子的用兵原則涵蓋著抽象的謀略和“以利動”的高超的鬥爭藝術，它可以適用於軍事以外的各個領域。波蘭學者石施道指出：孫子的理論認爲，戰爭具有普遍意義，涉及各種規模的鬥爭（因此很容易把那些規則用於其他形式的競爭，用於社會關係矛盾或用於市場競爭），而克勞塞維茨和

西方的思想一般把鬥爭規則看成只適用於自身領域。因此，在西方軍事思想中戰略和戰術相分離，把戰爭規則應用於民事生活與和平的社會關係中是不可想像的事。石施道在其題為《孫武——中國行為學、鬥爭哲學和科學的創始人》的論文中，高度評價了孫武理論的學術價值。指出孫武在中國古代思想領域裡，獨樹一幟，對中國的社會科學思想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文章分三部分：孫武對科學思想發展的作用；孫武的鬥爭哲學；孫武與西方的行為學。概括起來，孫武理論的特點有三，即它的科學性、開放性和開拓性。石施道還談到，孫武的理論在規範中國人的思想和文化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同孔子和道家一樣，兵家思想通過各種方式，如歷史、小說、故事、戲劇等，廣為流傳，家喻戶曉。“因此，從人類學的觀點看來，權謀派以及孫武的著作，都應列入最重要的學派。要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以及中國人的心態有真正的瞭解，就需要不僅懂得孔子的‘仁道’，而且懂得中國的行為學和孫武提倡的‘詭道’。”必須指出，石施道的結論有失偏頗。一是誇大了兵學原則在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影響；二是抽掉了“詭道”的前提，孫武所言戰爭中的“詭道”目的在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其實質是“以少勝多”；就連《戰爭論》也有“戰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需要使用詭詐”的主張。三是將“詭道”和“仁道”與中國行為學並列，不僅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而且顯出邏輯上的混亂。因為儒家的“仁道”在中國的傳統中根深蒂固，而“詭道”即使用於鬥爭領域和競爭行為也是有條件的：一方面要適合於鬥爭或競爭的環境要求；另一方面，必須銘記孫武所言“兵者詭道”是爲了攻戰取勝的“安國全軍”之道，決非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

有意思的是，石施道還從《紅樓夢》的遣詞造句與人物塑造中探討中國人的行為學。他將《孫子兵法》的研究與應用擴大到文學領域，不失爲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能否成爲研究紅學的一種新的思路，那是文學界探討的問題了。

#### 附一：“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證偽

1996年下半年以來人們所說的關於“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以下簡稱“八十二篇”)的真偽問題，應包括載體真偽和內容真偽兩個方面的含義。載體真偽是指此書是真“漢簡”還是假“漢簡”，是真的抄自民國十二年(1923年)的抄本，還是假冒民國十二年的贗品。內容真偽是指此書內容是否孫武親著，是否《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載體真偽與內容真偽既有區別，又互爲表裡，二者密切相關。

#### 與《吳孫子》篇數、內容不符

從“八十二篇”的掌握者已披露的有關材料看，該書並不是82篇，而是95篇。這與《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篇數不符。

據“八十二篇”中的《預示》篇講，其“八十二篇”是不包括《孫子兵法》十三篇的。請看其文：

“(孫武)歷時八年，周敬王四年秋而修成兵法八十一篇圖九卷，以名命簡，

定名《孫武兵法》……吾子 天機陰殺，去步圖而留大則，縮立成簡，一曰計，二曰謀，三曰形，四曰勢，五曰爭，六曰戰，七曰變，八曰實虛，九曰處軍，十曰地形，十一曰九地，十二曰火攻，十三曰用間。此爲十有三篇也，定名《孫子兵法》。所示前者，天機玄，陰氣 殺 ，故非聖明之君不可傳也，非智者賢士不可傳也，庸者不要傳也， 腥者不可傳也，故定爲家傳簡也……所示後者，百句取精……故定爲傳世簡也。此五年所定三[卷]，吾之後世子民明傳也。”

這段話意思很明確：“八十二篇”作成于“周敬王四年秋”，書名由孫武親定爲《孫武兵法》，是“家傳簡”；“十三篇”在“八十二篇”的基礎上“縮立成簡”，作成于周敬王五年，書名由孫武親定爲《孫子兵法》，是“世傳簡”。《孫武兵法》與《孫子兵法》是兩本書，“八十二篇”中不包括“十三篇”。

呂效祖所作《漢簡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張氏家傳手抄本序》中也說：

“這均說明孫武兵書除十三篇之外還有八十二篇。漢簡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張氏家傳手抄本完全證實了史書的這些記載。”

這段話也清楚表明，所謂“張氏家傳手抄本”“八十二篇”是不包括“十三篇”的。

如此說來，“新發現”的“孫武兵書”不是八十二篇，而是九十五篇。我們在史籍中沒有見到任何關於“孫武兵書九十五篇”的記載。《漢書·藝文志》只著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無《孫子兵法》十三篇，是因後者包括在前者之內，否則是不會不單獨著錄的。這早已是學界共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七錄》雲：“《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章學誠解釋說：“《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編次於中下，而爲後世亡逸者也。”他認爲，《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爲上卷，其餘六十九篇編次於中、下二卷，十三篇在八十二篇之內。畢以?則講得更爲明確，他說：“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其一爲問答若干篇，……《漢志》惟雲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俱在八十二篇之內也。”余嘉錫認爲，畢氏所考，可“以爲《孫子》之定論焉”。總之，《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是包括十三篇的，稍有點孫子文獻知識的人都懂得這一點。但“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的作者們卻恰恰不懂，他們將“十三篇”置於“八十二篇”之外，造出了一個“孫武兵書”九十五篇的東西，從而露出了作偽的馬腳。

據“八十二篇”持有者提供的“周書漢簡抄本孫武兵法”篇目中，居然還有一“篇”是《三十六策》。按，“三十六策”之名，始見於《南齊書·王敬則傳》，謂“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檀公”即南北朝時南朝宋名將檀道濟(?—436)。這裡的“三十六策”竟成了《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第81“篇”，這一“篇”中又有36“策”之多，而且還在《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那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如果這是真的話，那歷史就真成了梁啓超所說的“怪物”了。

顛倒“十三篇”與“八十二篇”成書順序

顛倒“十三篇”與“八十二篇”的成書順序

“八十二篇”中的《預示》篇講。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縮簡成“十三篇”。這與“十三篇”和“八十二篇”的實際成書順序大相逕庭。

“十三篇”與“八十二篇”成書的順序應是先有“十三篇”，後有“八十二篇”，“八十二篇”乃是孫子弟子及其後學在“十三篇”的基礎上附益而成。這是學界共識，是有充分的史實依據的。

《史記》孫子本傳兩次稱“十三篇”：一是吳王闔閭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二是“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上孫家寨漢簡孫子佚文亦有“十三篇”的記載。《呂氏春秋·上德篇》高誘注：“孫武，吳王闔閭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這裡的“五千言”也是指“十三篇”。曹操《孫子略解序》稱：“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這些記載都說明，孫武晉見闔閭時，只有“十三篇”。“八十二篇”始見於《漢書·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說：“《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為本書。”章學誠：“十三篇之自為一書，在闔閭時已然。”姚際恒：“《漢志》八十二篇，或反為後人附益。”餘嘉錫：“吳王與孫武問答，未必武所自記……此蓋戰國時人所追敘耳，至其後乃合而編之，或即劉向校書時所定著。”呂思勉：“今所傳十三篇，實為原書。《漢志》八十二篇，轉出後人附益也。”楊炳安、陳彭：“八十二篇乃是以十三篇為主題，另合其後學所衍繹、附益的六十九篇而成；原來十三篇的基本體制似乎並未打亂而保存於八十二篇之中了。”藍永蔚：“據現有資料可以看出，《十三篇》經過漢初的流傳，迅速繁衍出一系列的著作，成為長達數十萬言的洋洋大書，這也就是從《史記》所載的《十三篇》發展成為《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的根本原因。”李零：“所謂八十二篇本的《孫子》顯然正是逐步合併了漢初十三篇和陸續增益的《吳問》一類後出之作才得以編成。”“八十二篇”乃是在“十三篇”的基礎上增益而成，是學者經過科學論證得出的普遍性的結論，是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和嚴密的推理基礎之上的。但可惜“八十二篇”的造假者們對此一無所知，結果自己把自己的謊言戳穿了。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等有關孫子之文傳至東漢末年，曹操認為世人對《孫子兵法》“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於是刪掉了那些“失去旨要”的東西，只注“十三篇”，使之廣泛流行於世，其餘 69 篇則因價值不大而逐漸被淘汰，故《隋書·經籍志》已無著錄。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切”，並非完全沒有根據。這說明，《孫子兵法》經歷了“十三篇”——“八十二篇”——“十三篇”的歷史演變過程。《預示》篇的作者由於不瞭解《孫子兵法》這一流變情況，編造了一個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縮編成“十三篇”的天方夜譚式的神話，足證其是偽作無疑。

錯亂年代

房立中先生提出，《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中成書最晚的《預示》篇，其“成書年代也與銀雀山漢簡不相上下，甚至不能排除由韓信或其門客擬作的可能性，其價值相當珍貴。”但我們發現，在這篇“相當珍貴”的東西中，就有多處違背史實，錯亂年代是其一個方面。

該篇以孫武的口吻說：“周敬王十三年春，吾黃道起兵，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三萬，興兵伐楚。”周敬王十三年為西元前 507 年，而吳楚柏舉之戰實際發生在西元前 506 年冬，即周敬王十四年冬，而不是什麼“周敬王十三年春”。《左傳》載：定公四年(前 506 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自豫章與楚夾漢”，“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史記·吳太伯世家》亦載：闔閭九年(前 506 年)，“吳王闔廬……悉舉師與唐、蔡西伐楚”。《預示》篇所說吳伐楚時間比史實早了一年多。該篇記載孫武晉見吳王的時間比《吳越春秋》所記時間也早了一年。《吳越春秋》載孫武晉見闔閭的時間是西元前 512 年(周敬王八年)，而《預示》篇卻稱“周敬王七年(西元前 513 年)春，伍圓薦吾于吳”。這應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作偽者運用西元紀年換算王朝紀年時因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而犯了錯誤。另外，《左傳》記載得清清楚楚，吳攻楚的季節是“冬”，而不是“春”，“二師陳于柏舉”的時間是“十一月庚午”，《預示》篇卻記為“周敬王十三年春”。該篇是以孫武的口氣所寫，他對自己親身經歷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的時間絕對不會記錯、寫錯。文中出現了這樣的錯誤，不會是孫武之錯，亦不會是《左傳》、《史記》之錯，那就只有是作偽者搞錯了。

《預示》篇又說：“破楚一戰，傳于列國，吳王闔閭得以天下之親主也，《孫子兵法》從而傳民，吾願足矣。輔政七年，用戰勸戒，功成身退，民之情也，隱居景林，經以兵法。”這裡，作偽者是經過精心計算的。孫武既然是在周敬王七年春被薦于吳王，那麼，“輔政七年”後，自應為周敬王十四年。孫武于“周敬王十三年春”完成攻楚之戰，使“闔閭得以天下之親主”後，於十四年春“功成身退”，這個故事似天衣無縫。但由於作者把柏舉之戰的時間搞錯了，比實際時間提前了一年多，這就出了問題。柏舉之戰的實際時間是周敬王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吳軍入郢的時間為十一月二十八日，“闔閭得以天下之親主”更在其後，那麼，按照作偽者的演算法，孫武“輔政”從周敬王七年春算起，到實際破楚並成為“親主”後身退，那就絕不至是“七年”了。另外，《預示》既然是《吳孫子》中的一篇，是關於孫武事蹟的“珍貴”史料，被班固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中，班固不會置孫武“功成身退”這一重要“史料”於不顧，而妄說“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亡於後”的話。可見，班固沒有見過這篇東西。說《預示》作成于班固之前，甚至漢初韓信或其門客擬作，是沒有根據的。

《預示》篇後有韓信批語，並署“漢楚王韓信，於漢五年二月”。房立中先生說：“自漢四年二月至漢五年二月之間，韓信沒有大的軍事行為，僅接待了武涉、蒯通的遊說……在這期間他將以往收藏的孫子兵法整理、序次完畢，並於五年二月作跋語，從邏輯上是順理成章的。”這裡所說的“邏輯”也應是造偽者當時的心態。造偽者之所以署“漢五年二月”，很可能正是基於這一考慮。但這恰

恰是違反歷史事實的。漢四年八月，楚漢在廣武(今河南滎陽東北)相持時，韓信曾進兵擊楚，迫項羽與劉邦訂立和約；漢五年十二月，韓信參加了著名的垓下之戰。這樣的軍事行為還不“大”嗎？作偽者由於不懂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漢五年十二月在漢五年二月之前，錯誤地認為漢五年十二月在漢五年二月之後，因而得出漢五年二月初相當一段時間裡韓信沒有大的軍事活動，故能於漢五年二月將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整理序次完畢的結論。實際上，韓信在這段時間裡戎馬倥傯，是很沒得閒的。這說明造偽者雖有一定的歷史知識，但基礎很不扎實。韓信在漢五年一月由齊王遷為楚王，都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不可能與張良在都城共同序次兵法。楊炳安、陳彭先生指出，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其時間當在韓信被貶(高帝六年，前 201 年)至被殺(高帝十一年，前 196 年)之間。這時，秦亡未久，挾書之律未除(惠帝四年，即前 191 年始除)，獻書之路未開，在此情況下，竟得到一百八十多家，除來自咸陽祕府外，決無其他可能。”其論證是可信的。

羅根澤先生指出，“淆混史實，錯亂年代”之偽書，“誠宜析辨而雜燒之”。“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預示》正是這樣一篇“淆混史實、錯亂年代”的偽作。

#### 多有後出事實

從目前披露的“八十二篇”內容看，其中多有漢代以後的事實，足證其為後人偽作。

“八十二篇”中的《行空》篇談到：“黃帝談道，執談柄而觀盡，以空能大而（帖）天下。”這裡的“ ”亦即“ ”。典故出自舊題元代伊世珍撰《記》(實際很可能是明人所為)，此書系“子虛烏有”之類的筆記小說，語多不經。書內首載“福地”的傳說，“語皆荒誕猥瑣”，不足為信。明末張岱撰《文集》中亦有《福地記》之文，謂晉太康(280—289)中，張華為建安從事時，遊洞山，遇一仙人，“走石壁下，忽有門入”，洞中藏書萬卷，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連山》、《歸藏》、《 》等。問其地，曰福地也。華甫出，門自閉。張華回視，“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漢代著作中不會講出元、明時人編的關於晉人的神話，當是常識。

“八十二篇”中多次出現有關盤古的記載。《光明日報》1996年11月19日發表的《辨“兵法”真偽，明事實真相》一文指出：“有關盤古的記載最早見於宋代《太平御覽》卷二引三國徐整《三五曆記》，盤古原為苗族傳說中的始祖，漢代以後才被吸收入漢族創世神話序列中，因而先秦典籍中不可能有關於盤古的記載。”張敬軒等人辯解說，宋以前就有關於盤古的記載，但提不出任何三國以前就有此記載的論據。既然他們也承認盤古的事蹟最早見於三國時人的著作，當然也不能成為“八十二篇”就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依據。

再如，《拾中》篇說：“雪中之戰，車上鏈釘，馬上掌釘，卒上鞋釘……”

“馬上掌釘”是一句文理不通的話，其意當是指在馬蹄上釘掌。馬蹄釘掌在我國出現很晚。據養馬史專家謝成俠先生考證，“到目前為止，我國考古學界還沒有發現一千多年前的蹄鐵”，“姑且認為蹄鐵的應用恐怕是唐以後的事，但這也不能說是晚了。”目前所見記載出現馬蹄鐵的最早時間是十五世紀前葉，明成祖置建州衛之後。漢代之書不應有此內容。

前代之書不會記後世之事，這是辨別其書真偽的一條基本標準。“八十二篇”中屢見漢以後才有的史實、名物，足證其絕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

### 文字多偽造痕跡

“八十二篇”抄件中大量使用古字和生僻字，造偽者企圖以此證明其是抄自“周書漢簡”的古籍。但抄者又常常由於疏忽而寫出很晚才出現的簡體字。他們這樣做，恰恰暴露了其作偽的痕跡。這些字大體可分作兩類：

一是將本應為繁體的字寫成了簡化字。如《拾中》篇有“出積車居中”的話，“書理”者居然把其中的“積”寫成了“積”。按，“積”字，本讀作 zhǐ，《改並四聲篇海·禾部》：“積，音枳。”清吳任臣《字彙補·禾部》：“積，諸矢切，音枳。義闕。”這就是說，迄至清康熙時，“積”與“積”在字音和字義上還都不相干。二字可以互代，至少要晚于吳任臣的《字彙補》，漢簡中是絕不會將“車”寫為“積車”的。又，同篇中出現了簡體字“驚”。按，古代的“驚”與“驚”音、義均不同。宋人撰的《集韻》說：驚，音良，悲也；又注音諒，義與諒同，或作驚，其音、義與“警”都不相干。“驚”成為“驚”的簡體字，乃是解放後推行簡化字以後的事情。民國十二年的抄件中竟出現了解放後才有的簡化字，實在又是一個“奇跡”。

二是將沒有簡化的字寫成“繁體字”。《拾中》篇中就有多處將進出的“出”寫作“出”，如，“軍以律”，“勿以門”，“速水中”等。按，“出”字所出很晚，裘錫圭先生對此已作過考辨。這裡再作點補充。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十五載：“傳奇以一折為一。古無是字，始見吳任臣《字彙補》，注曰讀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廢。”王力先生也認為，“出”是近代產生的字”。

“周書漢簡”中居然出現了清代才有的字，豈非咄咄怪事！

關於“出”字的出處，《中國文物報》1996年12月8日發表的《〈孫子兵法〉82篇純屬偽造》一文中明確指出，此字“《改並四聲篇海》引《俗字背篇》謂出於道書，先秦及秦漢時代絕對不會有”。但房立中先生硬說“出”字“出自漢代張陵《道書》無疑”，並稱《後漢書·藝文志》中就著錄有“張陵《道書》”。對這一說法，人們是絕對不會“無疑”的。首先，《後漢書》中無《藝文志》，說《後漢書·藝文志》如何如何，這本身就是錯誤的。清人、民國時人所輯《後漢藝文志》、《補後漢書藝文》之類，那已不是《後漢書》的內容，後者距前者一千多年，這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將二者混為一談，不是無知，就是欺騙。其次，史籍中所載張陵造作道書，均是泛指道教之書，而不是專有書名。《華陽國志·漢中志》中說：“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

百姓。”《後漢書·張魯傳》謂張陵“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三國志·魏志·張魯傳》載，“張陵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中華書局等出版的以上各書點校本，均未在此處的“道書”、“符書”旁加書名號。《隋志》、《唐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官私書目中也均無著錄此書名。這裡的“道書”不是專有書名，而是道教之書的泛稱，乃是歷史常識。

但房立中先生說，《中華小字典》、《漢語大字典》都注“ ”出自《道書》。這不是事實。現將字典原釋文與房立中先生引文對照情況清單如下：

原釋文與房立中先生引文對照表

字典名稱	字典釋文	房引文
《中華小字典》	，與天同，出道書，見《篇海》。	，與天同，出《道書》、《篇海》。
《漢語大字典》	，同“天”。《改並四聲篇海·青部》引《俗字背篇》：“，與天同，出道書中。”	，同天，《改並四聲篇海·青部》引《俗字背篇》：“與天同，出《道書》中。”

從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出，兩字典釋文中“道書”二字均未加書名號，房先生引文中的“道書”卻都加了書名號，並謊稱他的這兩段引文就引自該兩部字典。房先生的眼力當不至差到連字典釋文有無書名號都看不清的地步。這種故意篡改文獻典籍以欺騙輿論的做法大不應該。且張陵造作道書在永和六年(141年)，時班固已去世半個世紀。無論如何這都不能成為“八十二篇”就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的證據。房先生為此扯謊，實無必要。

#### 抄本來歷不明

我國古代偽書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大都來歷不明。持有者為了說明其書是真的，都要編造一個關於此書來歷的離奇故事：或謂得自墓穴，或說來自牆中，或言出於戚屬，或稱受之某母某女等。也有前世已佚，經若干年後突然出現或被史籍無故著錄的，都屬來歷不明者。這些來歷不明的書經後人考辨，大都被確認為偽書。故梁啟超據此總結出判斷偽書的方法之一，就是“從書的來歷曖昧不明而定其偽”，認為對這種書，“可以徑從其奇離而斷定為作偽之確證”。

“八十二篇”的出現，也有一個離奇的故事。其大體情節是：持有者張敬軒是清光緒時進士、晉陝名人張瑞璣之孫。張瑞璣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赴陝西韓城任知縣途中，用重金買下了《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漢簡。1923年，張瑞璣辭職回家，與其二子張聯甲在西安共同“書理”這些漢簡。張瑞璣去世後，

張聯甲“遵照父訓”，終將此書竹簡“書理”成冊。“文革”時，張聯甲採取“毀簡保兵法”的策略，主動將竹簡“裝滿架子車”，送到西安藥王廟門前大坑內燒掉，又在“紅衛兵”監督疏忽時，從火中抽出一捆即將點燃的竹簡(即“八十二篇”中的第三十一篇)，“從而幸運地保存了一件漢竹簡的原物和張瑞璣父子書理竹簡的墨蹟手稿”。張聯甲去世後，第三十一篇兵書竹簡(共 27 枚)和手稿由其子張敬軒保存至今。

這個故事荒誕離奇，破綻很多，完全是持有者向壁虛構的謊言。

據張瑞璣真正親屬的揭發材料證實，張聯甲與張瑞璣根本無血緣關係，所謂張聯甲是張瑞璣的二子，純系捏造。這就使“張氏三代護國寶”的故事不攻自破，漢簡來自“張氏家傳”的說法成爲無稽之談。

“近兩千年”前的竹簡在沒有科學度藏條件的情況下，在地上不可能保存到現在，更不可能經得起那樣折騰而保存完好；且持有者對漢簡形制的描繪也證實了其對漢簡的無知。所謂張敬軒家中至今還保存有 27 枚漢簡的說法亦是謊言無疑。

經專家鑒定，持有者拿出的所謂抄自“民國十二年”的抄本“原件”，實際抄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證明持有者在“抄本”問題上也是在搞欺騙。

總之，“八十二篇”持有者張敬軒等人是晉陝名人張瑞璣之後的身世是偽造的；“八十二篇”“抄自漢簡”、張敬軒至今還保存有 27 枚家傳漢簡的說法是虛假的；抄本由張瑞璣、張聯甲共同書理於民國十二年的說法也是騙人的。“八十二篇”這樣“曖昧”的來歷，理所當然地應作爲斷定此書爲偽書的一個重要依據。

總之，“新發現”的“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無論從篇章構成上看，還是從內容反映的史實、典故和器物看，抑或是從文字使用和改動情況及其不明來歷看，都堪稱僞跡昭著。文中許多內容是漢代所沒有的。元、明、清甚至更晚才有的史實、器物、文字等，書中卻屢屢出現，這決不是一句“竄入後人文字”的話所能遮蓋得了的。此書是冒稱《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僞作，乃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 附二：《孫子兵法》研究論著知見錄

說明：1、1993 年以前的《孫子兵法》研究論著目錄，請參看于汝波主編《孫子學文獻提要》，該書由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2、此目錄分著作和文章兩類，分別按出版（發表）時間爲序排列，同一時期出版（發表）的，則按題目文字筆劃順序排列。3、各目錄構成要素：著作類爲書名、作者名、出版社名及初版時間；文章類爲文章名、作者名、報刊名及發表時間。同一論文集中有多篇與孫子有關的論文者，只在第一篇論文後著錄出處，並括注“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不再重複著錄出處。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

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知見錄

一、著作

1993年

- 中國古兵法[白話]精粹 李啓、姚有志選編 軍事譯文出版社 1993年1月  
孫子兵法與炒股實戰 100計 謝志強等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年1月  
孫子兵法——制勝武經 包繼英編著,春風文藝出版社 1993年2月  
兵法謀略——現代企業經營決勝之本 丁傅、穀弘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1993年2月

- 孫子兵法今譯今注 齊光譯注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3年2月  
孫子研究在日本 [日]佐藤堅司著,高殿芳等譯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3年2月

評析本白話諸子集成 王甯主編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1993年2月

中國智慧精典 薛貽康等編著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3年3月

白話兵法大觀 黃樸民等編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年3月

孫子兵法新譯 朱軍著 海潮出版社 1993年3月

孫子兵法辭典 吳如嵩主編 白山出版社 1993年3月

孫子兵法鋼筆字帖 任玉濤書 河北大學出版社 1993年4月

孫子探勝——第三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論文精選 本書編輯組編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3年4月

孫子集成 謝祥皓、劉申寧纂輯 齊魯書社 1993年4月

《孫子》精粹新編 黃志賢等編著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3年4月

厚黑孫子兵法 金楓編著 金城出版社 1993年4月

孫子兵法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 倪子蘭著 濟南出版社 1993年5月

漢英對照《孫子兵法》 潘家玠、劉瑞祥英譯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3年5月

兵家妙語選 王建偉編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3年5月

孫子兵法與經營決勝謀略 吳成編 湖北美術出版社 1993年5月

股市兵法 郭海培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5月

人生謀略九大兵書 胡平主編 團結出版社 1993年6月

中國兵書十種 徐子宏等編 湖南出版社 1993年6月

鬥智奇謀——孫子兵法百例應用 董際平、楊坤偉編著 同濟大學出版社

1993年6月

四庫全書精華 宋德全等編 大連出版社 1993年6月

先秦秦漢三國兵書名著精華 王寶元等主編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年6月

兵聖兩孫子(連環畫) 莊宏安等圖、劉慶等文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7月

孫子神術 閻勤民編著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1993年7月

中國謀略大典 吳井田編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3年8月

孫子與齊文化——海峽兩岸孫子與齊文化學術討論會文萃 逢振鎬主編 石油大學出版社 1993年8月

- 孫子兵法與帶兵之道 李建中著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3 年 8 月
- 孫子兵法與市場競爭 黃志賢等著 八一出版社 1993 年 9 月
- 孫子兵法函授講義(上、下) 《孫子兵法函授講義》編寫組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 1993 年 9 月編印
- 百戰百勝的兵法——孫子兵法 普穎華等編 遼沈書社 1993 年 10 月
- 孫子賺錢商法 [日]河野守宏著 傅志道譯 長春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
- 戰法與計謀——中外古今兵家名著大觀 何太田等主編 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
- (漢英對照) 孫子兵法 [英]賈爾斯英譯 程郁、張和生校注今譯 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
- 孫子兵法與現代企業經營謀略 暴奉賢編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 月
- 諸子精華今譯 王頌民、孫通海主編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
- 豐增秀俊選集 [日]豐增秀俊著、黃仁義等譯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3 年 12 月，
- 文史英華叢書 白壽彝等主編 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與下海實踐 吳崎、蔚然主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與市場行銷研究 王文舉主編 中國商業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與跨國經營 徐振利編著 對外貿易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孫子傳 黃堯德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精解 葉琦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孫子名言妙用史證 邱復興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錄音帶) 趙忠祥播講 山西教育音像出版社 1993 年
- 1994 年
- 《孫子兵法》與經濟發展戰略 吳岐山編著 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1 月
- 孫子兵法教本 劉春志、劉思起著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1 月
- 兵書觀止 房立中主編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1994 年 1 月
- 兵法商戰謀略全書 肖尙弼著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1 月
- 中國古代兵法大全 萬同林主編 國防工業出版社 1994 年 2 月
- 兵法謀略與企業競爭 虞祖堯、沈恒澤主編 企業管理出版社 1994 年 2 月
- 《武經七書》今譯 肖遲等譯 煤炭工業出版社 1994 年 2 月
- 商用孫子兵法 王東華編著 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2 月
- 古兵法今用——商戰韜略 200 王長遠、陳兆祥 李俊民編著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4 年 2 月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2)
- 孫子兵法與市場謀略 唐突生編著 青島出版社 1994 年 3 月
- 《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戰略 曹鳳高等編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6 月

- 孫子兵法與市場行銷 王文學主編 中國商業出版社 1994 年 7 月
- 孫子兵法解說 吳如嵩 于汝波主編 金盾出版社 1994 年 7 月
- 歷代兵法注釋 孫金城注釋 敦煌文藝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 孫子兵法 孫曉玲編著 武漢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 孫子兵法鋼筆字帖 盧中南書 金盾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 孫子兵法辭典 趙國華等主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 孫子兵法與市場經濟 高增廈等主編 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4 年 9 月
-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鋼筆多體字帖 梁孔政書 中國物資出版社 1994 年 9 月
- 生意經與孫子兵法 居商編著 學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
- 中國軍事藝術——兵法謀略在當今社會之應用 本書編委會編 北京出版社 1994 年 9 月
- 兵聖孫子與蘇州 蘇州市孫子研究會編 古吳軒出版社 1994 年 9 月
- 孫子學文獻提要 于汝波主編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
- 孫子評傳——一代兵聖的生平與思想 黃樸民著 廣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
- 謀略大典 蘇曉東、曾君華編著 黃山書社 1994 年 10 月
-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 鈕國平等編 中國人事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
- 文韜武略——中華智謀精品集萃 王清雲、遲玉收主編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百戰百勝——孫子兵法 普穎華、華名良主編 中國物資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孫子語錄 鮑民、陳莉菲編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 曹書印譯注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大辭典 古棣主編 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現代商戰與古兵法 劉凡編著 武漢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最新白話例解孫子兵法 杜確等編著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諸子百家大辭典 劉冠才等主編 華齡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袖珍本) 陳石平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德漢對照) 吳如嵩、吳顯林主編 人民中國出版社 1994 年
- 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管理 黃廷照等編著 天津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 孫子妙計炒股 侯以往、李建新 山西經濟出版社 1994 年
- 武經七書(繪畫本) 黃頰 哈爾濱出版社 1994 年
- 1995 年
- 孫子 楊書案著 中國文學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 孫子兵法與現代經濟運籌 李鼎文主編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 孫子兵法硬筆四體字帖 熊少軍書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 孫子兵法博義 朱軍著 海潮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 孫武 韓靜霆著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 孫子兵法與經營戰略 週三多等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2 月
- 孫子兵法 江小濤編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年 4 月
- 孫子兵法 王華偉校譯 東北朝鮮民族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5 月
- (原注)孫子兵法 公孫道明編 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5 年 5 月
- 孫子·尉繚子治兵語錄 劉強編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 1995 年 5 月
- 白話孫子兵法 普穎華、黃啓寶編著 時事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 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鋼筆字帖 梁孔政書 中國物資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 孫子兵法與經營謀略 趙瑞民、張乙辰編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 武學聖典《孫子兵法》與中國文化 龔留柱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 活用孫子兵法與經商 安平編 經濟日報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 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 公孫道明編著 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5 年 7 月
- 《孫子》古本研究 李零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7 月
- 孫子——謀略人生 熊忠武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7 月
-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 鈕國平、王福成編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7 月
- 傳世藏書 本社編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誠成文藝出版有限公司 1995 年 7 月
- 7 月
- 十家注孫子兵法譯注 盛瑞裕等注譯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 8 月
- 孫子兵法與經營藝術 張志祥編著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5 年 8 月
- 孫武演義 陳農村著 山東友誼出版社 1995 年 8 月
- 孫子兵法與公關 檀明山編著 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孫子兵法與計謀 檀明山編著 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孫子兵法與處世 檀明山編著 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孫子兵法與攻心 檀明山編著 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孫子兵法與商戰 檀明山編著 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孫子兵法》與謀略應用 黃葵編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孫子制勝術大觀——從戰場到商場 雷鳴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現代市場競爭韜略——孫子兵法的運用 舟俠主編 古吳軒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 月
- 古代謀略大全·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趙智海編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
- 月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3)

- 兵家十三經 戴龐海主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5 年 10 月 文聯出版公司 1995 年 10 月
- 八聖賢書 秦簡注譯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
- 中國兵學文化名著 雷慶主編 延邊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
- 孫子兵法與現代人際關係 舒志編著 花城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
- 商用孫子兵法 嘉斌編著 花城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

- 商戰謀略 張平等編譯 中國物資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 ·
- 孫子 袁嘯波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與現代領導科學 劉學啓主編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實用大典 劉伶主編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
- 孫子兵法與評述(英漢對照) 謝國良著 中國文學出版社 1995 年
- 孫子兵法——中國智慧之海(CD 光碟) 劉慶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 楷書孫子兵法 任明清書 原子能出版社 1995 年(重印線裝本)
-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英文版) 吳如嵩、吳顯林主編 林戊蓀英譯 人民中國出版社 1995 年
- 1996 年孫子(彩色繪畫本) 楊書案編 孫慶國等繪 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 孫子兵法 (春秋)孫武著 海天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 孫子兵法一百則(漢英對照) 羅志野選譯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6 年 1 月
-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歐陽繼波注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 孫子兵法啓示錄 馮西努著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 百子全書 張全民、閻忠譯注 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 漫畫《孫子兵法》 孟繁聰等繪 長征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 中國古代八大兵書——評說與現代社會的應用 郝莊人、粵鄉主編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年 2 月
- 孫子兵法 陳學凱譯注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2 月
- 妙算神機——孫子兵法與反盜竊鬥爭 鮑威著 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 1996 年 3 月
- 強國秘典 孔澤人主編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年 2 月
- 中國智慧精典 薛貽康等編著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4 月
- 古今中外孫子兵法實戰大觀 潘強思編著 延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4 月
- 孫子 柔然 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6 年 4 月
- 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 魯中傑著 黃河出版社 1996 年 4 月
- 孫子兵法今論 楊榮編著 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4 月
- 孫子兵法對現代戰爭的啓迪 鄧學鵬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4 月
- 中華智慧經典——孫子兵法 錢永剛、錢學智編文 戎鴻傑繪畫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6 年 5 月
- 孫子與商戰兵法 舒默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5 月
- 孫子兵法應用 466 例 陳平、燕援著 長春出版社 1996 年 5 月
- 一代兵聖——孫子 翟擎振編著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1996 年 6 月
- 企業兵法管理 周松波著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 孫子的用兵藝術 儲道立著 濟南出版社 1996 年 7 月
- 大智慧——中國十大兵書謀略指要 吳如嵩主編 中國工人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 四庫精華 黃世平主編 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9 月

孫子兵法在現代科技管理中的應用 周復元、黃鐵夫主編 瀋陽出版社 1996年9月

經文緯武七卷書·十大兵書 華鋒、王興業主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9月

孫子十三篇——用兵之法(英文版) 鐘棧譯著 新世界出版社 1996年10月

孫子兵法與商戰韜略 趙繼峰編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6年10月

孫氏宗譜世系源流 陸允昌主編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1996年10月印

商用孫子兵法 焦隆英、丘松、秋耘著 團結出版社 1996年10月

東方兵聖——孫子的智慧 舒暢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年11月

用兵經·孫子兵法 安繼民、劉國建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

孫子兵法 張弓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

兵書戰策(現代版) 吳明賢主編 巴蜀書社 1996年11月

孫子兵法與保險經營管理 程傳新著 黃河出版社 1996年11月

《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 夏書章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6年11月

孫子兵法集注 黃朴民、趙海軍點校 嶽麓書社 1996年11月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導讀 王士松、鄭冰凌主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12月

月

孫子兵法(春秋)孫武撰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年

孫子兵法(春秋)孫武撰 深圳出版社 1996年

思想家叢書 樊美筠、海童主編 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6年  
1997年

孫子 田旭東著 甘肅民族出版社 1997年1月

商髓——孫子經商兵法 何雲編著 海南出版社 1997年1月

孫子兵法五字訣 張文平編著 華文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孫子兵法與西方戰略(英文版) 陳西進等著 新世紀出版社 1997年2月

孫子兵法 孫曉玲編 華齡出版社 1997年3月

老子·莊子·孫子·吳子 黃壽成校點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年3月

#### 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4)

孫子兵法(春秋)孫武撰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7年3月

中國兵學文化 張文儒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年3月

孫子兵法解讀 吳榮政著 湖南大學出版社 1997年4月

孫子兵法十日談 戚文、周鐵強等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7年5月

孫子兵法與公安工作 孫宇著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7年5月

孫子兵法與商政謀略 王建民等主編 藍天出版社 1997年5月

孫武·孫臏 張文儒著 大象出版社 1997年5月

漫畫孫子兵法 苗中、力群改編 王志春等繪畫 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 1997年5月

年5月

吳孫子發微 李零著 中華書局 1997年6月

- 宋本十一家孫子注(影印本)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7年6月
- 孫子兵法(十集電視系列片) 李鷹、李黎撰稿 珠海出版社 1997年6月
- 孫子兵法 李鐸書 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7月
- 兵學聖典——孫子兵法 劉宋斌、游戰洪編著 九洲圖書出版社 1997年7月
- 中華四經 豐益新譯注 廣州出版社 1997年8月
- 不戰而勝——孫子謀略縱橫 張國治編著 藍天出版社 1997年8月
- 兵家鼻祖——孫子的故事 曹堯德、曹笑梅著 華文出版社 1997年8月
- 孫子兵法及其應用 范清安、曾三省主編 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 1997年8月
- 孫子兵法與行銷學 閻明恕著 貴州民族出版社 1997年8月
- 孫子兵法通解與應用 原林編著 廣州出版社 1997年8月
- 孫武本傳 周興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
- 孫武傳 劉春志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
- 白話武經七書 黃樸民譯 嶽麓書社 1997年9月
- 孫子兵法 李志清主編 接力出版社 1997年9月
- 孫子兵法(仿竹簡本) 昆侖出版社 1997年9月
- 孫子兵法民用導讀 王德志編著 中國鐵道出版社 1997年9月
- 孫子兵法(春秋)孫武撰 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7年10月
- 孫子兵法 趙智海編著 台海出版社 1997年10月
- 孫子兵法新校 [日]服部千春著 白山出版社 1997年10月
- 孫子兵法(彩繪本) 宋孟寅選譯 楊志剛繪畫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
- 孫子兵法戰術思想研究 劉樹新等著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7年11月
- 中國古代兵法四書 馮雲章等評說 山東友誼出版社 1997年12月
- 孫子答客問 楊善群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 孫子素描——兵刃上的思索 丁放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年12月
- 武經七書 毛元佑、黃樸民注譯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7年12月
- 孫子兵法與養生治病(漢英、漢日版) 吳如嵩等著 新世紀出版社 1997年1998年
- 孫子兵法(絲織版) 宋金木創制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審校 紡織出版社 1998年1月
- 世界兵學雙璧——《孫子兵法》《戰爭論》研究 薛國安著 西苑出版社 1998年1月
- 孫子兵法 郭新編 海潮出版社 1998年1月
- 孫子新傳 高友謙著 團結出版社 1998年1月
- 《孫子兵法》警官讀本 崔占國主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1月
- 兵聖孫武 王丕震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1月
- 享譽世界的十大軍事名著 袁品榮主編 海潮出版社 1998年1月
- 現代增廣孫子兵法 星斗、雍成編著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8年1月

學孫子兵法 王玉祥編著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2 月  
孫子兵法 程鬱注譯 花城出版社 1998 年 3 月  
孫子商法——孫子兵法與商戰謀略 薑瑞清編著 人民中國出版社 1998 年 3 月  
孫子兵法 (彩印絲綢本) 孫武原著 曹操等注 杭州出版社 1998 年 4 月  
孫子兵法全譯 田昌五著 齊魯書社 1998 年 4 月  
孫子兵法謀略與人民海軍海戰 王寅寶著 海潮出版社 1998 年 4 月  
爲人處世與孫子兵法 秦峰主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8 年 5 月  
現代商戰孫子兵法 劉凡編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5 月  
武經直解 蕭尙珍直解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8 年 5 月  
孫武子實用智謀大全 張建國主編 氣象出版社 1998 年 6 月  
孫子兵法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6 月  
孫子兵法 (漢英對照) 袁士楨譯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8 年 7 月  
孫子兵法與高技術戰爭 嶽永玉、梁敬民著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7 月  
孫子兵法辭典 黃葵、劉春生編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7 月  
孫子兵法與現代經濟決策 傅文章編著 中國農業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股市贏家法則 羅鐵鷹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兵聖孫武 曾廣開、盧世華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孫子兵法(插圖注解本) 曹操等注 王健整理 三秦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孫子兵法 蒲友俊評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十大軍事家 陳曉和、陳迅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5)

孫子兵法 董文武、石延傳編著 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孫子兵法 (絲印版)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審校 杭州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真與假的較量——“《孫武兵法》82 篇”風波大透視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孫子今論 邱復興著 白山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孫子兵法與市場競爭 馮星安主編 海潮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  
孫子稗疏 華星白著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  
孫子兵法與現代公安管理 劉漢文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孫武苑——’98 蘇州中日“孫子學術研討會”紀實 管正、談世茂主編 蘇  
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1998 年編印

#### 1999 年

孫子兵法 隆瑞主編 中國檔案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大謀略家 王振忠主編 遼海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孫子兵法 現代領導文庫編委會編 中國社會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孫子兵法演義 潘強思編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經商兵法 常勝編著 陝西旅遊出版社 1999 年 2 月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 楊丙安校理 中華書局 1999 年 3 月  
孫子兵法 馬一夫譯評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 年 3 月  
孫子兵法智謀三百 陳國慶主編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3 月  
孫子兵法(仿竹簡本) 孫武著 九洲圖書出版社 1999 年 4 月  
孫子兵法經營管理新解 張廣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4 月  
中國歷代兵書集成 程素紅主編 團結出版社 1999 年 5 月  
兵學聖典——《孫子兵法》 王心裁編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兵法與公安謀略 孫宇著 群眾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孫子兵法與行政管理 管正編著 白山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最新白話例解孫子兵法 杜確等編著 中國盲文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中華兵書寶庫 老根主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孫子兵法與國企攻堅 宋志勳著 中國物價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墨蹟孫子兵法 管正主編 蘇州孫武子研究會 1999 年 7 月印  
孫子兵法與商戰 阮其山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8 月  
中國孫氏世系源流 陸允昌主編 白山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兵商同法 李永生等編著 山西經濟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吳兆基編譯 京華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  
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故事 陶冶主編 遠方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  
孫子兵法及其現代價值——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黃朴民等主編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武經七書 林伊夫等注譯 齊魯書社 1999 年 11 月  
孫子兵法(黃金版) 學苑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  
孫子兵法(中法、中英、中德、中日對照) 杭州出版社 1999 年  
孫子兵法 孫武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 張輝力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9 年  
孫子兵法古今百戰韜略 陳雲金等主編 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漢英對照) 吳如嵩、吳顯林校釋 林戊蓀英譯 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老子·莊子·孫子兵法 延邊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2000 年

中國兵書十大名典(上下冊) 袁閻琨主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  
兵家智慧全書 伊力主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1 月  
孫子 黃朴民、張瓊著 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0 年 1 月  
孫子“十勝”思想與現代企業制勝 程美秀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0 年 1 月  
兵法與商戰——白話九大兵書評點本 李亭主編 京華出版社 2000 年 4 月  
孫子兵法(附孫臏兵法) 江小濤編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 5 月  
孫子兵法與現代企業競爭謀略 李永山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孫子學通論 趙海軍著 國防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孫子保險兵法 羅立著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8 月

孫子兵法的奧秘 吳學文編著 山東友誼出版社 2000 年 9 月

孫子兵法(圖文本) 張端成主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孫子兵法新解 施芝華著 學林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孫子探源 賈若瑜 國防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孫武輝煌在吳地——蘇州孫武遺址勝跡圖集 第五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宣傳組、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2000 年 10 月編印

活學活用孫子兵法 魯玉瑩編著 瀋陽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相聚在兵法聖地——第五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擷萃 管正主編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2000 年 10 月編印

孫子兵法 王峰東、玉慧等編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

孫子兵法全典 王光軍主編 印刷工業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二、論文

1993 年

“文”“武”雙聖“和”以濟“爭”——試談《孫子》和其它“武經”的文化意義 周繼旨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6)

“不戰而屈人之兵”與企業公關藝術 余以游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對“牆裡開花牆外香”的一點思考 李錦全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論孫武的經濟思想 楊善群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孫子》十三篇略說 金景芳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孫子》的決策論 黨明德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孫子》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吳如嵩、劉慶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論“君命有所不受”思想的管理理論價值——與臺灣中央大學林建煌先生商榷 李躬圃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學習研究《孫子兵法》的時代要求 劉魯民 《孫子兵法》1993 年第 1 期

第一批判《孫子兵法》的日本人 朱蘇進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韜略探源——《制勝韜略——孫子戰爭知行觀論》評介 葛玉瑩 《孫子學刊》

1993 年第 1 期

東方兵聖的最新評傳——讀《孫子評傳》 方子玉 《管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孫武之“道”論斷 劉玉民、穆成柏 《管子學刊》1993 年第 1 期

用《孫子兵法》“全爭”的觀點看蘇德戰爭初期的得失 沈志思 《蘇聯歷史問題》1993 年第 1 期

《孫子》與領導科學 唐守真等 《濱州師專學報》1993 年第 1 期

論孫子的經濟觀——兼論《孫子兵法》的現代意義 張金路等 《濱州師專學

報》1993年第1-3期

《孫子兵法》與當代經營管理 張波 《當代財經》1993年第1期

《孫子兵法》與體育競爭策略 肖威 《阜陽師院學報》1993年第1期

《孫子兵法》與現代企業管理 邱燕翎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1

期

《孫子兵法》與戰略管理 陳炳富等 《南開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

《孫子兵法》在日本的命運 朱蘇進 《世界軍事》1993年第1期

孫子，兵家文化，傳統文化 張頌之 《齊魯學刊》1993年第1期

《孫子》的軍事思想〔日〕淺野祐吾撰 屈連璧譯 《陰山學刊》1993年第

1期

《孫子集成》即將問世 劉申寧 《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

軍事歷史園地上一朵奇葩——楊善群著《孫子評傳》評介 徐德厚 《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兵法奇正論證 陳亞如 《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

詭道與企業競爭——《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 徐志清 《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

讀《孫子》劄記二題 餘毅恒 《宜賓師專學報》1993年第1期

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淺談《孫子兵法》對保密的論述和啓迪 徐保源、李霞 《南都學壇》（南陽）1993年第1期

在市場競爭中獲勝的謀略——《孫子兵法》與行銷謀略 趙芳 《山西財經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

評《制勝韜略——孫子戰爭知行觀論》 李祖德、魏富海 《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二孫子戰爭觀比較 岳玉璽 《謀略與競爭》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93年1月（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計謀、虛實、利得——《孫子兵法》在商業上的應用點滴 許振清、汪之潔 從洛陽玻璃廠的發展看《孫子》在企業中的作用 王智敏、張五勳

《孫子》與辯證管理 潘乃樾

《孫子兵法》與市場行銷 吳同光

《孫子兵法》與軍隊生產經營宏觀決策 林考誠

《孫子兵法》與搞好企業 梁樹良

《孫子兵法》與搞活大中型國營企業 虞祖堯

孫子兵法中軍事文化心理的現代管理價值 郭濟興

《孫子兵法》中的經濟管理思想 王同勳

孫子管理思想簡論 高小斯

孫武故里“惠民說”勿容置疑 王炳臣、吳學文

學習孫子兵法 加強企業管理 安民有

學古論今勇實踐 孫鴻順

兵法在深圳經濟特區企業經營管理上的運用 陳方

淺議《孫子》與企業經營管理的接緣 劉玉石

淺談《孫子兵法》的哲理思想和方法論在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應用 張曉峰

在“《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管理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鄭義堂

試論孫臏靈活機動的造勢和因勢戰術——兼論孫臏對孫武軍事地理理論的發展 劉文學、徐文

謀略思想與現代管理 常世忠、劉春德

推廣應用《孫子》的謀略思想 霍建訓、張澤田

馬來文《孫子兵法》譯本簡介 高殿芳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台兒莊會戰與孫子兵法——紀念台兒莊大捷55周年 劉蔚華 《孫子學刊》

1993年第2期

讀《孫子評傳》 木公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虎鈴經》與《孫子兵法》 毛元佑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論孫子的超前意識 孫洪敏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的哲理性及其應用價值 趙夢涵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是一部系統工程學 蕭漢明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 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7)

孫子學在俄國〔俄〕丘耶夫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轉換傳統文化機制——讀《孫子》有感 張立文 《孫子學刊》1993年第2期

劉伯承獨具慧眼的“兵勢”新論 吳如嵩、毛元佑 《軍事歷史》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與企業文化 陳炳富、倪海英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與刑事特情的用謀 李錫海 《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與吳文化 羅世烈 《四川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孫子兵學與春秋哲學政治思潮 黃朴民 《管子學刊》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美學思想初探 陳少華 《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明代《孫子》研究概說 季德源 《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對思維科學的貢獻 陳建國 《思維科學通訊》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在品質經營中的應用 余永康 《品質管制》1993年第2期

《孫子兵法》的幾個語法特點 韓曉光 《平原大學學報》(綜合版)1993年第2期

《孫子》篇目的邏輯順序探微 徐思光、張衛東 《中國軍事科學》1993年第2期

- 奇正兵略研究 盛奇秀 《山東大學學報》1993 年第 2 期
- 試論《孫子兵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運用 薛光武等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93 年第 2 期
- 經濟競爭與《孫子兵法》 楊先舉 《管理世界》1993 年第 2 期
- 內外線作戰與《孫子兵法》 趙榮 《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長沙) 1993 年第 3 期
- 劉伯承妙用“圍師必闕”戰法 崔培民 《大江南北》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兵法》與談判藝術 林勝強 《齊魯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 徐志祥 《齊魯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兵法》的幾個語法特點 韓曉光 《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兵法》的辯證思維與現代企業管理 鐘曉鳴 《安徽師大學報》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學文獻述論 於汝波 《軍事歷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研究園地中集大成性的新碩果 陳思林 《史林》1993 年第 3 期
- 從十三篇內證看《孫子》的成書時間 壽湧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批判繼承 盧秀華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毛澤東何時開始系統研究和運用《孫子兵法》 劉思起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毛澤東研究《孫子兵法》述略 孫向忠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司馬遷對研究孫武及其兵法首創之功 朱嗣廉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兵法》中的“仁”、“智”思想 孫世民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孫子軍事辯證法思想永放光輝 唐明邦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孫武破楚入郢之戰論析 孫壽寶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有德方可研兵 劉蔚華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武經七書》與中國古典兵學體系 皮明勇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第 4 期
- 談“迂直”謀略 邵斌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淮南子·兵略訓》與《孫子兵法》 丁原明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淮南子·兵略訓》論略〔日〕穀中信一撰 朋星編譯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3 期
- 善於“用間”的名將李靖——兼析孫武與李靖的用間理論 穆志超 《北京警院學報》1993 年第 3 期
- 長於戰術 短於戰略——評曹操《孫子注》 古棣、周英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不爭天下之交”辯證 楊善群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不戰”思想探源 王笑天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軍事思維特色簡析 高琨、宋立輝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譯注〉所輯〈孫子〉佚文的問題》補正 李家浩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運勢控制法——《孫子》管理控制論思想在目標管理中的應用 郭春平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祭《孫子》法寶 縛競爭蛟龍 楊先舉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曹操與《孫子兵法》 劉亦孫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粟馬肉食”與“殺馬肉食”孰是？ 朱軍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蒙文、蒙漢對照、滿蒙漢合璧《孫子兵法》簡介 高殿芳 《孫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與保險經營 李群堂等 《中國保險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在企業中的應用初探 朱建平、徐嘉恩 紹興師專學報 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思想體系新探 於汝波 《軍事歷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向經營管理的移植 吳如嵩 《中外管理》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的速戰思想與日本快速競爭戰略 陳炳富、李國津 《中外管理》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的思想方法與企業促銷方略 許茂珍 《管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8)

- 古代兵法謀略的實踐片斷——軌跡線和結合點 杜家琪 《管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企業興衰在於權謀——學習古代軍事思想的體會 陶靜山 《管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運用兵法謀略指導多元化經營 祁洪生 《管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
- 《孫子》將材論與企業家素質 楊雲 《中國企業家》1993 年第 4 期
- 評陳炳富、陳萬華《孫子兵法與管理》〔美〕法蘭克·哈伍德、潘潔譯 《南開學報》1993 年第 4 期
- 析秦對六國施行的“不戰而勝”之策 於汝波 《軍事歷史》1993 年第 4 期
- 淺談《孫子》的軍事法制思想 劉向陽 《政法論叢》(洛南) 1993 年第 4 期
- 國際廣播與《孫子兵法》 崔永昌 《國際廣播》1993 年第 4 期
- 談《孫子兵法》主動權思想與武術散手競技 萬懷玉 《瀋陽體育學院學報》1993 年第 4 期
- 《墨子》的諜報思想——兼與《孫子》比較 穆志超 《北京警院學報》1993 年第 4 期
- 古樹發新芽——評《孫子兵法的電腦研究》 謝揚 《軍事歷史》1993 年第 5

期

- 《孫子兵法》俄譯本簡介 高殿芳 《軍事歷史》1993年第5期
- 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研究 王聯斌 《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
- 淺析孫子的用人思想 孫世民 《山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
- 試析《孫子兵法》與《司馬遷》在戰爭理論上的若干差異——兼論孫武軍事思想的豐富源泉 黃朴民 《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5期
- 讀《孫子兵法》雜記 鈕國平、王福成 《西北師大學報》1993年第5期
- 領略古代兵家韜略的便捷之道——漫談“中國古代用兵韜略漫畫叢書”的《武經七書》 璞明 《中國圖書評論》1993年第5期
- 毛澤東與《孫子兵法》 孫向忠 《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6期
- 《制勝韜略》序 劉澤華 《新華文摘》1993年第7期
- 孫子雄兵決勝在今天 戴旭 《開發區導報》1993年第7、8期合刊
- 運用《孫子兵法》軍事哲學思想，推廣我院科技成果的實踐 張西盈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993年第8期
- 商業企業管理與《孫子兵法》 趙樹林等 《商業研究》1993年第9期
- 先秦軍事史研究的豐碩成果——楊善群著《孫子評傳》介評 錢宗範 《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12期
- 對《孫子兵法》文獻研究的思考 蘇桂亮、初昭倫 《東方謀略》 遼寧省兵法學會 1993年編印（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 孫子心理調控及戰術謀略在體育競技中的運用 萬懷玉、佟慶輝
- 《孫子兵法》及孫子思想具有廣泛的通用性 徐振波
- 試論《孫子兵法》在監察辦案中的運用 王學凱、馬文斌
- 日本《孫子兵法》研究家獲獎（服部千春） 張煥利 《新聞出版報》1993年1月8日第1版
- 《孫子兵法》熱 《北京青年報》1993年1月3日
- 《孫子兵法》妙用於商戰 《生活報》1993年第3月19日
- “孫子”並非萬能之神 耿建忠 《解放軍報》1993年8月18日
- 古代孫子指點現代商戰——孫子兵法與市場經濟國際研討會召開 羅小兵 《解放軍報》1993年8月18日
- 《孫子兵法》博大精深 雷鳴 《羊城晚報》1993年8月28日
- 化傳統謀略為現代經營謀略 舟俠 《中國企業報》1993年9月6日
- 中國兵書與兵學研究的新成果 趙吉惠 《光明日報》1993年11月22日
- 歷代《孫子》著述版本標注 劉申甯 《孫子與齊文化》石油大學出版社 1993年8月（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 從思維發展水準三個基本層次看《孫子兵法》的產生 燕國禎
- 孫子與齊文化 趙金炎
- 孫子與老子書中“道”——概念之意義及運用 唐亦男
- 《孫子兵法》與企業競爭謀略 孫子平、劉學田

《孫子兵法》與現代科技情報工作謀略 王德浩、葉元芳  
《孫子兵法》中的哲學思想 徐志祥  
《孫子兵法》的領導決策思想 王清江、聶景崗  
孫子伐謀思想簡論 李興斌  
《孫子故里“惠民說”新證》考辨 蘇明政  
《孫子》的認識論和辯證法思想淺析 叢領滋  
《孫子》、《管子》談兵論戰不同說芻議 於敬民  
《孫子》篇題木牘與佚文 李學勤  
孫氏武、牘《兵法》與齊文化 逢振鎬  
孫武、孫臏兵法斟兌三則 孫敬明  
孫武故里“樂安”說置疑 李祖德  
孫武故里“惠民說”的錯出原因析——兼說強加給林寶的編輯體例 侯青孔、  
鑒三  
孫、荀“壹民”軍事思想論析 劉玉明、戚俊傑  
學用《孫子兵法》，振興東營經濟 梁樹  
讀《孫子故里“惠民說”新證》有感 周維衍  
海峽兩岸孫子與齊文化學術討論會紀要 樂山、呂世志  
略論《孫子兵法》的用人思想 顏劍輝、陳其鈞  
中日《孫子》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 楊丙安 《豐增秀俊選集》 中國文聯  
出版公司 1993 年 12 月（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9)

自保而全勝 勝敵而益強 穆志超、高殿芳  
關於《孫子十三篇》作者的質疑〔日〕豐增秀俊  
《孫子》解說〔日〕豐增秀俊  
1994 年  
毛澤東對孫子全勝思想的歷史借鑒 顏劍輝、陳其鈞 《毛澤東思想研究》  
1994 年第 1 期  
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繼承和發展 夏征難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劉伯承元帥的軍事指揮藝術與《孫子兵法》研究 王德峰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與海灣戰爭 野慶裕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孫子論將〔日〕河野收撰 杜水源譯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孫子學文獻研討 於汝波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孫子略解》淺談 宮雲維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企業管理亦需“令文齊武” 駱承烈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讀《孫子》筆記 鈕國平、王福成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帥道”與“師道”——試論《孫子兵法》與教學法 王恩禦 《淮北煤師院

學報》1994 年第 1 期

論《孫子》的成書時間及文學價值 楊佐義 《長春師院學報》1994 年第 1 期

孫子的武德修養說 王聯斌 《空軍政治學院學報》1994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與生產競賽管理 張立廣 《工會理論與實踐》1994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與現代科學思維 張文儒 《北京大學學報》1994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與現代競技體育運動 宋元平 《貴州體育科技》1994 年第 1 期

期

孫子兵法與高校圖書館管理 楊桂珍 《圖書情報論壇》1994 年第 1 期

《孫子校釋》注辨疑三則 傅朝 《錦州師院學報》1994 年第 1 期

學習《孫子兵法》，提高經營決策水準 李樹生 《管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淺談《孫子敘錄》及其作者 畢庶金、石業華 《管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戰國時期《孫子兵法》流傳述論 於汝波 《管子學刊》1994 年第 1 期

試論《孫子兵法》在秦漢時期的流傳 於汝波 《軍事歷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期

讀《孫子》的門徑 習韜略的通衢——《孫子兵法辭典》評介 黃樸民 《中國圖書評論》1994 年第 1 期

從《孫子兵法》看用人之道 郭兆信、于洪亮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歷史上最早用兵法經商的人 維亮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以孫子兵法的理論奪取商戰優勢 張正清等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全爭”論新探 高銳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與戰國思想的關係〔美〕吉德爾·史密斯撰 潘嘉玢譯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與“勢”（上、下） 桂勝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的時代印記 榮斌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孫武世系之我見 穆志超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宋本《武經七書》考辨 謝祥皓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宋儒對《孫子兵法》的繼承和發展 王瑞明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淺談《孫子兵法》與金融稽核 吳存有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用孫子兵法指導企業管理與商業競爭 楊善群 《史林》1994 年第 2 期

學習的工具 知識的海洋——《孫子兵法辭典》簡介 黃樸民 《史林》1994 年第 2 期

關於“十六字訣”是《孫子兵法》具體運用的異議 徐國榮 《中共黨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世界第一兵書與經營管理體制 路若華 《管子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乃經營者之師 楊先舉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與市場行銷策略 李紀軒、李偉 《黃淮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用於體育訓練的研究 徐寶軒 《吉林體育學院學報》1994 年

## 第 2 期

《孫子兵法》對經營管理的指導意義 趙耀勳 《商業經濟研究》1994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的文學成就 萬懷玉 《遼寧大學學報》1994 年第 2 期

《孫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孫武世系考述之一 邱止戈 《軍事歷史》1994 年第 2 期

孫武乃陳國後裔——孫武世系考述之一 陳秋祥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4 年第 2 期

試論《孫子兵法》在戰國時期的傳播 於汝波 《軍事歷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試探孫子的將帥素質論 韓石萍、蘇愛紅 《洛陽師專學報》1994 年第 2 期

范蠡與孫武戰略思想的比較 薛國安 《中國軍事科學》1994 年第 2 期

談孫子兵學思想與現代理論需求的統一 姚有志 《軍事歷史》1994 年第 2 期

談《孫子》思維遷移 宋啓敏 《東疆學刊》1994 年第 2 期

勢治·法治·心治——《孫子兵法》與高校學生管理 戴奔、戴建 《撫州師專學報》1994 年第 2 期

踐墨隨敵，主隨客變 王向清 《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4 年第 2 期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0)

孫子對抗謀略與企業競爭 肖昌琦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3、4 期合刊

《孫子集成》評介 鐘心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3、4 期合刊

簡論《孫子兵法》在宏觀經濟管理領域的應用 吳學文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3、4 期合刊

魏晉南北朝時期《孫子兵法》流傳述論 於汝波 《孫子學刊》1994 年第 3、4 期合刊

孫子的著述及其釋疑 黃樸民 《北京圖書館館刊》1994 年第 3、4 期合刊

市場經濟與企業經營——《孫子兵法》學習劄記 張鍵 《中國石化》1994 年第 3 期

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四論《孫子兵法》的辯證思維 王向清 《湘潭大學學報》1994 年第 3 期

孫子兵法與市場行銷策略 李紀軒 《信陽師範學院學報》1994 年第 3 期

孫子兵法在市場行銷戰略中的應用 王林生 《湖北大學學報》1994 年第 3 期

《孫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評《孫子兵法辭典》 董志新 《晉陽學刊》1994 年第 3 期

論如何制定計策 閻勤民 《學術論叢》1994 年第 3 期

經營管理與《孫子兵法》 蔡清生 《管理世界》1994 年第 3 期

- 《孫子兵法》與市場競爭 吳德剛 《中外企業家》1994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在棋藝中的應用 於學嶺 《體育文史》1994 年第 4 期
- 孫子兵法的基本原理與工業企業的管理思想 樂平 《長春黨校學報》1994 年第 4 期
- 孫子擇將“五德”與現代領導素質 《行政與法》1994 年第 4 期
- 論球類競賽中的“奇正術” 蔡廣楣、恒築慧 《湖北體育科技》1994 年第 4 期
- 淺談《孫子兵法》與醫療保險市場的開發 官明源等 《保險研究》1994 年第 4 期
- 虛實兵略研究 盛奇秀 《山東大學學報》1994 年第 4 期
- 市場競爭中的“陷阱”戰術 歐陽盟 《東方企業家》1994 年第 4 期
- 市場經濟與企業經營——《孫子兵法》學習劄記（續） 《中國石化》1994 年第 5 期
- 《孫子兵法》與商業經營三策 阿祥 《商業研究》1994 年第 5 期
- 《孫子》的情報學思想 周維國 《學語文》1994 年第 5 期
-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研究的寶貴收穫——《孫子評傳》 劉修明 《中國社會科學》1994 年第 6 期
- 《孫子兵法》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學校思想教育》1994 年第 6 期
- 孫子兵法與名牌戰略 張仙英、劉建寧 《經濟與社會發展》1994 年第 6 期
- 《孫子兵法》中的“有形”與“無形”思想探析 馬建新 《軍事歷史》1994 年第 6 期
- 試論《孫子兵法》以“勝”為核心的戰爭理論體系 於汝波 《南開學報》1994 年第 6 期
- 孫子兵法與市場競爭謀求之管見 齊景祥、唐武文 《中外企業家》1994 年第 7 期
- 《孫子兵法》“廟算”與企業經營決策前的策劃 岳興錄 《遼寧經濟》1994 年第 7 期
- 《孫子兵法》與企業形象戰略 韓文輝 《中外企業家》1994 年第 8、9 期合刊
- 孫子兵法的領導藝術 楊善群 《現代領導》1994 年第 11 期
- 簡本《孫子兵法》的篇題與“天”、“地”含義考 周生春 《文史》第 38 輯
- 一代成語驚千載 萬世兵家之絕唱——《孫子兵法》中成語結構特點及軍事價值 黃志賢、王炳先 《東方謀略》遼寧省兵法學會 1994 年編印（以下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 關於在體育院校開設《孫子兵法》講課的嘗試 萬懷玉
- 《企業家兵法經營錄》序言 劉伶
- 《孫子兵法》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及圖書出版概述 蘇桂亮、初昭倫

《孫子兵法》的論證藝術 申天心、何柏龍

《孫子兵法》研究電腦檢索系統使用者使用說明 大連陸軍學院孫子兵法研究小組

孫子謀略在論辯中的運用 鄭鴻魁

運用孫武邏輯 探求《孫子》真諦 薑仁耕、何柏龍

學習孫子“形”、“勢”、“變”的辯證思想，實事求是地編組高炮射擊單位 童勤學

振興企業需借助《孫子兵法》 徐振波

“不戰而屈人之兵”與企業公關藝術 余以游 《兵法謀略與企業競爭》 企業管理出版社 1994年2月（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從《孫子》的知行觀談起 高泉成

古為今用見成效，增添活力立新功 張恒寶、周煥庭

古代兵法與現代企業競爭 王守志

用《孫子》的戰略眼光看中國沿海發展戰略 王坤堂

論《孫子》“君命有所不受”思想的管理理論價值 高小斯

在市場經濟中運用《孫子兵法》 張玉勳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朱曉斌

兵非益多 梁祖望

企業戰略與《孫子》軍事戰略思想 尤炯、丁暉

《孫子兵法》是競爭取勝的法寶 楊先舉

運用兵法謀略，指導企業行銷策略 王漢琪

運用《孫子》之謀，把陝西企業推向世界 王一成、薛魁

運用《孫子兵法》制定地方鋼鐵企業發展戰略 許惠祥

運用《孫子兵法》，制定實施企業發展戰略 冷少宏

#### 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1)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楊明鑫

“聲色”之變，不可勝“聽”觀 梁勳軍

吸取兵法謀略，強化企業競爭戰略 謝瓊

實踐古代兵法謀略的軌跡 杜家琪

試談《孫子兵法》的競爭思想 党伯奇

學用古兵法，依法治廠新 楊維書、徐榮福

學習《孫子》四論，搞活企業經營 虞祖堯

“擇人而任勢”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關鍵 林其鈞

擇人而任勢，如轉木石 馮厲行

詭道與企業競爭 徐志清

略論市場上的“全勝”競爭 芮明傑

“得人”思想與企業思想 白炎

靠兵法經營，蘇州交行發展壯大 邢富生  
蘇州發現孫武家譜 雲清 《浙江工人日報》1994年3月16日  
讀《孫子》的門徑 習韜略的通衢——《孫子兵法辭典》簡介 黃樸民 《解放軍報》1994年3月22日  
獨具匠心的刻意之作——《孫子兵法辭典》評介 益輝 《遼寧日報》1994年4月23日  
竹簡本《孫子兵法》 小李 《人民日報》1994年12月30日  
從孫子兵法將帥素質論看當今現代企業家的必備素質 張興義 《孫子兵法與市場經濟》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4年9月(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從孫子的角度看我國企業導入 CIS 宋榮東  
用孫子兵法理論奪取商戰優勢 張正清等  
對孫子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作用的幾點看法 王笑天  
雜於利害與趨利避害——談如何看待俄羅斯的投資環境 楊先舉、張亦雪  
兵商機遇論——關於孫子兵法的戰場、市場說 王軍  
論孫子兵法與市場競爭結合的基本要素 劉德文  
論孫子兵法在市場經濟中的應用 柏曉冬、王福欣  
孫子七字謀略——行銷經理如何應用孫子兵法 〔美〕約翰·艾黎  
孫子太極思維模式對市場競爭的指導作用 周敏  
孫子對抗謀略與生產行銷 肖昌琦  
孫子地緣戰略思想及其對我國地緣經濟的啓迪 王笑天  
孫子軍事經濟思想對當代軍事經濟研究的影響 顧建一  
孫子兵法與中國市場經濟 [馬來西亞]陳基球  
孫子兵法與市場競爭 吳德剛  
孫子兵法與市場競爭謀求之管見 齊景樣、唐武文  
孫子兵法與電視廣告 崔揚  
孫子兵法與以人爲中心的企業管理 楊春  
孫子兵法與企業文化 劉誠實  
孫子兵法與企業形象戰略 韓文輝  
孫子兵法與企業形象塑造 劉少伏  
孫子兵法與我國企業在“複關”後的國際市場行銷戰略 陳炳富、李國津  
孫子兵法與現代商戰 陳昆福、許昌嶽  
孫子兵法與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 金乃鵬  
孫子兵法與經濟謀略 曹俊明  
孫子兵法與新星鑄管聯合公司的崛起 高增廈、趙桂林  
孫子兵法中的“時、度、勢”與現代企業經營管理 江成  
孫子兵法——企業經營之道 高增廈、汪幹祥  
孫子兵法——商戰制勝之道 羅海曦  
孫子的速戰思想和日本企業的“快速”競爭戰略 陳炳富、李國津

孫子謀略在市場競爭中的應用 黃志賢

學用孫子兵法振興龍江經濟 林顯忠

商戰之經——談《孫子》對商戰的指導原則 姚平

1995 年

一卷在手，盡得孫子風流——談黃樸民著《孫子評傳》于澤民 《管子學刊》

1995 年第 1 期

廣饒歷史溯源 景以思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廣饒孫武祠簡介 任樹德、王清江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孫子與“孫子學”研究的新成就——黃樸民著《孫子評傳》讀後 興斌、華松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與人事工作領導藝術 張緒寅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與現代企業經營管理 楊亦彬、趙鋒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勢”論與黃河三角洲的開發建設 龍戰宇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孫子》有關最佳經營態勢的思路 劉玉石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試論孫子的制勝思想 周海航、施芝華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日本在諜報活動中是怎樣運用《孫子兵法》的 穆志超 《北京警院學報》1995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中的逆向思維 劉波 《昆明陸軍學院學報》1995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比喻句特色 潘天華 《修辭學習》1995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指導醫療疾病的功效 楊善群 《管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修辭藝術探微 陳炳昭 《漳州師院學報》1995 年第 1 期

孫武七世祖田敬仲完——孫武世系考述之二 陳秋祥 《蘇州大學學報》1995 年第 1 期

吳楚戰爭與《孫子兵法》之讀解 周德鈞、李本義 《湖北大學學報》1995 年第 1 期

試析孫武“伐謀”思想形成的歷史條件 林燕 《太原師專學報》1995 年第 1 期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2)

淺析孫子的運籌思想 周大雄 《湖南社會科學》1995 年第 1 期

論《孫子兵法》的謀略思想 王向清 《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5 年第 1 期

現代企業的競爭謀略——孫子兵法在市場行銷中的應用 唐小果 《山西統計》  
1995 年第 1 期

談孫武深謀遠慮因勢利導的決策思想 楊在溪 《社科縱橫》1995 年第 1 期

讀《孫子兵法》談企業管理 羅仲亨 《貴州工運》1995 年第 1 期

“智、信、仁、勇、嚴”對公安領導者素質要求的借鑒價值 李濤、劉漢文 《公安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孫子兵法》流傳述論 於汝波 《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五論《孫子兵法》的辯證思想 王向清 《湘潭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廣饒巡禮 任樹德、榮子錄 《孫子學刊》1995年第2期

《元和姓纂》“編寫體例”商兌 王瑞功 《孫子學刊》1995年第2期

《孫子兵法辭典》榮獲兩項最高獎 尙廈 《孫子學刊》1995年第2期

《孫子》“全勝略”的緣起及現代的再興 於澤民 《孫子學刊》1995年第2期

孫武產生于齊原因試析 李金海 《孫子學刊》1995年第2期

金澤文庫本《施氏七書講義》殘本考——以新發現的《孫子講義》零本爲主 [日]阿部隆一 《孫子學刊》1995年第2期

用孫子兵法探討經商規律的歷史先驅——司馬遷 張守軍 《商業研究》1995年第2期

劉帥與孫子兵法 李普 《書與人》1995年第2期

《孫子兵法》與現代市場行銷 周建民 《蘭州商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孫子兵法》與圖書館管理 匡文波 《圖書館工作》1995年第2期

孫子兵法在市場競爭中的運用 郭文才、崔欽德 《市場經濟研究》1995年第2期

《孫子兵法》決策思維原則對現代經營的啓示 吳俊明、潘德榮 《中等城市經濟》1995年第2期

《孫子兵法》研究綜述 吳如嵩 《中國軍事科學》1995年第2期

孫子兵學與古代戰爭 黃樸民 《浙江學刊》1995年第2期

孫子的“全勝”思想對公安工作的借鑒價值 李濤、劉漢文 《公安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

孫子制勝之道綜說 黃樸民 《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論孫子的戰略比較思想 閻勤民 《晉陽學刊》1995年第2期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讀兵法與經營之一 路昔華 《管子學刊》1995年第2期

周武王的“不戰而知勝”和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 宋廣梅 《開封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略論《孫子兵法》在商戰中的運用 張武華、李名波 《廣東青年幹部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

上兵伐謀——美國在海灣戰爭中對《孫子兵法》的借鑒與運用 劉思起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樂安孫氏譜·序》質疑 蘇明政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子十家注》戰例選釋 春波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子兵法》文獻研究之新成果 朱軍、陳紅、顏劍輝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子兵法》對美國陸軍空地一體戰理論的影響 [美]白恩時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子兵法指導體育競賽的戰略戰術 楊善群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子學文獻研究上的一次重大飛躍 朴民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子學文獻研讀劄記 於汝波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武祖書“食采于樂安”析 鑒三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運用“廣義量化”法研究孫子決策思想 郭俊義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論《孫子》的軍事後勤思想 陳宇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疏於校詁和考證——再評曹操《孫子注》 古棣 《孫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毛澤東對孫子全勝思想的歷史借鑒 顏劍輝 陳其鈞 《成都黨史》1995年第3期
- 兵學聖典《孫子》及孫氏家族 常征 《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
- 孫子兵法與現代鄉鎮企業的經營戰略 黃譚富 《桂海論叢》1995年第3期
- 孫子兵法在審訊對策中的運用 薛祿辰、沙萬中 《預審探索》1995年第3期
- 《孫子兵法》的系統思想與體育管理 何璽、蘇文山 《福建體育科技》1995年第3期
- 孫子學海一輕舟——評介《孫子學文獻提要》 王聯斌 《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
- 《孫子》談“兵” 於敬民 《管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子決策思想對公安管理決策的借鑒 李濤、劉漢文 《公安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 試論呂尚軍事思想對孫武的影響 李全海 《管子學刊》1995年第3期
- 孫武在吳國若干問題考述 陳秋祥 《揚州師院學報》1995年第3期
- “君命有所不受”與實事求是 王向清 《貴州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
- “君命有所不受”辯正 於植元 《中國圖書評論》1995年第3期

### 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3)

- 春秋時期外交活動與孫子軍事外交理論 吳榮政 《湘潭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 借鑒《孫子兵法》在語文教學中培養學生良好的思維品質 汪鳴 《江西教育科研》1995年第3期
- 一位日本企業家的《孫子》情結（服部千春） 尙夏、邱止戈 《孫子學刊》

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十家注》戰例選釋(二) 春波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與小本經營及經商謀略 [馬來西亞]陳正華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與毛澤東思想 於聯凱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與毛澤東抗戰時期的戰略戰術思想 王振富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與軍事認識論 張瑞忠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將之素質論 劉先廷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孫武傳記資料考證 穆志超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評關羽“武聖”之偽 駱承烈 《孫子學刊》1995 年第 4 期

從孫子的用人思想談當代體育領導素養 蘇文山等 《體育高教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中的用人思想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之比較 《江蘇社會科學》

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和商業謀略 張煥林 《領導理論與實踐》1995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論節奏與球類競賽 傅利君 《湖北體育科技》1995 年第 4 期

《孫子》“作戰”解 陳學凱 《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孫武高祖須無、曾祖無字事蹟述略——孫武世系考述之三 陳秋祥 《蘇州大學學報》1995 年第 4 期

中國《孫子兵法》和希臘《長征記》之比較 李恒 《武陵學刊》1995 年第 5 期

從《孫子兵法》中學保險競爭的經營謀略 張忠義 《保險研究》1995 年第 5 期

劉帥與孫子兵法 李普 《東方文化》1995 年第 5 期

《孫子兵法》的魅力 劉春志 《國防大學學報》1995 年第 5 期

孫子“九變”思想對公安工作的借鑒價值 李濤、劉漢文 《公安大學學報》

1995 年第 6 期

評《孫子兵法大辭典》 胡道靜 《學術月刊》1995 年第 7 期

《孫子兵法》西行記 山青 《中國圖書評論》1995 年第 7 期

帶你到智慧之河汲水——電視紀錄片《孫子兵法》問世 趙麗平 《中國廣播影視》1995 年第 7 期

孫子兵法與以人爲中心的企業管理 楊春 《中外企業家》1995 年第 11、12 期合刊

《孫子兵法》與資金投放戰略原則 劉志遠 《財會研究》1995 年第 12 期

大氣莊重的《孫子兵法》郵品 魯宣 《集郵》1995 年第 12 期

《孫子兵法》郵票主創人員訪談錄 張玉文 《集郵》1995 年第 12 期

《孫子兵法》對於現代教育的意義 佚名 《內蒙古教育》1995 年第 12 期

論春秋孫武非齊國陳書之後——對孫子研究中一個定論的質疑 壽勇 《文史》  
1995 年第 40 期

1995 年出版《孫子兵法》著作編目 尚夏 《東方謀略》遼寧省兵法學會 1995  
年編印（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芻議詭詐心理戰 耿建忠、黃志賢

《孫子兵法》與體育新聞採訪 萬懷玉

《孫子兵法·火攻篇》今用 朱忠義

孫武的“伐交”論 黃志賢

試論《孫子》謀略學對政法工作的指導意義 郭鴻翔、郭兵

楊守敬、佐藤堅司評櫻田本《古文孫子》文獻輯要 蘇桂亮

暗論《孫子兵法》人才觀 徐振波

威懾與遏制——學習《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幾點體會 葛成文

孫子十三篇全文碑勒石紀事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蘇州孫武子研究》蘇州  
市孫武子研究會 1995 年編印（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孫氏家譜尋訪記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孫武子亭建亭始末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孫武子祠考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孫武子橋、宅專訪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孫武家考 沈福昌等

孫武演兵場遺址及王妃廟、墓考 劉慎安

吳縣西山橫山島孫氏宗譜、宗祠、塞址、墓碑專訪記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南武城訪考 邱維俊

孫子兵法應用于企業管理 筱文 《人民日報》1995 年 2 月 1 日

不同凡響的《孫武》 范傳新 《解放軍報》1995 年 2 月 7 日

用孫子兵法學中國交際 魯法譯 《參考消息》1995 年 4 月 29 日

扶孫武上馬——《孫武》 侯健飛 《文藝報》1995 年 5 月 6 日

詩具史筆，史蘊詩心——評長篇小說《孫武》兼談歷史小說的創作 陸文虎  
《文藝報》1995 年 5 月 6 日

春夢秋尋——評長篇小說《孫武》 丁臨一 《文藝報》1995 年 5 月 6 日

李鐸書碑《孫子兵法》 陳大鵬 《解放軍報》1995 年 5 月 19 日

回首春秋看到了什麼？——讀韓靜靈的長篇小說《孫武》 周政保 《人民日  
報》1995 年 10 月 17 日

孫子兵法的體系及其文化精神 黃樸民 《光明日報》1995 年 6 月 19 日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4)

“孫子學”辭典的奠基之作(《孫子兵法辭典》) 邱止戈 《解放軍報》1995  
年 9 月 21 日

方寸之地演繹“兵經” 孟春 《人民日報》1995 年 12 月 17 日

《孫子兵法》箋校商補 劉如瑛 《諸子箋校商補》 山東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9月

市場競爭中的《兵法》運用 王雙《現代市場競爭韜略——孫子兵法的運用》古吳軒出版社 1995年9月（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以《孫子》指導經濟競爭 周成名

以《孫子》謀略發展蘇州規模經濟的思考 楊志清

《孫子兵法》與蘇州工業園區投資環境分析 趙大生

《孫子兵法》與世界商戰的饋贈 虞祖堯

《孫子兵法》在房地產投資上的運用 楊肇鋒

《孫子兵法》的管理學價值 胡海洋

《孫子》是行銷的風帆 顧文元 《現代市場競爭招略》 古吳軒出版社 1995年9月

《孫子》將才觀對企業家的意義 諸福倫

《孫子》謀工商五法 舟紅《孫子》精要 哺育“金貓” 錢峰、舟俠孫武韜略和市場經濟的合契與分野 陸承曜、文工初探“詐謀”的商用性 蔣金生

《兵法》新論——現代市場競爭 虞先澤

企業技術進步的謀略思考 沙鎮寰

走《兵法》經營之路 李直

商戰中能否運用詭道？ 一碧

研究《兵法》指導經商 張煥林

效法“九地”取勝市場 楊先舉、許群峰

道·法·分數·形名·九變——淺論《孫子》組織思想的運用 姚怡衷

兵聖孫武 于汝波 《中華名將》 金盾出版社 1995年10月

1996年

“飛翔在歷史縫隙間的快樂之鳥”——讀韓靜霆春秋人物長篇系列之一  
《孫武》朱向前 《小說評論》 1996年第1期

對《孫子兵法》今譯的幾點質疑 厲平《參謀季刊》 1996年第1期

《孫子十家注》考辨 謝祥皓 《管子學刊》 1996年第1期

《孫子兵法》譯詞考釋四則 楊堅康 《管子學刊》 1996年第1期

論孫子“知彼”思想 顏曉峰 《管子學刊》 1996年第1期

《孫子兵法》與企業決策造勢 李亞梅、張福墀 《北京聯合大學學報》 1996年第1期，

《孫子兵法》與銀行經營 謝宏節 《安徽金融》 1996年第1期

《孫子兵法》向現代領導科學移植例釋 高自有 《領導與管理》 1996年第1期

孫武論將的素質論 劉先廷 《軍事歷史研究》 1996年第1期

試析《孫子兵法》的資訊觀 傅威、冷一江 《山東圖書館季刊》 1996年第1期

- 淺論孫子兵法與思想政治工作 劉益陽 《疏導》1996年第1期
- 試談《孫子兵法》與籃球競技 劉希林 《山東體育科技》1996年第1期
- 《孫子十家注》考辨(續) 謝樣皓 《管子學刊》1996年第2期
- 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管理 暴奉賢 《經濟與發展》1996年第2期
- 《孫子兵法》與領導之道 宋有 《理論探討》1996年第2期
- 孫子其人其族墓考論 褚良才、徐楓 《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
- 《孫武》導演闡述 徐康 《歌劇藝術研究》1996年第2期
- 走進歷史，呼喚和平——我對《孫武》的審視 戴曉權 《歌劇藝術研究》1996年第2期
- 作曲家的幸運——歌劇《孫武》創作隨筆 崔新 《歌劇藝術研究》1996年第2期
- 歌劇《孫武》座談會紀要 江蘇省歌舞劇院 《歌劇藝術研究》1996年第2期
- 孫武兵書審美風致論 虞德懋 《揚州師院學報》1996年第2期
- 隋唐五代時期《孫子兵法》流傳述論 於汝波 《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論《孫子兵法》中的“率然功能觀” 鄒益華、徐偉榮 《領導科學論壇》1996年第2期
- 試論《孫子兵法》中的倫理學思想 劉向兵、張躍進 《科學·經濟·社會》1996年第2期
- 毛澤東讀《孫子兵法》 夏征難 《燧石》1996年第2、3期合刊
- 毛澤東詩詞中的孫子兵法 劉濟昆 《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3期
- 五德皆備，可為大將 路若華 《管子學刊》1996年第3期
- 孫子所述領導者的基本素質系統 韓石萍 《管子學刊》1996年第3期
- 中國古代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孫子 吳榮政 《廣西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 《孫子兵法》“而”字研究 劉光明 《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6年第3期
- 孫子——春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 吳榮政 《貴州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 形神兼備，功力不凡——讀林戊蓀譯《孫子兵法》 鮑世修 《中國翻譯》1996年第3期
- 淺說孫子與《孫子兵法》 田旭東 《華夏文化》1996年第3期
- 論孫子軍事哲學的思想淵源 吳榮政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
- 《孫子兵法》的篇序安排體現了戰爭展開的自然進程 王向清 《湘潭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 孫子的信息觀初探 韓石萍 《洛陽師專學報》1996年第4期

- 試探孫子智將論的資訊特色 韓石萍 《淄博師專學報》1996年第4期
- 論《孫子兵法》在歐美的影響 吳榮政 《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
- 論孫子戰略決策的社會考察 閻勤民 《河北學刊》1996年第4期
- “抄本《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真實性質疑 宮玉振整理 《中國軍事科學》1996年第4期
- 利害原則——《孫子》將略中的基本原則 盛奇秀 《山東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 孫子兵法在現代商戰中的運用 冷崇總 《企業經濟》1996年第4期
- 淺析《孫子兵法》對稅收工作的啓示 馬世榮 《財政研究資料》1996年第4期
- 淺談《孫子兵法》與教學藝術 王先山 《聊城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
- 《孫子兵法》在西方國家的傳播與影響 慧敏 《華人之聲》1996年第5期
- 兵聖孫武的兩部兵書 呂萬星、張山河 《報刊之友》1996年第5期
- 張瑞璣祖孫四代收藏書理《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軼事——訪張瑞璣孫女張愛玲、孫女婿呂效祖 薛耀■、來明善 《報刊之友》1996年第5期
- 試論《孫子》的軍事情報思想 任俊爲 《現代情報》1996年第5期
- 《孫子兵法》中的公關思想 王保義 《淮海文匯》1996年第6期
- 《孫子兵法》中擇人任勢思想探析 程美秀 《管理現代化》1996年第6期
- 《孫子兵法》軍事認識論思想淺析 張瑞忠 《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6年第6期
- 孫子的慎戰原則與現代經濟決策 孫光禮、曹智英 《湖北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
- 釋《謀攻》中的“能” 吳延陵 《求是學刊》1996年第6期
- 《孫子兵法》原理在班級管理中的應用 杜元偉 《山東教育》1996年第7、8期合刊
- 《孫子兵法》與現代領導者的素質 郭曉君 《江西社會科學》1996年第8期
- 孫子的“師克在和”思想 劉學啓 《發展論壇》1996年第8期
- 散佚近二千年的《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發現 楊才玉 《收藏》1996年第10期
- 服部千春與《孫子兵法》 尙夏、邱止戈 《人民中國》(日文版)1996年第11期
- 民國時期《孫子》研究述略 蘇桂亮 《東方謀略》遼寧省兵法學會 1996年編印(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 《孫子兵法》詞義疏證十則 穆志超
- 孫武“兵者,國之大事也”戰爭觀與高技術戰爭觀念發展的新趨向 王炳先

孫武“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論與高技術戰爭“知彼法” 黃志賢  
略論孫子軍事哲學思想 邱復興

偽造文物等於篡改歷史——專家呼籲：徹底澄清“《孫武兵法》八十二篇”  
作偽真相 《北京青年週報》1996年第47期

極富魅力的“第二課堂”(孫子兵法) 徐小勇 《中山大學校報》1996年1  
月22日第2版

談造勢 鄭繼文等 《解放軍報》1996年2月6日

武學聖典——《孫子兵法》 龔留柱 《光明日報》1996年2月13日

《孫子兵法》與世界性商戰(下篇)——孫子的思想原則 虞祖堯 《中國企業  
報》1996年7月15日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發現 孟西安 《人民日報》1996年9月18日

破譯《孫子》之謎 彭洪松 《今晚報》1996年10月5日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發現始末 楊才玉 《解放軍報》1996年10月11日

關於《孫武兵法發現記》一文的說明 《北京青年報》1996年10月14日

祖孫四代護國寶 孫武兵法今揭秘 王兆鱗 《中華週末報》1996年10月18  
日

西安發現《孫武兵法》八十二篇 楊才玉 《光明日報》1996年10月20日

撲朔迷離辨“兵法”——專家對“抄本”《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提出質疑 緯  
零 《科技日報》1996年11月17日

辨“兵法”真偽 明事實真相——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部分專家駁疑“抄本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 達甲 《光明日報》1996年11月19日

談造勢 李吾田 《解放軍報》1996年11月26日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真乎？偽乎？ 黃樸民 《文匯報》1996年11月29  
日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純屬偽造 本報記者 《中國文物報》1996年12月8  
日

尋訪“兵法新發現”的真偽 黃樸民、仲偉民 《文匯報》1996年12月13  
日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考偽 吳九龍 《光明日報》1996年12月17日

是真是假《孫武兵法》 曾偉 《北京青年報》1996年12月24日

1997年

想像的限度 葛兆光 《中華讀書報》1997年1月1日

郭化若與孫子兵法 吳如嵩 《解放軍報》1997年1月6日

孫子兵法研究的最新發現 房立中 《陝西日報》1997年1月13日

一位研究《孫子兵法》的外國人(高利科夫斯基) 朱富賢、曹慧清 《人民日  
報》1997年3月21日

歷史豈容隨意篡改——《孫武子全書》考偽 吳九龍 《中國軍事科學》1997  
年第1期

對《孫子兵法》中戰國時期兩個論述細節的考證——關於《孫子兵法》《九地篇》中“四五”和《用間》篇中前人未涉內容的解釋 [波蘭]高利科夫斯基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 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6)

《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真偽 黃朴民 《文史知識》1997年第1期

《孫子兵法》與“資訊戰方略” 黃棟甲 《參謀學刊》1997年第1期

《孫子兵法》決策理論的科學價值 徐學軍、陳炳富 《南開經濟研究》1997年第1期

《孫子兵法》語言藝術探微 徐維、趙月新 《修辭學習》1997年第1期

孫子是世界上首先揭示戰略戰術奧妙的大軍事家 吳榮政 《湘潭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孫武軍事經濟思想評析 潘明德 《武漢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吳文化與《孫子兵法》散論 徐同林 《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淺析《孫子》“詭道”與“仁道”的辨證統一思想 孫世民 《管子學刊》1997年第1期

淺談毛澤東“造勢”的謀略藝術 魏國富、張偉 《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1997年第1期

淺談《孫子兵法》戰略管理模式探索 陳炳富、邱昭良 《國際經貿研究》1997年第1期

《孫子兵法》版本源流考略 《圖書館》1997年第2期

孫子兵法的精算智慧 孔維勤 《中國科技產業》1997年第2期

孫子的軍事情報思想 吳榮政 《貴州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試論《孫子兵法》中的認識論思想 紀光欣、馮啓海 《齊魯學刊》1997年第2期

《孫子兵法》及其語言藝術探微 徐維、趙月新 《武警技術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

《孫子兵法》中的對策思想 張守一 《開發研究》1997年第3期

《孫子兵法》軍事管理系統論 程梅花 《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

《孫子兵法》評述 何香枝 《福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當前《孫子》研究中若干問題釋疑 徐勇 《歷史教學》1997年第3期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作偽的破綻 張景賢 《歷史教學》1997年第3期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系托古偽書 羅樹偉 《歷史教學》1997年第3期

對“《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意見 王連升 《歷史教學》1997年第3期

我對抄本“《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看法 王玉哲 《歷史教學》1997年

### 第3期

運用孫子兵法搞好財務決策 袁功甫 《貴州商業財會》1997年第3、4期合刊

《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思想 張再林 《西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孫子》真偽及價值 黃樸民 《煙臺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孫武與孫文世系源流考論 褚良才 《杭州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

《孫子兵法》倫理思想探析 常守桂 《攀枝花大學學報》(綜合版)1997年第

### 4期

《孫子》對周朝兵學的批判與繼承 劉慶 《管子學刊》1997年第4期·

《孫子》“形”義辨 黨軍旗 《山西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孫武遏制戰爭謀略思想初探 李元奎、尹新建 《參謀學刊》1997年第4期

《孫子兵法》與現代競技體育運動的共性 宋元平 《浙江體育科學》1997

### 年第4期

優勢理論——《孫子兵法》在現代企業經營中的用武之地(上) 吳稼祥、季桂平 《方法》1997年第5期

中國古代兵法與毛澤東的軍事藝術 王學堅 《昌濰師專學報》1997年第6期

孫子兵法與商戰 程振清 《甘肅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

《孫子兵法》與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 餘德仁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孫子兵法與高校管理 鄭偉鵬 《麗水師專學報》1997年第6期

《孫子兵法》對班主任工作的啓示 廖象勝 《浙江教育科學》1997年第6期

《孫武》的悲劇意識 夏菁 《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論加強公安民警的謀略素質 孫宇 《警官學報》1997年第6期

虛虛實實話“造勢” 賈宋智、單愛東 《思維與智慧》1997年第6期

公安謀略探討 孫宇 《雲南警學》1997年第7期

深邃的哲理于平易的述說中——談談電視系列片《孫子兵法》的藝術表現 王燦坤 《電視研究》1997年第7期

再說“《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系托古偽書 羅澍偉 《歷史教學》1997年第10期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曆法質疑 陳美東 《歷史教學》1997年第10期

疑似之跡 不可不察 倪金榮、師迪 《歷史教學》1997年第10期

近二十年來孫子研究述評 璞明 《文史知識》1997年第11期

再談“《孫武兵法》82篇”作偽的破綻 張景賢 《歷史教學》1997年第11期

《預示》篇考偽 冷銳 《歷史教學》1997年第12期

簡論《孫子兵法》在“戰略管理會計”中的應用 餘緒纓 《會計研究》1997年第12期

《孫子兵法·九地篇》校勘舉隅 周幹■ 《文史》1997年第42期

銀雀山漢簡《吳問》撰寫年代考辨 壽湧 《文史》1997年第43期

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的現代價值 姜國柱 《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冬卷(總第18期)

已故書法家程可達楷書《孫子兵法》墨寶傳世 沙鎮寰 《蘇州孫武子研究》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1997年編印(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 1993--2000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7)

《左傳》中的戰爭記載與孫子軍事思想的淵源 婁家驊

孫子文化與吳地經濟 舟俠

《孫子兵法》與商務談判 姚依哀、葉勇

《孫子兵法》在經濟領域應用論著目錄 蘇桂亮

孫權佚文《天子自序》考辨 陸允昌

孫武兵書美文風致散論 虞德懋

孫武隱居地之初探 談世茂

初探《孫子兵法》與行政管理 管正

論《孫子兵法》戰爭理論體系 於汝波

論《孫子兵法》的軍事心理思想 朱永新

吳楚吳越之戰與水軍 廖志豪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大事記 鎮寰、陸清

蘇州新區恢復孫武子橋名 沙鎮寰

蘇繡藝術博物館繡成《孫子兵法繡冊》 沙鎮寰

略論《孫子兵法》關於兵民在戰爭中地位與作用的基本觀點 黃士林

集兵典、書法、刻石藝術的大成——《孫子兵法》全文碑誕生記 沙鎮寰

簡論“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蘇氣誥

毛澤東讀《孫子兵法》 夏征難 《解放軍報》1997年5月5日

《古文獻研究叢書》總序 裘錫圭 《光明日報》1997年6月9日

《李鐸書〈孫子兵法〉碑拓全集》首發式舉行 陳大鵬 《解放軍報》1997年8月29日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證偽 於汝波 《中國文物報》1997年11月2日

感受創世之作的分量 李黎 《中國電視報》1997年第50期

### 1998年

《孫子兵法》與行銷戰略管理 牛寶保、陳炳富 《河南社會科學》1998年第1期

《孫子兵法》的光輝普照全球 高殿芳 《軍事歷史》1998年第1期

《孫子兵法》的戰術思想體系 葛榮晉 《管子學刊》1998年第1期

《孫子兵法》縱橫談——從海灣戰爭的“聖典”現象談起 《昆明陸軍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

孫武故里考析 宋書其、楊祥林 《山東社會科學》1998年第1期

兩千年的謀略溝通——毛澤東與《孫子兵法》 于澤民 《黨史縱橫》1998年1期

把《孫子兵法》的研究和運用推向21世紀 閻明恕 《貴州文史叢刊》1998年第1期

《孫子兵法》與經營管理 嶽輝 《商業文化》1998年第2期

《孫子兵法·計篇》歸要與解說 單秀岩 《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

《孫子兵法》對實施資訊戰仍有指導意義 施芝華 《參謀學刊》1998年第2期

孫武籍貫考 蔡瀛海 《志與鑒》1998年第2期

解讀古代戰略戰術奧秘的力著——評《孫子兵法解讀》 陳小波 1998年第2期

先秦諸子關於“轉化”及“轉化條件”問題初探(老子、孫子、韓非) 馬煥龍、霍豔霞 《河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一國兩制”構想與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施芝華 《空軍政治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

《孫子兵法》Giles譯本譯誤分析 羅建軍 《青海師專學報》1998年第3期

《孫子兵法》與軍隊建設 葛榮晉 《唐都學刊》1998年第3期

《孫子兵法》煉句析 徐同林 《修辭學習》1998年第3期

孫子“將備五德”與企業家素質(之一) 孫光 《丹東師專學報》1998年第3期

孫權佚文《天子自序》考辨——兼評序文的史料價值 陸允昌 《管子學刊》1998年第3期

孫武事略 鹿勇 《辛亥革命研究動態》1998年第3期

吸取《孫子兵法》精華，促進新時期軍隊建設 吳如嵩等 《中國軍事科學》1998年第3期

略談孫子兵法的哲學思想 馬數鳴 《徽州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從孫子的“用兵之法”到毛澤東的“戰爭指導規律” 溫鏡明 《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1998年第4期

《孫子兵法》與英語教學 貝昱 《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孫子兵法·作戰篇》解說 單秀岩 《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孫子兵法》的安全觀及當代價值 陳舟、丁文宏 《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曲經通幽——《孫子》教理領悟 李誠忠 《教育科學》1998年第4期

《孫子兵法》的世界性傳播和重大現實意義 王志華 《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

報》1998 年第 4 期

論《孫子》 盛瑞裕 《華中理工大學學報》1998 年第 4 期

論《孫子兵法》的勝負觀與市場競爭 寇小萱 《天津商業學院學報》1998 年第 4 期

《孫子兵法》軍事情報思想初探 孫建民 《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8 年第 5 期

孫子奔吳動因新論 劉博 《中州學刊》1998 年第 5 期

“君命有所不受”與下級服從上級 王向清 《鐵道師院學報》1998 年 第 5 期

文武兼備，珠聯璧合——從《孔子》到《孫子》 牛運清 《影視文學》1998 年第 6 期

成功的啓示——觀大型電視連續劇《孫子》 陳寶雲 《影視文學》1998 年第 6 期

淺談《孫子兵法》對海軍建設的指導意義 余祝明 《海軍學術研究》1998 年第 6 期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8)

本世紀孫子研究概述 樸民 《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 年第 8 期

試論學校圖書館館長的素質修養——從《孫子兵法》說開去 蔡文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 年第 19 期

孫子兵法 82 篇揭秘 俞戲堯 《山西文獻》1998 年第 51 期

登山之路不一 望巔之目相同——服部千春與《孫子兵法》研究 劉春生 《中華讀書報》1998 年 4 月 22 日

兵家韜略精髓 民間智慧結晶 王定烈 《解放軍報》1998 年 5 月 15 日

全彩印絲綢版《孫子兵法》出版發行 盧雲 《新聞出版報》1998 年 5 月 19 日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答問 褚良才 《陝西日報》1998 年 8 月 7 日

孫子的全勝思想與國際安全 李炳彥 《中國國防報》1998 年 11 月 24 日

1999 年

中國古代“統體”思維及其在古典戰略研究中的運用 於汝波 《南開學報》1999 年第 1 期

從《左傳》看《孫子》“革車”的本意 壽湧 《文史》1999 年第 1 輯(總 46 輯)

走向安國、人道與和平——《孫子兵法》道德資源對現代世界文明的價值 王聯斌 《軍事歷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春秋時期諸子學說對《孫子兵法》的影響 曾廣開 《周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 年第 1 期

勢域·生死·天時——論《孫子》思想方法的特色 陳延年 《寶雞文理學院學

報》1999年第1期

對《孫子兵法》文化遺產與跨世紀國際安全的幾點思考 李際均 《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孫子兵法在企業行銷中應用的幾個問題 胡樹紅 《蘭州學刊》1999年第1期

《孫子兵法》論戰與足球競賽 蔡永勇 《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孫子兵法》唯物辯證思想芻議 楊振溟 《貴州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孫子·虛實篇》“以吾度之”語解 王家祥 《文獻》1999年第1期

“不戰而屈人之兵”與資訊化戰爭 王保存 《中國軍事科學》1999年第2期

切磋兵學聖典精義，共謀國際安全宏圖——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主要觀點綜述 黃樸民 《中國軍事科學》1999年第2期

對《孫子》文化遺產與跨世紀國際安全的幾點思考 李際均 《中國軍事科學》1999年第2期

《孫子》與當代核威懾戰略 盧浩衷、張進喜 《中國軍事科學》1999年第2期

孫子的“伐交”思想與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糜振玉 《中國軍事科學》1999年第2期

孫子的“戰爭與經濟關係論” 劉先廷 《中國軍事科學》1999年第2期

論《孫子》國家安全戰略觀與我國的國家安全戰略 俞世福、韓曉林、張慶彬 《中國軍事科學》1999年第2期

《孫子兵法》的表述策略 傅明 《錦州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孫子》“而”字用法辨析 陳志明、晉月愛 《山西師大學報》1999年第2期

淺談《孫子兵法》在氣象保障中的運用 沈永偉 《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2期

從孫子到資訊戰 史越東 《現代軍事》1999年第3期

孫子兵法與公安謀略 孫宇 《警官》1999年第3期—12期連載

孫子的“道勝”思想與經濟管理 程美秀 《管子學刊》1999年第3期

《孫子》研究文獻鉤沉(八則) 於汝波 《管子學刊》1999年第3期

孫子慎戰思想及其現代價值的再認識 單秀法 《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中國孫子學史》弁言 於汝波 《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孫子兵法》研究新觀點擷英 施芝華 《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孫子》絢爛多彩的中國古代軍事思想 盧冀平 《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論《孫子兵法》對中國古代軍事謀略學的構建 李興斌 《軍事歷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關於“孫子學” [日]服部千春 《浙江大學學報》1999 年第 4 期

兵聖孫武子乃齊將田開 褚良才 《浙江大學學報》1999 年第 4 期

論《孫子兵法》對古典軍事學的貢獻 陳學凱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99 年第 4 期

說“四五者，一不知” 王永祥 《湖北三峽學院學報》1999 年第 4 期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何炳棣 《歷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孫武及其軍事思想 楊劍 《史學月刊》1999 年第 5 期

《孫子》全勝思想新探 張永紅 《文史雜誌》1999 年第 6 期

論孫子計謀在企業決策中的應用 曹金豔 《遼寧行政學院學報》1999 年第 6 期

孫子謀略思想在高科技戰爭中的價值 於澤民 《國防大學學報》1999 年第 7 期

論孫子的國防觀及其對當代的啓示 劉春志 《國防大學學報》1999 年第 9 期

孫武子史料論述輯錄 陸允昌 《蘇州史志》1999 年

用《孫子兵法》譜寫和平樂章 俞學標、李志剛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9 年 1 月 7 日

把《孫子兵法》課開進公安課堂 張放 《法制日報》1999 年 5 月 8 日

上馬迎敵焰 下馬治兵書——訪《孫子》譯注者郭化若 魏猛 《一代儒將——郭化若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9 年 1 月（以下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19)

半個世紀以來孫子研究的旗手 畢建忠

《孫子兵法》：友誼的紐帶 [日]阿竹仙之助、周季華

我與郭老的一段書緣 李劍雄

我黨我軍研究孫子的拓荒者 樊吳

郭化若同志在軍事科研領域的傑出貢獻(三) 薑思毅、譚一青

郭老推動我研究《孫子兵法》 高殿芳

追憶郭化若將軍閣下 [日]服部千春

研究《孫子兵法》的泰斗 趙勇

梅嶺飛雪 廣陵繼絕動地歌 韓升

緬懷儒將郭化若 吳如嵩

山東省惠民縣人民政府致詞 步兵 《孫子兵法及其現代價值——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不戰而屈人之兵” 與資訊化戰爭 王保存

不戰而勝與香港回歸 邱羽潔

五行學說與兵學謀略 李如龍

“五事”新探 季德源

中西軍事戰略傳統差異攝要 姚有志

中國古代“統體”思維及其在古典戰略研究中的運用 於汝波

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周邊事態)[日]新井鐘次郎

毛澤東與孫子兵法 譚一青

從《文選注》看《孫子》成書的淵源 黃樸民

《文心雕龍》裡的兵略思想 林中明

世紀之交的海洋具有典型的“爭地”地理戰暗意義——兼議“爭地則無攻”

王寅寶

世界兵學雙璧的比較研究 薛國安

以莊子之說辨孫子之武 [美]蘇德愷

以《孫子兵法》的五事概念分析香港在世紀之交的競爭與合作 閔建蜀

民國時期《孫子》研究述略 蘇桂亮

對《孫子兵法》文化遺產與跨世紀國防安全的幾點思考 李際均

地緣戰略規律述要 糜振玉、程廣中

孫子“不戰”戰略與世紀之交的國際安全 陳少華

孫子與綜合安全——武力與福利微妙的關係 [比利時]吉期達夫·吉爾瑞茨

《孫子》中“形”與“勢”兩項概念之開展 鄭克強

孫子對資訊戰的指導 [美]喬治·斯坦因

《孫子兵法》與中國古代軍事謀略學的構建 李興斌

孫子兵法與當代軍備控制問題 趙立德、譚民

《孫子兵法》與國防動員工作 秦春、劉建武、劉建剛

《孫子兵法》與經營謀略 張志祥

《孫子兵法》與核威懾戰略研究 盧浩衷、張進喜

《孫子兵法》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戰略策略研究 馮樹梁

《孫子兵法》與知識經濟 楊少俊

《孫子兵法》與金融安全 庫桂生

孫子兵法與新軍事革命 [美]白邦瑞

《孫子兵法》對 21 世紀安全政策的導向作用 周敏

《孫子兵法》的“用間”謀略與日本諜報工作 高殿芳

《孫子兵法》的安全觀及當代價值 陳舟、丁文宏

《孫子兵法》在經濟領域的應用概述 初昭倫、尙夏

《孫子兵法》成書沿革考略 藍永蔚

《孫子兵法》的軍事文化底蘊 吳如嵩

孫子兵法的政治謀略在當今世界的運用 楊善群

《孫子兵法》戰略理論的寶庫 劉達材

孫子兵法和亞洲金融危機 龍安志  
《孫子兵法》管理思想論析 楊堅康  
孫子兵學的復興與當代戰略變革 馮海明  
孫子“伐謀伐交”思想對當代非對稱戰略的啓示 蔣磊  
孫子國防觀及其對世紀之交國家安全的啓示 劉春志  
孫子國家安全觀及其現代價值 王明亮、盧進  
孫子的“爲將之道”及其現代啓示 任力  
孫子的“伐交”思想與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糜振玉  
《孫子》的“先勝”思想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跨世紀發展 李大倫  
孫子的戰爭與經濟關係論 劉先廷  
孫子的勝負觀與國家安全觀 韓嘉禾、祁雲防  
孫子思想與現代局部戰爭的戰略運用 餘起芬  
孫子謀略思想在高技術戰爭中的價值 於澤民  
孫子慎戰思想及其現代價值的再認識 單秀法  
孫武家世考析 陸允昌  
孫武隱居著兵法地考辨 談世茂  
孫臏“戰勝而強立”與孟軻“仁政”而“五道”辨析 楊玲、王亞萍  
“兵家源于道德”辨 楊丙安  
兵法經營與蘭煉管理 張學信、周征雲  
兵法謀略對經濟運籌的意義 李鼎文  
兵經真理千古盛譽 國之瑰寶古爲今用 孫遠謀  
兵陰陽家初探 田旭東  
企業家，企業安危之主 楊先舉  
《紅樓夢》中的戰略思想與中國傳統軍事文化 [波蘭]高利科夫斯基  
先秦兵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簡論 龔留柱  
關於“孫子學” [日]服部千春  
論《孫子兵法》戰略欲望觀的內在特徵 張雲  
論《孫子》國家安全觀和我國的國家安全戰略 俞世福、韓曉林、張慶彬  
《軍志》和中國戰略文化 鐘少異  
同舟共濟開創未來——在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劉魯民

####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20)

論中國先秦兵家的戰爭哲學觀 尚金鎖、陳立旭  
論《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管理 宋開霞、邵斌  
多極化、單極化與無極化 皮明勇、王維廣、何仁學  
有關“馬陵之戰”的問題 王汝濤、薛寧東  
走向安國、人道與和平——《孫子兵法》道德資源對現代世界文明的價值 王  
聯斌

評索耶的《武經七書》英譯本 潘家玠  
圖書打假初議——談《真與假的較量》 王曉紅  
知勝的智慧——對《孫子》“知勝之通”的哲學探討 王輝青  
試論《孫子兵法》的至善觀 邵振庭、胡建明、韋取名  
試論孫子的軍事哲學思想 邱復興  
核威懾戰略的興衰與《孫子兵法》 趙德喜  
絕對戰爭向可控制戰爭的歷史轉變 彭光謙  
美國福特基金會賀詞 [美]高芙蔓  
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開幕辭 劉精松  
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閉幕辭 蔣順學  
繼承孫子思想 謀求制勝良策——對高技術戰爭中運用《孫子兵法》的思考  
李文慶

2000 年

《孫子兵法》的人才素質觀 宋協科 《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中的思維方式探析 劉瑞卿、紀光欣 《勝利油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0 年第 1 期  
《孫子兵法》的章法和語詞訓釋 傅朝、楊旭 《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 年第 1 期  
兵聖孫武 李正教、郭方亮 《春秋》2000 年第 2 期  
淺談孫子治軍原則中的軍事心理 楊曦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 年第 2 期  
《孫子兵法》詞義疏證十則 穆志超 《濟南大學學報》2000 年第 3 期  
《孫子兵法》釋疑三則 於汝波 《濟南大學學報》2000 年第 3 期  
孫武故里新說 張效忠 《石油大學學報》2000 年第 3 期  
略論《孫子》十三篇的人本思想 周曉勇 《濟南大學學報》2000 年第 4 期  
對《孫子兵法》產生時間及作者的再審視 劉劍康 《湖湘論壇》2000 年第 4 期  
毛澤東早年接觸《孫子》線索考察 董志新 《濟南大學學報》2000 年第 6 期，  
朝鮮戰場上的《孫子兵法》——朝鮮戰場以弱勝強新戰法 任旭、李士國 《解放軍生活》2000 年增刊 · ‘  
閃光的足跡——訪香港著名孫子兵法研究家方潤華先生 管正 《蘇州孫武子研究》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2000 年編印（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孫子全勝戰略論與中國的人才戰略 錢鋒  
《孫子兵法》中的戰略管理思想初探 蘇濤  
《孫子兵法·計篇》與經營戰略系統識別模型 安文、蔡紅波  
《孫子兵法》成書淵源探析 管正

《孫子兵法》和 21 世紀企業管理 徐永林、葉珊因  
《孫子兵法》的思想與商業競爭戰略 周華明  
孫子兵法研究與知識創新 姚怡衷  
兵聖堂的建築特色及文化內涵 談世茂  
蘇州應對“孫子學”研究作出更多的貢獻 費之雄  
“奇正”經營操勝券 舟俠  
知者必勝——經營之道 虞先澤  
試論孫武與伍子胥在吳的功績 廖志豪  
兵聖孫武將與雅典娜同上未來戰場——談“新軍事革命與東方謀略” 李炳彥  
《解放軍報》2000 年 2 月 15 日  
制勝的智慧——讀《兵法與公安謀略》 吳影 《人民公安報》2000 年 6 月 15 日  
連結古代經典兵法與現代企業運作 戴建兵、張蔚平 《新聞出版報》2000 年 7 月 21 日  
《孫子“十勝”思想與現代企業制勝》 楊崗 《新聞出版報》2000 年 8 月 18 日  
吳如嵩與《孫子兵法》 包國俊 《解放軍報》2000 年 8 月 2 日  
癡迷于《孫子》世界(蘇桂亮) 董志新 《中國國防報》2000 年 8 月 9 日  
孫武銅像炳照吳中 李泉田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 年 10 月 11 日  
中外專家認為《孫子兵法》撰寫地在穹窿山 顧不祥、吳旭峰 《解放日報》  
2000 年 10 月 17 日  
兵聖傳兵書 今人為今用——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在蘇州舉行 王莉、旭峰  
《蘇州日報》2000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  
《孫子兵法》成書于吳縣 吳旭峰、楊晴福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0 年 10 月 19 日  
不仿用孫子兵法應試 《參考消息》2000 年 10 月 23 日  
孫子兵法在美國大有市場——中國軍事科學院代表團訪美紀實 姚有志 《中國國防報》2000 年 10 月 25 日  
“兵經”昭日月 智慧耀古今——第五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采風 李佩東、趙忠範 《中國國防報》2000 年 11 月 8 日  
研究《孫子》成專家(蘇桂亮) 董志新 《瀋陽日報》2000 年 9 月 15 日  
讓兵聖智慧閃爍於新世紀——第五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部分專家訪談 柴永寬  
《解放軍報》2000 年 12 月 19 日  
21 世紀：擴大《孫子兵法》的和平利用 楊少俊 《相聚在兵法聖地——第五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擷萃》 蘇州市孫武子研究會 2000 年 11 月編印(以下論文未注出處者，與此同)

1993--2000 年《孫子兵法》研究論著(21)

中國古代大一統思維與維護國家統一戰略 於汝波

邁向 21 世紀的《孫子》研究 吳如嵩

孫子不戰思想對 21 世紀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影響 吳克銓、虞先澤

《孫子兵法》與 21 世紀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思考 李文慶

孫子兵法與未來 [馬來西亞]呂羅拔

孫子兵法中的“法”與開發區的法制環境建設 趙大生

孫子兵法運用于行政管理初探 管正

孫子“同舟而濟”思想對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的啓示 李鼎文

孫子突襲速勝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邱劍敏

《孫子》談判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指導意義 周敏

孫武在蘇遺址勝跡雜詠 樊泱

孫星衍的孫子祠情結 潘家玠

兵法十三篇誕生於吳地 談世茂

全球化中的“稱勝”之道 庫桂生

學習孫子“先為不可勝”的思想 [美]白邦瑞

經營乃企業大計 [日]服部千春

新千年開啓之際的戰爭哲學思考 姚有志

新中國《孫子》研究五十年 蘇桂亮

《孫子兵法》成書淵源探析 管正 《傳統文化研究》(第 8 輯) 白山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族譜研究隨筆 陸允昌 《傳統文化研究》(第 8 輯) 白山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